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五 2023.01

小鸟文学编辑部年度书单

曾梦龙《断联和连结，社会学如何看待抑郁症？》 | 小鸟访谈

易小荷《我要划着我的桨》 | 非虚构图书馆

皮拉尔·金塔尼亚《只是毛毛雨而已》 | 故事群岛





小 说

第二回 | P3 大风的日子 顾嘉怡
故事群岛 | P9 武装之家 卡洛斯·富恩特斯
P15 只是毛毛雨而已 皮拉尔·金塔纳

非虚构

非虚构图书馆 | P19 我要划着我的桨 /
P23 盐约 /
P33 有谁在釜溪河看见过鲑鱼 易小荷
生活亲历者 | P43 黄金海岸：中非跨国掘金者的暗流 在场
P51 驾驶我的车，拿起我的笔 沈非
局外人 | P55 那天晚上，我发现了三四十年前中国人的聚餐照片 Christopher St. Cavish
发现经典 | P59 解读希特勒：背叛 /
P65 旧世界的解体 /
P73 魏玛与凡尔赛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档 案

小鸟访谈 | P79 断联和连结，社会学如何看待抑郁症？曾梦龙
小鸟年度专辑 | P87 武定路上的社会想象 伊险峰
Newsletter | P109 长久危机下的个人抉择 | 2022 年度 newsletter ①~② 曾梦龙
P119 关于书，这里有一组来自旧金山的对话 黄璐
P125 当世界似乎万劫不复，我们如何在行动中找到意义？张依依
P129 “女性、生命、自由”，2022 年小众群体动态关键词 Snufkin

专 栏

接力访问 | P133 006 里林：“我就是很想跟大家聊天呀” /
P135 007 Yuan：“我是茨威格笔下的维也纳人” /
P137 008 吴玉莲、老杨：“通过她的画，我们的感情能连接起来” /
P141 009 烟囱：“在中国这算事儿吗？” /
P145 010 王淼淼：“我有很长的人生阶段在一个深井之下” /
P147 011 陆冉：“对，就没有退休，也没有上班和下班” /
P151 012 Jiro：“我觉得今年我想要更多自由” 杨樱



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剧照

小鸟问答 Vol.25

小鸟 | 小鸟问答

“不感恩，不遗忘，不原谅。”

i

你还是会有惊喜。

比如文学作品中所刻画的人。

我们先看到了易小荷的《盐镇》，新经典发过来的样书，还没正式上市。写得很好，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国内一线作家的非虚构著作。我们觉得非虚构作家应该有她一席之地。

这是一本有关“愤怒的女性”的书。易小荷与约翰·斯坦贝克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一样：触及生活苦难的深处，抱以巨大的怜悯，爱，还有对不公正、对不平等保持愤怒。这些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仅仅感慨“命运”是浅薄的，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女性而言，愤怒的指向从来都清晰而准确。

所以请她为小鸟文学写了最新一篇——她在盐镇所遇到的仙婆们。按她的说法，写《盐镇》是一个近乎的过程——取得不同年龄段女性的信任。易小荷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而我作为读者感受到的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背景下，她们超越时间而所做的抗争何其相近，还有屈辱，何其相似。但是为什么时间被超越了？看《盐镇》会让我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无论是对国民性的挖掘，还是性别意识的自觉，都有某种呼应。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说没有什么变化，那时间都过到哪里去了？

我们会担心这超越时间的无休止的伤害和折磨，最终消耗掉我们每个人的热情和创造力。那也将是我们最脆弱与最困顿的时候。这是文学让我们感受到的事。文学，让我们保持感受力。当你看到《盐镇》这样的作品出现的时候，它让我们看到生生不息的爱与自由的能力。

按照“非虚构图书馆”的要求，我们刊登一篇原创文章，同时从《盐镇》中精选另外两篇。

ii

接力访谈已经开始。

接力本来是想以被采访者为下一个采访者，也就是 A 采访 B，B 再去采访 C，如此循环流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效率最高的是被采访者仅仅推荐 Ta 感兴趣的人，我们一路聊下去。

现在，与二十几个人聊天，各有故事，各有其精彩之处。我们所接触的大部分是普通人，生活平淡，他们如果有一个共同点的话，是对平庸生活的突破。靠专业，靠热情，靠改变生活的冲动，甚至只是靠心血来潮，靠兴致勃勃——躁起来，打破那个平衡，他们呈现给我们的是种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iii

有人在聊天过程中谈到了和这个访谈初衷相似的思考。不止一例。无论形式如何，大家似乎都想突破原子化造成的交流屏障，“让我们看到彼此”，也有人说，“追求最低限度的共识”。这很感人。如今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作为万物的尺度，在社交网络

分享所谓的个人体验，但奇怪的是，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看，个体价值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的膨胀带来的是暴戾与不信任，而不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更广泛的同理心。对陌生人的善意和好奇心，是一个珍贵的东西。

iv

当然，我们不止是寻找有趣的人，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因此能够抵抗脆弱、无趣、沉闷的生活。生活是不会一下子松动的，否则必然伴随巨大的冲击力，这个我们最近都感受到了。但是审视自己是否在过有价值的生活，随时都可以开始。

一个叫 Linna Li 的读者给我们写邮件，说她现在人在海外，半年内应该会回国。对国内种种，不只是疫情三年，无力、无奈、愤怒、惶恐，常常对着手机落泪，她说她想的也是那句话：“为什么是我走？”

与更多的人一道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v

一个月前的小鸟问答中，我们说将启用尽可能多的传播手段。

我们并没有说用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好奇心日报”这个账号是否能顺利使用。现在看应该还可以。

我们也不知道会用多久。在过去两年里，它无所作为。感谢所有一直保持关注的人。

vi

“我们过了怎样一个 2022 啊”。

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无数话都梗在喉头。但 2022 之所以是 2022，不是这一年自己就能达成的。每一次让我们内心受到冲击的事情发生，都和过去那些近乎被遗忘的日子维系在一起。我们对过往的态度和选择，决定了今天的我们。

看过一份个人化的魔都疫情总结视频，下面大部分评论是九个字，也很难得：“不感恩，不遗忘，不原谅。”

vii

这一卷中会有一些年度回顾文章，这是小鸟文学的惯例，更宽泛一点说，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保持热情、保持批判，保持愤怒的惯例。

具体来说：小鸟的编辑们会推出自己的年度书单，都是今年（同时延续了以往的兴趣）集中关注的议题。

曾梦龙会撰写一份小鸟年度访谈，核心议题是抑郁症。包括抑郁症在内，心理问题在近三年内在全球都大量增长，但在中国依然缺乏有力的公共服务和关注。这一期访谈会谈及抑郁症的现实和文化现状。

值得额外说一句的是“24 小时文学聚会”。《我们》的作者顾嘉怡发来了新作，即将发布在“第二回”栏目。如果你希望看一看 2022 年我们刊登过最好的一篇原创小说，请在“小鸟文学”里搜索《十万嬉皮》，作者是杜桥。

除了非虚构图书馆和接力访问，我们和非虚构写作平台“在场”的合作在一月还会继续，本月刊发的是 2022 年度获奖作品之一，来自人类学家谭威的《黄金海岸：中非跨国掘金者的暗流》。作者从淘金者阿伟在中非的死亡证明，写到素有淘金传统的广西小城上林，那里的男性有几乎一致的生命轨迹：离开家乡，外出淘金，父辈可能是去东北，他们则是远赴非洲。非但如此，他们吃的苦，希望享的福也大同小异。这里人司空见惯的命运，外人如你我会有怎样的解读和想象？

最后，本月的 Newsletter 都会以 2022 年度总结的形式发布。

viii

本来想改封面版式的，后来觉得现在这个用着还不错，决定延续。不过用了新的作者，美国动物学家、鸟类学家联盟创始人 Daniel Giraud Elliot。一月份的封面是红极乐鸟，极乐鸟科，极乐鸟属。

ix

新的一年开始了。这是小鸟文学的第三年。

愿我们永远不放弃自由的理想，永远不丧失自由的能力。

还有，保持愤怒的能力。这一年也许和今后很久一样，拉斯普京的书名可以借来一用，《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新年快乐各位！

与我们联络：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我们也会适时启用新的公众号。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Cici Hung on Unsplash

小说

大风的日子

顾嘉怡 | 第二回

孩子来到这世界上，是可以讨爱的吗？

从城东的火葬场开车回来，已经是夜里的十点钟。哈尔滨在下雪。鹅毛大雪，在阿什河的右岸，松花江的冰面，纷纷扬飞落下去，很快便积起来厚厚的一层。他们在殡仪馆的登记手续办得很慢，江锐扬递过去父亲的身份证、户口本和死亡证明，户口本却叫人从窗口一声不响地给退了回来，过了半晌，那边才传来个皱着眉头的男声：“我们这边现在是限制家属人数的，只有直系亲属可以留下，非直系亲属要到外面去等。”江锐扬诧异道：“我们就两个人，已经在这里排了二十几分钟了，而且你不是已经在登记了吗？”

窗口里的人抬起头来，耸了耸肩道：“我只是通知你们。”

汽车转进地库，江锐扬将副驾驶位上的人叫醒，问道：“你眼睛还那么疼吗？有没有好一点？”钟含有半边身子靠在车门上，闷着声音，心不在焉道：“好多了，不像白天时那么厉害了。”江锐扬将车停好，探身上去，仔细看过他的眼睛，轻声道：“也就是有一点泛红。”钟含只是任由他摆弄着，没有说话。后视镜旁，那一点灯光柔黄的，昏缀流泻到他们的肩膀上来。

他父亲家楼下的地库原本是连着家得乐超市的，秋天的时候，他们刚刚从南京过来，这里还总是泛着种冷冷的油腻味道，摸一摸铁门就粘上了你，非常恶心。这些天却听说居委会来人给负一楼的小门上锁了：铁链在把手上绕过三圈，有小臂粗，一路拖拽到水泥地上。那气味于是才消散得七七八八，闻不见了。

这样子其实很不方便。从超市的正门进去，查健康码的人总好盯着他们不放。那神情！人家夫妻上了四十岁早已不爱挽手，他们倒没什么变化，但是他知道钟含被看得浑身都很紧张。九十年代的时候在南京，他们才刚认识就每天都在一起。当时，江锐扬工作的“新世纪琴行”就在洪武北路上，钟含家面馆的前街，电脑城还没有遍地地开起张来，但那一带已经算顶繁华的了。每到傍晚，红庙临观音阁的一边，便会日复一日地架起个臃肿的水果摊子，把这条本就不宽敞的小街挤得更窄。江锐扬每次都送他到这里，隔着成排成列的苹果与枣子，目送他像一个精灵，很得意地穿过人群，回到家里面去。中国的城市是，哪里都差不太多。他对故乡也没有情谊，可是南京却独有的让人着迷。自己和钟含在那里想当然地吃苦、伤心，没有一次觉得要搬到外地，从头再来。最开始同居的时候，钟含还只是在金陵影城做售票员，一个月赚的才够吃饭，还要被他的父母给讨走不少。他们在三条巷的那个房间只有几平米大，和邻居两间不过是一层胶合板隔着，厨房和厕所都设在外面，没人愿意清理，凡事都需要自己动手。大风大雨的日子，天花板漏水到石灰都结了钟乳，两个人一张一张地撕了硬卡纸贴上去，窗外的雨打在防水的三色布上，像碎步的鼓点——

最讨厌的还是电话，每一次钟含他妈打电话到房东家里，老太太都风急火燎地上楼敲门。二叔来了，三叔来了，你爷爷的坟地占住了人家修路的地方。很多很多事情。电话外听得见他父亲在一旁恶着声音，而钟含用左手攥着电话，右手摆弄着电话盘茶色的按键，好像已走神儿了似的。

不需要钟含和他倾诉，也知道红庙那四面咬合的房子不是能称为避风港的地方。他姐姐离家离得早，卫校出身，有过人的逃脱意识，才毕业就投身到婚姻里去了，是一个很强硬的女人。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她便不忌讳和江锐扬讲以前的事情，她父亲是打人打惯了的，骂起人来，更是下流，邻居们三五家联合起来，竟然还盖不过他的气势。她和他卧室的那扇木门，就是钟含小时候给撞到门上的时候撞坏的，这些年没有修过，开关到一半，就会卡在原地，推拉都不管用。所以他们从小睡觉也是不关门的。

他姐姐会说：“钟含嘛，心眼是很好的。就是差在个，凡事拎不清！”她伸出手，如同指挥家对乐团做出的开始动作，用力地凌空一挥。

想一想，他是那样死心地爱着钟含。幸好是他和他永远没办法结婚，自己才可以永远像未婚的情人一样珍惜着他。那些年，两个人一起出门，每每有风吹动天空，行道树滔滔的一片树影，钟含总是快几步走在前面，他的衣裳给风吹翻了——那个是莫愁湖！这一条是南河！他们过生日从不去别处，只是早起上灵谷塔，望下去一路高高下下的桂树。而无梁殿也只不过是给他们唱歌的。阵亡将士的名姓底下，石制的大殿一点点发着冷汗，犹自阴沉着那一种民国时代的阴沉，整个南京市轻飘飘的，浮在将明的天空下面。

江锐扬父亲留下的房子在二十一楼，他站在窗边，视线被纱窗的网格切断了，而窗外面更高的住宅楼像一列整齐的水泥棺材，温暖地将他们抱在自己的阴影底下。他是出走到南方去的，二十一岁离家，二十八年只回来过九次——或者十次，他实在没有去记，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不比别家，总好像有一点夹生似的。今天从医大二院把父亲拉去殡仪馆登记，最后一眼，他目光落在那紧闭的、有一点泛青的嘴唇，想象不出来他会说的或者要说的话。只能想到很童年的清明，父亲带着他，半夜出发，一路搭公车、跨泥水，再走土路走到泥水在裤子上结痂，到石羊给母亲上坟。远远地，他看见平原上一块隆起的山包，安静地坐落在黎明的月亮下面，父亲身前。其实，微信被发明出来以后，逢年过节，他们也会打上十几分钟的视频电话。彼此说说近况，很无聊，好像还是在大学的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很讲礼貌，如同在家里的餐桌前一样。

他们打视频，钟含便枕在他和江锐扬石绿色的沙发扶手上，看无声的电视节目。他是最愿意和他回家的。更不要说新冠出现之前，每一回都是钟含张罗着回哈尔滨去。但是他父亲是节制的人，两个人回去了，他看着钟含的眼光也总是冰凉的，不会给一个脸色。

想起这些，江锐扬又开始对哈尔滨感到十分的厌恶。这房子是几年前老楼拆迁的时候新得的，自带精装，由不得选。是，这些年牺牲掉多少，想要一间栖身的屋子、有门的卧室，最后也仅仅是这样而已？那些使人看厌了的，电视剧里的装修！房子里乳白地镶银边的家具上，找不到一丁点他父亲存在过的痕迹。尽管在住进医院以前，人生的最后几个月，他一直被封在家里，等待着社区敲门送饭菜物资的小工。又或者是，父亲临终，很吃力地开口，叫他去买一罐八宝粥回来，等他买好的时候，父亲却已经死了。钟含洗好了澡，短袖短裤地走到江锐扬身边，半坐在宽大的沙发扶手上。手机的亮光很柔地照在他脸上，头发刚刚洗过，湿答答黏在一起，看不见多少白发。江锐扬将窗户关上了，问道：“看什么呢？”钟含扬起脸来，挑起眉毛，用一种十分明朗的声音答道：“胡松和我说，今晚，他们那栋楼刚查出来五个确诊，又不知道要封到什么时候去了。”江锐扬小声地骂了一句，回身道：“这到底还有完没完了？”钟含一面回着消息，一面说：“怎么办？我只能先和他说别着急了，等我们料理好这边，再回去自己开门。”江锐扬没有说话，两个人冻住了一般，都在原地。过了片刻，江锐扬才放下声音开口：“我们过了年再看。实在不行，就把浦口的那家店兑掉。”钟含没有理他，只是笑道：“你还记不得，浦口还没怎么建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散步到那边，碰见了一个算命的老头，他看了你就说，哎呀，要遇贵人，要乱发财的！”江锐扬也笑了，他说：“记得，他还说你命里没有和我的这一段，坐公交车回去的路上你一直生气，好像这话是我说的似的。”钟含又跳起来道：“他根本不是只说了这个，他说了我好多的丧气话！”江锐扬任由他拉着自己的手，任由他把自己直拉到沙发上去，忍俊不禁道：“你记性什么时候这么好了？他说的要是有一样是真的，我们都不会站在这里操心！”

他们的青春时代是一轮巨大的七彩转盘，那氛围像所有人都可以赶着上前，趁机会发达一把。但他们的起步到底是非常晚的，也没有父母买房、出力，只是两个人琢磨着怎样能养活自己。多少不安的年月！自己开琴行，五六年才开始走上坡路，除去在北京东路的主店，他们还在浦口盘下了一家分店。稳定了小十年后是不断的死结。照常开业的时候，生意也差得厉害。也知道没有人手里有钱。他们的路，一向是走得战战兢兢的。

他们在老白下的那间小公寓被封的时候，冰箱里其实并不短少吃的。两个人每天下楼排核酸的长队，一眼望过去，人人都低头划着手机，恨不能把头埋到胸口，江锐扬心里面冰凉的，不知道什么感觉。惊恐两字已忘记了怎么去写。钟含是看电影长大的，每次听江锐扬朗诵业主群里的通知，都会拧着眉头，似怒似笑地说道：“这真的不是在打仗吗？”真的不是在打仗。真的不是在打仗。但生活的滋味实在像提了满满一口袋的鸡蛋，走一条长长的、长长的土路，不知道哪里是可以停下来歇息的地方。更何况还有愤怒——但愿人真的可以提着鸡蛋打仗。

上海之后，每次去超市，钟含都会例行公事地买两盒午餐肉回来。三个月后，偶然有一天收拾柜子，一开门密密麻麻、砖头一样垒起来的午餐肉像一面矮墙，一下子翻倒了。满地的午餐肉收藏包围他们，而他们都笑了。连超市也应该来他们这里进货。那一段日子，只有钟文丽隔三差五地给他们发来消息。钟含对他姐姐很有依恋，所以更变本加厉地撒谎。他们老了，快五十岁，钟含却好像从没有变过一样。每一次江锐扬看着他趴在被子里，有一下没一下地回复着钟文丽的消息，他都会想到视频里看过的方舱：二十四小时不熄灯。

父亲还在医院的时候他们轮班倒，一个人进去换一个人出来，在医院的门口见面。很自由，他们都对着光，江锐扬在廊下，冬天的太阳只照在钟含长长的围巾尾巴上。那一天他听他说了：“你爸心里面其实很受不了，他不是唯独不愿意和你讲话的。”父亲从前在海岛上当营长，有退伍到哈尔滨的战友说要来探他的病，他一直都不同意。

等江锐扬从浴室里冲澡出来，钟含已经将卧室的灯关掉了。这间次卧的地暖有一些问

题，光着脚踩上大理石的地面，冻得厉害，觉不到一点热气。远近的车声在外面的街上，白墙白床的房间，除去床以外什么都没有，夜里躺在床上，好像躺在个简陋、逼仄的山洞里面。

钟含的呼吸浅浅的，十分均匀，但是他知道他没有睡着。东奔西走的一天，平躺下来，望进天花板才茫然想到，如今他再也没有父亲了。天大的事。那从前呢？有一回他和钟含在南京的一家面馆里吃面，两个人并排坐着，吃一碗皮肚面。这样的事情，女孩子做起来有更大的自由，换成他们便很招眼光。可他们在看电视，武侠片，看了好久，钟含却忽然转过头，悄悄地对江锐扬说道：“赵敏可真是爱他！”大雨天，电视机里的张无忌和赵敏在山谷里游荡，像一对清清白白的孤儿。江锐扬想，这个就是我们。

孩子来到这世界上，是可以讨爱的吗？有人是用来还债而有人是来讨债的，算来算去，他有的也仅仅是一方没办法下泪的书桌。他和他父亲当年日日相对的时候也很少讲话，那是个不是岩石而是生铁的家。

江锐扬轻声问道：“今天我出去买粥的时候，他有留下什么话吗？”

钟含本来是背对着他，半晌，才翻过身来，一只手点着他的胸口说：“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一直在看我。”

江锐扬重复道“在看你”钟含摇了摇头道“什么话都没说。一句话都没有说。江锐扬说“你当时在干什么？”钟含说：“我在忍眼泪啊。”江锐扬在心里笑了，可是那疲惫——他没有说话。钟含把目光搁在落地的窗帘上，很出神。江锐扬说：“那天我听见你叫他爸。”钟含拉过他的左手，黑暗中细细分析着他每一个指节似的。钟含说：“我想要让他放心。”又过了好一会儿，江锐扬听见他哑着嗓子开口：“这次和你回哈尔滨，我总是想起我外婆。小时候我一直都非常害怕，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认识过我，我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死了。我很怕你爸爸也是这样。”然后便说不下去了。

城边上公路两旁的灯光蹦跳着，雪天里游织成一条明亮的缎带。他人的命运……年青的时候，心里面的恐惧至少比现在还多，以为游水到中年，总该能找到个更加舒服的姿势，好让自己在水面上毫不费力地漂流。长久的游水能治疗心灵的刀伤。现在也发现了其实不是这样。那到了他父亲般的老年呢？大可以说，命运不是等你来捉的，但好险他们还是有可以把握的部分。有信心的时候他想，如果他们有孩子，那一定是一个另类的小孩。不是他们的这种另类，而是自在的、没有辛苦的另类。甚至是浪漫的小孩。他很希望。三十几岁的时候，在钟文丽家里看她辅导女儿的功课，每次责骂过后都要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太苦了。我们都没有喘气的时间。”她们家的装潢像整个的从欧洲古堡公主的故事里搬过来的，恨不能在家里装罗马柱。钟文丽的脸被水晶坠子的吊灯照着，无奈也显得更无奈。江锐扬又笑笑地想，是吗？我们这一代人？他看见钟含双手捧着茶杯，坐得靠后却没有倚沙发的靠背，知道他也在和自己想一样的事情。等钟文丽回过身去，给女儿改好的英语试卷签字，钟含才终于抿着嘴，转头去找江锐扬的眼睛。一下子笑了出来。那秘密的、只有他们可以听懂的语言。

当天晚上，江锐扬睡得很沉。屋里的白窗帘透光，他睡到太阳高照了也不觉得，仍然在做梦，想他童年的打雪仗，学校已放假了，他和父亲住在庆云胡同背后的那座红砖楼，从阳台上看出去，天空银丝丝的，像一只柔亮的斗篷，在大雪里不断地招挥着。

睡醒后他先看手机，已经是上午十点，微信上有姐夫和父亲过去的几个战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几个还在坚持着想过来看他——江锐扬没有复制粘贴，一个个打字回过去：谢谢您，父亲已于昨天上午……葬礼在明天早晨……给姐夫的自然亲切一些，说了一切都好，明后天处理好这边，很快就赶回南京去，不用挂念。

钟含还没有睡醒。平常都是自己起得晚些，钟含倒简直像不需要睡眠，看见他睡过了八点就要来摇他，或者索性在家里面大放音乐。王菲的“醒不来”。江锐扬每每被吵得头疼，听见这首歌又忍不住要笑，早上的时间往往就这样过去了。他一只手撑在床上，一只手去摸钟含枕头上一块扎眼的红痕，并不大，摸上去有一点发硬，是一点已经干透了的——

江锐扬上前去看他的侧脸，却发现他右边脸颊上也沾着些细小的血迹，铁锈末子似的，手一擦便掉了。

他手上的力气用大了，钟含被他弄得清醒过来，紧张道：“怎么了？”一睁眼，江锐扬便看到他右边的眼白充血得厉害，简直像被人拿玻璃碎划伤了似的。眼睛总是让人心惊肉跳。江锐扬不敢多看，只是问他：“你昨天半夜是哭了？”钟含才睡醒，见他这样紧张，自己却忍不住笑了：“我是哭了，怎么了？”江锐扬先是自己下地，又将他从床上拉了起来，柔着声音说道：“我看你眼睛有一点出血，都红了。枕头上也有。你等我套件外衣，我们上医院看看去。”

钟含惊跳起来“出血？他不再笑了，回身去找自己的枕头，然后又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镜子上有水渍，有一点浑掉了，但是他那只血红的眼睛依旧是那么显眼。“怎么会这么严重的？”钟含把左眼捂住，测试右眼的视力有没有一夜间发生变化，“这会不会是他们说的那些青光眼或者视网膜脱落之类的？但是它已经不疼了啊。”一下子，他自己也有点害怕，很快将视线从镜子前移开了。

江锐扬随便漱了下口，换好衣服，回到卫生间门口，却看见钟含依然还穿着睡衣，在打洗面奶的泡泡。他哭笑不得道：“你到底是真害怕还是假害怕？”钟含说：“我们的核酸过期了，他们要二十四小时的。”江锐扬的声音高起来：“这是要看急诊的！”钟含笑道：“所以啊，他们要对我指手画脚，我难道还蓬头垢面地听着吗？吵架有吵架的态度。”他避开自己的那只病眼，埋头洗脸。

江锐扬想，这时候如果胡松在场，肯定又有些说笑话讲。今年春天时有一次，他们找胡松来家里吃饭，胡松喝多了就指着江锐扬叫道：“你——他做了个长长的停顿，说：“你就是一个男的！”他说话时带着天津的声口，滑来荡去的，非常滑稽。钟含也喝了不少的酒，听了便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江锐扬马上转过来对着胡松，不平道：“为什么？我是男的那他是什公，难道他是个女的？”钟含抢道：“你看，你看他这个思维，除了男的就是女的——”这一回胡松没有停顿，立刻接道：“他是上海人啊。”江锐扬和胡松隔着火锅升起来的热气，看钟含在桌子的另一面争辩道：“我明明是南京人！我是南京人！”他们都笑话他。

钟含穿上毛衣再穿上大衣，俯身将下摆的褶皱抹平。才出家门，江锐扬便觉得眼眶上

凉飕飕的，有一种疼痛的预感。冬天的感觉。今天有零下二十度。电梯里钟含问他：“你想什么呢？”江锐扬偏过头笑道：“我在想胡松说你是上海人。”钟含说：“他纯粹是瞎说。”江锐扬只是依着他讲：“他这是说你时尚。”钟含笑笑地侧过头去看他，随即又转回去，正色道：“我不看你了，我这只眼睛太吓人了。”

他们先是到地下车库，却发现刚出电梯的那一道黄色铁门已锁上了。江锐扬心里已做了不好的预感，回转一楼的正门，果然看见玻璃门上贴着张小小的告示：鉴于我区不断出现输入确诊病例，多名阳性感染者轨迹涉及我区多地，存在社区传播风险，社会面传播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异常严峻复杂……经专家综合研判，十一月二十九日零时起……

江锐扬用力拍一拍门，将门外两个看守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他们同时转身，又同时搓了搓手，看着玻璃门内，两个人都有点局促的样子。

左边人上前一步，两只手在空中平挥了一下，喊道：“封控——封控管理——回去吧！”

江锐扬说：“我们有紧急情况，要去医院。”右边人喊道：“你们是一户的吗？”左边人喊道：“要去医院，你要先给医院打电话，看人家接不接受，接受的话，你再打救护车来，然后打电话给社区报备，就可以出去了。我们是做不了主的！”江锐扬冷笑道：“对，我们是一户的。”右边人喊道：“回家打电话去吧。”江锐扬说：“我为什么要去确认一家医院接不接受病人？我们自己有车的，犯不上叫救护车过来。你们把门这样子用铁链缠上，如果有紧急情况呢？”他听到自己的语言像是从哪里摘抄的。也不好张嘴就直接骂人。左边人大笑道：“你说这话，咱不是玻璃门吗？”

那惯性的、可耻的尊严：是情况还不够危急吧？不然的话。不然的话。他想起小学时老师高高在讲台之上，而自己不知道在班级里哪一排。学校有学校的规则：上课时不准讲话。他摸到有个有名的东西沉甸甸横在那里。搬不走。右边人的语气放缓了，生怕他听不懂似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们现在疫情期间，全国都是这样的，很多医院它是不接受封控区病人的，所以你……”江锐扬不再听他讲了，他拿出手机，折返道：“我先搜一下你眼睛是什么情况。”钟含冷着脸，但江锐扬感到他浑身都透着笑意。他问：“怎么了？”钟含说：“你不要和他们吵了，这些人根本就是——”江锐扬和钟含看向玻璃门外，那两个人已经重新背对他们，坐回到椅子上面了。他们身上的白色和未清扫的夜雪叠在一起，有一种默默奉献的心情。钟含摇摇头，语气像是攥紧个藏在口袋里的金铃：“楼下那个锁很好开的。”他们又回去负一层。

江锐扬和他一起跪在地上，看他将钥匙圈掰直了，专心去捅那只小铜锁的锁孔。古老的智慧。他已经给忘了。钟含父亲出车祸去世之后，曾有一次，他们一起去紫金山看钟含的外婆。当时的南京不知道在搞什么施工，那一片都被蓝色的铁皮围了起来，钟含也是这样，掏出口袋里挂钥匙的铁圈，拉直了去开小门上的锁头。钟含只是说：“这就是江锐扬。”野草下，她的坟茔小小的，淋着光在一棵大树的面前。

江锐扬笑道：“你以前是不是干过小偷啊？”钟含没有答话，将铁丝又送进去转了片刻，铜锁便“啪”的一下被打开了。他这才站起身来，满意道：“怎么样，我的手法，这些年都没有坏过！”江锐扬说：“倒是省去了和他们吵架，或者是叫什么救护车的工夫。”他们进到车里，钟含一边绑安全带一边说：“没心情和他们吵，想一想，他们这样的位子也坐不了几天。让他们威风去吧。”江锐扬犹豫道：“我不知道。”钟含将太阳穴轻轻地靠在窗玻璃上，说：“昨晚我看见朋友圈有人发，北京有好多核酸亭都已经被吊车吊走了。”

江锐扬失笑道：“什么？”钟含的声音里也听不出喜悦：“人家都说这个叫，‘终于醒悟了’。可能吧。”江锐扬冷冷地说：“至少这也算一件好事。”钟含换了种声调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南京发洪水，我们被关在家里快一个星期，两个人除了睡觉，就是在闹别扭。”江锐扬微笑道：“我记得。”钟含笑道：“还有，我在KTV上班的时候，每天凌晨你都会过来接我。我说冷，你就把外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这时候我又很烦躁，说，‘你不可这样控制我！’”他把自己学得很夸张，声音做起来，好像个动画片里的角色。江锐扬只是伸出手打他一下，不屑道：“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还记得。”

这一天，地下车库的每一个车位都停上了车。江锐扬小心地打着转向，没人阻拦，汽车从昏暗的地下，直开上车库出口的上坡，开到外面的蓝天底下。这蓝天下只有他们，而他们是悲喜剧那面目模糊、半哭半笑的脸。

江锐扬还记得那时候常常送钟含回家过节。他父母是不过问他的事的，离家两年，想起他住在哪里，依然没有印象，简直像没生过这个儿子。每次回家，钟含都盛装地，衣服像骨肉一样，将整个人撑起来。有一回江锐扬远远地看见他母亲在门口收拾纸壳，她穿了件肥厚的蓝色棉衣，一抬头，前额上便隐隐的有一块黑下去的印子。而钟含挺拔地走过去，像做慈善，但实际接下来的是他。江锐扬总会在这时想到别人说的：等你们三四十岁的时候，再回头看自己家庭的这些事情，就两样了。生命就两样了。世界是朝令夕改的。所以一到中年，每个人都会是完完整整的，像一块被晾干洗净的毛巾叠在那里。

也是别人讲：父母过世后，人在这世界上才是真的无依无靠了。江锐扬边开车边想，那他们现在才终于是真正的无依无靠了。钟含的父亲在两千年去世了。他是喝酒，骑自行车在马路上逆行，被一辆刚上路的大货车撞倒，当场便没命了。他母亲是两千零三年，江锐扬记得很清楚。在火葬场的门外等钟含，两次都是夏天，黎明的天空泛青白色，收掉了其他的光彩，天与地之间只有雨水，点点滴滴地飘落下来。网络发达起来之后，钟文丽便很爱给钟含上课，正经有一段时间，每次见面她都要搬出一个词来：“你这是讨好型人格。”钟含在她面前也并不拘着，只是哭笑不得道：“这个词好难听。”

钟文丽还会说：“我以前没少告诉过你，该断的东西断掉，人都得为自己考虑，有安生日子可过才是好的。咱爸妈那个样子，它这辈子不可能学会什么叫体贴人，它那哪是为儿女付出的人呢？”钟含会淡淡地回她：“我知道，但我总觉着——反正他们现在都已经走了。”

钟父的墓地安顿好的那天，也是下雨。一整夜，江锐扬都听见邻居家传来铁架床尖锐的晃声，一刻不停，就好像有个孩子不停地在上面起跳、下落似的。反正也睡不着。顶着夜灯，钟含收拾出家里几十上百张的扬子晚报，用剪刀将晚报橙色的中缝裁剪下来。他在收集军人俱乐部旱冰场的五折优惠券。一夜无话。江锐扬坐在一边，读他剪破了大洞的报纸：中国神舟一号无人太空飞船凌晨六点半发射升空；微软正式发行

Windows 2000 系统；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阿拉斯加航空 261 号班机事故，有两名飞行员，八十三名乘客遇难。到处都有事情发生。这旋转的、地震的世界！天擦亮后，他们带了好多的啤酒，一路骑车到象山公墓里去。

他父亲的墓做得很简单，和周围的几座没有区别，都是灰黑的大理石板，不仔细看上面的名字，没办法分辨出哪个才是他的。没有人管他们，他们简直像在河边野餐一样，不停地吵闹着。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没有很多朋友，没有非常多的朋友。不喜欢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他们在说醉话。喝过酒，钟含侧身地趴在墓碑前平放的石板上，江锐扬的右手轻轻地搭在他的手臂，他们的衣服都已经被雨淋透了。哈尔滨的街道好宽阔。人们在家里，城市便清洁到像是随时可以被打破的样子。江锐扬想到父亲家辉煌的电梯，三面有金色的花纹，地上却铺着艳红色的皮垫——唯恐外面大雪，将电梯也脏污了。生活的趣味！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那一天从象山墓园出来，江锐扬便发现自己的自行车也被偷了。其实也醉到没办法骑车，只好坐公交车回家。在公车的最后一排发抖，夏天的窗口外是水色的天。高天上有太阳，而雨只是沙沙地打在梧桐叶上。



顾嘉怡

哈尔滨人，喜欢文学，但最大的梦想是拍电影做编导。迷恋很多情绪化的作品。喜欢吃肉。

第二回

这是“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Alfonso Navarro](#) on Unsplash

小说

武装之家

卡洛斯·富恩特斯 | 故事群岛

他仍然留在军队中，
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大自然。

在马塞利诺·米雷斯将军深入格雷罗山脉 [1] 的那刻，他深知自己踏上的是什么样的土地。作为步兵部队第五营的指挥，他接受的任务十分明确：消灭所谓的人民武装“比森特·格雷罗”，他们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独立战争 [2] 中的最后一名游击队员，他于 1831 年被枪决。他们给我们上了一课，看着先头部队艰难地攀登着南马德雷山脉 [3] 的陡坡，米雷斯将军嘀咕道。

他不得不时刻劝解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民武装都会向他们投降，不会反抗。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中，这条惯例将墨西哥与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区分开来：墨西哥所有的武装力量都会臣服于公权力，臣服于共和国总统。确凿无疑。

然而，这天上午，将军对他的任务产生了一丝疑惑，因为站在反叛大军队伍之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亲生儿子，安德烈斯·米雷斯，在意识到墨西哥的民主统治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后，他就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很小的时候，安德烈斯就开始为左派的事业奋斗，当然，是在法律的框架下，期望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来达到人民企盼的目标。

“一个拥有一亿人民的国家，半数都活在贫困中。”

这是安德烈斯每天在桌边坐下，准备开始享用晚餐时会说的话，而他的兄弟罗贝托则会温和地反驳他。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而这得从维持家庭和睦开始。“以一次又一次的延期为代价？”安德烈斯反驳道，与往常一样，这天他也坐在父亲的左手边。“民主的进程是缓慢的，独裁比它要快得多。可我宁愿生活在发展缓慢的民主制度下。”罗贝托说，语气中流露出一丝知足。

“革命才是最快的，兄弟。”安德烈斯气恼地说，“要是民主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应该把左派扔回山里去。”

米雷斯将军，作为两个儿子之间的仲裁人，拥有比他们更长的记忆。他还记得那时候的叛乱，在墨西哥流淌的鲜血，人民对执政长达七十年的唯一政党 [4] 以及历任总统和平交替的感激，正是这两个先决条件，使得 2000 年政党间的民主轮替成为可能。

“轮替确实实现了。过渡倒谈不上。”安德烈斯铿锵有力地说，努力克制住自己，不用咖啡勺去敲击咖啡杯，然后，他转过身，朝向他的兄弟，“别关上我们的门。别用法律的托辞来烦扰我们。别狂妄地蔑视我们。”

“别把我们扔回山里去。”

现在，安德烈斯进了山，统领着一支只在黎明和黄昏时分发起进攻的影子大军，夜晚，他们消失在深山中，而白天，他们就伪装成普通村民，藏身在山间的村庄中。在一百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村民中辨认出一名叛军头目，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安德烈斯·米雷斯明白，在那些城里人看来，所有的农民长得如出一辙，难以区分，就像你很难把一个中国人从一群中国人中区分开来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了他——米雷斯将军——的原因。因为只有他能够认出叛军头目。

因为那是他的亲生儿子。因为在灰色的、充满荆棘的、高耸的、连能走人的路都没有一条的密林——叛乱巨大的阴影——中，没有任何拟态的力量能够为一个儿子披上连他的父亲都难以识别的伪装。

马塞利诺·米雷斯将军咬着牙暗暗咒骂着愚蠢的右翼政府，他们一扇一扇地关闭了左翼政党合法行动的门，迫害他们的领袖，通过一些急忙炮制的条文剥夺了他们的豁免权，唆使媒体发起对抗他们的运动，直到把他们逼上绝路，只能发起武装起义。

这么多年的开放与和解毁于一旦，毁在一个既无能，又深深陷入专横与虚荣的泥淖的右翼政府手中。民主体系内日益发酵的腐败切断了这条本就脆弱不堪的丝线，安德烈斯向他的父亲宣称：

“只能诉诸武力了。”

“耐心点，儿子。”

“我只是想得比你更远，”安德烈斯怀着天真，预言道，“当这条路走到尽头，当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无济于事，诸位，将军们，就不得不夺取权力，结束政府消极、轻浮的行为。”

“与此同时，我得枪毙你。”父亲严肃地说。

“确实如此。”安德烈斯低下了头。

沿着南马德雷山脉向上爬升的时候，马塞利诺·米雷斯就想着这件事。他会完成他的任务，尽管这项任务违背了他的本意。先头部队被笼罩在缠绕着攀缘植物的无味榕 [5] 和其他榕属植物 [6] 的叶片交织成的阴影下，这片阴影难以穿透，于是，他们开始挥舞砍刀，在藤本植物中间开出一条路，而这时，对儿子的爱和作为军人的义务在米雷斯将军的意识中交战，继而糅合在了一起。或许安德烈斯说的有道理，或许，反叛之人的牺牲就是换取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

只不过，换取的是什么样的和平？米雷斯将军思考着（他之所以思考，是因为他必须想些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想，这样他才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登上这座不可逾越的大山，这似乎是这个布满褶皱，如同羊皮纸一般的国家的通关口令），一座山攥紧的拳头无法容纳墨西哥。他张开手，看见他满是伤口的皮肤上扎满了刺，沾满了淤泥，仙人掌的绿刺，美洲狮的黄牙，石痕，干掉的粪便，还沾上了栖居在科阿特佩克 [7]、拉库奇利亚 [8] 和拉腾塔西翁 [9] 山脉或是迷失在这里的动物刺鼻的气味。每走一步，他都在手上寻找着某种无形的东西——反叛的军队，然而，他能够找到的只有更加具体的东西：琐碎的、具有侵略性的证据，它们证明，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击溃我们，只是因为它漠视我们。

罗贝托·米雷斯怎么可能不反对他的兄弟安德烈斯呢？将军节制地养育着他的两个儿子，却也让他们舒舒服服地长大成人。他们从来不少什么，但也从来不多什么。将军想要向他人表明，至少在军队里，容不下腐败这项作为国民消遣的活动。他是个来自墨西哥南部的、严守纪律的人，在墨西哥南部，生活的苦难和大自然的辽阔拯救或损害了那儿的人。那些坚守着最低限度的价值观的人，无论是密林、大山还是热带都无法打垮的人，自然能得到拯救。

马塞利诺·米雷斯就是这样的人。然而，自从他的上级把他从奇尔潘辛戈 [10] 调到了墨西哥城，两个儿子发展的趋势就显现出来，完全超出了父亲给他们定下的标准（他和大自然签订的条约）。

密林和大山是米雷斯将军具有讽刺意义的同盟。用刀开路，沿着山脉一路攀登，他就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游击队向来不会在正式的战斗中现身，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逃避这个任务中最核心的部分。他们只会攻打就地扎营的军队，或者在山上发动奇袭。之后，他们就会像奇美拉 [11] 一样，像模糊的镜子一般消失在密林不可思议、难以捉摸的魔法中。进攻，然后消失。提前防备是根本不可能的。过去的教训他们牢记在心。要是在今天，萨帕塔 [12] 就不会落入政府设下的陷阱中，天真地以为敌人已被击溃，只得与他相约在奇纳梅卡种植园，然而，事实上，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双重阴谋。表面上，政府军背叛了首领卡兰萨 [13]，背地里，却悄悄酝酿着对萨帕塔的背叛。

背叛就是最后一战的名字。

前一天的过分自信，逐渐过渡到了今天对天真的极度匮乏。马塞利诺·米雷斯苦涩地想着，因为如果他，马塞利诺·米雷斯，承诺给予他的儿子安德烈斯豁免权，以此来换取他的投降，他的儿子只会觉得父亲的慷慨只不过是他使的花招。儿子不信任父亲。儿子知道，父亲必须抓住他，枪毙他。

在马塞利诺·米雷斯将军率领他的军队沿着山脉一路攀登的时候，两个想法盘旋在他的脑中。一，他想到，不论是住在山上的人，还是住在平原上的人，都忠于起义军。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愿意帮助起义军，既不是因为生活所迫，也不是因为信仰。他们忠于起义军，是因为那些游击队是他们的兄弟，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他们的朋友。正是他们从事着那些再日常不过的工作，比如播种、收获，比如烹饪、跳舞，比如买卖，买卖子弹、砖坯、玉米、瓦、瓦潘戈舞的服装、吉他、陶罐，还有更多的子弹……正是这种亲缘关系使游击队变得无坚不摧，它们为他们提供住宿、吃食，以及藏身之所。

将军的第二个想法，在这个充盈着某种如同猕猴刺耳的叫声般的嗡嗡声的夜晚，云层很低，似乎马上就要将先头部队吞没，并用那嗡嗡的鸣叫声把他们逼疯，就好像那无止歇的汽笛声来自于空气中，而不是遥远、古老的海，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厌倦战争，背弃那些起义者。他祈求着这一天能够快点来到：这样以来，他就无需抓捕，并且审判他的亲生儿子了。

他立即意识到，自己是在骗自己。就算这些曾经支持过他的村庄都背弃了他，安德烈斯·米雷斯也不会轻易投降。他是那种会一直坚持将战斗进行到底的人，无论他还剩下多少人，六个，两个，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游击队队员，也就是他本人。安德烈斯·米雷斯，他因风吹日晒而逐渐沧桑的脸庞，他忧郁的双眼，他草莽一般的头发在三十岁的年纪就过早地变白了，他细高的身体，总是紧张、急躁，总是像山中的猛兽一般蹲伏着，随时准备飞扑向前。当然了，他不属于钢筋水泥的世界，他不是钢筋混凝土做成的怪物。大山总在召唤着他，它们唤醒了他心中的怀恋。小时候，在他们还住在格雷罗州 [14] 的时候，他就常常到山上去，之后，一整天都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到了夜晚，他才会回家，但怎么都不肯承认自己是迷路了。他身上一直带有一种愚蠢的，愚蠢到让人几乎有些钦佩的骄傲，这使得他打小就与他人不同。

他的兄弟是不是比他更优秀呢？罗贝托机敏，安德烈斯聪明。罗贝托喜欢算计，安德烈斯

随心所欲。罗贝托扮演一个面带微笑的骗子，安德烈斯则在一部真诚的戏剧中充当主角。两个人都是牺牲品，父亲痛苦地思忖着。安德烈斯从少年时期就受到了左翼运动的牵累。他没结婚。政治，他说，就是他合法的妻子。他有个情人，一个住在奇尔潘辛戈的少女。有时候他会去奇尔潘辛戈看她。有时候她也会来首都。安德烈斯住在将军，也就是他父亲家里，但他从没有向父亲引见过她。不是因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惯例。而是因为他爱她，不想让任何人评判她，哪怕这个人是他自己。

与此相反，罗贝托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结了两次婚，也离了两次婚了。他依照自己的想法，根据社会地位来选择妻子。刚开始他进了一家高科技公司，打算开展属于他自己的电磁仪器业务，矛盾的是，他又渴望成为一名软件大亨。然而，只能说一切进行得是不好也不坏。因此，现在，他，一个离婚了的男人，回到了家中，根据如今十分普遍的“意大利”法则，大部分时间他都尽可能地待在家中，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省下租金、饭食和需要支付给佣人的费用。他总能吸引女人，因为他是个好家伙，“帅哥”，他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只不过他从不把她们带回家，也从不提及她们。

一个女人连结起了父亲和儿子，母亲佩雷格里娜·巴尔德斯，然而，在两个孩子还没懂事前，她就死于腹痛。

“为了我，照顾好他们两个，马塞利诺。我了解你的那些纪律。但是，除了那些，也请你给予他们爱，就像你给予我的那样。”

罗贝托和他的兄弟截然不同。他的肤色更浅，绿色的眼睛中溢满了对他人的不信任，他每天都要刮两次脸，似乎是为了磨平这张脸上所有鳞状的崎岖，似乎这样就能得到他人的信任，然而，他从没有真正得到过它。

这些温馨的、对于家庭生活和家人的回忆并不能干扰将军的判断，他承认，自己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一天又一天，他们都在格雷罗山脉仔细地搜寻，将军是个有条理的人。没有人可以指责他在执行任务时马虎草率，他们在山中的每个角落搜寻着反叛者。米雷斯知道他们的付出是徒劳的。一是因为反叛的队伍规模很小，而山区辽阔无边。起义军也知道这点，因此，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将自己隐藏起来，并能够时时刻刻改变自己的位置。他们就像是散落在无边草场的细针一般。将军从山的最高处向下勘察，连一条路都看不到，更别提一整个村庄了。在整个广袤的山区，甚至看不到一缕烟，证明有人在这里生存。这片结实的密林容不下任何东西，除了它本身，那密实的、郁郁葱葱的大自然。

二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知道，他也知道。每天开始行进的时候，每一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永远找不到敌人。但没人敢大声说出他们心里的话：米雷斯将军这番徒劳无益的搜寻行动能够帮助他们避免与敌人正面交战。截止到目前他们只对野兔和黑美洲鹫开过枪。这两者的速度都快得非比寻常，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需要准头的刺激游戏。后者喜欢掠夺死兔子，从士兵的手中抢走了不计其数的战利品。

这种建立在指挥官和他的军队之间互相欺骗的协议让马塞利诺·米雷斯得到了手下人的感激，同时也规避了上级对他的训斥。他们可以随意问他手下的任何一个士兵，将军到底有没有完成在山中搜寻起义军的任务。他们可以随意去问。指挥官无罪，他的军队就不会有过。

他们就这么在山中搜寻，幽灵般地度过了六个星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将军从未料想过，他的军队也永远无法想象到的事。

在山中搜寻了三个星期后，米雷斯将军和他的士兵在奇尔潘辛戈安了营扎了寨，这时，他们觉得三个星期以来尽职尽责的表现能让他们过上几天轻松的日子。尽管将军清楚，他的军队和他一样，都知道游击队员根本不会出现在山中，他们沿着山脉不辞辛劳地攀登和搜寻，只是为了不让自己获罪，但他仍然担心：要是，此刻，起义军逃向高处，出现在他们面前，要是将军和他的军队就在这里抓获了他们，那会怎么样？

就算这种矛盾的想法不停地在米雷斯和他的士兵头脑中打转，无论是米雷斯将军还是他的士兵们，都毫不费劲地作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将军发号施令，士兵服从命令。将军尽善尽美地完成了搜寻整个山区的任务。他的士兵们，同样地，也仔细地搜查了山上每一寸陡峭、荒凉、长满了林木的土地。谁又能当面怪罪他们逃避他们的任务呢？

罗贝托·米雷斯。只有他。将军的小儿子。罗贝托·米雷斯，穿着尤卡坦衬衫[15]，牙间叼着一根蛮横的、象征着男子气概的雪茄。罗贝托·米雷斯坐在酒店的庭院中，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墨西哥甜面包[16]和一小杯苦咖啡，他正等待着父亲的到来，面包和咖啡都等凉了，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因为惊讶这两个字甚至不存在于他的词典中。

马塞利诺静静地在罗贝托身旁坐下，为自己点了一杯咖啡，什么也没问。他们甚至没有对视。父亲的严肃是一句无声的谴责。儿子来这里干什么？他怎么敢用他徒劳无功且不合时宜的出现打断一项专业的军事行动？他突然出现，无比自负，是对父亲的不敬。难道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正满山搜寻他大哥的踪迹吗？

引用：这片结实的密林容不下任何东西，除了它本身，那密实的、郁郁葱葱的大自然。

“不要再在山里找他了，父亲。”罗贝托缓慢地吮吸着杯中的咖啡，说道，“您在那儿是找不到他的。”

将军转过头冷冷地看了他的儿子一眼。他什么也没问。他不打算拿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计划去冒险——或者说，不允许这个计划失败，他在心里如此对自己坦白道——他找不到起义军，这样，他就能欺瞒他的上级，不至于给自己惹上麻烦。

让罗贝托说吧。将军什么都不打算说。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他必须得这么做。不看。不说。第二天早晨，当将军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他觉得下巴上那一小撮细细的胡须实在是可笑至极，就像一条铅笔画出的线一般，便用吉列剃须刀刷两下刮掉了它们。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洁净无比，没了过去，没了积习，没了一文不值的自负。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指挥官。T恤垮垮地罩在身上，裤子也蔫蔫地向下垂着。

他作出了反应。系紧了皮带，擦了擦汗淋淋的腋窝，带着矛盾的情绪，既怒气冲冲又无精打采地穿上外套，扣上纽扣。

安德烈斯·米雷斯已经进了监狱。他们在他的情人，埃斯佩兰萨·阿瓦尔卡的家中拘捕了他，他对父亲笑了笑。

“没有什么是比无形的伪装更好的伪装了。”被拘捕的时候，大儿子笑着说，“换句话说，你得看看那些再显眼不过的地方。”

他往嘴里塞了一小根香蕉，没有抵抗便投降了。看到父亲和那群他率领的士兵同样悲伤的脸，他就明白，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违背了他们的本意。父亲和那群士兵似乎突然失去了执行这次任务的理由，因为他们并未料想到这次任务最终会导向此刻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成功抓获叛军首领安德烈斯·米雷斯，而这件事会将所有人置于一个无法回避的局面，即最终的审判。消灭叛军。

“只要不要对我使用法外法。”在双手被扣上时，安德烈斯微笑着说。

“儿子……”父亲鼓起勇气小声喊道。

“我的将军。”儿子回应道，声音铿锵有力。

就这样，马塞利诺·米雷斯一整个晚上都在进行自我斗争。他应该遵照军法中的速审程序，对他的儿子发起审判吗？对政府当局来说，最好的处置方法难道不是枪毙叛军头目，不留下一丝痕迹吗……——让他消失，组织一场短暂的抗议活动，确保他被忘却，以此赢得最后的胜利——把叛军头目带到法庭上，让法官们决定他发动起义和暴乱，应该遭受什么样的刑罚，这多麻烦。对一个有道德的父亲来说，参与亲生儿子的审判，无奈地当庭呈上那难以启齿的证据——是他的兄弟告发了他，这简直具有毁灭性。更好的解决方法难道不是把罗贝托排除在外，让他的父亲来承担这沉重的责任吗？

“我是在山里抓住他的。我手下的人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完成了任务。请按照程序对他进行审判……”

他还记得罗贝托告发哥哥时脸上的表情……

“就像二乘以二等于四一样，”他还有心情嘲讽他，“别跟我说，父亲，您从来没想到，那个勇敢地站出来的起义者会像个胆小鬼一样藏在他女人的裙子里，就在这里，在奇尔潘辛戈？”

他笑了。

“而您却在山中盲目地寻找，您看看……”

“为什么，罗贝托？”

讽刺的面具碎成了片。

“您算过吗，父亲，算过有一个每天都作为在逃起义者在报纸上出现的哥哥，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您想过这会给我的生意带来多严重的损失吗？您觉得人们、人们、我的将军，当局政府，企业家，外国合伙人，所有人，您觉得他们知道我的哥哥是个打游击的，还会信任我吗？上帝啊，爸爸，想想我吧，我才二十八岁，我的生意近来不怎么景气，给我一个机会吧，拜托……”

“抓住他只是时间问题。你得有点耐心。”马塞利诺·米雷斯使了很大的劲，试图稳住他。

“不不不不不儿子毫不掩饰地嘲弄道：别说了！您就装傻吧，这还是好听的说法呢，您……”

将军站起身，举起鞭子在他的儿子罗贝托面前甩了一甩，便向监狱走去。

“放了他。”他对负责看守的上尉说，“告诉他，这次他可得真的消失，因为下一次，他就彻底输了……”

“但我的将军……要是上面的人知道了，他们会对你……”

米雷斯粗暴地打断了他。

“谁会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玄武岩般的坚定。

“我不知道……”上尉吞吞吐吐地说，“下面的士兵……”

“他们都忠于我。”将军肯定地说，“没有人想抓住我的儿子。我就和您明说了吧。”

“这样的话，我的将军，您的另一个儿子，”上尉用同样坚定的声音对他说，“就是那个告发了他的儿子，他……”

“那个犹大[17]，我的上尉？”

“好吧，我……”

“我的儿子该隐[18]，我的上尉？”

“是您说……”

“您怎么看待法外法，上尉？”

上尉咽下了一大口唾沫。

“好吧，有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觉得相比而言哪个更糟呢，我的上尉，反抗还是背叛？允许我重新表述一次：哪个人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我们作为军事机构的荣誉？一个造反派还是一个告发者？”

“军队的荣誉？”

“或者家庭的荣誉，要是您……”

“别说了，我的将军，此刻，阿尔瓦拉多上尉眨了眨眼：叛徒是可耻的，而起义者会获得尊重……”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在罗贝托·米雷斯走进奇尔潘辛戈的荣耀酒店的时候，朝他背上开了一枪。他当即倒在街上，一枪毙命，周围流淌着从他的伤口中喷涌而出的浓稠鲜血，染红了他白色的尤卡坦衬衫，散发出一种不详的光芒。

马塞利诺·米雷斯将军向上级通报，反叛头目安德烈斯·米雷斯在被军事羁押期间侥幸逃脱了。

“我知道，部长先生，这场家庭闹剧实在让我悲痛不已。您要知道，对我来说，在山中搜寻整整六个星期，只为了抓住我的亲生儿子，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然而，我还是完成了任务。我更不敢想象，我的另一个儿子，罗贝托·米雷斯，竟然会拿枪指着为荣誉而生的阿尔瓦拉多上尉的头，要求他放了他的哥哥安德雷。斯。”

“那罗贝托呢，是谁杀了罗贝托，我的将军？”

“阿尔瓦拉多上尉，部长先生。一名勇敢的军人，我敢向您打包票。他不会让我的儿子罗贝托玷污了他作为军人的荣誉……”

“他是个杀人犯。”

“阿尔瓦拉多上尉也是这么觉得的。”

“您相信吗？或者说，您知道？还是只是猜测？”国防部部长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道。

“我的将军，阿尔瓦拉多上尉已经上了南马德雷山脉，加入了那支名叫‘比森特·格雷罗’的人民武装。”

“天哪，幸好他加入的是游击队，而不是贩毒帮。”

“没错，我的将军。现在弃我们而去的那些人，十个里面有四个成了毒贩。”

“您知道您的任务所在，米雷斯将军。继续搜寻他们。”部长先生微笑着说，他的微笑中带有一种深远的讽刺意味，马塞利诺·米雷斯将军猜测，这就表明，在未来等待着他的将是一种他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马塞利诺·米雷斯满意地回到了格雷罗山。他爱着山中的植物和鸟类。没有什么能够比远近地辨认出一棵生长在热带的扁桃树更让他高兴，扁桃树是森林中一座高高的瞭望塔，每到秋天，它就如同被火焚烧过一般，叶子掉得一片不剩，不过，新叶很快就能长出来：如同星星的花朵，吸引熊蜂的气味，还有黄色的果实。走近之后，他还能看到黑色瓢虫——黑刺尾瓢虫，寻找着山中那块灼热的石头，这也让他感到无比兴奋。他会逐一细数郁金香的五瓣花瓣；这种花朵离开庭院，来到这密林中，竟然还能存活，这让他感到钦佩。视线上升，他便能看到黑冠白唇的喜鹊喳喳地飞过，还能看到群栖短嘴霸鹟昂得高高的脖颈和点缀着斑点的羽冠，肉桂色的蜂鸟针状的嘴儿。报时鸟用它深色的喙指示着钟点，松鼠杜鹃在它周围盘旋着，以这种方式与它交谈……这就是马塞利诺·米雷斯最大的快乐。辨认树木。欣赏鸟类。正因如此，他深深地爱着格雷罗山。他没有再去搜寻安德烈斯。也忘却了罗贝托。他仍然留在军队中，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大自然。

[1]la sierra de Guerrero，是坐落于太平洋海岸、位于格雷罗州的一条蜿蜒山脉。

[2]la Revolución de Independencia，此处指的是墨西哥的独立战争，即始于1810年9月16日的、墨西哥人民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爆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它以理想主义的农民对殖民地领主的反抗为开端，却以自由派与保守派达成同盟而告终。比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rero, 1782-1831）是带有当地土著血统和非洲血统的墨西哥政治家、军事家，于1829年4月至12月担任墨西哥总统，在墨西哥独立战争期间担任起义军的首领。

[3]la Sierra Madre del Sur，墨西哥南部山脉，从米却肯州南部向东经格雷罗州，直至瓦哈卡州东部的特万特佩克地峡，长度为1000千米。

[4]此处指的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墨西哥中间派政党，1929年3月4日成立，连续统治墨西哥长达71年（1929-2000）。前身是国家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 PNR），后改名墨西哥革命党（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PRM），最终于1946年改为现名。

[5]amate，是桑科榕属的一种常见热带乔木，生长在河流沿岸的森林栖息地。它的范围从墨西哥到南美洲北部。

[6]ficus，又名无花果属，是桑科内的其中一属也是无花果族的唯一属，内里包含近800种的树木、灌木及藤本植物等。它们原为热带雨林的原生品种，但也有部分延伸至暖温带，常被统称为榕树。

[7]Coatepec，位于韦拉克鲁斯州的一个市镇。

[8]La Cuchilla，位于墨西哥索诺拉州荒漠中一个废弃的村镇。

[9]La Tentación，位于乌拉圭派桑杜省的一个村镇。

[10]Chilpancingo，墨西哥南部城市，由格雷罗州负责管辖，同时也是该州的首府。

[11]quimera，古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是提丰和厄喀德那的孩子。它拥有狮子的头，山羊的身躯和一条蟒蛇组成的尾巴。

[12]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 1879-1919），墨西哥革命领袖，墨西哥南方解放军领导人，他所领导的墨西哥南方农民武装，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重要组成功力量。于1919年4月10日在莫雷洛斯州遭伏击身亡。

[13]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 1859-1920），墨西哥第一任立宪总统，墨西哥革命领导人之一。生于自由派地主家庭，革命爆发后任第三军区司令、临时政府陆军部长，于1917年2月5日颁布新宪法，恢复宪政民主体制，力求实现政教分离，同年3月当选总统，并于1920年被暗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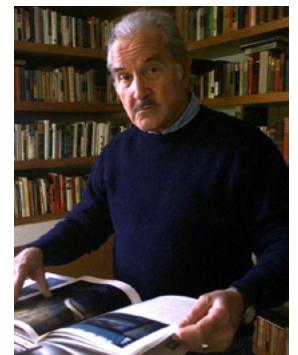
[14]Guerrero，位于墨西哥南部的州。临太平洋。除沿海狭窄平原外，南部为南马德雷山，北部是巴尔萨斯河谷地。沿海平原及谷地气候湿热，山地气候温和。

[15]guayabera，也叫古巴衬衫，特点是有两个或四个贴身的口袋，胸前和背后有两排细小的缝褶，通常是十个，紧密地缝合在一起。

[16]chilindrina，一种墨西哥甜面包，用小麦粉、酵母、鸡蛋、肉桂和棕糖制成。

[17]Judas，《圣经》人物，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又称加略人犹大。据《新约》载，他生于加略，后因三十个银币而将耶稣出卖给罗马政府，耶稣被十字架钉死后，犹大因悔恨而自杀。

[18]Cain，《圣经》中记载的人物，亚当和妻子夏娃最早生的两个儿子之一，该隐是兄长。因为憎恶弟弟亚伯的行为，而杀害了亚伯，后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伊卡洛斯·富恩特斯

墨西哥著名作家、外交家，西语美洲文坛最出类拔萃的作家之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1977年荣获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1987年荣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94年荣获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译者：徐恬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主要译作有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长篇小说《感谢火》，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短篇小说全集》（待出版）、卡洛斯·富恩特斯短篇小说集《幸福之家》（待出版）。

《武装之家》选自卡洛斯·富恩特斯短篇小说集《幸福之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Hector Falcon](#) on Unsplash

小说

只是毛毛雨而已

皮拉尔·金塔纳 | 故事群岛

她只想观赏那片胜景，吸纳它，
然后将这段记忆存储在她的脑海里。

当他们起飞的时候飞行员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来称目的地圣安德烈斯岛此刻气候宜人，天空晴朗，阳光充沛。玛丽亚想，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她将会透过舷窗看到由白色沙滩和绿松石色大海组成的天堂胜景——就像谷歌图片上所展示的那样。

然而，当飞机着陆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灰色。天空，大海，沙滩。甚至是建筑物和植被都显得暗淡无光，没精打采。何塞·米格尔在飞行途中一直用平板电脑阅读，此时他抬起头，望向窗外。

“下雨了。”

“只是毛毛雨而已。”玛丽亚说。

大部分没有耐心的乘客在飞机停下之前就纷纷起身。玛丽亚和何塞·米格尔夹在队伍里，被迫等了很长的时间。飞机到航站楼之间没有通道，只有一段老式楼梯。一走出飞机，他们就感到咸而热的空气迎面扑来。接着，他们沿着平台上标出的道路行走，细雨在他们身上留下针扎般的刺痛。

移徙管制站的人群队伍非常混乱，仿佛是演唱会台下的观众。没完没了。一个身材高大、态度粗暴的女人接待了他们，她检查了他们的身份证件和旅行卡，询问他们准备在此地停留多久，在哪里落脚。她盖了一个章，没有再说什么，把文件还给了他们。接着，他们走进一个狭窄的厅室，四面的墙壁很脏，嵌有两扇吱呀作响的门。他们各自的背包——款式相同，她的是紫色的，他的是橙色的，已经显得摇摇欲坠。他们抓起背包，面前又是一条长长的队伍，队伍尽头是海关设置的行李扫描仪。这条队伍向前挪动的速度比之前的那条还要缓慢。

这个地方挤满了人。孩子们跑来跑去，女士们用旅游卡扇风，男士们满头大汗，年轻人们则忙着自拍。这里没有空调，热浪粘稠。混合着炸鸡、海带和屁的气味一波接着一波涌来。何塞·米格尔的嘴唇边上冒出了一圈透明的汗珠，就像是细密的水泡。玛丽亚一言未发，她没说你应该擦一下汗，没有说这里太热了，我很绝望，谢天谢地我们还有中转去普罗维登西亚岛的时间，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她只是用旅游卡给自己扇风。终于轮到检查他们的行李了。没有人要求他们打开背包配合检查。他们穿过一条走廊，出口挤满了出租车司机和提供旅行服务的人。你要去哪里朋友？你有地方住吗？老兄，安心拿着这张卡。玛丽亚和何塞·米格尔拒绝了他们，继续往机场内部走去，一直走到了航空公司的柜台处。

他们再次排队，托运了各自的背包，领取了飞往普罗维登西亚的登机牌，然后去寻找位于二楼的候机室。前面等待他们的，是另一条队伍。另一个扫描仪。另一个移徙管制站。何塞·米格尔的腋窝湿透了，玛丽亚觉得自己刚刚跑完一场马拉松。他们经过免税店和头几个候机室，人满为患，到处都是行李箱，充斥着噪音。幸运的是，他们所属的那个候机室里只有寥寥几个乘客，而且空调开得很足，这让人松一口气。他们坐在第一排椅

子上，正对着一扇通向其他候机室的玻璃窗。通向室外的窗户则位于他们的两侧。

“如果有客房服务的话，我们可以在房间里吃饭，”玛丽亚说：“房间里有一个可以看到海景的阳台。”

“随便你。”

“如果没有客房服务，我们就去餐厅吧。一切都设在室外，而且面向大海。”

“在普罗维登西亚，天气会好一点吗？”

细雨还未停止。透过两侧的窗户可以看见停机坪上被淋湿的飞机，正午时分的阴霾，以及四处蔓延、触目皆是的黑云。也许，这场毛毛雨已经越下越大了。

玛丽亚说：“我相信那里一定很美。”

何塞·米格尔没有回答。他拿出平板电脑开始阅读。玛丽亚透过玻璃，专注地望着其他候机室里的人。那些被太阳灼伤的旅客留着辫子，穿着哥伦比亚圣安德烈斯岛[1]的T恤——上面印有棕榈树的图案，绘有拉斯塔法里教旗帜[2]的颜色。她向虚空，向宇宙，向反复无常的大气现象祈求，希望雨停，希望普罗维登西亚的天空晴朗，让他们可以看到超级月亮从海平面上升起，仿佛那月亮是由谎言组成的，巨大而明亮，像是一段梦太奇，又像是一张纯粹的恶趣味明信片。她没打算拍任何照片。她只想观赏那片胜景，吸纳它，然后将这段记忆存储在她的脑海里。

她掏出手机，查了一下天气预报。自从她得知了超级月亮的消息之后，就开始不断查看天气预报。当她在计划旅程的时候，依然不断查看关于超级月亮的预报。而每当何塞·米格尔告诉她，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十一月份会一直下雨，他们最好留在波哥大的时候，她还是在查看预报。玛丽亚认为十一月的雨只是他当下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总是想留在波哥大。天气预报总是播报着同一个信息：有雨。

玛丽亚的 WhatsApp 上显示有十四个消息提醒，这些消息都来自她大学同学的群聊。一开始，有人发了一个表情包，引出了一连串的回应：贴图，颜文字，哈哈哈，还有更多的表情包。玛丽亚写道：这表情包太赞了哈哈哈。接着，她发消息给自己的母亲，说他们已经到达圣安德烈斯了。她又点开 Facebook，点了几个赞，发表了几条评论，祝了一个朋友生日快乐，然后又点进一个链接，开始看一篇文章，它的内容是关于某个隔绝于亚马逊地区的部落。

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屿，她读道，是一架飞往丛林哨所的直升机发现的——当时它遭遇了一场风暴，被迫偏离了原来的航线。配图是航拍照片。印第安人穿着缠腰布，没有胡须，头发部分被剃光，没有剃掉的部分留着乌黑的发。他们的脸上和身体上都涂有红色，或是画着深色的图案。其中有一个人，看起来最为年长，他头上戴着一顶色彩斑斓的优雅羽冠。孩子，妇女，男人。一些人拉起弓，把箭瞄准空中的入侵者，而其他人则用手指着他们。还有一些人只是盯着他们，其中还有几个躲到了树叶下面。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惊讶，或者说，是一种混杂着恐惧和好奇的神情。玛丽亚觉得自己在一个紧紧抱着棕榈树高大树木的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了惊恐之色。如果有机会，她很想去安慰这个孩子，做一个让他平静下来的手势，让他知道那些发现他们的人并不是什么坏人，那些人和他们一样，也感到很惊讶。看到他们健康，强壮，在丛林里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人感到很高兴。那些人只是要给他们拍一些照片，照片和记忆一样，只是存在于脑海之外，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而且，那些人很快就会离开，不再打扰他们。

在文章右侧的空白处，有一个名为“最热话题”的版块，上面有其他文章的链接。她点开了一个链接，照片上展现了一些倒下的树木，这是关于森林砍伐和流行病的文章。那些难究其源的流行病愈加频繁地爆发，它们正在消灭当地的动物们，并迟早有一天会蔓延到人类身上。她很痛苦，一阵胸闷袭来，对于那个亚马逊部落受惊男孩和人类的未来，她感受到了一种隐约的恐惧。她转向何塞·米格尔。他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没有注意到她正在看他。每当他阅读的时候，就会咬自己的嘴唇。那天早上，他刮了胡子。他的下巴——玛丽亚最喜欢的部位，正在冒出新茬。她觉得，到了晚上，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普罗维登西亚，对着大海和超级月亮，在那样的奇观面前，他们会不知所措，会牵手：一开始只是指尖和指尖的摩挲，到了最后他们的手指会像编织物一样交缠在一起。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表。飞机应该在二十五分钟以前就已经起飞了。

“何塞，看看时间。是不是飞机已经起飞了但我们没注意到？”

何塞·米格尔将目光从平板电脑上挪开，环顾四周。

“没有航空公司的人吗？”他问道。

玛丽亚站起身。她走向一位坐在另一排的乘客，一个看上去岛民打扮的女人，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个尿布袋。

“去普罗维登西亚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吗？”

“没有。”

“这是那趟航班的候机室，对吧？”

“对。”

“没有航空公司的人吗？”

“到现在为止还没来。”

“已经晚点了。”

“对。”

“会出什么事呢？”

女人做了一个表示不知道的手势。玛丽亚回到了何塞·米格尔身边。

“我们不可能按时到达了。”

“那位女士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不知道。”

其他候机室里也没有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距离他们后面两排位置的地方坐着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他拖着齐腰的长发，一边看手机一边发出笑声。

“先生，抱歉打扰了”，何塞·米格尔说：“您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航班还没起飞吗？”

那人将目光从手机屏幕上挪开，摇了摇头，又继续开始做其他的事情了。

“飞行时间只有半小时”，何塞·米格尔说：“我们确实很快就能到。”

“三十五分钟”，玛丽亚纠正道：“他们甚至还没通知我们登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好了，你说吧。”
“说什么？”
“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说你早就提醒过我了。”
“玛丽亚，我难道暗示了什么吗？”
“你现在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能感觉到。你生我的气了，你什么都没说，但这一路上你一直躲着我。”
“我得看学生的论文。明天就是提交分数的日子了。”
“何塞，你说出来吧。”
她站着，而他则坐在位子上。他面对着她说：“
“我告诉过你，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不喜欢旅行，而且我有一堆工作要做，我宁愿留在波哥大……”
玛丽亚挪开视线，开始不耐烦地把脚移来移去。
“你总是喜欢留在波哥大。”她轻声说道。
“是又怎样，这有什么错呢？”
玛丽亚沮丧地走远了几步，但马上又转身回到了原处：
“你非得自己找不痛快，还要让我不痛快吗？难道你就不能尝试着去享受一下吗？”
何塞·米格尔的手里拿着平板电脑，他没有看向玛丽亚，而是凝视着窗外。
“享受什么？壮丽的景色？这些塑料椅子？”这时，一个女人咳嗽了一下；还是人们的病毒？”
玛丽亚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带着怒火说道：
“设想一下我们一起在海边看超级月亮。”
“我们在波哥大也可以看到。”
“在那边阴云密布的天空下看？”
何塞·米格尔把平板电脑放在一边，双臂交叉，定定地看着她。他什么都没说，但他脑子里想的东西却一目了然。玛丽亚争辩道：
“我怎么知道这里会和波哥大一样呢？”
“现在是十一月。”
“十一月也有几天是晴天。”
“十一月是雨……”
玛丽亚打断了他：
“我知道，你和我说过无数次了，这一年中雨水最多的月份。”
“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买了机票，花钱定了酒店。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意见。所有这些钱……”

她不想继续争论下去，也不想听后面的话——那些关于所有的钱都打水漂的喋喋不休，说什么应该把这些钱省下来买公寓，那户不管他们怎么存钱，都永远不可能买得起的公寓。她走向窗户，从那里可以俯瞰停机坪没用的。他们永远都无法平静而愉快地达成一致，无论有没有超级月亮；不管是在波哥大还是在由白色沙滩和绿松石色大海组成的天堂里，还是在宇宙的其他地方，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致。她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他们无法理解对方，他们太不同了。

停机坪上方天色过于暗淡，灯已经打开了。当时才下午五点，但仿佛夜晚已经降临。突然，透过机场挂灯射出的锥形光束，她看到了雨。在强风的鞭打下，剧烈而狂暴。是暴风雨。显然，它正像野兽一般嘶吼着。人们在航站楼里听不到那风暴声，只是因为这栋建筑很结实，走廊尽头的窗户玻璃很厚实，而走廊另一头的窗玻璃也很坚硬。在波哥大是见不到这样的暴风雨的，或者说，至少在她的记忆里，在近几年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风暴。

她安慰自己说，反正就算到了目的地也不可能看见超级月亮。

背后有人大声地向她打招呼，玛丽亚转过身，发现原来是机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她说，

由于天气不好，机场暂时关闭，他们的航班也被取消了。

“要关到什么时候？”一位戴着眼镜的先生问道，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建筑头盔。

“到明天。”

“为什么不能等雨停就复航呢？”那个一直咳嗽的女人问道。

“不可能，我的夫人。普罗维登西亚机场的跑道上没有灯光，飞机是无法在黑暗中降落的。”玛丽亚仍然站在窗前，她转身继续透过窗玻璃向外看。窗外，燃烧着暴风雨的怒火。在航站楼内，旅客的抗议声以及埋怨声变得越来越微弱，直到最后，他们认命了。玛丽亚的眼睛盯着窗外，但她感觉到身边的旅客开始陆续离开候机室，步调缓慢而无精打采，就像牛一样，她想。何塞·米格尔来到她的身边。

“我们走吧？”

“我得给酒店打电话，说我们不能去了。”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机场关闭了。”

“我们得设法在这里订个酒店。”

他试图安慰她说：

“也许过一会雨就停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的海滩上看到超级月亮。”

“是。”她不以为然。

一场暴风雨正在肆虐，夜晚很快就会降临。玛丽亚转身离开窗口，没有看何塞·米格尔一眼，也不在乎他是否跟着自己，只是加入了离开候机室的最后一批乘客。

[1] 圣安德烈斯岛是哥伦比亚的珊瑚岛，位于加勒比海，由圣安德列斯-普罗维登西亚省负责管辖。

[2] 拉斯塔法里教，是1930年代起自牙买加兴起的一个黑人基督教宗教运动与社会运动。这项运动没有中心领袖，信徒之间有非常多元的解读。该运动信奉一神论，唯一的上帝称为“Jah”，而这一神存在于每个个体中。该教派的旗帜由绿、黄、红三色组成。



皮拉尔·金塔纳

生于1972年，哥伦比亚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于2007年入选英国海伊文学节评选的最佳拉美青年作家名单“波哥大39人”。著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小红帽吃了狼》。《雌犬》（2017）获得哥伦比亚小说图书馆奖，《深渊》（2021）获西班牙丰泉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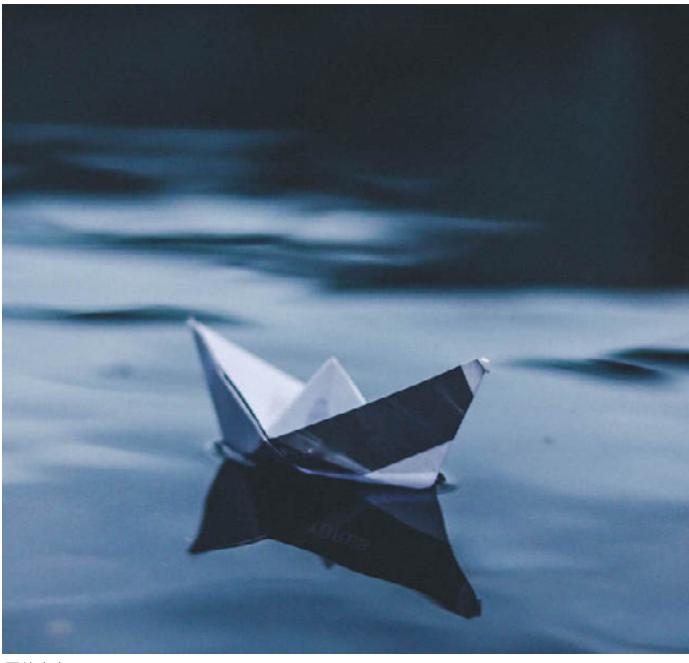
译者：周妤婕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在读博士。主要译作有乌拉圭作家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的短篇小说集《无人亮灯》、波多黎各作家路易斯内格龙的短篇小说《花园》《为了瓜亚玛》等。

Copyright © Pilar Quintana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ilar
Quintana c/o Massie & McQuilkin Literary
Agents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Ahmed Zayan on Unsplash

非虚构

我要划着我的桨

易小荷 | 非虚构图书馆

这方圆几里之内，
我已经见识到了那么多形态各异的生命，
不分高低贵贱地活着

在这里，即便是鸟，看起来活得也很粗糙，我对鸟类无甚研究，看着应该是禾雀的一种：身子肥嘟嘟，脑袋圆溜溜的，芝麻眼睛扑棱铺棱地闪。动作迅疾，仿佛视频跳帧，快过人眼的视觉残留。偶尔听见瓦片上一点细密的响动，是它们在跳跃着觅食。有时某只胆子大，扒在窗台上歪着头看我。它们大概认出，我是这镇上的外人。我租住的房子颇具古意，老式对开木门陈旧失修，横插着一根如今很少见的门闩，开关之际总是吱吱呀呀地唱。屋主在里面加了带锁的对开玻璃门，不知何故又坏了半扇。力气稍大一点的成年男子，使劲儿一推，这些门肯定会訇然仆街。房子里倒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除了我，还有一群尺寸惊人的蜘蛛。

从两千多公里之外的上海，到离自贡市区十几公里的小镇，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居住在这里的邻居，此前也从未涉足这里，虽然自贡就是我的故乡。在农耕时代，自贡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井盐产地，盐商们在数百年间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富，又在近现代的迭代中灰飞烟灭，只余些如今残破的建筑和盐帮菜。

如今的自贡，只是一个位于四川盆地的五线城市，仙市古镇更是一个连地方志都没有的平凡小镇，人们的生活水平介于贫困和温饱之间，前些年的房地产大潮造就了几个富有的商人，但财富距离当年的盐商相去甚远。

在我的认知里，这样的小镇可能才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真实中国的面貌。对于西方人而言，它的位置等同于“锈带”——二十世纪之初的伯明翰或者二十世纪后期的底特律。于我而言，从故乡出发的长久远行，鸟飞兔走之余，逐渐有些倦怠。走在路上，穿行于高楼大厦之间，突然发现，从前依靠艰苦的努力而填补的时间像一块混凝土，瞬间被爆破，粉碎一地。2021年7月25号，在骚客文艺的那篇《不想告别的告别》文章里面，我写过“在悬崖边上站久了，有点累，想按下暂停键，容我歇息一段时间，先暂时回家去种红薯去了。”

这句话原本是玩笑之意，说出来之后，竟然盘旋在我的脑海久久不去。回到故乡，那个出生长大，跌跌撞撞出发的地方，完成一部关于外婆的书，这个想法十年前就有了。

然而真的到了仙市，在距离上海两千公里之外的夜半两点，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如同设想的那般无所畏惧。夜雨针一样细密的声音弹在屋檐上，对面的廊下有盏明晃晃的大灯，却更照映出来这个世界的空无一人。

迷迷糊糊，也还是睡着了。仙市镇是典型的丘陵地带，釜溪河蜿蜒而过。我住的房子靠近码头，处于小镇最低处。2022年的夏天雨水狂暴，釜溪河也凶悍起来，不过数小时便浑浊了颜色，上游的水越来越急，夹杂着看不清的杂物，越滚越高。某夜，河水甚至逼近了王大娘茶馆门口齐平的台阶，一条无辜的小船也被冲了上来，摆渡人很无奈地拉着船站在岸边，

状若摩西。此时的水位离码头最高的台阶，也就是和我房子齐平的地面，只有一步之遥。

我开始疯了般问每个住在自贡市区的亲友，洪水会不会涨上来把房子淹了？大家安慰我，说不会的。秋秋说，“肯定会有水位勘测员晚上去监测水位的，有了危险通知你。”那个晚上我不断冲向河边，11点去看一眼，12点去看一眼，夜里2点再去看，河水依旧在缓慢而坚定地上涨，但是河边空空荡荡，没有水位勘测员，人影都没一个。次日我鼓起勇气，去问几个隔壁的邻居，邻居们正在打麻将——镇上的人们永远在打麻将，让人怀疑其主业就是打麻将，业余时间再过过生活——并没有人认真对待我巨大的对生死的担忧，斜对角卖糖的师傅叼着烟说，“有可能，有一年水淹上来，我一直用扫帚扫……”开茶馆的王大娘说，“一会我得去把重要的物件收拾下。”她们的口吻平淡，神情安然，似乎滔天洪水只是不重要的小事，根本不值一提。

后来和镇上的人熟悉起来，和每个人聊天，几乎都能聊出一段令我不可思议的故事，我最早熟悉起来的王大娘，项中戴着一串闪亮的珍珠项链，开着茶馆，还是个风风光光的媒婆。我们刚开始还客客气气，她也话里话外有意展示着自己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直到有天她带我去找仙婆，回来的车上，她开始诉说自己的痛苦：丈夫孙弹匠是个“烂帐”，勾搭过无数女人。更让我震惊的是，之后没多久，邻居告诉我孙弹匠当街打王大娘，“镇上人都知道。”

和王大娘认识越久越理解不了，她有模样，也会赚钱，两个女儿已经成家。家里人似乎对已经进入老年人的王大娘依然挨打习以为常，她自己也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王大娘的这一生，出生于赤贫，由于没有生下儿子被老公嫌弃，老公一辈子出轨她一辈子忍气吞声，被计划生育部门强行流产，古镇有过一场很大的火灾，把相连的五户人家烧得干干净净，陈家祠面前的大院坝便是当年那五户人家的所在。然而作为直接受害者的王大娘说起这次火灾也轻飘飘的，描述得不多，嗟叹得更少。她当然不是忽略掉自己的苦难，我问她记不记得孙弹匠打过她多少次，她说随便乱说，五百多次肯定有了。”

那一瞬间，我想起《小城畸人》——“从每个人身上望下去，都如同一座深渊。”深渊可能是水灾、火灾、雷暴、来自他人或者某些部门的屈辱。

我认识王大娘的2021年，她62岁了。一个一辈子在小镇生活的女人，几乎就是镇上的活字典。我想方设法去寻找仙市镇的地方志，并没有什么结果。所谓的仙市古镇介绍里面，写的全是名胜风景。

王大娘说她忍受了几十年都是为了子女，对于未来她也没有任何远大的希冀，只是将来有一天百年归老的时候，她的女儿能为她写一篇关于她的一生。

这个卑微的几乎算不上是什么愿望的愿望触动了我。王大娘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是那一天的那句话差点让我哽咽。我突然想起了外婆，同样都是女人，本质上并没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了，为了爱，为了家庭，为了生活……

我对一位远方的朋友讲述自己初到盐镇的见闻：“没想到都已经这个年代了，还有这样的女人，全镇的人都知道或者目睹过她遭遇家暴，但是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而她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过摆脱这种生活。”我接着发了第二条，“但你想不到吧，她同时也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媒婆。”

朋友说，“记录下来吧，这就是你的米格尔街。”

王大娘的故事打开了我的触角。有天新认识的邻居黄茜晾在门口的衣服丢了一件，“我妈妈说，会不会是被陈二娃偷走了？我说不可能，又不是女人内衣。”我打断她问，“女人内衣，陈二娃，是什么意思？”见我惊讶，边上的庆梅淡定地说，陈二娃专门偷女人内衣，还有丝袜，甚至会把女人丝袜穿在腿上。

“他就是这里有问题，”庆梅指指脑袋。

陈二娃我有印象，不就是那个总在我门前转悠的，特别矮小的一个男人吗？她们点头确认，不当回事地笑。我提高嗓门，“这不是脑壳有问题，这分明是违法了啊。”

陈二娃是小镇第一个和我热情打招呼的人，有的时候瞥见他，都是在欢快地帮人干活：扛重物，拖垃圾桶，打扫卫生，他就靠着干所有别人不乐意的脏活累活糊口。太阳下，有人驼着背慢吞吞在经过新街路口，遇到陈二娃，停下来，扫一眼，不说话，回过头接着走。而他毫不介意大家对他的轻视，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他都一头扎进去凑热闹。

陈二娃唯一的朋友是只橘猫，起初我以为是流浪猫，后来才知道是隔壁徐九娘家里养的。仙市的猫大多用一根麻绳拴起来，这只橘猫居然能够自由放任，属于上等待遇。镇上人判断一个猫“好坏”的标准是：好猫要会逮耗子，不爬房子不挠家具，其余便全归于“坏猫”。几个月后，我有天发现包三婆膝下的小狸花猫不见了，换成一只大猫，一问才晓得原来它被定义成坏猫，于是拿一个麻袋装上，走到很远的地方连麻袋带猫给扔了，“这已经很仁慈了嘛！没弄死它，放它一条生路。”

橘猫特别亲近人，我轻轻地喊一声“咪咪”，它就跟着我走下了长长的台阶，我停下，它便也停下，摊开肚皮，惹人爱怜。朋友强烈反对我要去买罐头喂猫的想法，她们在微信里说“如果你能一直喂它罐头固然好，可是让它尝试了美味，以后又再吃不到，岂不是太残忍了？”于是我只能忍着，每次橘猫蹭我手脚，也只是摸摸它圆滚滚的小脑袋。除了我之外，橘猫偶尔也蹭陈二娃，出太阳的时候，河坝上一人一猫，算是乡间难得的风景。

随后几天，镇上突然流传一个女人自杀的消息，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在曾二婶（庆梅妈妈）的茶馆里，我听到的说法是：女人偷了高铁站的几根钢筋，被监控录像拍到，高铁站报警后，警察把她带去问话，之后又去现场指认，第二天又把她带去问话，回家的路上她就跳堰塘自杀了。家里人气不过，和村民们一起把棺材抬到派出所，双方还起了冲突。

我请镇上的张大娘指路，一路陪我去了芭茅村，离镇上大概半小时的车程。远远的就能看到逝者家门口搭起的灵棚，人们挤在门口宰猪杀鸭，吃着送别的宴席。

人群里站着她儿媳妇和亲家母，听说我是作家，女人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跟我说话。她们说那个女人才50岁出头，家里一个女儿已经嫁出去，身体不好没有上班，一个儿子在上高二，又指指屋头里躺在床上的男人，“她老公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又绝

食了几天。这个家全靠她去高铁站打扫卫生那点工资。”男人呻唤起来，有人翻开被子，我看见他的面容和肢体，用“形容枯槁”来描述恰如其分。

她们说，女人起初以为只是捡了些许别人不要的垃圾，结果被派出所带过去以后，男人在隔壁听见类似于子孙后代会受影响之类的话；第二天过来传唤，不让男人去陪，结果到很晚也不见人回来。后来到派出所去问，说早就开车给她送回来，半路的时候轮胎坏了，就让她就地下车走回去。

女人的尸体是在离下车地方将近两百米的堰塘发现的，我去现场看，发现去那个堰塘并不顺路，必须“翻山越岭”才能抵达死路，我的脑海里拼凑出一个勤劳简单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不舍得吃穿，盘大儿女，养着丈夫，突然被带去当着众人的面“指认犯罪现场”、又因为缺乏文化，觉得孩子的前途会被自己毁掉，于是就投了塘。

生命在这里被碾轧到尘埃里，大部分时候没有任何反抗。无论是人，或是猫狗。我见过一次一群孩子拿石头砸橘猫，它吓得耳朵向后倒去，低着背脊寻找躲藏的地方，面对任何侵犯，除了躲避，它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撕咬或者反抗……而它最后活下来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顺从了这里的生存法则。

王瞎子也是这样，“顺从”地活到了 68 岁。这里没有人管她和她的丈夫叫“盲人”，人们的称呼简单了当，就直呼“瞎子”，盲人自己也就跟着这样叫。王瞎子 27 岁嫁到这里，那时仙市还不是如今的旅游景点模样，四处都有很深的泥沼。“那时候下雨都要穿筒靴，里面都要灌进去。乐乐幼儿园后面那条马路，根本不敢走，全是稀泥浆。”我不忍心问出“那你为何还要嫁过来”这样的话，这是王瞎子的第二次婚姻，一个瞎子嫁给了另外一个瞎子，对她来说，生活本身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嫁过来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983 年，她就经历了两回水淹：六月二十九淹了一回，八月初一淹了一回，一个多月的时间遭了两次洪水。

1997 年涨大水的时候，雨特别大，水冒得快，墙都倒了，水淹到古镇大部分的街道，她记得所有人都受了灾，但是有人察觉早，搬了东西到高处，损失就小一些。

“来水的时候，也有人通知你搬。那水来得太快，我和儿子去找人帮忙搬家，十几二十分钟左右，去的时候在小腿肚子，转来都到大腿了。水涨上来，把棉絮都打湿掉。如果是现在我都不会要，那时还要慢慢洗，不管洗没洗干净，还要晒干了——下半年还有冬天，没得棉被怎么过？”

古镇那场著名的火灾王瞎子也没逃过，“我屋头的照片都是娃的，我的都被火烧了。”那场大火把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一无所有，火灾过后，人情冷暖更是让她心如刀割，“当时烧的时候是早上，中午饭都没弄，像你说的那种人与人之间邻居之间，人家看得到的关系不错的，就说‘我这里做好你来吃嘛。’平常跟我们俩摆龙门阵摆得好的，那时候人家都不得喊你去吃的。因为想着你房子烧了这辈子就完了，你本来就是瞎子，娃儿又小，日子咋子过都不知道。他们就更看不起。”

如今的王瞎子早已融入盐镇的“芸芸众生”之中，大部分时候她家的门都关紧，下午三点以后，半扇门虚掩，每次进去，她都在做家务，择菜、削胡萝卜，带小孩……从不闲着。熟悉之后她也无意中透露，家庭赚钱的主力，她那个瞎子丈夫，从来不给她一分钱，而且早些时候还家暴她。

她两任婚姻生了四个小孩，小孩们又都生了小孩，从我居住的屋子二楼，能望到节假日时候她家的“盛况”：堂屋里的大桌子坐得满满当当，所有人都在说话、吃东西——那一刻看上去，她家和这镇上的其它人家，并没有什么不同。

芭茅村女人的女儿过了很久才回复了我的短信，说是政府在和她家谈补偿的事情，暂时就不和外界（我）联系了。多年的记者生涯过来，我并不奇怪这种基于利益的计算，一条命，换来几万块钱。

乡村里多的是苦难，大部分时候意外是突然袭来的：有倒在地里的劳作老人，有被河水淹死的孩子，跟外地人“跑了”的妻子，或者无故不归的出门人，诸如此类。但如果不是意外，大家不知死亡，活着就好，管它改朝换代，管它洪水滔天。

陈二娃也好，王瞎子也罢，她们都是由于篇幅、选材，或是其它原因没有如同王大娘那样写进书中，她们和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橘猫、黑猫、山羊没什么区别，活着就是唯一托举她们的意义，尽管你和我或许理解不了全部的意义。

那天早上起来，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往东，最后停留在码头，看着 100 多米宽的釜溪河，和古镇对面的村庄，最后的摆渡人吴长生还在河上，两只桨相互交叉，每天早上 6 点一直到下午五点半，一个月 20 天，来回摆渡，把河对面的村民送往镇上，把镇上的村民送回村里。

我去过一次摆渡人的家，普通的两层小楼，只有厨房安装了几片透光的亮瓦。屋子外面，被村里仅剩下的农田包围着。

吴长生是 45 岁来做摆渡人的，退休之后又被航运公司返聘。冬冷夏晒，从此岸到彼岸，如此生活二十年。他肯定不知道西西弗斯，如今河上有桥，桥上有路，只是要绕很远。“有些老的又不会开车，如果不摆渡，他们怎么办？”

我站在不知来处的田地里，头一次感受到四季的分明，大自然轮转的颜色，甚至是味道的差异。

我和数百人聊过，选择了十二位女性的故事作为切口，90 岁的陈婆婆（1932 年）、63 岁的李大娘（1959 年）、59 岁的钟传英（1963 年）、50 岁的董慧（1972 年）、40 岁的黄茜（1981 年）、37 岁的曾庆梅（1985 年）、35 岁的梁晓清（1985 年）、35 岁的陈秀娥（1987 年）、26 岁的詹小群（1996 年）、17 岁的黄欣怡（2005 年）。她们的生活细节几乎涵盖了三十年以来整个小镇的历史，这也是一本“乡下人的哀歌”。这方圆几里之内，我已经见识到了那么多形态各异的生命，不分高低贵贱地活着，在盐镇，人们拥有的，只有这条命。

夜幕降临了，透过家家户户敞开的大门，能看到小镇的人围坐在木桌前，认真吃饭——那就是这样的人在遇到生活的重创之后，最不擅长的。穿过漆黑安静的巷道，我知道悲伤之河正等着，但我必须独自渡过它。

而写作将是这条河流的船桨。



易小荷

资深媒体人、作家。《七个作家》、《骚客文艺》、《搜历史》公号创始人。代表作《盐镇》《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Dmitry Arslanov](#) on Unsplash

非虚构 盐约 易小荷 | 非虚构图书馆

“你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我走了也不会找你的，你好好活着。”

“她们的命运里，有你所不了解的中国。”

这是一本有关“愤怒的女性”的书，与约翰·斯坦贝克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一样：触及生活苦难的深处，抱以巨大的怜悯，爱，还有对不公正、对不平等的愤怒。易小荷通过这些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感慨“命运”是浅薄的，女性愤怒的指向清晰。

无论是国民性的挖掘，还是性别意识的自觉，易小荷似乎承继了民国一脉，这本书让我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它带给我的震动也同样如此，它蕴含的丰富性将让“盐镇”在文学和文化史意义上留下一席之地。



01

天刚蒙蒙亮，翠鸟叫了几声，陈婆婆睁开眼，看到大儿子站在床边，她忍不住叹气，用手指头隔空戳他：“你哟，渔船卖了九万块钱，也不分给你妈一点，你忘咯，粉刷的三千块钱，都是我出的哒……”儿子没有回答她，依旧站在床边默不作声。然后她真正地醒过来，连忙去蹲在自制的尿桶上，在稀里哗啦的声音里她望向空荡的屋子，才想起来大儿子两年前就得癌症死了。

陈婆婆这一生足够漫长，足够她送走身边所有至亲的男人。漫长的一生之间，阴天落雨，晴日刮风，河边野地的油菜花开了谢了，隔壁檐下的月季开了败了，古镇的新街子街空荡死寂，仿若一座遭受废弃的墓园，往来的鸟雀都不愿落脚。

对于仙市人来说，“陈婆婆”这三个字像是古老的咒语，人们提到时声音会不自觉压低，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就是那个开猫儿店的陈婆婆？”

她实在太矮小了，皱纹和老年斑攻占了她的每一处皮肤，半年前的一场梗阻性黄疸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她也因此瘦脱了相，手臂上的皮肤如同布袋一样，松散地挂在骨架上。手术过后，她不得不整天在腰间挂上一个黄疸引流袋。天气再热，她都会用一件长衣服遮住那个袋子。她长时间地坐卧在躺椅上，嶙峋瘦骨，给人的感觉

如同躺在躺椅上的另一张躺椅，但一旦有动静她就会睁开眼睛：“要买点啥子？”陈婆婆门框上的牌匾写着“渔夫人家”，卖冰棍、矿泉水和塑封的小玩具、不怎么耳熟能详的袋装食品。前些年主要卖茶水，暗地里容留妇女从事性交易。没有人记得住“渔夫人家”这四个字，虽然它们明晃晃地写在招牌上。这里的人们叫的是另一个名字：猫儿店。

“猫儿”，是自贡地区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

“一辈子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我问她。

“没有，没有，啥子都差不多，一辈子都为了要吃饭。”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摸索半天，最后从一个陈旧的木头箱子里掏出身份证，那上面的名字叫作“陈炳芝”。她说上面的出生日期是错的，她今年已经 90 岁了，而不是按身份证推算的 88 岁。有时候，陈炳芝的一只手会紧紧抓住一根晾衣竿，就像是她衰弱肢体的延伸，收拾床铺，撑着自己，或许对她而言，晾衣竿是比拐杖更让她感到有尊严的依靠。

1990 年，陈炳芝通过熟人担保借贷了些钱，租下半街的一个门面，又去镇上首富高森林家告贷，借钱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开了一个茶馆。这年她 58 岁。

陈炳芝的茶馆一碗茶水卖五分钱，一天下来，收入也没有三五块钱。据《富顺县物价志》记载，1988 年的学费是初中每人每学期八块钱，小学是每人每学期五块钱。但陈炳芝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读到初中——“还不是因为穷”，她说。

茶馆开张没多久，从前卖牛的黄居光来给她帮忙，招揽了一群卖牛的贩子，见天在茶馆喝茶、摆龙门阵。90 年代的某天，黄居光跟她说：“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啥子钱都赚不到。我帮你想了赚钱的办法。”那天大概就是“素”茶馆开始变成猫儿店的肇始。但直到现在，若有人问起这事，陈炳芝还是会对自己经营猫儿店的过往语焉不详，她坚称：“是小姐自己找过来的，至于是不是黄（居光）叫来的，我也没有问过他。”

2019 年，陈炳芝被“扫黄打非”抓了，判了个“组织卖淫嫖娼”的罪名，因为年龄太大，两年刑期监外执行。陈炳芝比较忌讳谈论这个话题，但并不是因为羞于启齿。“我没办法的。要吃饭，要养娃儿。”她的一只眼睛总是不受控制地流出眼泪，但是很快，就消失在皱纹的褶皱之处。她唯一担心的是，“将来要影响孙子的升学就业”——在中国，一个人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可能会影响到三代之内的亲属参加公务员考试、征兵、银行、国企、事业单位、军校和警校等的政审。而她的一个儿子正在为政府工作。

02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四川各地的乡镇陆续出现了卡拉 OK、桑拿房、歌舞厅等场所，自贡开始流行“想逮猫儿，去田湾儿”的谚语。自贡的火车站所在地田湾附近，各种各样的歌舞厅星罗棋布。逮猫儿的意思就是找小姐。仙市镇也有了好几处地下色情场所，陈炳芝开的猫儿店，是其中最简陋的一家。

镇上最开始出现的是卡拉 OK。何四娃和楚哥都把各自的地盘装修得富丽堂皇，打门口过，就能瞥见浓妆艳抹、年轻漂亮的小姐。后来何四娃赚到了一点钱，就搬回乡下去；而楚哥因为干这个事，把他老婆气得跳河，送进了精神病院，楚哥的手也在若干年后摔断了一只，现在吃着低保。“做这种事一定会有报应。”正街上的徐四娘说，“好人家没有干这个的。”

“他们两处的女人要周正点，我呢就是捡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家不要的小姐，就往我这里来。”陈炳芝并不在乎小姐的质量，她提供的是场所，获得的是几块钱的抽佣，“我想管他妈的，进两块钱是两块钱的事。床铺反正又晒（睡）不烂的。”

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开店，但是陈炳芝笃定主意：“我说管我的，你们又不给我一分钱。”附近乡镇许多老、弱、残、穷的男人，他们路过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卡拉 OK，那里面年轻漂亮的女子，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然而他们到了陈炳芝的房子里，只要付出二十块钱，甚至十五块钱，就能换来一位小姐睡觉的机会。

陈炳芝的低价策略非常彻底，她从不曾为了提高猫儿店的营业额而添置任何家具或者装饰。有的床坐上去摇摇晃晃，有的床是板凳垫起来的，她也将就着使用。“很多人喜欢往我这里跑，就是都晓得我收费便宜，有时候三块、两块都在收。”

她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实在看不出来曾是个淫窝，就连她自己睡的床，都是用几个木头板凳搭起来的。她说一辈子都没有睡过床铺，早先是买不起，后来觉得也没有必要。房间里光线阴暗，一股潮湿的气息使人疑心墙角长满了青苔。这间房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既是小卖铺也是厨房。放在门槛位置最显“气派”的透明冰柜装满饮料，然而其实并未插电——“想着好点。”缺胳膊少腿的粗木家具胡乱堆在一起，陈旧、过时，委顿于地。

无论成交价格多少，陈炳芝每单生意都只抽五块钱，如果没有生意她就不收钱，却依然给小姐们提供一天三餐。

陈炳芝一个人煮饭、洗衣、赚钱，五块五块地攒起来，养大所有的孩子，给所有的儿子买房子。她的一辈子跟了几个男人过日子，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依靠。

时间退回到 1932 年，陈炳芝出生在富顺县鸡公岭。她的父亲陈细蓝是教“鸡婆学”的蒙学先生，学生拿一些谷子就可以跟着学习一年；母亲毛淑芬是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女人。陈细蓝嫌弃她没有生出儿子，就抛妻弃女，和“小妈”一起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毛淑芬带着四个女儿艰难生活，只能在深山挖一些野菜或者砍柴卖钱。卖得一点钱，就买一棵青菜，放两粒盐巴在水里，煮一下就吃；卖不到钱的时候，把盐巴直接炒一下就着米饭也是一顿。

陈炳芝 18 岁离家，她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帮工是能换口饭的唯一活路。她先是离开瓦市去富顺县少湖路，帮一个叫何怀壁的人家带十个孩子，后来又在瓦市里面的黄支书家帮工，再后来去帮一个老师。因为常年没通过信，也没钱回家，妈妈毛淑芬以为她淹死在河里了，就沿着富顺的河坝头走，一边喊一边哭——人家说如果人淹死了，亲人去喊，人就会浮起来。那之后没过多久，毛淑芬就饿死了。陈炳芝在富顺去茶馆帮工，有天来了个川剧团在茶馆演出，他们唱《柳荫记》，也唱《一只鞋》《萝卜园》《陆文龙》《张羽煮海》《陈三五娘》等剧目。人声鼎沸中，她在干活的间隙偷眼望去，那个唱花脸的也正好看向她。

花脸叫邓修玉，结过婚，有过孩子，那又能怎样？陈炳芝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条件”挑选。他们遇到了，在一起了，但并没有如同当时的习俗那样成婚：如果两个人欢喜，男的要拿一两个大洋去算八字，合适就在一起，不合就算了，当然大洋也不用退。他们就是简单地住在了一起，没有仪式，也没有大洋。

旧时代戏班漂流四方，戏子不仅被划入“下九流”之列，收入也不固定，请的茶馆多，才能挣到一点吃饭钱。稍不留意还会碰上“砸戏台”的厄运。据《自贡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自贡“品玉科社”有一年在资阳临江寺演出，会首点唱《破单子》一戏，有一位丑角佚名唱道：

“天黄黄，地黄黄，人黄黄。天黄有雨，地黄有灾，人黄有病……”会首认为这几句话含沙射影，挖苦这个地方，于是叫狗腿子们向台上抛砖头、掷石子，演员和锣鼓匠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甚至被打成重伤。

邓修玉随着戏班四处唱戏，一走就是很长时间，也没给老婆留下一分钱。1957年，陈炳芝肚子大了就快生产，通知不到邓修玉。居无定所的她，就在仙市的河边找了间废弃房子栖身，连草席都没有一张，只能把谷草铺在地上当床，所幸尚有一床薄被。邻居罗启看不过，拿来几个瓦盆、两双筷子送她。她自己又腆着肚子从野外搬来一坛石头做桌子，没有板凳就席地而坐。陈炳芝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房子里，偶尔拿根棉线放在桐油碗里点上灯，等孩子降生，或者等丈夫突然回转。临盆时候天已黑透，身旁无人，她拿着把旧剪刀惊慌失措，隔着薄薄的墙壁，问邻居冯大娘：“这脐带咋子剪嘛？”

冯大娘生过五个女儿、两个儿子，隔着墙壁教她：“剪刀比起磕膝头儿（膝盖）剪起，然后用线来套起。”

“这娃儿落下来，耙嗒嗒（软绵绵）的，咋子包起来哦？”

“莫慌，你拿裙子来兜起嘛。”

她小心翼翼地拿裙子裹起婴儿，抱在身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她顾不上痛，就起来打扫、给自己做吃的。

几年以后，生下第二个儿子没多久，邓修玉离家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被逮进了监狱，总之这个男人从此在陈炳芝的生命中消失不见。30岁的陈炳芝拖着两个儿子，跟了一个叫作张运成的渔民。

张运成是退伍军人，打过仗，离过婚，性格暴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打断了左手。那时候还没有退伍转业费，国家能提供给这位残疾退伍军人的唯一福利，就是可以去供销社打招呼，预留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肉和酒。

张运成嗜酒如命，每天要喝一两斤酒。看到陈炳芝和哪个男人多说了一句话，拖过来就打。张运成身材高大，即使只剩下一只右手，力气也大得很，身高不到一米五的陈炳芝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把我按到地上，我躲了一下，他的手敲到咸菜坛上，都能留下很长一条血口。打一次架，我头发都能被他扯脱几撮。”

陈炳芝挨打是家常便饭，他酒喝多了打，推船推得累了就按到河边打，把她的头浸在水里面，直到她气都出不过来，才又把她拉起来。周围的渔民看见了喝止，他才住了手。

“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报官，可以离婚。很多夫妻都那样。”陈炳芝说。

既然“都那样”，日子也就可以忍着过下去。在陈炳芝给张运成生下了儿子小俊和女儿小红之后，她忍无可忍跑掉了。张运成就来找她赔小心、说好话，陈炳芝一辈子也没听到过几句甜言蜜语，俩人就又在一起，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小五。

打架之外，两个人便在釜溪河上撒网捕鱼，又上岸到很远的地方卖鱼。那个时候人们没什么钱，改善生活通常是割猪肉，很少有人吃鱼，把鱼卖掉也是件难事。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回一次家，几个孩子在家自己做饭喂饱自己，自己哄着自己入睡。

仙市小学的老师古四和陈炳芝的女儿小红从小是同学，经常放了学去她家玩，却几乎没有见到过陈炳芝夫妇。“她哥哥和她好像永远没人管。每次去她家都没有大人，也没有饭吃。她常年脖子都是黑黢黢的，还是我们去她家给她烧水，督促她洗澡。”1969年，陈炳芝生下小五，坐月子第七天，张运成喝了酒去鱼洞捕虾，脚在崖上没踩稳，摔下来断送半条命。陈炳芝求两个邻居去帮忙抬，谁料想刚到河边拐弯处，绳子断了，又把他摔了一下。到家后找赤脚医生拿了药吃，转天睡醒，陈炳芝发现男人已经断了气。

第二个男人也死了，陈炳芝又在世界上无依无靠了，张嘴要吃的孩子倒是五个，其中一个还在襁褓之中，没办法，只好把和张运成的大儿子让张家领回去养。

“后来张家把张运成抬回玉河坝去埋的，再后来，他兄弟也死了，妈妈也死了，嫂嫂也死了，全家都死光了。”

“他死了，你哭没哭？”我问。

“还在月子头，他就打我，我才没有哭。”

陈炳芝的第三个男人叫袁新历，俩人生了一个女儿，这是她的第六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那个年代没有避孕这个说法，国家鼓励“人多力量大”。袁新历是个跛子，走路一瘸一拐，也靠打鱼赚点零钱。与张运成相比，这是一个堪称温柔的男人。小红回忆说“见他打过我妈”，陈炳芝却断然否认这一点。

在一起没几年，袁新历就得癌症死了，这时候陈炳芝四十出头，在粮站搬运重物养活五个孩子。生活当然仍旧是惨淡的，几个孩子都没有正经衣服穿，一天基本只吃一顿，就是把一点点蔬菜煮进稀饭里。

“那时候娃儿腿裤儿（里面有棉花或者衬裤的裤子）都没穿过一条，布鞋都没穿过一双。”妇女主任郭六娘看不下眼，给政府部门反映陈炳芝的困境，在别人捐助的衣物中分了一点给她的孩子。

这个残破家庭的所有孩子，都是自顾自长大的。小红说，父母从来没有教过她女孩该如何保护自己；二儿子小理翻遍记忆，也找不到任何一道“属于妈妈的菜”——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就是自己带着幼小的弟弟、妹妹，给他们做饭吃。吃得最多的是稀饭，里面放了苏打粉，黏糊糊泛着绿色，时常连碟菜都没有。

最小的儿子小五也最不省心，他对父亲张运成——那个脾气刚烈的退伍军人——毫

无印象，生下来才七天也不可能有印象，却把他的脾气遗传得别无二致。那些年在仙市，“小五”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打架”。有次去瓦市看电影，有人占了他的位子，小五和人家打了一架；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偷吃别家的甘蔗，挽起袖子就把那人一顿打。这样的事情不知凡几，但陈炳芝从未为此数落过儿子。陈炳芝不觉得小五打架有什么错，她认定儿子就是“见惯不公平的事”。

“我这辈子，打架都打伤（腻）了。”小五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和邻居罗聋子打牌，因为欠钱没给，罗聋子就出去到处跟人家说，正好被小五听见了，觉得伤了自尊。那天陈炳芝在家里，看见儿子冲进厨房拎着菜刀就往外跑，她吓得跟出去，就看见罗聋子一边的脸都被儿子砍掉下来了。

“脑壳上五刀，肩膀背上还有两刀，我看到血飙出来，才去自首的。”小五说起自己当年的鲁莽，记忆犹新。那时候陈炳芝在公社挑潲水，四处扯红苕藤，喂着几个肥猪。小五被公安抓走了，她只能把肥猪全部卖掉，凑齐了五六百块钱，拿去医院赔偿了人家。好说歹说，小五才被放回家。

“他后来当了兵之后，才好了很多。”陈炳芝从未从父母处得到任何教育，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管教小孩，只拼命赚钱喂饱他们，衣服破了帮他们补，小孩打架伤人，她也就一次次地掏空家底去赔偿。

如今的小五穿着交通辅警的制服，说话和气，满脸都是憨厚的笑容。当兵之前找不到工作，他就给邻居挑水，从湾湾那头挑到街上，几里路，一担水七八十斤，挑一趟五毛钱。

03

袁新历死后，陈炳芝开始尝试做小生意，煎豆花、豌豆卖，一分钱一勺；卖凉水，一分钱一杯。她守在小学门口的黄葛树下，等放学的时候学生来买。

后来陈炳芝陆续做过各种小生意，她乐于投入，曾经托人花了两千多块买煎花生的机器，一天能卖出去十几、二十斤花生。“可惜现在没人要，只能当废铁卖几块钱。”她也买过绞肉机，一千多块钱买的最后三百多就卖了，还有绞糖机等各种机器。她还特别敢于尝试，但凡听到或者看到可以赚钱的小生意，就毫不犹豫去做。

做生意需要投入资金，镇上的人都靠民间借贷，彼此约定好利息、期限，便可放贷。陈炳芝在这点上极具魄力，她做生意的设备和本金全是借贷而来，只要约定了还款期限，到期之后即使没有赚到钱，她也会从另外的邻居那里再拆借，多付利息也要履行承诺。这使得她的信用极高，邻居们都愿意借钱给她。

在仙市小学的钟老师心中，陈炳芝做生意敢想敢为，就是“仙市上的董明珠”；媒婆王大娘也把陈炳芝称为“仙市的女强人”。镇上的人都见识过她开猫儿店生意兴隆的“盛况”：茶馆的门敞开着，每个桌子面前都坐满了老头，他们挨着那些小姐，嬉笑放松，叶子烟的味道浓郁呛鼻。茶馆的门廊处，陈炳芝也支了一个摊子，卖些鱼线、渔网等渔具——她不会浪费任何能赚钱的可能性。

90岁的陈炳芝身上，精于算计的女强人形象在打牌的时候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那是她唯一的娱乐活动。”二儿子小理说。菜市场附近的一个茶馆，坐满了乡镇赶来的中老年人。这种茶馆投入极低：简易的桌子，塑料板凳，几副麻将就行。陈炳芝显然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她是整个茶馆唯一坐木头靠椅的人，老板还给她特意垫上了棉垫。

陈炳芝坐在一群年龄比她小二十多岁的老头中间，身量瘦小，几乎有点小学生上桌的感觉。她身上穿着明显用于节假日的笔挺外套，白头发一丝不苟梳到脑后，用发夹钳住鬓间的碎发，甚至穿了双干净的黑布鞋。和趿着拖鞋、露出粗糙脚后跟，满不在乎的老头们相比，她的妆扮堪比女王。坐在对面那个浑身印满“Boss”花纹的老头今年也70岁了，他是陈炳芝第二任丈夫张运成在和她结婚之前的孩子，陈炳芝一言不发，没有一点寒暄的意思。她只死死盯着桌上的纸牌。

这是一种只在沿滩乡下流行的纸牌游戏“猫儿牌”，一副牌去掉一对黑8和一对黑9，保留2到7，再加上四张K，也就是所谓的“金”，一共三十二张，四个人打。打法有点类似于比大小，到三轮后才可以“拖金”，就是出的牌大于其他家再加上手头的K，就可以直接赢钱。当然最后出的“接牌”也很重要，就是如果手头只剩下两张，一张大过其他家，一张是K，那也可以稳赢。

老头们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出牌随意，陈炳芝目光锐利，戴着手表的手腕不管不顾地在牌桌上翻动，她终于忍不住跟“Boss”花纹老头说：“你是头家，前面出过一条金；肯定还有三条‘金’在外面，你明明有一对，就应该尽量出一对噻！出个这么小的单牌，让他逮住机会拖了三条‘金’，你咋子这样不讲究，不然我们输不了这么多……”

那一刻，好像有另外一个人从她那个弱小的皮囊里钻出来，那是一个经验丰富、察觉一切的猎人，随时可以在变幻莫测的牌局中运筹帷幄。

陈炳芝的茶馆几易其址，最早位于仙市镇汽车站旁边，守着通往自贡市区的公路，本地人和往来客流都可以截住。自从汽车站旁的菜市场搬到更里面一点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才失去了最中心的地位，照相馆、副食商店和一家音响震耳欲聋的垃圾回收站如今取而代之。

兼营猫儿店之后，陈炳芝秉承着成本最小化的原则，除了最初开茶馆就有的黑白电视机之外，并不添置任何固定资产，连床铺都是用竹子砍的——把竹子劈成四爿，排排摆在一起做床板，下面用板凳缠好做床脚，再铺上棉絮，这样一看就是七八张床。“不像别家都买的是席梦思。我这里的女人尽是四五十岁，一个个很丑的。收费十五块的我就抽两块，二十块就抽五块。最年轻的也就是三十块。做得到，就抽点钱；做不到，就不收钱。不管有没有生意，我都要管她们的一日三餐。”陈炳芝说，她的茶馆都是收留“别人不要的”小姐，仙市上的很多人至今记得那些女人的粗腰和拙劣的腮红颜色。

“比如‘姚排骨’没有奶（乳房），别个嫖客都嫌，她赚不到钱。可是她要吃饭啊，至少在我这里还可以帮补她点伙食。我说我不抽你的钱，你来吧。我这个人心善，看到人家难过，钱都不要她的。都要吃饭嘛。”陈炳芝回忆说。

在陈炳芝的描述中，她更像是一个“场所提供者”，多过于是一个“组织经营者”。小

姐不愿意去打针，她也不会强迫她们：小姐喝酒惹事，她也管不到她们。20世纪90年代生意兴旺的时候，最多有七八个小姐在陈炳芝的茶馆里讨生活，也有政府部门（防疫或者其他什么机构，陈炳芝记不得了）一年会给他们发两三百块钱，还免费发避孕套。隔一段时间来查一下小姐有没有性病，有病就给她们打针。

90岁老人的记忆有时候并不太靠得住，陈炳芝声称她早就不记得那些女人的名字和事情，叙说的过程中她时常就摆摆手，“记不到咯，记不到咯。”不过有时候个别细节又灵光一现，比如一个叫小梁的，个子也高，头发浓密，“屁股登登的”，很勤奋地做生意，一天接二十来个人，再加上有时候包夜的一两百（“我也只抽十块钱”），可以赚到四五百。赚到了钱之后，她就在自贡买了门面和房子，然后很快就金盆洗手去做包租婆了。

也有完全不会做计划的小姐，比如那个做了几天就跑了的“新疆姑娘”。“新疆姑娘”是个绰号，她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人们都说她是从新疆被拐卖过来嫁人的，实际是哪个地方的人，任谁也不知道。刚来仙市镇的时候她才十几岁，长得就像外省人，鼻子很尖，个子不高，身材一般。她跟着一个所谓的“干妈”在卡拉OK做皮肉生意，赚到的钱都交给那个干妈。后来年纪渐长，就到了陈炳芝的茶馆继续做。

新疆姑娘脾气不好，喝多了酒就开始闹。陈炳芝觉得新疆姑娘看着就像是傻的，因为她连钱都不会算，十块和一百块分不清。她看到一个人觉得很亲热，就抱着人家亲嘴。“我说你不要对我亲热。我帮不到你。”

陈炳芝有一次跟她说，你为什么不让派出所送你回老家呢？她回答说派出所也没办法——她太小离开家，压根就说不清家里的位置，没上过户口，更没有身份证。

2022年3月的一个周末，新疆姑娘路过“渔夫人家”，拖出张板凳坐在门口，喝了两瓶啤酒，又和别人要烟抽，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陈婆婆聊着天。那也是新疆姑娘第一次跟陈炳芝提到自己的身世，她现在的男人姓赖，“他骂我卖×，但他自己又打牌又好色，我手头好不容易攒了一千块钱，都被他拿去输了。”

陈炳芝说：“前些日子我生病你都不来看我。你有个装娃儿的背篼在我这里放了两年，你不来拿，我要是死了，娃儿可能就拿去丢了。”新疆姑娘说：“那就不要咯。”坐了一个多钟头，陈炳芝开始赶她走：“你快走，我这里出了名的。一会儿派出所看到，又说我在做生意。”

新疆姑娘摆摆手，摇摇晃晃回家去，陈炳芝目送她的背影，就像无数次目送其他人离开一样。

过了几天，就有人顺口告诉陈婆婆，那天喝了点酒的新疆姑娘打算横穿高速公路——她家住在姚坝新湾，绕着走很远——她冒险穿这条捷径看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一辆小车把她撞到地上，车上的人下来刚打算去拉她，后面刹不住脚的一个大车又撞了过来。新疆姑娘头都给撞没了，只剩下两个脚杆。本来是她自己的错，不用赔钱，最后车主还是给了三万块。她留下了四个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早就送了人，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小一点的儿子，由政府帮忙抚养。

陈炳芝到最后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两年前猫儿店生意关了之后，新疆姑娘说她也失业了两年，算起来今年应该是三十来岁。

“她在我那里也没干过几天，喝酒就骂人，有的嫖客和她对骂，她就拿刀挥来挥去。因为总闹事，（小）五儿还把她赶走过一回。”陈炳芝叹口气说，“死了也好。她这辈子，也造孽得很。”

04

每攒到一万块钱，陈炳芝就买下一间房子。她倒未必有什么高瞻远瞩的投资眼光，或许只是出于从小就居无定所的不安全感。随着古镇的开发，那些房子升了值，除了抱出去的张家老大，三个儿子每人都分到了一套，就连她现在的这间店面也是许给了大儿子的。“等我将来死了，就留给大儿媳。”

陈炳芝一辈子跟三个男人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感谢老天爷，他们全都被养活了。邓家的两个儿子和她感情亲密一些。邓家老大从小跟着父母打鱼，十几岁交了女朋友就出去自立门户，凑些钱买了条渔船在河上讨生活。好不容易，他年纪大了，生活条件好转起来，就赶上古镇禁渔，两年前又得癌症死掉了。

邓家老二小理，被其他孩子公认为“妈妈最爱的一个”，2022年也已经62岁。据说陈炳芝唯独分给她两套房子，这个决定让其他孩子觉得“他就应该多照顾点妈妈”，尽管陈炳芝否认了这个传言。而小理自己觉得是因为他脾气好，老人家不免啰嗦，他耐得下性子而已。他个头不高，身材敦实，说话的同时就能瞬间组织好脸上的笑容，不管外人说什么，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指给我看河边的旧房子：“以前过的日子，说艰苦都不足够。”就像镇上大部分的子女，陈炳芝叮嘱的事情，他会照做，没有什么抱怨，却也没有特别地亲密。他离婚之后一直在努力寻找第二春，每天早上过来陈炳芝这里报到之后，就要立即回家洗衣服、做饭，伺候新交的女朋友和孩子。早些年，小理一直都以开摩托车载客为生。2001年8月，一天晚上酒后送好朋友古华回家，到田湾那里瞥到条狗，鬼使神差就摔倒到旁边那条很小的沟壑里。古华没什么大碍，小理不仅摔断了肋骨，手臂至今都弯不过来，手术过后的伤疤触目惊心。他因此被评了个残疾，现在一个月拿着两百多的低保。

陈炳芝和张运成生的大儿子被抱回张家养，因为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从小在外面流浪，自己养活自己。古镇有人说他学坏了，从仙市到火车站跟着人家做“撬杆儿”（小偷）。现在他就住在离陈炳芝不到一里地的仙市中学附近，据说他恨他妈，母子之间基本没有来往。

女儿小红的境遇在六个孩子中算是比较顺遂的，19岁和邻居家孩子结了婚，婚后生了个儿子。丈夫是做老师的，她在古镇开了个“红姐餐馆”，虽然经营惨淡，好在丈夫的工作稳定，儿子成年后也早早结婚生子，后来离了婚，又再结再生。

小儿子小五做辅警，每个月一两千块钱，媳妇一直在家，最近才去找工作。他的孩子生得晚，每月工资除了他自己要抽烟喝酒，还要供儿子上高中。小五每天早上上班，开着电瓶车“嗖”一下就从小店门口飞过去，母子二人也不打招呼，他说跟母亲一见就吵，“说小声了，她听不见，大声了，她说我在吼她。”

90年代中期，随着最小的女儿远嫁泸州，陈炳芝的人生任务基本完成。虽然没了压力，她依然将猫儿店经营下去，谁都没想到，它会成为仙市镇维持得最久的卖淫场所。她一生中只去过小女儿家一次。面对牢笼般的楼房，她百般不自在，不能敞开门窗通风，也不认识楼上楼下的邻居。早上六点，她就起床到附近的菜市场转，琢磨那里的母鸡多少钱一只，小菜多少钱一斤，烟多少钱一盒。后来回到仙市的时候，邻居笑她：“怎么弄回一大堆扫把？”因为泸州的扫把才三块钱，仙市要卖十块钱，她就带了一堆扫把放在门口卖，把路费赚了回来。

除了泸州，她没有踏足过其他城市，她人生后几十年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出门左转二十米的河边，到出门右转的电线杆，然后回到那间光线阴暗的小屋。精神利索的时候她会去看看附近的广场舞，为了省电，电视机一年也难得打开一次。

陈炳芝在第三任丈夫袁新历死后，再也没有跟过任何男人，或者说她原本对任何男人都没有什么指望，问她如果她的男人也出去嫖，她怎么办。她说：“看每个人咋个想，反正我觉得只要他把家庭照顾好，拿钱回来用，让家里有得吃有得穿就行。”

开茶馆的时候，牛贩子黄居光来帮忙将茶馆转型做猫儿店。“他卖了牛或者做生意赚了钱，也会时不时帮补我一点。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讲道理的人，嘴巴很来得，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跟你分析清楚。”

镇上的人都说黄居光是陈炳芝的情人，但她断然否认：“人家有婆娘的，不要去惹，闹起来很恼火。”没过几年，黄居光得了肺病死了，她原来想去看看，祭拜一下，最后也是作罢。“人家家里有大娘，我这样子去不太好。”

黄居光死后，陈炳芝再也没有找过帮手，始终自己一个人经营茶馆。

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出现在她80岁那年，只有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她的脸上会出现一丝温柔的表情，男人的名字也是张口就来：“他叫张明辉。”

张明辉是庙里的一个居士，比陈炳芝小十几岁，做完事喜欢来茶馆喝茶。他性格内向，是个好人，哪个邻居屋顶的瓦漏了，跟他说一声他就爬上去帮忙，偶尔得包烟抽亦是欢喜。

张明辉有一身好力气，给庙里挑水，一百块钱一个月，后来用水量大，庙里就给他涨到了一百五十块。在陈炳芝漫长却乏味的感情生活中，张明辉是对她最体贴的一个。“他会把饭煮好，舀到桌子上放好，洗澡水、洗脚水都给你放好。”她停顿了一下说，“可惜就是没得钱。”

俩人好上刚一段时间，张明辉开始吐血，隔几天又吐。因为没钱，就没去医院，后来转成了肺气肿。他有个儿子，就把他接回家去照顾。从那之后，陈炳芝再也没有见过他，等后来得到他儿子通知的时候，张明辉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他才62岁，如果早点医，其实是医得好的，就是没得钱。”

张明辉死了，陈炳芝又重新过上了一个人的生活，每天摆摊、守摊、收摊，每周去自贡市里进一次货。小理要叫她一起生活，陈炳芝说：“我一个人生活惯了，算了吧。”

05

陈炳芝每天早上六点醒过来，撑到八点开店，小理有时候给她代买点油或者急需的生活用品，帮她清理头天的便桶，然后就要匆匆赶回去给女人孩子洗衣服、做饭。她坐在店里守着，卖点小东西出去，如果需要搬运重物，她也会拜托过路的行人帮一下忙。下午五六点，小红过来帮她收摊，遇到她打麻将赢了钱，她就让小红给自己买一袋苞谷粉。

一个人的生活如此安静，简单到连一只猫都容不下。隔壁养的母猫生了小猫，她只喜欢小的，不喜欢大的，因为“小的不乱跳桌子，也不会拖走吃的”。木质房子容易招老鼠，一到入夜，它们就会在房梁上肆意奔腾，这种时候她就会去借一下猫。那种对猫的喜爱当然也是有限的喜欢，她甚至不曾伸出过手抚摸一下猫，或是轻声呼唤它们——在她眼中，猫和猪、马、牛的作用本质上差不多，都算是家畜。

她每天都盼着天亮，也许就是单纯地沉迷于做事，从表面上看起来，她是一个连掏出一块钱都要哆嗦半天的人。去年开始，为了游客的方便，她的小卖柜上也开始立起微信支付的二维码，那其实是她长孙的，卖出去十块钱，她就往墙上的塑料袋里放入一颗大花生，卖出去一块钱，就放进去一颗小花生，到周末再根据花生的总数统一跟孙儿索要现金。

有天来了一个年轻女人——“我把她认错了，以为是我的幺女从泸州回来了。我问她，你回来了？她答应我说，啊我回来了。”——女人买烟，拿了一张一百块钱的，陈炳芝补她八十五。“那会儿我有个钱箱，里面有八百块钱，她跟我说，把你钱搁回去，我说得嘛，结果后来钱箱里的钱全都不见了，手镯、两个戒指也被她摸走了。最后发现就连收的那一百块都是假钞。”

陈炳芝清醒过来，那个女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隔壁老太婆说记得这个人，监控器也找出来这个人，二十来岁，圆脸的，牵着个八九岁的娃儿。陈炳芝却不知道自己为啥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完全不记得当时的具体状况。

后来陈炳芝承认，那会儿还干着猫儿店的生意：“年轻女娃儿说明天再来。我说要得，想着她长得漂亮，看她的意思，要做个把儿生意也可以。等我醒过来才觉得，不对……”

那不是陈炳芝第一次上当受骗，毕竟年龄大了，她被假钞骗了无数次……这都还只是小小的损失。再后来陈炳芝把小五的房子给卖了，赚了十二万，给了小五七万，留下了五万。2016年，又凑齐了十二万借给了江平。

江平也是仙市本地人，比新河街的黄茜高一个年级。读书的时候在仙市中学并不起眼，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个包工头，开个车整天晃来晃去。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也参与到放高利贷的行列当中，江平揽储能给出五分利（在民间借贷中，几分利就是月利率百分之几的意思，五分利就是月利率5%），也就是一万块钱一个月能拿到五百块钱，比银行高出不少，也有些人着实在他手头赚到了不少的利息，比如小红，借出去十万，一年就能拿到六万块钱的利息。

于是那些年仙市有钱的人都争相把钱借给江平，住在陈炳芝对面的邻居，也就是黄二姐的前夫松伯也借给他八十万，就连卖猪肉的笑平都凑齐了二十万借给他。

陈炳芝借出去十二万，刚刚收到三个月的利息，江平就失踪了。

债主们去乡下找他，才知道他早就和老婆离了婚。那些钱被他赌博全部输掉，于是他又不停地借，企图翻盘，又输，又借，直到累积到五百万这个天文数字，实在还不了，就四处躲藏。

他唯一剩下的一辆车被先找去要债的人当了，松伯气不过找人去打他，还倒赔了四十万医药费。他们也打不了官司，借出去的钱连个起码的借条都没有，而且他也没说他不还。

就这样，陈炳芝手头的一点养老的钱也泡汤了，她自己倒是显得无所谓的样子，“多聪明的人都被騙了，狗日的（江平）死沒死都不知道，拿不回来还能咋子办？”

陈炳芝将手头的最后一套房子卖掉，几个孩子想把卖房所得的三十万分掉，小五说留着将来给妈妈住院、办后事。

一天三餐她自己煮给自己吃，因为“娃儿些吃得淡、吃得硬，我吃得咸、吃得耙”。偶尔隔壁“徐大姐餐馆”客人吃剩下的菜，她看着可惜，要过来也是一顿。对面酒厂扔掉一坨塑料袋，黄二姐跟她说的是冰箱里放的猪儿耙，时间太久了，她也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热一下，又是一顿。

她不记得什么“自然灾害”，但她记得年轻时吃过“白善泥”，把长在石头上的白色的颗颗锤下来，和着灰面烙粑粑，吃了以后便秘到都屙不出来屎。她大概因此一辈子都对食物匮乏有种不安全感，做生意就是为了要吃上一口饭。

偶尔她也会伤感起来，抱怨孩子们周末吃的好肉好菜也不给她端一点过来，这种时候多半她也要和自己强烈的自尊心作战，毕竟她独立了一辈子，没靠过男人，没靠过孩子。第一次动完手术，有天小红扶着她，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派出所的一位领导（后来知道是所长）亲切地问她多少岁了。她说：“快 90 岁了。”所长吃了一惊：“婆婆，等些天我去看你哈。”果然过了些日子，所长送来了二十斤米、一桶油，还有一根拐杖，前两样她舍不得吃拿去卖了，至于拐杖，她小心翼翼放到一旁，够不着的时候宁可使用晾衣竿——她可不愿意用这根看上去就是拐杖的棍子。

“拿那个多让人笑。”她说，似乎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刚动过手术，已经有点颤巍巍的老人。

06

直到 2019 年，猫儿店依旧在营业。有个姓王的女人找到陈炳芝，她家住在瓦市那边的村里，四十几岁，老公生了病，有两个娃儿，上面还有个八十几岁的老婆婆。她是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的，和男的打工认识了就跟了过来，也是刚刚出来做，只收二十五块钱一次。“看着就很造孽。”

客人们都说她很温柔，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是个靠谱的人。

那个时候派出所已经开始严打，一开始他们就在门口骂，“喊你莫做了！赶紧走！”，把小姐们都吓走了。陈炳芝也没太在意，以为还像原来那样只是做做样子。

那天早上六点多，门没关。陈炳芝还躺在靠大门的床上，姓王的女人和那个嫖客在里面的床上，突然，警察破门而入，据说是邻居举报，就这样他们被抓了现行。陈炳芝被判管制两年，姓王的女人被派出所审问了一天，送到乡下去了解家里情况，发现她的情况确实很困难，就没有处罚她，但是需要随时听通知去派出所报到。

陈炳芝也需要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和很多人一起开会，有的时候陈炳芝还会忍不住就哭起来：“早晓得这样赚不到什么钱，又怕小五的孩子受影响。”直到生病了才没有继续去报到开会，而猫儿店也就此彻底停摆，警察也不再上门来吼。

陈炳芝从来都不懂也不了解她的猫儿店“是否违法”。她只知道自己要吃饭，而且仙市也开了好几家，此前许多年没有人来找过她的麻烦，个别的领导问起她的情况，知道她靠这个养孩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一辈子连报纸都不懂得看，又怎么会察觉到时代的变化，也不知道新上任的领导要狠抓狠打，不懂得新闻媒体上提到的“扫黄打非”，更不懂得“完成任务”这四个字的含义。

她的低保也因此被取消了。大儿子刚刚死的时候，陈炳芝去找过一回社区的罗主任，他说我帮你反映一下。后来他就跟小五转告说不行，你妈妈毕竟有几个孩子。

“他们就是针对我。”以陈炳芝的自尊，问了一回被拒绝了，也就不会再问第二回。

那一年什么都不太顺利，年底的时候武汉暴发疫情，即使整个仙市都没有出现过一例，古镇却封闭了一段时间，几个入口都有人把持，居民凭借出入证进出。

听到几个过路人闲聊疫情，她完全不懂，“以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说，只有猪瘟鸡瘟，没听过还有人瘟的。”

陈炳芝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螺蛳壳里面，她从不关心政治，只能认出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数字，除了自己那条街道上的老街坊，连多走出去两步距离的仙市老人都认不全，晚上收完摊偶尔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剧，座机或者手机都没有一部，更别说像古镇的嬢嬢们去录那些抖音视频了。

偶尔，对门的黄二姐过来坐个几分钟，两人扯一点闲篇，这就是她新闻的主要来源。黄二姐跟她说哪个国家又打赢了。她插嘴说打得赢啥子嘛，毛主席都解放几十年了，打得赢啥子嘛。她关心得更多的是听说米也涨了价，油也涨了点价。

陈炳芝的记忆库里，只有“毛主席”，她并不知道现在的国家主席是哪个。她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的，因为过去“一个人造孽（可怜）就一辈子造孽（可怜），没得一个月的一百多块钱的低保，而现在田土占了的，还拿养老保险给她。哪里又不好了嘛？”她一天书都没读过，不懂什么叫作“文化大革命”（得说“文革”），也不知道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她没有听过周璇的《天涯歌女》，也不知道阮玲玉、邓丽君，她唯一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只是凭借升斗小民的简单生活来感受大环境，一旦提起某些那个年代的专有名词，或者“批评”政府时，陈炳芝就会像那个年代的许多过来人一样，压低了嗓门。

唯一让她惴惴不安的，是从前衣服破了，补了就接着穿，现在随便一件衣服都比那会儿的好，却穿一件丢一件。而好好的饭菜，吃不完就那样倒了。“看着心痛，浪费太严重了。”她说。

2020 年疫情肆虐的时候，政府号召大家打疫苗，瓦市的一个老姐妹，坐着车专门来接她，说打一针新冠的疫苗能得两百块钱的补贴。她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完全不考虑自己快 90 岁的身体有没有副作用，并且一直对此念念不忘，打完之后还盼着，直到听说第二针没有任何补贴了才作罢。

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病魔大概已经顾不上她了，她就连感冒发烧都不曾有过，就如同鸿公岭的一棵野草，风吹雨打都影响不了它的野蛮生长。如果说她有什么养生秘诀，那就是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卖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她说话的声音都是生动而活泛的，即使没有生意，她也会挑出来一条围裙、一条裤子，一针一线慢慢缝制。“你帮我一个忙行吗？”那天她小心翼翼地说，“娃儿们都说忙，没一个愿意帮。”她从床铺的最里面翻出一个掉漆的红木盒子，里面是各种黏糊糊的陈旧硬币，她想去银行换钱，又担心被银行的人嫌弃。

第二天当她拿到五十块钱的纸币的时候，整张脸都笑开了，她说这两年收入锐减，一个月能赚个几百块钱都算大钱。这间房子早就划给了大儿媳妇，每个月还需要向她额外支付房租。

不管怎么说，这半年她的生活似乎过得比之前更好，有一天不认识的一个游客非要给她两百块钱。“这是哪里来的菩萨哦。”她把纸币小心翼翼收藏到了红木盒子里，里面还有一张 70 岁时领到的免费乘车证和一张旧身份证件。

“你要啥子？”她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柜台前。一个期期艾艾的老头站在那里，躲躲闪闪的目光扫射进来，他穿着陈旧，一看就是久居乡下，没有和时代接轨的那种老年人。“你赶紧走，你走。”陈炳芝突然强硬起来，也不解释为什么，挥着手，如同对方是个讨厌之极的人。

“早都不做那种生意了……”看到老头走出去两步，还在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看，陈炳芝嘟嘟哝哝地抱怨说，“哪个不晓得我这里出了名的……”又伸出手来摆摆，“你快点走，你走。”

坐下来又歇了一会儿，一如之前每天那样，她都要自我总结一下：“今天又只卖出去一包烟，一下雨，冰棍一支都没有卖出去，还有那个玩具不好卖，人家宁可去陈家祠那边的广场去买，回头再也不进了。”这一天是周末，门口一共过去了十个游客，其中有两个去对面酒厂打了瓶酒，其他的人都只是匆忙地经过了而已。天很快就黑了，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听见房间里窸窸窣窣的动静，她一点都不害怕。不管怎么说，只要不是冬天，日子都比较好过一些。这间房子没有空调或者暖气，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四面漏风，只能用三床旧棉絮压在身上保暖，晚上睡觉会被压得喘不过气。她也有自己夜晚的小快乐，比如，头天晚上做梦看到死人，和死人摆龙门阵，拉屎在茅房，或者看到红色的东西，她早上起来就喜滋滋的。果然当天生意就会好一点，烟都多卖两盒。

“拉卡拉到账，五元钱。”——这就是 90 岁这一年她认为的“人生意义”。

07

2022 年 4 月 16 日，因为胆道感染，她再一次入院治疗，这一次和四个月之前的手术大同小异，并不是什么大手术，她购买过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八千多，只需要再支付四千多块钱，然而她对整个过程稀里糊涂的，只知道把手指上的金戒指，耳朵上的金耳环都委托孩子们卖了，大概一万块钱，她手上抓着一把单据，嘟囔着我又不认字”。

1 月和 4 月的这两场手术，把“陈炳芝”彻底地打成了“陈婆婆”。她如今苍老、衰弱、无助，一无所有。

作为古镇年龄最大的女性，陈婆婆很有可能随时离开这个世界。在镇上，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信奉土葬，认为保持躯体的完整，才能保持灵魂的完整。他们离开之后，子孙后辈也往往要通过“做道场”来表达对亲人的不舍和孝顺，否则就会被邻居朋友们数落，某种程度上，那些仪式复杂的道场几乎就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

她一直觉得活人比死人更重要，“人死了和猪儿狗儿有啥区别，人家战场上战死的也没有埋的？所以哪天走了就走了，烧成灰，装进坛子里扔河里就行了。”

她是如此透彻，却又活得如此具体。2019 年沿滩开庭审理她的案件那天，两个法警站在陈婆婆两旁，几个子女就坐在旁听席。审判长刚喊出一声“开庭”，陈婆婆就晕了过去，后来她跟小理提起此事：

“丢死个人，简直感觉像很多年以前的地主审判……”陈婆婆因为“组织卖淫嫖娼”被判决了两年监外执行，罚款三千元。

“知道她的气性很大，我们几个子女就和法官说好，把钱分摊了，也没有告诉她。”

小理说。此后每个月，作为判决的结果之一，他都需要替陈婆婆填写一份“深刻”的思想认识报告交给检察院，表达她改过从新的态度。“还好，两年很快就到了。”

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陈婆婆的，好几个邻居都很不以为然地和我说，“她有钱得很，好几套房子”，“不要可怜她，她比哪个都更有钱”。他们对于陈婆婆的评价比较极端。大概他们并不觉得，在这一个收入都不怎么样的地方，这样一个瘦弱的老太婆需要什么特殊的照顾，或者换种说法，这样一个有那么多儿孙环绕的老太婆，需要外人的什么照顾？

在她的少女时代，有天晚上在蚊帐上发现一条菜花蛇，她吓得连连作揖，“你走吧走吧，莫要来找我”，从此她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

那段时间我时常去看她，每次都买瓶水，买些小吃冰棍，于是从不相信什么“人生启示”的她居然想起来：“早就有人算过，我老了以后会出现贵人。”有个周末我比往常的时间去得更晚，她居然在半边街的坡底下望着，细微的身影弯成了一个圆点。

她没有任何信仰，尽管整个古镇最崇拜信奉的观世音菩萨供在离她咫尺之遥的河边。每年菩萨的三个重要日子（诞辰、成道、出家），河边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几乎整个仙市镇的信徒们都会经过陈婆婆的屋前，赶去那里为菩萨进香烧纸钱。陈婆婆却一次都没有去过，她只是记得那会儿庙子里面（南华宫），正堂都不止这些菩萨，都被造反派拆了的，打烂了扔了。现在的菩萨都是后来做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菩萨了。”

这一年的 3 月 21 日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也是镇上娘娘们的大日子。据说乡政府还是哪个政府部门看不惯河边那里长年香火过于旺盛，年前出钱，让镇上的傻子陈二娃把那里给推了……不料善男信女们很快又悄悄把菩萨请了回来，甚至还有一个聋子娘娘义务在那里守护着，进香磕头的人群依旧络绎不绝。

陈婆婆对此甚为不满，“那些人和文革时候的造反派比起来有啥区别……”她摇摇头，“你相信就相信嘛，不相信就算了，何必做这些讨人嫌的事情？想做啥子就做啥子。农民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多半是政府、派出所才会做这种讨嫌的事，依我说，（他们就是）换汤不换药……”

除此之外，她真的就像镇上大部分的女性，只把眼光和精力注意到最微小的和自身相关的事情了。然而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欲望了吗？她和熟人打招呼，最关心就是对方吃过了没有，吃的是什么。有一次听我提起镇上的羊肉汤，她后来忍不住抓住我的手说，晚上馋到睡不觉：“汤啊，煮过新鲜羊肉的汤啊……”提起小炒猪肝的做法，她也是津津乐道：“把猪肝裹一点点豆粉，放葱、姜、蒜、辣椒、花椒、郫县豆瓣，一定要记得放一点料酒去腥味，爆炒一下赶紧捞起来，又香又辣又入味……”

手术过后，她反而把自己的饮食调整成了一天四顿，一两左右的米饭，配一份干胡豆就可以，或是一份辣椒拌皮蛋，一小碟红辣椒拌青海椒也可以……按照医嘱，她那个悬挂在腰间的胆汁引流袋要一直挂到死，她再也不能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了。可她似乎完全没有禁忌——奉劝各位最好不要观察她吃饭的模样，她会缓慢而又郑重地把一块兔肉塞进嘴里，下嘴唇赶紧跟着向外兜一点，再慢慢咀嚼，眼睛眯缝起来，面部的皱纹都在发力，这世间的美味啊——似乎她生命力的来源都在手中那小小的饭碗里了。

前些天陈婆婆问女儿今年多少岁，她说 57 岁了。这把陈婆婆吓了一跳，在她越来越衰弱的记忆中，女儿好像还应该是个年轻人，“人家都说她，小时候你妈妈拖起你，你才造孽哦，你妈妈去挑鱼哦，你跟着撵哦，拉你转来，你又朝坡上爬，拉你转来，你又朝坡上爬，憋得没办法，只好把你肩膀上挑起，跟着一起走。”她认为大概是听了这些话，女儿这些年和她愈发走得近了些。

她并不像大部分的老人，喜欢沉潜于往事之中，提起那些过往的买卖，她像个真正的生意人一样理智、客观。“我认识的那些老头，就是那些嫖客，死都死完了咯。小姐也死了很多个。”她掰着手指头说，“有个叫王丽的，身体很好，又高又胖，想着自己长得不好看赚不到啥钱，就开个场子请人管，她整天去打麻将，一来一去欠了不少钱。她在市里借了高利贷，回家的时候，家里人听说她借钱的事就骂她，一时想不通就上吊了……她还不到 30 岁。还有一个叫作李梅的，40 岁左右，也不晓得是得了病还是啥原因，下面大出血死了，还有得病死了的姚排骨，出车祸的新疆姑娘……”

那个猫儿店或多或少应该是她一生最深的烙印。“沿滩桥洞里都有七家，自贡波密湾还少了啊？到处都是，但都没得我们这里管得紧。我听嫖客说满世界都有，这里变成了古镇，就不让做了……”她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为啥子别个可以做，我就做不得？”

因为在派出所被教育时，被指着鼻子吼来吼去，陈婆婆压根不敢提出心里的这个疑问，只是一直哭……她这一生，当众丢脸，就是那一次。而 2022 年 1 月份，她人生当中第一次发病住院，就是因为又急又气，倒在了派出所里。她这一生是否为做过的这件事情有过反思？她很倔强地不肯正面回应，两只手把一张草纸拧成了麻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一天。”她说，一只眼睛又习惯性地分泌出泪水。

前两年路过青岩洞的时候，有个算命的人跟陈婆婆说：“老人家，你最少能活到 96 岁。”她走了几步又找了一个算命先生，这位说“你能活到 104 岁。”说到这里是她难得嗓门提高，眼睛弯成一条缝的时候。她一生中曾经有过幸福的时刻吗？她说并没有，“都差不多，都造孽。”但是这次因为生病住院，“第一次躺着不用干活，吃得还比原来好一点点。这就已经活够本了。”

这一辈子她送走了父母亲、四个老公、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儿子。除了第二个男人，没有为任何人建过坟墓，送上过山，同时代的人当中只剩下一个妹妹还活着。2021 年妹妹去世，她大老远找到富顺县的小溪庙，四处向人打听“陈炳芬”。她和妹妹见面的时候，彼此压根就认不出来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各顾各，哪里有时间见面？”

端午节到了，路过“红姐饭店”，陈婆婆和她的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吃饭，完全没有长辈的那种威严和“啰唆”，不给孙辈们搛菜，也不需要他们给她搛菜，她一言不发，默默地吃完一小碗饭就急着回去看摊子——干脆、俐落得仿佛是这个家的过客。

最近这一年，尤其生病手术以来，医院开的消炎药有副作用，会不断拉肚子，她的夜晚被分割成无数碎片，梦境也接踵而来。过去的故人频密地出现在陈婆婆的梦里——指导她生孩子的冯大娘、捏着小额钞票的嫖客、被癌症带走的大儿子……陈婆婆甚至还梦到过鬼魂来索命，可她一点都不怕，和它们激烈地对打，力气不够的时候，陈婆婆就喊人来，合力掐住鬼魂的脖子，直至胜利着笑醒。

她从来没有梦到过自己的母亲，早在七十年前，毛淑芬在走之前跟她说：“你这辈子太不容易了，我走了也不会找你的，你好好活着。”

妈妈的话似乎成了她和这世界不可废弃的“盐约”，她一辈子都在拼命，让自己和家人好好活着，为此，她在梦里都不能输。



易小荷

资深媒体人、作家。《七个作家》、《骚客文艺》、《搜历史》公号创始人。代表作《盐镇》《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电影《雪花秘扇》(2011)剧照

童慧的父母在供销社工作，李红梅的父母都算得上知识分子。“我妈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看大字报，生怕万一有自己的名字，那就完了。晚上根本睡不好，太害怕了，一晚上就可以改变（命运）。”李红梅说。

两个女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性格也不相似，却在多年以后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她们住同一个房子，睡同一张床，常常肩并肩走在小镇的街巷之中，但她们从来不肯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虽然镇上不像乡下是“男多女少”，但用著名的媒婆王大娘的话说：“只有找不到婆娘的男人，没得找不到男人的女人。”因此人们背后使用“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都带有一种嘲笑的含义，童慧总是斩钉截铁地否认：“不，我们不是。”

02

这天早上童慧刚刚走进新街，“酒疯子”就走过去了。酒疯子不是古镇里面的人。没有人熟知他有过什么往事。他经常穿一件军大衣在街上走，路人总让开他。他有子女，平时也还种菜来卖，除了早上弄点菜去卖的那阵子的短暂时刻，其他时候他都是一副喝了酒醉醺醺的样子。大家都说他有酒病。

“仙市你个狗日的地方，他妈的什么鸡儿屎政府……”他开始破口大骂。

童慧快步地走了过去，低跟鞋躲过酒疯子的一泡浓痰，脸上带着些许漠然冷峻的表情。这一生中，她从没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候，也不曾和人对峙，不曾红过脸，说过一个脏字。这在民风彪悍的古镇大标新立异了，大概她受母亲徐言秋的影响太深了。

她的父亲童世贵和母亲徐言秋是这镇上难得的恩爱夫妻，他们之间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相互尊重。父亲2007年走的时候快90岁了，母亲还说，这辈子都没有过够。

2015年一个亲戚结婚，那时候徐言秋也快90岁了，她的一个老朋友上台讲话：“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徐言秋），今天不怕说句得罪人的话，来了那么多人，大家穿得再如何，也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她的气质。”

徐言秋没有进过学堂。家里请过几年私塾，她能写会道、思维清晰，教育理念秉承着“以理服人”，哪怕是对于自己的孩子也尽量礼貌周全，从来没有碰过孩子们一个手指头，就算她的小儿子个性最强，属于那种只要有人惹到，就会变得很冲动的人，但只要徐言秋眼睛一瞪，他就会坐下来。“妈妈一生气，随便哪个都不敢动。”小儿子说。

童家的后院，相当于是个小湾子，住着好几家人。有家搬来的邻居李丽是整条街远近闻名的“吵架王”，语速快、嗓门大、腔话连绵不绝，每次都能让童慧听傻。邻居们都很怕这个人。有一次，也只有一两次，“吵架王”又在骂人，徐言秋从屋子里走出来，平心静气却又一字一句地说：“人家已经没吭声，你就不要骂了。”李丽立即偃旗息鼓。在“凶才是生存准则”的镇上，这是带给童慧极大震动和影响的一件事。

李红梅家则完全相反，妈妈林书芝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全是几个孩子做，爸爸李建设热爱阅读，每天早上必看《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报纸杂志，还要写下读书笔记。但他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把孩子拖过来一顿暴揍，甚至都不用竹片，而是用洗衣棒和扁担，除了孩子的头以外，哪里都打。李红梅至今都怀疑几兄妹的腰就是给他打坏的。后来大一点，看他拿洗衣棒，三哥和李红梅马上就跑，李建设扔都要扔到他们身上，林书芝有时候看他打得太重了去阻拦，李建设急了会拽过林书芝一起打。

2003年春节，红梅的姐姐在泸州搬了新家，红梅带着儿子去做客，让儿子记得带作业，贪玩的他就是不愿意带。李红梅追着自己儿子打，在她打得最凶的时候，他跑，她就追，一定要追到打到他为止。她有一瞬间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暴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因为在‘文革’中他不愿意说谎，只讲实话，我出生之后他就去坐牢了。我也才理解了他。”

红梅从小就很调皮，她玩的都是斗鸡、打烟盒这些男生的游戏，家里也把她当男孩子使用，没有自来水，就让她挑水。爸爸教育他们要胆子大，大晚上也逼着她出门去借盐巴。家里这种有意识的训练让红梅越发坚强，割草的时候手上经常被砍到，嚼一下铁见草抹在伤口上就继续干活，被狗咬了，也是找来墙上的蜘蛛网捂在上面。“我家的女孩都像男的，性格刚强、脾气暴躁，男孩反而像女的一样温柔。”红梅说。

李红梅天天在河沟里泡着，早上去洗衣裳，和小学同学混在一起，边洗边换上，还要在河里游半天泳，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回去。暑假爸妈都不在家，她更是去河里泡一天，在水里脱掉身上所有的束缚，快活得像个自由自在的野孩子。

13岁的时候，李红梅认识了童慧的姐姐童佳，几个女孩经常叽叽喳喳地在童家屋门前玩耍。有一次童慧从门口进去，同行的张三儿吓得马上噤声，李红梅至今都记得她说：“童佳的幺妹看上去太凶了，她在我们就不要来耍。”

童慧对此一无所知，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都比她的年龄大，那个年代家里孩子大多都是大的带小的，姐姐很早就出去工作，每月寄钱，帮着养家。衣服都是自家做的，而童慧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穿的。最苦的时候春节买的胡豆，一个人只能分到一调羹的分量……但是再穷困，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秩序感，厨房里的每一只碗都整整齐齐，就连锅子也要按照大小摆放……多年以后童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全都成了党员，她家的门口也是全镇唯一一个在“星级党员文明户”牌匾上打上了五颗星的人家。邻居们经过她家，都忍不住面带欣赏，啧啧称道。

小时候夏天的夜晚，一家大小睡着，大门敞开，父亲点上蚊香，大家横七竖八，却也都是乖乖地闭上眼睛入睡。没有偷过菜，没有下河摸过鱼，没有撒过野，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童慧循规蹈矩、克制隐忍，生活得如同一根绷得很紧的皮筋。

03

童慧从小就是个文娱标兵、积极分子。成绩虽然普普通通，但她性格温和乖巧，会在课堂上用大眼睛盯着老师，属于那种很听话的好学生。

1985年，初中毕业后，她觉得自己读书天赋有限，让人介绍去富顺的一个工厂上班，负责装酱油瓶子，那一年她15岁，厂里的人都喊她“童妹”。她需要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靠人工一瓶一瓶地把酱油瓶装过去，有的时候玻璃瓶子可能是烂的，一不小心就把手划破流血。在那里一个月也就赚几十块钱，她却一待就是两年。

1987年，有个机会可以做政府部门的临时工，因为镇里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太少，她关系最好的发小萍萍也想去，跟童慧也提过一嘴。但童慧的一个姐姐当时在乡政府工

有谁在釜溪河看见过鲑鱼

易小荷 | 非虚构图书馆

在这个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就是她们狭窄而又宽广的全部

01

晚上临近七点，是釜溪河一天之中最与众不同的时刻，镇上一片寂静，天空和地面交界处有种观赏鲤鱼的绯红色，小镇路灯昏黄未明，得以延长了晚霞燃烧的时间，更映衬出釜溪河水的乌黑。钓鱼的人说，河里多是一些最普通的鲫鱼、鲢鱼，更多的是泥鳅、黄鳝。但是立在河边，经常会看到河中间有黑色脊背远远翻腾着，迅速从水底下升上来，搅动大团的泡沫，眼见着逆流而上。

电视里很好听的普通话：“无数鲑鱼挤在一起，从海洋直奔向河流开始的地方。”童慧一直很喜欢那节目的画外音，有时候她不禁疑心，那黑色逆行的孤单脊背，或许就是远道而来的鲑鱼吧。

童慧小时候见过最清澈的河水，自然也见识过它们躁动的时刻。对她而言，那些景色并没有什么出奇。如同她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过的古镇，无论出现怎样新鲜的事物，她都能有一种本事，把自己“凝固”在自己的规律和节奏里。

她总是同一时间起床，早上七点半到单位，下午五点下班，每天经过仙市镇新街的同一段路程，数着相差无几的步数。她就像一台计算精准的机器，演绎着一样的程序，经年累月，螺丝从未松动。

1970年出生的童慧是古镇有名的美人，皮肤的黝黑也没有让五官的精致减损，从不化妆的缘故，仔细看就能看出眼角的细碎皱纹，大笑的时候微翘的小虎牙增加了一种别样的媚态。她的衣着基本是同一种风格，低调朴实，衣服的领子很高，甚至遮住了脖子，即使穿裙子，长度也都在膝盖以下。

童慧四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需要去粮站上缴一定的粮食，大多是挑着担子送过去。在去粮站的路上，胆大的孩子乘人不注意，从人家的担子里面抓一把就跑，多偷袭几个，就能把衣服兜全部装满。这种原本每个孩子都引以为乐的游戏，她身旁的哥哥姐姐不但不参与，还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这种行为。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所谓的“有序”，此后一生她都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且从不懈怠。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正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热烈之中：1969年的2月20日，富顺的一千六百多名知识青年赴宜宾、乐山等地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0年10月18日至29日，富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童慧对那个年代的细节完全记不清楚了，她的集体记忆只有古镇赶场的时候，那些靠近码头的船，青石板铺成的古镇街道，两旁是木头串架房一间接一间，人头攒动到把人都抬起来的景象。那时候一条街各行各业都有，各家也都比比皆是五六个兄弟姐妹。而她最好的朋友李红梅，只比她大两岁，和她的记忆却完全不同：她家曾经住在公社（戏台）楼上，隔壁的邻居就是地主、富农。她永远都记得，有一天走到庙子（现在的南华宫）那里，人山人海，“把欧阳成、罗运清押出来！”上面的人被强行戴上了尖尖帽，接着就是五花大绑，偷眼望过去，绳子把人的肉都勒出了血，下面全是红旗，所有人都在振臂高呼，相比较台上那两个人的面如死灰，那一切的喧嚣特别像做梦。

作，认识的人更多，“更有关系”，姐姐托人去说，人家肯定第一选择了童慧，两个小伙伴的友情就此破裂。

虽然是临时工，童慧从第一天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不会电脑就利用午休时间学习，哪怕不吃饭也要学会。她永远都是第一个踏入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从很小的时候，姐姐们带童慧出去玩，总有人说：“这个妹妹长得真乖（漂亮）。”稍大一点时，她有一次攒钱买了一身白裙子，搭乘瓦市到自贡的公交车，一上车，司机就说：“好像个演员啊。”整个车厢的人一路都在望着她。

她是这街上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从成年开始，给她介绍朋友的人络绎不绝。邻居郭三娘至今都记得有高大帅气的男孩追求童慧，但她总是不屑一顾的样子。童慧似乎并没有把“恋爱”这种事情放在心上。看到身边的朋友十七八岁谈恋爱，她心里就想：“我要等到23岁，那时候才足够成熟。”

但她的内心也充满了自卑，没有正式编制，即使转为合同工，和正式员工相比，没有社保，一个月也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靠哪个，我就想我一个人，要生孩子、养家，我的工资那么少，没有那个能力，工作又相当于一直没解决。”一旦结婚，她条件又不好，如果加上自己一家人，她觉得根本负担不起。

她一辈子对待自己的工作都谨小慎微，对己对人都要求严格。1996年7月，她入了党，不管是否是正式编制，童慧都是那种共产党员中最单纯质朴的人。她最不喜欢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姐姐的孩子在幼儿园，她去帮忙接孩子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些老师下午就知道带着孩子做游戏，在坝子里赛跑，混时间，她就特别不高兴，而且会把情绪直接写在脸上。“这个班上还有很多孩子是从农村走过来的，有的时候还下雨，你要对得起人家那双脚。”

因为外表端庄、普通话标准，她也多次代表单位参加演讲比赛，在台上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说起一个党员的职责，每每声情并茂、泪流满面。童慧拿过全市的演讲冠军。只要她的记忆允许，她会熟记每一条党章，并且每年都能获得“优秀党员”的称号。

党员集体过组织生活，一起观看主旋律电影《跨过鸭绿江》。有一个场景，彭德怀到前线视察，看见许多志愿军战士身上缠着绷带，衣冠不整、面容憔悴。（“和人家对手相比，就跟小鸡生的一样。”）彭德怀眼含热泪亲自赶去迎接这些勇士们，他哽咽地说道：“祖国感谢你们！这是我见到最整洁的军容，最震撼的军威……”她能回忆起电影里所有的难忘细节，且忍不住热泪盈眶。

每天登录“学习强国”也是她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她每天设定好闹钟，学习二十几分钟的“学习强国”，要做“两人对答”“四人对答”“每周答题”，把学分学满，每天学习了还要把截屏发到党委会。她现在已经累积到四万多分了，也是单位数一数二的“学习标兵”。2005年仙市古镇划分给了沿滩区之后，童慧家找到关系，把她的情况去和领导讲了一下，说她除了在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还拿过那么多次自贡市的优秀党员，获得过那么多次荣誉，等等。终于，2006年她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经过考核，转了正。

从转正前一个月只能拿到三百多，到转正之后的三四千，再到现在，月工资五千，童慧才终于觉得自己有了立足之本。

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她也谢绝了无数的介绍人，“我从没想过找个有钱的改变命运。我一直觉得结婚要养家，一想到我的压力就很大。她们没有那个意识观点，那时候我工资低，为啥要去找一个男的去依靠，那些‘嫁一夫靠一主’的生活有意思吗？”

她目睹了父母亲幸福的婚姻，但她同样也看到了王大娘、梁瞎子、曾二娘、张三娘，还有各个同学朋友吵闹而失序的婚姻，她就不明白，大家都是平起平坐，为啥总有人想要去依靠另外一个人？那天早上她看到了那个酒疯子，在这昏昏欲睡的小镇，多的是这种酗酒纵欲的男人。有的时候下班，天才微微黑，就已经能看到烟雾缭绕的饭店里面，游手好闲的男人在粗声大嗓地举杯，喝多了直接躺在路边的也有一一这些人和她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新街上住着的一个老邻居，五十岁左右的一个男人，为了引起童慧的注意，七绕八绕也要把电瓶车绕到她面前来对她笑一笑，期盼童慧能和他打个招呼，童慧从来都是无动于衷，微微抬头，把眼神掠过人群，最后安放在遥远的一个虚无之处。

有天晚上童慧和李红梅一起经过陈家祠堂的时候，李红梅被一个邻居，一个口碑不怎么好的男人一把拉住，他大声地邀请：“咱俩老同学，你怎么都得干一杯。”一边若无其事地补充一句：“另外那位朋友我就不喊了。”最后那句话多半是为了掩饰尴尬，因为童慧不仅没有客套的敷衍，还站在远远的屋檐下，毫不掩饰地用对方听得见的声音催促李红梅：“喝什么酒，赶紧走啦走啦！”完全不想遮掩脸上的嫌弃和不屑。

童慧的这种性格，一个邻居用当地的俗语形容她：“觉得哪个都配不上她，衣服角角都要铲倒人（浑身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瞧不起人的清高劲儿）。”

04

李红梅大概算得上是另外一种异类：她在古镇生活了五十二年，是一个不怎么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教师这个职业说话太多有关，如今她的嗓音像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磨平了，已经如同男人般低沉。她平胸，穿着中性的衣服，永远的长裤，裤带边缘甚至挂着一串钥匙，走路的时候有点含胸，略带点外八字，抽烟抽得很凶，一有时间就外出喝酒、打麻将。

李红梅出生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妈妈对家务事完全不行，所有的家务事都压在了她这个女儿头上，再加上弟弟很喜欢读书，她时常都是被忽略的一个。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养成了她的坚韧果断，背五十斤的重物也好，洗全家所有人的衣服也好，她都从不抱怨。

李建设对她的教育颇有指向性，看到李红梅和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就喜笑颜开，把成绩差的同学带回家玩，他会直接跟人家说：“不欢迎来我家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父亲最喜欢对家里的孩子们强调“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即使家里买不起收音机，每天父亲也都要提醒孩子们记得收听广播：“要听党中央的声音，要关心国家大事。”

李红梅记得小时候见过父亲抄写天安门诗抄（是一本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什么邓小平如何、周总理如何。“我们这种闭塞的地方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事，我老汉当时喊我们戴白花，整个仙滩都没人戴白花，我们都不好意思。”

1976年，毛主席死的消息传来，李红梅的学校要求集体默哀，她看到周围的老婆婆、老师都哭成一团，默哀一场接一场。镇上有个朱大娘是做搬运的，小时候过得很苦，1949年以后体会到了“无产阶级贫农”的好日子，她一个人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晕厥过去，嘴里直呼：“我的毛主席啊！”李红梅完全没有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只觉得好笑，扫视了四周，才只好埋下了头。

1983年春节父亲平反，李家买了台12英寸的长虹黑白电视机。1984年奥运会，最热血沸腾的就是中国女排的比赛。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上先是不敌老对手美国队，决赛的时候再遇到美国队，那场比赛播出的时候简直是万人空巷，没有电视的人都挤在单位的会议室。更何况队员孙晋芳还是四川人——那是中国人“爱国情绪”慢慢高涨的80年代，中国女排也被宣传为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息息相关的旗帜。那场比赛是在夏天，一大群邻居挤进李红梅家，带着小板凳挤在她家的电视机面前看比赛，她当时穿的是短裤，看完比赛才发现大腿都拍红了。

隔天三哥和红梅回家，桌子上摆着《人民日报》，他们明白这是爱看报纸的父亲布置的任务——他总会把自己觉得值得阅读的文章摆在那里，作为一项任务，还要孩子们做读书笔记。那是李红梅第一次看到二传手梁艳的故事，关于她是怎么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国家队队员的，她第一次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也要成为一名运动员。

李红梅加入了篮球队，她个头矮小，但是敏捷灵活，因此成了队里的组织后卫。她家门口就是篮球场，每天再晚都会出门练习投篮，她发疯一样地训练以提升自己的球技。1984年，她代表富顺县参加自贡市的农村运动会，许多球队的人因为李红梅是得分手，都会专门派人盯防，故意去冲撞她。至今撩开裤腿，李红梅腿上的伤疤还比比皆是。她们最终拿下了第一名。很多年以后李红梅展示了那张参加比赛的照片，作为中锋的钟传英也在照片当中。李红梅留着长马尾，皮肤弹性十足，杂乱的刘海也没能挡住饱满的额角，那是李红梅一生的高光时刻。

1985年，自贡大地震的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临走的时候，不忘在女儿耳边叮嘱一句：“要读书，记得读书。”

很多年以后，李红梅说：“大概就因为老汉太关心国家大事，我就反而不关心了，我的心思只在我的下一节课。”她是一个对政治完全脱敏的人，从不和同事朋友讨论时事热点，也不爱看《新闻联播》《环球时报》，也没有超凡脱俗的爱好，她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普通人。

她也设想过，当年如果不做老师，要么继续读高中，要么就去深圳闯荡了。她为此一直抱怨妈妈，但是“那个年代的娃儿，再叛逆，最终还是要听父母的”。

当然，红梅接受工作安排，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一米五几的个头对于做一个运动员来说，太“先天不足”了，她认清了现实，认为自己只能选择一份这样的职业。

17岁时，李红梅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把长头发剪短，平时哈哈大笑的表情收敛起来，那时候的李红梅在照片上看上去就是个甜美的酒窝女孩。她按部就班，履行着一个普通女人的流程，上班、下班。她参加工作很早，也年轻，追的人很多，一天到晚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来献殷勤，还有人因为追不到和她绝交的，她一天到晚都为此而烦躁。

一开始她被分配去了乡下教书，虽然挨着仙市镇，但公交车班次并不多，凌晨六点就需要起床。通常她给自己还有家里人做好早饭，就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乡际中巴车上打起了瞌睡。朦胧阴晦的车上，有时候也挤满了牲畜，和着恶臭的味道，在布满坑洼的路面，她得紧紧抓住座位的扶手……乡村教师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晚上也不能准点下班，因为需要继续在办公室上班，一周有两天是政治学习，校长给大家念《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念各种政策法规。老师们在下面批改作业，直到夜里的八九点下班。乡村小学条件并不怎么好，四周围连盏灯都没有，走出校门只剩下漆黑一片，还得随时小心附近的野狗、草丛里的蛇……李红梅因为这样的经历，也就练就了走夜路的本领。

那时候的乡村小学，一个老师需要通吃一切，李红梅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是音乐老师也是体育老师。她后来自嘲说能力不够性格来补，她泼辣外向，学生们倒是很吃这一套。

又过了两年，她终于调回了仙市做语文老师，学校里除了几个四十几岁的老师，全是刚进来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她也感觉自己成熟了一些，终于接受了一个同龄男生的追求。他们也有过稀里糊涂的好时光，但很快，结婚、生子。

1991年的一天，下课之后她照例在学校操场打了会儿篮球，远远地听见有几个人在边上聊天，还有人“咯咯咯”地笑得像只小鸟。休息的时候她走了过去，看到一个同事正在和一个陌生的女孩聊天，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童慧，那一眼，她觉得胸口有股说不出来的东西汹涌而来。“她应该是我的女人。”她心想，“我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05

太阳在远处就像被盐浸透了一样，昏黄黯淡，仙市小学面积不大，但整齐的教学楼、塑胶跑道、教室配备的投影仪、整洁舒适的办公室，和城市里的学校没什么两样。夜色如同整面巨大的岩石，庄严凝重地降落到这里，东侧的一棵大树，每逢此时就会有喧闹的混响，有可能是鹰鹃，或者翠鸟，叽叽喳喳漫天盖地喧闹起来，掩盖了篮球砸在地上的声音。

我陪着童慧在那里跑过一次步，也试图感受一下李老师的学校有什么样的魔力和氛围，可以像她说的“一个瞬间就改变自己的人生”。

后来就发现，学校和政府都有种相似的氛围：就是在这里，不太能够感受到“镇”的存在。这里没有青瓦白墙，看不到河水上的白鹭，甚至遇不到背着背篼赶场的人。它们都是如此封闭的世界，自成一个体系，在那里，保守落后任人评说的乡镇生活似乎根本就不存在。而一门之隔，女人的一生大多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出生、干活、读书、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工作、嫁人、生孩子……直到成为大娘，帮着带孩子，再直到孩子成家，才开始去打麻将，或是坐在那棵黄葛树底下一动不动，消磨时间直到死亡降临。

箭口村的詹玉芬，也就是詹小群的姑妈，因为两次流产不能生孩子，一吵架就被人说是“不能下蛋的母鸡”，王大娘生了两个女儿被婆婆数落了一辈子只知道生“趴蛋”，古街上曾经有个独居老太婆，经不住舆论压力，就领养了一个孩子，但所有人提到她，用的称呼都是“就是那个孤老太婆”。婚育在这种地方是一个女人的头等大事。

根据《富顺县志》中 1990 年的富顺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县总人口为 1,111,387 人，其中男 575,047 人，女 536,340 人。文化结构为：中专 7,720，高中 25,899 人，初中 212,853 人，小学 535,430 人，文盲半文盲 202,323 人，大专仅为 3,576 人。

在这样文化结构的县城，和芝麻大小的镇上，怎么可能容得下一个同性恋？

李红梅在初中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整天就是中性的打扮，看见漂亮女孩就去追，李红梅理解不了，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脏”“恶心”还因为她纠缠过自己的另外一个好友，李红梅甚至于有一次差点动手打她。

但是那天童慧的笑像是给她打开了一扇门，23 岁的她仿佛第一次认清自己是什么人。“想了很久，以前自己不是这种人，也想过自己是不是受了那个朋友的影响，后来想清楚肯定不是。那时候就一门心思想要和她在一起，我自己都不晓得咋子回事。”

一开始李红梅想方设法靠近童慧，送衣服、鞋子给她，童慧隐隐地察觉“这个人好怪哦”，有意地回避她。某天童佳去瓦市耍的时候，回来就跟童慧说：“红梅和我们聊天，说起你们以前关系那么好，现在莫名其妙都不理她了，还哭了，你不要不理她嘛……”

童慧心里想：“你倒是不晓得她啥子动机哦。”李红梅像每个求偶的雄性动物一样，每天出现在童慧面前死缠烂打，给她端茶倒水，给她讲笑话。

那几年，李红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自我怀疑中，她整夜整夜失眠，一边非常坚定自己爱那个女人，一边又不敢相信自己的性取向，怀疑自己是不是不正常，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童慧的拒绝加重了这种情绪，她有天在家里吃了一大把安眠药，试图自杀，没想到昏睡了两天居然醒过来了。

有一次李红梅弟弟拿回家一本《小说月报》，里面有篇小说讲的就是这种同性之间的感情，那是李红梅第一次看到相关的故事，她偷偷看了两遍，把这个故事记在了心头，那也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才这样。”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人会为了感情的事情去查阅相关资料或者寻找专业帮助。我后来问过李红梅，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同性恋情颇有研究的李银河，也从没看过李安那部超级有名的《断背山》，大概她们对世界的认知大多数都来自于口口相传和所谓的传统。“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正常，现在也都不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那时候啥子都不顾了，就觉得这是生命中最强烈的感情。”

说出这些话的李红梅眼帘下垂，两只手下意识地交叉在一起，表情艰难，语速比平常慢了一倍。她性格外向，善于高谈阔论，也因为教师的职业深受尊重，但回去三十年前，年轻无助的李红梅，能向谁袒露心声？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红梅学会了抽烟，专抽劲儿很大的烟，一天就能干掉一包“天子”。她也开始剪短头发，此后也再没有穿过裙子，打扮越来越中性，永远都穿看不出胸的上衣和裤子，从背影看已经很难辨别出性别。

童慧并没有完全接受她，只是碍于“这个人对我太好了”，和她以好朋友的身份相处。一天晚上李红梅被爱而不得的痛苦折磨，一言不发，拿起手里的烟头烫向自己的手腕。多年以后她毫不顾忌地展示出左手，手腕的地方有个圆形的疤痕，那是她“爱的痕迹”。

童慧差点吓哭了，她的内心也开始松动，她没有李红梅天生的能说会道，有的东西她是内心明白，表达出来却变成了干巴巴的，她不懂什么浪漫，只擅长最朴实的那种交流。“那是一个人把你命放在你手上，你该咋子办？”

像童慧这样的人，最怕的就是“欠”人家的，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次，因为一个男同学太调皮总惹她，她把一本教科书卷成卷，打了对方的头一下。那是上午最后一节课发生的事，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惴惴不安，中午饭都没吃完就跑去窗前观察，“他怎么样？有没有给我打坏？情绪好不好？”，并因此内疚了一整天。

大概接受一个同性并且和她一起，对于当时不谙世事的童慧来说，并不算最大的困扰。她妥协的结果里面也有她对男人们的失望，毕竟她对这镇上的男性是一个都看不上的。从 1991 年 12 月开始，李红梅天天晚上去找童慧。她去童慧在古镇的妈妈家吃饭，大多数时候也就索性住在那里。红梅也毫不犹豫地向丈夫提出了离婚。那时候的古镇，民风更为保守，这里容得下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贫穷的夫妻、打架的夫妻，唯独容不下离婚的夫妻，家里人在说，朋友也在说，连学校的领导、教导主任都跑来劝红梅不要离婚。“一个地方小，相对不开放，周围一个离婚的人都没有。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妈妈当时想管我，不准我离婚，我说她，你能管我一辈子吗？你死了咋办？”

她没说原因，丈夫也没问。在这个古老的镇上，街头见不到亲吻的情侣，他们就是最传统的中国人，含蓄而保守。拉扯了两年，最后还是靠法院判决离的婚。多年以后那个男人和红梅近在咫尺，却再无联系，甚至于他们儿子的婚礼，他都拒绝参加。

她俩从此形影不离，更多的是红梅每天守在童慧身旁。两年以后，童慧有次送了张手帕给红梅，把红梅激动得快哭了，也许那才是她心目中两个人真正意义的“开始”。

两个人的感情也开始持续升温：一个人只是短暂地出差一天，另一个人心里都放不下。有一年冬天，童慧去荣昌培训，红梅上午改完卷子，天空开始下着刀子一样的雨点，红梅不管不顾，转了几次公交车去找童慧，等她赶到的时候天都黑了……

曾经一度，李红梅也希望能够公开两个人的关系，以她坦荡直率的性格，她多么希望对全世界大声喊出自己的心声。慢慢地，她清醒过来，和爱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童慧比她还小心谨慎，她俩之间的情书、小纸条阅后即焚，对外都说是“好朋友”。

经济在飞速发展，年轻人基本都开始外出打工或者求学，古镇也扩大了一倍的面积，游客越来越多，高铁开始修建，附近村庄的居民由于拆迁搬到了镇上，大家越来越只沉潜自己的生活。受到时代冲击的古镇就像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它新旧掺杂，既传统又崭新，既浮躁又凝滞。

李红梅说：“我们在外面从来不得罪任何人，没得啥子人当我面说。就算猜到我俩的关系，和你的生活轨迹无关，说我们也不会当面说，最多背着摆几句。”

她们遇到的最大压力其实来自于各自的家庭。

红梅那边，父亲不在世，母亲从小就管不住她，也就任由她了，后来习惯了以后偶尔还

会问她一句：“今天吃鳝鱼，你把童慧叫来一起吃饭吧。”

童家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摆在明面上，妈妈也总是委婉地提醒她：“你一天到晚和红梅在一起耍，人家倒是有娃儿的，你以后一个人咋子办？”

爸爸有一次为了件什么事情批评童慧，她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还能去哪里呢？红梅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她。她在邓关的一个朋友家里，那是她唯一的好朋友，当年童慧去厂里上班的时候，她哥哥和那个朋友的哥哥关系很好，她们也因此结下了一生的友谊。“我至今都会记得，我俩挤在一张床上摆龙门阵的场景，至今也还记得她身上的那种味道……”

2015 年 5 月 1 日，朋友被检查出了肺癌，国庆过后，是她旧历九月二十的生日，童慧去看她，才得知这个消息。此后每次看完朋友，从她家出来的路上，童慧都会大哭一场。有一次去探望的时候，朋友的姐夫（是医生）和姐姐（是护士）在给她抽腹水，她趴在那里，家人正在从她的脊髓里抽，看着就很痛苦。

“从前只要听人说，太造孽了，还不如早点走算了，我心里就不以为然，觉得那个人是不孝顺，不想多照顾……”但看到她抽腹水的时候，童慧终于理解了。

好朋友在次年元月去世，她老公打电话让童慧去“看她最后一眼”，童慧拒绝了：“只想记住她最美好的样子。”

从此时起，童慧身边只剩下李红梅这一个“好朋友”。她有“洁癖”，要求完美，做她的朋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家里还在不停给童慧介绍男朋友，那些人都对童慧很心仪，童慧说：“她（李红梅）要晓得了就得了，那可是一条命在我手头。”时间流逝，童慧发现，她越习惯和李红梅在一起，就越容不下其他人。

06

镇上的人在喝酒这方面的教育是毫无保留的，李红梅至今都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亲偶尔高兴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拿出筷子蘸一下，也让几个孩子尝尝，直到后来干脆也给他们满上一点……红梅在成年以后也渐渐爱上了喝酒，而且只喝白酒。红梅原本就是个真性情的人，在学校这种社交范围极其狭窄的地方，并不那么需要圆滑世故，她就更由着自己的性情。有次喝了酒，她走得慢落到后面，看着前面几个朋友不理她，就顺着原来镇政府面前的斜坡，直接把自己当作皮球滚了下去，还好下面的农田没有灌水，算是躲过一劫，第二天醒来发现身上到处都是擦伤。

酒似乎能带来一个和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人沉溺其中。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数得出来一个爱喝酒的男人，喝了酒家暴的、打架的、在大街上纵情纵性的，似乎早就让人见怪不惊了。

而就连学校门口的一个靠租房为生、无所事事的男人都知道关于红梅喝酒的八卦，“可惜了好好的一个童慧啊，听说李红梅总是喝了酒去闹，把童慧家里给她介绍的男朋友全都闹跑了。”

童慧说她不是不喜欢男的，而是看不上。没有遇到过合适的。如果那时候不是遇到李红梅，而是另外一个男的这样对她穷追不舍，说不定也有可能会在一起。

2022 年端午节来临之前，几个老师聚在一起吃饭。语文组的林老师毫不忌惮地和大家分享谁谁谁酒喝多后发生的趣事：“那个张大胆上次在外面喝多了，非要自己骑着两轮，从富顺骑回家，中间摔了一跤，也没管，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咋子手恁疼，整条胳膊上全都是血，其实头天晚上把车扶起来时已经摔断了……”大家一阵大笑，相互指认说：“你还不是上次喝得东倒西歪，被背着去医院……”之后大家都不以为然地提起因为喝酒去卫生院打吊瓶的各种事例。李红梅也不例外，因为饮酒过量打过七八次吊瓶，近三年还有过让学校的校长背回家的时候。

而童慧这样的女人，在这样的镇上算是独一份：她不抽烟，有一次试过喝了三杯啤酒就摔倒在地。她从不和人起正面冲突，遇到不喜欢的人或者事就把头扭过去。她勤奋，有洁癖，自尊独立，但是却极其不喜欢表达和沟通，至今她的微信朋友圈通讯录也只有几十个人而已。

但无论是家教，还是后天的职业，都决定了童慧极其在乎自己的尊严，即使李红梅当众骂了她，她生了气，受了委屈，统统都是沉默以对。

童慧大概没想到，这段情感和其他异性恋越来越相似，李红梅变得越来越像这镇上的大部分男人，她身上所有的积习恰恰是她之前不能接受的“那些男人的坏毛病”。

2021 年 12 月 22 日，童慧自己又去考了一个文凭，她为此准备了两年多。除了完成论文等基本要求，提前一个多月就背材料，每天晚上在镜子前练习，即使如此，还是每晚都在失眠。

同事觉得不可思议：“你是表现那么好的人，这种答辩通过率是百分之九十八，一千个人里面最多只有一两个不能通过……”

童慧最怕的就是那个小概率，为了能通过答辩，她把鬓角的白发焗了油，特意穿了一身低调的黑色，羽绒服、牛仔裤。

答辩那天，她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却是排在她前面的一个人，也是个单身成熟女性，她知道她平时很讲究，在外面坐下都要掏出手帕垫着坐。“但是那天我看她头发花白，也没打理，一缕一缕的。”

她做人做得这么努力，往浅里说是爱面子，往深里说，她一辈子都在维护自己的形象和人设，想要“和她们不一样”。

07

用李红梅的话来说，童慧是个一辈子都焦虑的人。这样的人要求完美，某种程度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压力，自己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童慧就对工资的事情很在意，也很看重没有保险这种事情。1991 年就开始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并且和关系好的几个朋友采取了一种“转转会”的形式。比如，每个人每个月出 300 块钱，一个人这个月领 1200，其他人就不领，领的那个人就可以拿着这钱去买保险。

2014 年，外地工作的姐姐回来教大家跳坝坝舞，童慧跳完回家澡，没吹干头发有点

感冒，第二天有点蒙蒙的，乡村医生说让她捏着鼻子鼓气，结果就完蛋了，下午还没下课她就难受得去了医院。

那是童慧第一次感受到疾病的可怕。她被诊断得了神经性耳鸣，看遍了医生都治不好，发作的时候好像有个起重机在耳朵里疯跑，家里人甚至去请了仙婆，说她遇到了一个疯神，让她家人去七个坟前，分别捡一块石头，压在枕头下面，睡七天，再分别还回去。她每天都过得很痛苦，睡着了，世界才安静，一醒过来耳朵就轰隆隆地响。

童慧在自贡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同时还去中医院拿药，还是不见好，后来李红梅带她去泸州医院去看，吃了一种药，终于有所好转，但因为药里面含激素，童慧因此胖了十几斤。得病的那个时候，童慧还没有转正，虽然未雨绸缪地给自己买了商业的医疗保险，那一次是拿了报销，但是如果还有下一次得同样的病，就不能再报销了。

住院那阵子，李红梅因为要上课没有办法时常相伴，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孤独，也毫无安全感。

她听闻，有个乡政府的人，在姚坝当乡长，出了点事情被判了两年，后来出来以后没有工作，给他安排在社区干活，他之前买了十五年的养老保险，蹲监狱就没有接上，现在60多岁了，退休金才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去年一退休就检查出来肺癌，他老婆在粮站工作，退休金两千多一个月每个月治完病就没什么钱了，两口子不得已把父母娘接过来一起住，其实就是为了老人家那三千多的退休工资。

2021年，她的六哥也检查出来肺上的问题，他能报销的就很少。如果遇到大一点的病，医个十几二十万，自己都可能要出十多万。

“一病致穷，这是我生活中最没有安全感的部分。”大概正是因为如此，童慧特别节俭，不舍得吃穿。

童慧说她从来没有幻想过所谓理想生活，对现在的联系方式很满足。她是如此节俭，“有时候发点钱，人家就开心，可以去买衣服，而我就想着，可以凑点钱存进来啰。”至今为止，童慧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多年以前的一件中长款的皮衣，价值一千元，心疼了很久，还是李红梅买给她的。

童慧不知道特别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她周遭的朋友，读书读得多的比较有出息也有那么几个，但是大部分人都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

像萍萍初中毕业就去做生意，卖点百货，后来人家介绍了一个沿滩什么厂的工人，就结了婚，过着见不得好的平淡日子，连聚会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林四儿表哥是隔壁区的区长，给她安排了一些事，她不太喜欢，她爸爸妈妈是裁缝，就来跟着爸妈打过一段时间的衣服。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在自贡一个比较有钱的、做服装生意的男人，两个人结婚以后，却因为她生了个女儿，让对方不太高兴。她当年就去广州打工，让她妈妈帮忙带孩子，而她老公从此一分钱抚养费不出，终于离婚了之后，她就西藏、云南四处走。在这样的地方，平淡反而是一种福气，如同李红梅永远都记得那个同性恋好友，她对世俗的不在乎，和周遭环境对她的某种（眼光上的）排斥，“我们这种地方太小了，平凡一点融入人群，比标新立异更好。”

李红梅也因此对自己和童慧在一起的生活心满意足，她觉得和童慧走在街上，人们看她们的目光更多的是隐隐的羡慕，“你说多少夫妻能做到像我们这样，都不说那些过不到头的，大家过孽的、离婚的、感情冷淡的有多少？”

但李红梅不清楚的是，新街菜市场那头住着个男人，大家至今都叫不上他的名字，他喜欢穿女装，红色的、绿色的、露肩膀的，也经常和大家一起打麻将，人们都说他出过车祸，脑子不对劲。那也不妨碍他们在背后对他嘲笑讥讽，并把他的钱都赢在手头。镇上的人没有她想得那么淳朴，也没有她想得那么善良。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她的圈子和职业保护了她。

08

2000年的5月，李红梅家出现了一件怪事：睡到半夜，感觉有什么东西咬了一下脚趾头就消失了……侦察了几天才发现是一只硕大的耗子，体型像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猫，眼睛贼溜溜的，一开灯就躲，一关灯就出没，根本就逮不到，也找不到它的窝巢。

某天晚上大耗子得意忘形，把红梅儿子的头给咬破了，急忙送去打了狂犬疫苗。之后红梅实在没辙，请来了庙里的和尚作法，也请了仙婆，下阴的时候仙婆说是红梅故去的爸爸回来了，要烧纸钱慰藉一下。

画完符烧完纸钱，大耗子还是神出鬼没地作案，李家一到晚上就惴惴不安，红梅楼下的退休老太太听说了此事，“我还不信邪了”，于是她操起一根大火钳，把红梅家的人请出去，大门一关，在屋里一阵“叮里咣当”。十分钟之后，老太太推开大门，得意洋洋地钳起奄奄一息的死老鼠，才终于消灭了李家的噩梦。

李红梅不怕地不怕，唯一就怕这种啮齿动物，它们逮住机会就会蚕食一切，她的生活经不起这个。

2022年3月，本来是讨论一个养老问题，最终却演变成了童慧和李红梅的一场大的争吵。

“你们都说我儿子，可是从小到大，除了过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李红梅说。

“你还管得少啊？他工作、结婚，哪样你没有出力？”童慧忍不住打断她，“你为啥就那么看不惯我给屋头的人做事？”

“那是因为你对你屋头的人和对我娃儿太不相同了。你也就是这几年态度才开始变化的。从他结婚开始，你咋子骂的？球钱没得，还又结婚又买房子。”他当兵回来五千块钱放在我这里，我给他买个一万块钱的戒指不该吗？你姐姐娃儿的车是不是你掏钱买的？我儿子的房子还至少是自己在供贷款……”

“你就是太计较钱了……童慧！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自私自利。”红梅的嗓门大了起来，和童慧不同的是，她即使生气，说话也能保持一定的条理性。

“我太自私了，你咋子不把心子掏出来？你儿子的房子钱是咋子拿的？首付七万，我借了五万，后来要在成都买房子，把幸福家园的房子卖给我，换成你儿子去成都付的首付……钱不够，我妈还借了的。”

李红梅又说：“上次儿子带娃儿回来，我让他去看你妈，跟他说每年都要去外婆那儿，拿四百块钱，这是长久的。但是我们去，你当时的表情，好像我们是带着娃儿去要过年钱的。

你姐的孙儿、孙女我每个都拿了的……即使你姐也给了我孙女，你那种眼神，伤人一辈子。以前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父母教的，礼尚往来是起码的。真的你的眼神……我当时发誓，以后不要再去你家了。”

李红梅接着说：“其实这都是些小事，但是这种伤人的事太多。我检讨了我自己，张燕说，人家童慧没结婚，但我投入的是两个人的命。我亏欠我的儿。”

童慧说：“你都带着这种亏欠的心理，你还会对我好吗？你亏欠是你的事，不要在我身上找补。”

李红梅又说：“所以我说，离了婚带着娃儿的一定要慎重，要不然就永远都不要找。”

“说得对！”童慧回道。

“我对我儿子管了好多？”

“该不该管，该管。问题是咋子管。我们要进入老年生活，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买房子是理所当然，我也帮了的。买个房子三四十万，你出了多少？车位也是你买的……这样出去，有没有个头？你自己还要不要养老？生疮害病咋子办？”

说到最后，两个人都泪眼婆娑，而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早从2016年李红梅的儿子结婚开始，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

对于李红梅来说，是这几年，看到童慧姐姐哥哥如何对他们的孩子，反观自己，就发现她对自己的儿子有多不好。“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从2016年娃儿结婚的时候开始的。她那时就每天骂，儿媳妇生娃儿后，她又骂。问题是跟你我在一起之前，我已经有了这个娃儿，而且因为她说过，如果我离婚，她就和我在一起，我才下定决心离的婚。”

她一直记得，那些年她对儿子的忽略：“现在想来娃儿的性格有缺陷，不善于沟通，很有可能就是他小的时候我总不在家，把他留给我妈妈带，我妈有时候也不在家，比如他打呼噜，就一直不出气，呼吸猝停，多半是晚上受了惊吓。”

李红梅的儿子成年之后，买房子、买车、结婚、买车库，所有的钱都是李红梅在出，她钱不够，就找童慧借给他们。

她俩之间经济独立，也不像异性恋那样可以通过法律来确定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李红梅花钱大手大脚，童慧擅长存钱，但她觉得即使红梅把钱存着，以后也是给她儿子，她可一分钱都不会要她的。童慧说她也永远忘不了，前年李红梅动手术的时候，卡里连几千块钱需要垫付的手术费都掏不出来。

李红梅寒了心，童慧没了安全感，三十年以来，她俩之间的感情第一次出现大的危机。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尽管红梅儿子过来做客的时间屈指可数，童慧也不知道怎么去招呼应酬，于是只要他来家里住，童慧就早出晚归，而这无疑也让红梅心生嫌隙。

童慧最后泪水涟涟地总结说：“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听我的建议，我会说千万不要找同性，更重要的是，不要找一个离过婚有娃儿的，以后你就知道了，她会永远把娃儿看得比你更重。”

09

2016年，童慧和李红梅两个人凑齐了三十六万买下了一套位于镇上新街上的房子，从古镇的正街搬了过去。除了没有物管和电梯，这种房子和城市的商品房没有多大差别，她们对左邻右舍一无所知，每天关上门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此时的李红梅已经彻底变成了古镇上的“丈夫”之一，她上班，回家后等着童慧做饭，不累的时候帮一把忙，周末的时候照例去打麻将，抽烟的时候就躲到厨房去抽，偶尔应酬喝多了，也都是童慧把她扶回来，给她洗脸、扶她上床睡觉。

知道她有低血糖，童慧每天会特地给她煮上一盒甑子饭，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煮八分钟左右，米汤黏稠、米粒变白时关火把米饭盛出来，将甑子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将蒸锅里的米和米汤全部倒入甑子，静置一会儿，当米汤基本沥干，甑子放在蒸锅的蒸格上，盖上甑子配套的木头盖，大火烧开后，中小火蒸15到20分钟。

这样的做法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童慧的细心温柔也越发像这镇上大多数的贤妻良母。

两个人的性格如此不同：一个大大咧咧，一个小心翼翼；一个好交朋友，一个遗世独立；一个随心所欲，一个有洁癖强迫症……她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矛盾其实都来自于细枝末节的小摩擦，比如童慧抱怨李红梅地拖得不够干净，碗洗得不够干净，拿的东西不放回原处，等等。

2012年，两个人在香格里拉旅游时，朋友建议她们收养一个孩子，被童慧谢绝了。前两年，李红梅想申请去藏区支教，正好带着童慧去过几年逝世的日子，也被童慧给否决了。

她们就像真正的夫妻，日子平平淡淡，但也变成了真正的相濡以沫，成为至亲好友眼中羡慕的一对”。

2010年两个人跟团去贵州旅游，因为下午要爬山，童慧劝李红梅不要喝酒，李红梅就开始对童慧破口大骂：“你凭啥子管我喝酒？我喝点酒咋子了嘛？”童慧气得走了出来，站在餐馆门口掉眼泪。导游溜出来劝她，一起来玩的朋友张燕则跟李红梅说：“你们要过就好生过，不要来来去去发浪大的脾气，别个童慧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嘛？你不想过的话，童慧也不想跟你过了。”

2020年的端午节，李红梅得了结肠炎，去四医院检查，童慧每天去医院照顾她，李红梅的儿子儿媳也回来了。“早上要查房，要赶在那之前到，两个年轻人都没有起床，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我确实心头有点不高兴，但是我发誓下车的时候关车门是不小心关重了。”李红梅晓得了这件事以后就各种骂，啥子我的病就是被你气出来的，你滚你趴，当着医生、护士、她儿子，所有人的面，骂得之难听……童慧说：“我当时想算了她是个病人，也就忍了。”

出来之后，童慧跟李红梅的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你来照顾你妈妈，就把手机关了。在四医院的外面，她和一个朋友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出来以后才买了一个包子吃，这也是她一天当中的第一顿。

她打了车，想到仙市这种小地方无处藏身，就去了还没开通的高铁站，找了块石头，一个人坐到天黑。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还可以找谁倾诉。几个小时之后她走出来，到车站路口，遇见一个同事，那人焦急地说：“我们到处找你。”那人连忙给她姐姐打电话报平安，电话那头连侄女都担心地说：“我们赶紧去看哈小娘……”

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童慧，回忆起细节的她眼神里空荡荡的。感性的她并没有落泪，只是声音里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如同我们去跑步的那一天，黑色的夜并不是一点点到来的，而是快速、垂直地跌落了下来。

她觉得和李红梅之间所有的感情都被这几年击败了，自己好累，“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也很不好。”她最大的委屈就是付出了这么多，到头来却一无所有。那次两人的争执过后，她发过一张照片给我，颈子上面有一道明显的伤痕。“你算没白来我家吧，我的生活并不是别人看到的那样，好像还可以，其实李红梅的性格很怪，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被她打的，这事你知道就行了，我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比如今年已被她打过了……她甚至当着她儿子的面给我耳光……”她说自己不会反抗，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她们的选择原本就比一般人要艰难许多。

两个人爆发大战的那个晚上，李红梅反而是一直在抹眼泪的那个，“我把话放在这里，就算退一万步我也不可能和我儿子过，这三十年的时间如果还不足以证明一段感情的话……我没话可说，我从没有过二心，不像有的人，估计已经有了其他想法……”

童慧对此没有辩解，但她后来在微信上对我说：“别人到民政局就解脱了，我们反而是没有约束的约束。”

她们之间没有孩子，连一纸承诺都没有。大概最深的羁绊就是那三十年，这个时间足以把不羁的李红梅都变成另一个童慧。“我从前是个多么洒脱的人，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管再远，朋友也特别多，现在也经常有人打电话过来，但我都不想出去吃饭了，就和童慧一样，越来越喜欢安静。”

她们都如此惧怕改变。周末的一天早上，李红梅又照常在家里抽烟，童慧给她发出最后通牒：“你要再不戒烟，这暑假我就走了。”“你去哪里？”“你管我。”

她其实并没有地方可去，童慧第一次去成都，就被行人走路的节奏给吓着了。若干年前还有一次，童慧随李红梅一起去成都亲戚家，两个人在人民广场就迷了路，怎么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几路公交车在哪里，朝哪个方向才是对的，最后只好站在原地，等人来接。那一天开始，她俩都知道，这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她们再也不想离开小镇。在2016年搬到新街的房子之前，她在古镇老街住了四十年，从那里往上沿着斜坡走，跨上台阶，穿过车站的十字路口，三分钟就能走到单位上班。她可以悠悠地走，比夏天上涨的河水速度还慢。

李红梅十年前已经彻底放弃“出去看看”的想法，她周围的好朋友至少都是“出去过的”，但她心甘情愿守护着童慧，在这个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是她们狭窄而又宽广的全部。

10

清明的头几天，童慧梦见妈妈回来了，说我有个很宝贵的东西要给你，你等着。第二天又梦见她回来了，还是在家里到处找那东西，还是没找到。“我问她啥东西，拿给我一个人不行，这么多哥哥姐姐要分，她说我是给你一个人的。”

然后，还没有等到那个礼物的出现，童慧就醒了。

闹钟设定在了清晨的七点、七点半她收拾好出门，五分钟之后就可以出现在单位的大门口。“但是妈妈到底要给我什么礼物呢？”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童慧根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年龄，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老了。前些年有人问她多少岁，她说自己1970年生的，说出口的瞬间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大岁数了。“我感觉自己还很小很年轻。出去总会有人问你孩子多大。只要一说出没有结婚的时候，对方的表情总是会很震惊：‘真的？你咋子还没有结婚？’”

妈妈走了以后，她才感觉到自己曾经被保护得有多好。

爸爸最后走的时候，要打开棺材给大家看最后一眼，她就不看。妈妈走的时候，最后那一眼，她也不想看。家里人把妈妈的遗像也都收起来，有次姐姐不小心翻出来，一看到照片，两姐妹就号啕大哭。

亲人的离开，仿佛撤去了她与死亡之间的隔断。童慧的妈妈信仰佛教，金桥寺门口那尊弥勒佛就是她捐赠的，她也信因果报应。受妈妈的影响，童慧逢佛、菩萨的大日子也会去寺庙烧香，但她不希望有来生。“生离死别的滋味太难受，家里的大姐也老了，大概这后五十年就是不断地告别，我受不了。”

关于妈妈的细节，李红梅、对面的邻居、视频里的一条狗，都能让童慧瞬间掉入情绪之中，她的感性里面总透露出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天真。

我问过她俩同样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小镇待着，会不会觉得孤独？她俩都摇了摇头。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这两年童家事情不断，某个哥哥得了癌症，某个姐姐出了车祸，每次遇到类似的事情，都是靠童慧一个人撑起来，她帮忙做饭、打理家务，忙前忙后。作为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她却是最能干、最愿意牺牲自己的那个，也是当之无愧的核心。

李红梅心疼童慧，觉得只要家里来一个人在古镇的老家居住，童慧就要跟过去照顾，“不应该”。有次两个人闹起来，她干脆拿了个小板凳，守在卧室门口不让童慧走。童慧又急又气，而李红梅却说：“她每次累了以后就容易感冒，一感冒神经性耳鸣就再犯，为了家人，她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爱惜自己……”

若干次去她们的家，两个人从未依偎在一起，李红梅殷勤地洗水果、剥果皮，拿着牙签递给童慧时，她也显得不冷不热。李红梅如果挨着客人坐这头，童慧必定坐在沙发的另一头，仿佛也有意识地要以肉体的距离表达她潜意识的感受。

到了52岁这一年，和许多人相比，童慧承认自己之前从未过得艰难，但还是要经历生离死别以及感情的困扰。童慧说：“她总觉得当初为了我离婚，一个人多造孽，但我都到这个年纪了，人生还能有什么改变？”她说的这一句话，和她认识但是完全不熟悉的那些镇上的女人，已经相差无几。

童慧最深爱的妈妈选择的是土葬，但她从来都不相信人有来世。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她并没有看到多少的家庭幸福。“我觉得别人的家庭很艰难。有一个娃，他很小的时候肚子痛不会说，你也不晓得，稍微大了一点又有学习压力，读书、成家、生儿育女，好累哦，人的一生真的是……一言难尽。”

童慧觉得，如果真的有来生，她不想变成人，她想变成水，很清澈很安静的那种，就算

没有意识但也对这个世界无所谓。

2004年，李红梅的妈妈得了食道癌，屋里姐妹有人说做手术，有人说不做，最后家人的选择是相信科学，然而手术并没有延长老人的性命，她妈妈有隐性糖尿病，几天之后创口发生感染，伤口不愈合，就走了。因为和妈妈住了一辈子，她已经习惯了妈妈在的日子，有的时候下了班，她在家里做饭，妈妈卡着点打完麻将后上楼，敞开的大门永远会传来妈妈远远又清晰的一句：“梅啊……”

从此李红梅对“将来”这种事反而有些不以为然，她觉得童慧太过于胆小，对死亡，还有不可知的事情看得太重，她永远焦虑特别遥远的事情，我就不是那样，你说我有没有担忧，肯定有，但我首先过好当下，那么远的事情想它做什么？”

妈妈的事却对李红梅的弟弟产生了很多的冲击，他从2004年开始戒掉荤腥，吃素吃了七年。有一次他在朋友圈发了一首《大悲咒》，童慧就顺手收藏了起来，每天睡觉之前放一下，她心里面就会变得很安静，而这件事情也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秘密。

童慧好像放弃了对生活所有的抵抗了，她是如此平静、如此顺从，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会在临睡前放着《大悲咒》，一遍又一遍，祈请菩萨慈悲化解。

然而生活中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大的烦忧，除了年过五十之后，童慧和李红梅一样，都因为胆结石摘除了胆——釜溪河这条自贡人的母亲河，养育了这里的人，也由于当年的三线建设，来自上游化工厂的污染，使得整座城市成为肝胆病高发的地方。直到2022年4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通报的全省地表水质量排名，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差的后三名还有自贡市。

不过经过那次吵架，她们关系也缓和很多，至少李红梅说：“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对你说伤人的话。”她们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正常上班、下班，一前一后地穿过古街，在夜晚时分，缓步地走到河坝上，静静地看着黑洞洞的河水。

到了雨季的时候，河水很高，漫上河边的台阶。夜色中的釜溪河水流速加快，大段的树枝拦阻起雪白的浪花，就像有什么闪亮的东西泼溅出来了似的。童慧又看见黑色的脊背翻腾着，正在逆流而上。她指给李红梅看，李红梅盯着河水半晌也看不太清楚。有个搞渔业的朋友曾经说过，有些淡水鱼每年产卵的时候也会洄游，但是像鲑鱼这样的海洋生物，绝对不会在自贡出现。童慧没有说话，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出现了一句普通话字幕的话外音，像是当初看电视的时候被按下了静音键——“釜溪河为什么就不能有鲑鱼呢？”



易小荷

资深媒体人、作家。《七个作家》、《骚客文艺》、《搜历史》公号创始人。代表作《盐镇》《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Ross Sokolovski](#) on Unsplash

非虚构

黄金海岸： 中非跨国掘金者的暗流①

在場 | 生活亲历者

故事要从一张从非洲传来的死亡证明书开始说起。

本文为“在場·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作者：谭威。小鸟文学授权转载。“在場”由 [Matters Lab](#) 与 [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可关注[官网](#)与[Facebook](#)获得征文、讲座与其他活动的最新资讯。

白发送黑头，真伤心。儿挖金，不稳定，在非洲丧命。我心惊，又怎么顶过这一辈子
——电影《夏至》

2020年12月1日中非共和国当地时间12时30分，上林籍的淘金工人阿辉在位于雅诺凯(Yaloke)镇的矿区突发胃出血，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4岁。阿辉短暂的一生浓缩在一张简易的，由中非首都班吉圣布兰丁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单上。死亡证明单上写着他姓名、出生日期、死亡时间(2020年12月1日20时05分)、职业(矿业经理人)和死亡原因(胃出血与心肺震荡)，证明单印着中非共和国外交和海外侨民部的印章和当地医院医师的签名。

阿辉的遗体被放置在当地医院的太平间里，他的死亡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证明：当地医院的医学鉴定、当地警局的死亡鉴定书、驻中非大使馆的死亡认证、中非共和国矿业协会的死亡通知……这些死亡的告示和确认的语言冰冷而精准，像是为这位来自中国南方籍籍无名的矿工所写的官方墓志铭。12月4日，阿辉的老板老覃总算拿到官方的死亡认证书，办理好了遗体火化的许可证。许可证上这样写着：伟，生于1975年，广西，男，于2020年12月1日班吉圣布兰丁医院休克后去世，尸体将于12月5日8点30分送往火化。

阿辉的遗体静静地躺在粗壮的木材堆上，当地运尸工淋上汽油，点上一把火，要等上六七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火化。阿辉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旅途遥远和疫情爆发，不能陪他走完这人生最后一旅路。熊熊大火，发出滋滋的响声，陪在他身边是他矿区的几位工友和老板老覃。漫长的火化拉长了这备受煎熬的时刻。蹲在一旁的老覃沉默不语，一支接一支抽着苦闷的烟。在非洲淘金这些年，他亲眼目睹和见证太多工友的死亡：挨马啦痢(Malaria)死的同村发小、在工地上被当地劫匪乱枪打死的表叔、在去勘探矿区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的工人，去集镇卖金时被劫丧命的合伙人……都是老覃为他们处理身后事。

老覃说挖金这一行挣的钱都是拿命搏出来的，黄金带着人血。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是为一个感染疟疾，不治身亡的同村矿工处理后事，才36岁，年纪轻轻就在异国他乡送了命，由老覃负责送他的骨灰回国。那一天，因为大雾天，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的航班大面积延误。晚上他与骨灰盒同处一室，挤在机场旁旅社一间狭窄的小屋里。那一夜他一直睁着双眼，开着灯，整夜未眠。他说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有

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他不敢想象如果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的遗骸，他农村年迈的双亲和妻儿该如何度过余生。

老覃为这个逝去的矿工单独买了一张机票，他的骨灰盒用书包包着，坐在老覃的旁边，靠窗的位置，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了，老覃说不想委屈他挤在行李箱里。经过十九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终于落地，入境时却被海关人员拦了下来，怀疑骨灰盒里是非法的东西。老覃拿出一叠叠死亡证明材料、病例单和使馆证明反复解释后，才得以放行。他抱着骨灰盒连夜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回南宁，又驱车三个多小时，才终于到逝者的老家，天已经蒙蒙亮了。临近村口时，老覃摸了摸骨灰盒，心里默念道：“老表，回家咯！”。

而这一次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国内严格的入境隔离和熔断政策，从非洲回国的航班少得可怜，也异常的贵。在非洲的上林矿工们想回国变得十分困难。阿辉的爱人找不到带阿辉骨灰回国的同乡，最后只好请老覃把他埋葬在异国他乡。在去往雅诺凯镇矿区一条土路旁，有一片棕榈树，阿辉被埋葬在小小的土丘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

在寄回家的遗物中有阿辉的两本护照。第一本护照上的证件照，是阿辉2011年3月在县城出入境大厅拍的，35岁的他穿着黑色的POLO衫，眼神笃定。这是他第一次办护照，第一次出国，将去往一个从未听说过，却又令人向往的，被称之为“黄金海岸”的西非国家——加纳。国际黄金的价格从2008年开始一路飙升，在阿辉办理护照的2011年3月份，伦敦金银市场的黄金交易价格已经从2008年1月855美元/盎司飞涨至1426美元/盎司。大世界的黄金热潮，开始席卷上林这个华南边陲的贫困之地，撩动着这个有着深厚采金传统的地方的人们的心弦。

在阿辉办理护照两个多月后，当地的银行和信用社突然在一个月涌进十二亿多的汇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如此异常的资金流动，甚至惊动了北京有关方面，官方怀疑这些钱可能是“黑钱”，担心与境外的洗钱、赌博和电信诈骗有关。证监会、银监会和公安部等多部门派出联合工作组前往上林县调查此事，当地基层干部带着他们看集镇上正热火朝天生产的砂泵制造厂，走访非洲淘金者的家庭，指着村里一栋栋新起的楼房对这些北京官员说道：“这些都用‘非洲钱’盖的，都是我们金农在非洲挖金挣的血汗钱”。那一年的年末，县信用社挂起巨幅的红色横幅，写着“热烈庆祝我社居民储蓄存款达到30亿元”，镇政府挂起“一人出国务工，全家脱贫致富”红色宣传标语。

(印度尼西亚的Bre-X金矿)这是一场表演，一出戏剧，一个魔术和一种集体的幻觉……利润必须先想象，然后再提取。魔术越是壮观，投资狂热的可能性就越大

——Anna Tsing, 2001

那时在阿辉生活的村子，黄金、加纳和投资非洲成为打架茶余饭后最重要的话题。村里人在老槐树下聊着这股淘金热中的财富传奇人物：在加纳的工地上挖到“狗头金”的幸运儿、负债累累的赌博佬靠在非洲挖金实现了咸鱼翻身、曾经混江湖的“三毛”在非洲淘金暴发后在县城买豪宅购豪车、某个命里带金的老板在加纳机组一夜净赚数十万……这些传奇亦真亦幻，像彩色的希望泡泡机，不停地给当地人造梦，俘获人心。清明祭祖后的家族聚餐，变成了投资股东大会，亲戚们热火朝天地分享着投资加纳，投资非洲的秘诀，商量着怎样集资入股，抓住这个千载难得的致富机会。酒桌上，村里的年轻仔们拿着像素不高的手机，互相传看着一张张从加纳传回来的照片：在加纳矿区拿着一根根金条、一块块金砖的上林淘金者，与印度老板卖金交易时一捆捆塞地(加纳的官方货币)和一叠叠百元美元的现钞，上林人在库马西的矿地上一台台轰鸣的卡车挖掘机和上林制造的砂泵……这些照片，这些表象的碎片，像一幅财富宝藏图的拼图，像一块具有魔力的吸金石，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足三千元的贫困之地，激发出人们对于发财和暴富的强烈渴望。加纳——这个被称为“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西非遥远国度，成为这群充满旺盛能量的草根淘金者眼中新的“金山之城”，新的希望之地和财富沃土。



“淘金乐园”里非洲女性雕像和已经报废的非洲淘金设备。
由本文作者谭威拍摄

在阿辉生活的集镇上，与非洲有关的事物如雨后的野蘑菇一样涌现。

集镇公路旁的一栋五层的天地楼顶，矗立“投资非洲”的巨幅广告牌，这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门店招牌写着“上林一塞内加尔一马里”，门店内左右两边悬挂着镶着金边的毛泽东像与习近平像，墙上挂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语。外贸公司对面的砂泵制造厂棚外，堆积着密密麻麻地砂泵机和柴油机，在淘金者眼里它们就像一台台胖胖的印钞机。

狭窄的村镇公路旁，停着长长的集装箱货运车。这满满一箱物资将运往深圳的盐田港，从那里出发，漂洋过海运往上林人在西非的矿地上。代理销售挖掘机、柴油机和零配件的公司纷纷成立，他们的老板在办公桌上关注着国际金价，墙上贴着一张张大大的非洲地图。电线杆上贴着“专业签证：专业办理加纳、加蓬、津巴布韦等国家及

世界各地的签证，保证让你快速、顺利、安全的到达目的地”签证代办广告。

小店门前立起“加纳签证，北京正规发证，上林一条龙”的招牌，私人药店的门前贴着“本店长期供应非洲药品，青蒿琥酯片”的海报。在集镇公路旁学校的白色围墙上，刷着“从非洲回来的到县疾控中心检查是否患有疟疾”的标语。在非洲发家的金老板在当地开了一家“淘金乐园”的农家乐，在园区中央，放置着一套已经报废的非洲淘金设备，旁边摆放着一群西非部落的黑人女性塑像。园内西非农村草屋样式的包厢上面写着“加纳厢”、“喀麦隆厢”、“尼日尼亚厢”、“刚果金厢”和“马里厢”……销售淘金设备配件店的大厅前摆着关羽、财神爷和观音像，老板办公室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下面，一个身上写着“黄金万万两”的金色招财猫在不停地招手。

老板的记账簿记着各种要发往加纳的机器零件，账簿的金灿灿的封面，像是用沙金铺成的一样，扉页写着 Today you do things people will not do, tomorrow you will do things people cannot do。开砂泵厂的老板娘带着老花镜，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 Excel 表格里敲国际物流的发货清单。

砂泵厂的工人们昼夜不停地赶工生产，厂子里都是刺耳的机器轰鸣声。开叉车的工人一趟接一趟往集装箱里“喂”淘金设备和机器零件：砂泵、增压器、转盘、直流焊机、链板、斗齿、斗轴、黄油枪、链条、收金袋和机油。女工们正在打包矿地工人所用的生活必需品，像回力牌的男装工矿的雨靴、雪花啤酒、真龙香烟、金银花茶、红牛饮料、八宝粥、太阳伞、卷纸、挂面和面粉等。

载着集装箱的大卡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排起了长龙，司机不耐烦地疯狂按着喇叭，刚修好水泥路被压得坑坑洼洼。这一个个集装箱将被运往深圳盐田的国际集装箱码头，经过五六十天的海上航行，抵达加纳的特马港。这些设备和物资在清关后将被运往塔诺河 (Tano River) 和奥芬河 (Offin River) 沿岸，那里蕴藏着丰富的沙金，来自上林的淘金者们在这两条河流沿岸，由北至南不断开辟新的沙金矿区，游动的淘金足迹遍布库马西 (Kumasi)、奥布阿西 (Obuasi)、顿夸 (Dunkwa)、萨姆雷博伊 (Samreboi)、阿桑克兰瓜 (Asankragua) 等多个加纳的采金重镇。

国际黄金市场的强势脉动，深深地影响这个华南边陲人们的生计和对财富渴望，这个小地方开始刮起一股“投资加纳！”的热带风暴。卖肉的小贩、服装店的店主、小卖部的老板不再甘心地做薄利的小本生意，纷纷拿出他们积攒多年的积蓄，在上林人的加纳淘金机组占上一股。有的农民卖掉牛、羊和庄稼，七拼八凑到非洲淘金的差旅钱。民间放贷者夹着公文包往村子里跑，四处放款给那些渴望想登上这列“投资非洲”财富快车的人们。开厂的老板、基层的公务员、信用社的主任也眼红那些有“金命”的富豪者，鼓起勇气纷纷“下海”，投身于这股淘金热之中。朋友之间见面的寒暄，从“你吃饭没？”变成了“你投资非洲了没？”。

在这个小地方，去“黄金海岸”淘金成为财富和希望的代名词，像一股从非洲大陆吹拂而来的灼热而充满魅惑的热带的“风”。

县城的狭小的出入境大厅，挤满了前来办理护照的人，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街边很远很远的地方。2006 年，这个偏僻的县城办理护照的人数才不过 378 人，但到了 2010 年和 2011 年，全县办理护照的总数飙升到 5229 人。很多人拿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本护照，他们即将动身，第一次出国，前往未知的“黄金海岸”加纳，去找寻一粒一粒的诱人沙金。

阿辉就是这群出国人潮中的一员。随着 2012 年国际黄金价格创下 1970 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在最高峰时飙涨至 1920.8 美元 / 盎司，一股股淘金的热浪不断席卷南中国这块边陲之地。这一年，全县办理护照出国的人数飙升到 6941 人，创下了历史新高记录，县出入境大队不得不开设“绿色通道”，以应付洪流一般的出国人潮。



2010 年阿辉第一本护照上
加纳移民局盖的第一个签证戳。
图片由阿辉家属提供

阿辉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了两万块，找了一位“北京”中介代办加纳的签证和代购机票。没过多久，签证就顺利下来了，加纳的签证官在入境居留的最长时限“30 days”上画了黑色的圈圈。和许多同乡一样，阿辉拿的是 30 天短暂停留的旅游签证，办理签证所需要的双程机票也在那位“北京”中介的运作下，在出发登机那一刻变成了单程机票。这趟未知的出国淘金之路，很多上林人将归来的日期定在了投资回本、清偿债务和发财的那一天，而那一天也许很短很短，也许很长很长。这是阿辉人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去遥远的非洲大陆，他对非洲的印象只有“动物世界”里的荒蛮燥热的沙漠、狂暴的狮子和湿漉漉的热带雨林。

阿辉这一次非洲远行，就像在十五年前阿辉和他三叔第一次出远门，坐七天七夜的绿皮火车，从南中国的南宁到遥远的北方黑龙江，去有着金镶边之称的大兴安岭采金。在万名金农闯关东的淘金热下，阿辉从深圳的电子厂离职，离开了干了三年的流水线。列车狭窄的通道上，大家背着沉甸甸的蛇皮袋子，列车里面像春运一样拥挤。火车上的厕所和过道挤满了去黑龙江淘金的上林人，有的蜷缩着身体挤在车厢的行李架上，有的困了就躺在座位下狭小空地眯会儿眼打会儿盹，有的歪在厕所门口打瞌睡。在当年广西《南国早报》一篇“桂西金农闯关东”的报道中，这样描述这股声势浩大的淘金热潮：

“从 1994 年到 1996 年，上林县每年都有 3 万多淘金者裹挟着 1000 多万元资金北上黑龙江，如此大规模的民工、资金大流动，在上林县是空前的，在广西亦属罕见……

在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这支为强烈的发财欲望所驱使而千里大迁徙的农民“远征军”要上演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

回忆起当年和阿辉一起闯关东吃的苦，阿辉的三叔仍然历历在目：“绿皮火车走走停停，我们从黎塘火车站到北京站，然后转车到哈尔滨站，再坐班车到达县城，到长途汽车站搬运的设备。矿区在深山老林，砂泵、柴油机、铁锹、月光、水枪和铁锤，都得我们自己扛上山。六个壮汉扛着七八百斤的砂泵，四个男的抬六百多斤的柴油机，一步一步从山脚扛到山上。山路十八弯，颠簸的要死，磨得我们的脚起了血泡，用针穿破了继续走。扛机器的人每爬一段山路，就大口喘气，重重的机器压弯的腰，把肩膀都磨脱了皮。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落脚就开始搭工棚，砍些树当木桩，再用彩条和粗布围好，吃喝拉撒睡全都在那里。四月份，北方的地还没完全解冻，三四个人拿着高压水枪冲地层，被冰水弄湿全身，刺骨的冷，我的风湿病就是那时落下的根。一伙人沿着河沟探好“金路”，圈好矿地后，就开始架砂泵，搭木质的溜槽，搬柴油机，然后挖土、打井、抽沙、清溜，最后用舀金桶淘洗出沙金。工棚的木板床上不时溜进去蛇、刺猬和老鼠，我们就杀了当打牙祭的野味吃。我们二三十天才下趟山，平常一日三餐都是土豆、白菜和黄豆。早上吃，中午吃，晚上炒了再吃。矿地上的女工少得可怜，但干的活一点不比男工少，要给一大群人做大锅饭、洗碗、洗衣服、买菜、记账……晚上一伙人睡大通铺，夫妻两口子和我们之间就拉了个布帘子做隔断，他俩说悄悄话我们都听得见”。

那些年，阿辉就像北上南归的雁鸟一样，清明祭完祖后就坐着绿皮火车北上黑龙江，七月十四中元节前后回来。他淘金的足迹遍布大兴安岭、黑河、嫩江和呼玛。有一次从北京站转车回家时，他特意去了天安门、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毛主席，一叠褶皱破旧的钱他藏在三角裤边缝的小口袋里。



90 年代“闯关东”的上林淘金者

在东北的一处工地。

图片由田野关键报道人阿桂提供

讲到这里，阿辉的三叔突然说道：“我有个好东西你看看”。他从杂物间的木箱子里翻出一包东西，它用发黄陈旧的信纸包裹着。阿辉的三叔小心翼翼地打开，黑色泥土中夹杂着金灿灿的细小颗粒，他对我说道：“这就是我在黑龙江淘到的沙金，是我和阿辉在矿井里用月光一下一下刮出来、舀金桶一点一点淘出来的”。16 年后，阿辉这只不知疲倦的雁鸟，又将踏上淘金的旅程，这一次，他将奔赴一个被称作“黄金海岸”的西非国度——加纳，在遥远的非洲大陆寻找这样一颗颗、细细发亮的黄色沙金。



阿辉的三叔所保留的当年

在黑龙江所采的沙金。

由本文作者谭威拍摄

2011 年 6 月，在南宁吴圩机场航站楼入口，阿辉和抱着襁褓之中孩子的阿莹，请路人给他们拍了一张失焦模糊的合影，谁也不曾想到这张照片会成为他们夫妻俩最后的一张合影。阿辉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在亚的斯亚贝巴转机，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客机，经过 19 个小时 10 分钟漫长飞行，最后降落在加纳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在那一班航班上，还有很多讲着壮话的阿辉同乡，他们都怀抱着淘金梦，奔赴加纳这个被誉为“黄金海岸”的神秘国度。

阿辉的第一本被剪去边角的护照旧得像老人的皱纹和皮肤，上面盖满了西非各国的签证戳。从 2011 到 2020 年，他淘金的足迹遍布加纳、刚果布、刚果金、喀麦隆和中非的矿区。他和工友们去热带雨林和溪流勘探金矿，与当地的大纳纳 (Nana，即当地的酋长，不仅是掌握着许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是地方社会的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 和村民谈判矿地，和老板一起驾车将黄金卖给边境和集镇上的印度老板，将工人的工钱请福建和浙江老板走地下钱庄汇回国。他们还去当地集市上赶集，买菜、买一袋装的水、买 Made in China 的中国货。碰到“达不铁”(当地信徒礼拜、祷告的时间，禁止开工生产) 休工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当地的“上林街”吃一碗家乡风味的粉，去福建佬开的赌场玩一把老虎机，再去 KTV 跟宁德的小妹唱唱歌调调情。单单 2017 到 2018 这一年时间，阿辉就在喀麦隆边境出入了 34 次，像一条在西非海域自由游弋的野生鱼。

2020 年，阿辉在班吉中国驻中非的大使馆更换了第二本新护照，到 2030 年才到期。阿辉当时非常高兴，因为在护照被严格管控、众多出国淘金者护照被拉黑的上林县，一本能长期正常出国的护照简直比黄金还珍贵。第二本护照证件照里阿辉的模样与

第一本护照里的他，判若两人。长年在热带的矿地里苦作，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饱受马啦痢、痛风和胃病折磨的身体，让 44 岁的阿辉尽显老态。证件照里的他，皮肤被热带毒辣的太阳晒的黝黑、眼眶凹陷两眼无光、昔日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额头上一道一道的皱纹或隐或现。

如今，这本曾经让阿辉欢喜的新护照被剪去一角，像一纸无情的死亡判决书，正式宣告了这个曾经在野黄金的世界里自由流动的草根生命的终结，留下他 43 岁的妻子阿莹和两个年幼孩子，度过艰难的余生。



阿辉的第一本护照上密密麻麻盖满了西非各国的签证戳。

图片由阿辉家属提供

阿辉的爱人阿莹和孩子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那天，她在保险理赔协议书上颤颤巍巍签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孩子低头刷着手机，似乎在荧屏世界的壳里躲避现实的残忍。父亲对他们来说好遥远，好陌生，是越洋电话那头每次简单的“听妈妈的话”、“还有没有钱”的重复而简单问候；是信号微弱，时断时续的远程视频通话里的模糊形象；是每两年才回来一次的陌生中年男人……他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叫过“爸爸”了。可是如今，这个遥远的、常年缺席的父亲客死他乡，永远地离开，不再归来。

保险员让他们三人拿着父亲的保险理赔单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理赔的证明材料。他的妻子说这就像是他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阴阳两隔。尽管有六十万元的死亡理赔款，但是他的妻子说这是拿命换的钱，要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省着用。现在她每天要出去打几份零工，孩子的学费、家里的生活费、还有前些年阿辉投资非洲挖金没有还清的债，如今全都要靠她一个人来扛了。离开保险公司时，阿辉的妻子小心翼翼地拿着他的两本护照，彷彿捧着他爱人的骨灰一样，眼角落下两行无声的泪水，真的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从远处看阿辉的家，在村子一堆新起的房子中并不起眼。未封顶的楼顶上挂着生锈的绿色起重机，第二层还是红砖瓦的毛坯房，钢筋架漏出了尖尖角。红色生锈的大门两侧贴着已经泛黄的“财源广进富贵家，出外求财财到手”的春联，堂屋左侧的墙上挂着“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和两个孩子的奖状。来到阿辉的家的时候，他的爱人阿莹刚从隔壁村子的柑果园做工回来。阿莹用长着厚厚一层茧的手指着房子说道：“这个家是一点一点建的，房子是一层一层起的，有的用的是‘黑龙江钱’，有些用的是‘非洲钱’”。家里的每一块石砖、每一扇门窗，每一寸空间，都有漂泊在外阿辉的影子。前年清明阿辉回来的时候，他告诉阿莹说再在中非矿上做两年，回来就把一直未动工的二层给装修了，可阿辉和阿莹没有等到那一天。阿莹垂下头，泪珠滴落在她沾满灰尘的褶旧牛仔裤上，留下一道一道的泪痕。堂屋前的先人牌位前的残烛燃烧着，发出微微昏黄的光。

阿莹摘下遮阳帽和袖套，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脸颊和脖子被毒辣的太阳晒得通红，她用力捶了捶酸痛的老腰。收果的忙季她在村子附近的果园做工，一天一百块钱，管一顿午饭。在柑果园里施肥、剪枝、嫁接和打农药。她做工的这片柑果园，是隔壁村一位在喀麦隆淘金的金老板承包的，金老板的老婆在家负责管理。前几年在非洲发了财的金老板们，听说在家种柑果有前途，就一窝蜂地跟风包几百亩的大田种柑果，家乡的土地和风口上的柑果变成了新的“金矿”。这几年，当阿辉在中非的上林老板的矿地做工时，阿莹在老家给金老板的果园修枝、施肥和收果。阿莹说：“柑果不像金子，金子保值，柑果一年一个价。前两年柑果的价格跌到请人来摘果和选果都不能回本，很多老板就让果子烂在果园里，地上掉的全都是熟烂的果子”。

如果将时光倒流到三十六年前的 1986 年，阿莹辛苦做工的这一片百余亩的柑果园及其周边农田，被国营的“上林金矿”公司曾视作为一片蕴藏丰富黄金资源的财富沃土。广西地质勘探队和国营的东南金矿公司对这片矿床的开采前景信心满满，整个上林金矿的基建投资总预算就高达 1212 万元，预计开采的生命周期长达 14 年之久，沙金预测储量多达 2233.9 公斤。经过复杂的测算，这将是一个年产值高达 485.53 万元，投资利润率 16.5%、返本后利润总额可达 1355.982 万元的大型的优质金矿项目。在“上林金矿”的宏伟的蓝图里，上林这块南方贫困的边陲之地将变成一座富庶而丰裕的“黄金之城”，金矿业将如同一台马力强劲的“发展机器”，带领这个贫困县的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90 年代“上林金矿”的淘金船，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淘金船之一。
图片由上林县黄金协会提供

1990 年，在绵延起伏的大明山下，矗立着一艘重达 1164.4 吨，耗资 498 万元打造的巨型采金船，这艘 200 升桩柱式连续链斗采金船是由冶金部黑河采金船设计院设计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采金船之一。

在矿区的围墙外，每天挤满了成群结队的围观的人，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庞然大物，期待着它从地下挖出无穷的黄金宝藏来。还有排着长队，带着红领巾的学生，来参观这艘像变形金刚一样的采金船，回去写老师布置的关于“采金船”的命题作文。在这些孩子们的眼里，这艘淘金船，像外星球来的天外之物，像亦真亦幻的梦航船，像一头钢铁巨兽。谁也不曾想到，在这群孩子们中间，有很多人将在二十多年后驾驶着一台台挖掘机，在西非一片片被铲平的热带雨林和可可树林里，挖掘着埋藏在土地下的黄金宝藏。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仅仅过了三年，这个雄心勃勃打造的大型金矿工程就突然停产解散，“死因”至今未明，昔日喧闹的矿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淘金船和采金设备杂乱的丢弃在矿区，一片狼藉，这片昔日的希望之地和财富沃土沦为废墟。常年征地未获赔偿的农民，被矿区开采损坏农地的乡亲，开始将这艘淘金船当做替罪羔羊。他们开始悄悄地“肢解”这艘巨无霸式的采金船，船上的电气、吊车、供水和液压等设备被全部盗光，顶棚和房板被悉数拆毁，三台 220 型的推土机被卸得只剩下底盘。到最后，这艘巨型的淘金船被周边村民拆得只剩下光秃秃的船体和钢架，当时的一份县黄金局的汇报中描述了矿区的惨状：

“从六月份起，管护人员不知去向，采金船和队部的资产设备也随即失管，资产被盗、被转移、被卖的情况不时有人反映。到十月廿七日前。采金船上的设备也被盗、被拆得所剩无几，从电路、电气设备到机械配套设备。从易拿易要的另配件到固定的设备，从船头船尾到船里船外，都已是被拆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惨象）。好端端的一条采金船，就因为失管失控，变成了如此惨不忍睹。再看看金矿的情况，大门敞开，进出自由，院内杂草丛生，满目荒凉，车间仓库门窗破落。贵重的仪器、设备、零件已大多不翼而飞”

这艘魔幻现实般的淘金船，犹如外星飞船突然降临在大明山脚下，又突然剧烈的夭折死亡。它那犹如黄金般的“铠甲”，被拆卸成一根根、一条条的废铜烂铁，被愤怒的村民当做废品贱卖。而它如猛兽般身躯，被肢解的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昔日梦幻般的“黄金之城”变成了枯枝败叶的荒凉废墟。如今，这段魔幻的历史永远深埋在这片柑果园的地下，而这片柑果园的主人正在喀麦隆的偏僻农村，开着挖掘机，推掉农户的可可树，在十几米深的地层中采掘出一粒粒的沙金来。

这十年来，阿莹已经习惯与阿辉相隔八个多小时的两地生活。阿莹上午做零工时，阿辉还在矿区的工棚里睡觉。阿辉早上醒来吃完一碗粉、在像蒸笼一样的操作室启动挖掘机时，阿莹已经收工，去学校接两个孩子放学，喂猪、喂鸡、给孩子们做饭和洗澡。阿辉干完一天活，阿莹和孩子们早都已经熟睡了。最早去加纳的几年，阿辉每个月从丛林密布的矿地驱车一百多公里到库马西的“上林街”，给阿莹打一通报平安的越洋电话，问有没有收到他的工资，问她和孩子过得好不好。后来，阿辉的工地上装了卫星锅，但信号总是不太好。他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 11 月 26 号中非的时间八点多。阿辉打给阿莹，那时儿子和女儿刚放学，准备上工的他说想视频看看两个孩子。阿莹对我说：“他是个常年缺席的爸爸，去非洲那年，大女儿四岁，儿子才一岁两个月，小的连爸爸都还不大会叫。他去非洲两年多才回来一回，在家里呆个把月又上去，他在外面其实也很想家的，小儿子跟他爸爸视频通话说：‘爸爸吃饭哦！’；他爸爸说：‘挖不出金子，爸爸没工做，都快饿死了啦！’，小的说：‘家里有那么多饭，有菜有肉，你回来吃，我留给你’。有一年清明他回来，他吃完饭冲完凉，小儿子问他：‘爸爸，你今晚还回家吗？’，他爸爸说：‘我回哪里去啊？’，小的说：‘回你家哦！’，他爸爸问他：‘我家在哪里啊？’。小的说：‘你的家不是在飞机上面吗？’。小儿子看到他爸爸是坐飞机走，坐飞机回，以为飞机就是他爸爸的家。

“飞机是爸爸的家”就像是一个稚嫩却残酷的童话寓言，我不禁想起当地一位年轻导演拍的电影《夏至》：故事取材于他老家村子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女孩小童的语文老师让他们写“我的爸爸”，可是她的爸爸在非洲采金。小童常年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写“我的爸爸”。她想了很久很久才动笔：“我想念我的爸爸。上星期我收到了爸爸托人给我买的新书包，我非常喜欢。但是我依然盼望着他可以早点回家，跟我和爷爷团聚，再也不用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淘金了”。可是这个画着冰雪奇缘艾莎公主的新书包却是个残酷的童话。小童的书包是和她的爸爸的骨灰一起带回家的。当女孩在教室里念着“我的爸爸”的范文时，她的爷爷在荒山里他儿子的坟头前烧纸祭拜。而在小童读书的小学门口，画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写着“放眼世界”四个大字。

这些年，阿莹既盼望，又害怕着从非洲打来的电话。因为电话可能是报平安，也可能是报丧。这些年，村子时不时传回谁家的男人在非洲挨抢劫死，谁家的儿子挨马拉痢不治身亡，谁的侄儿又被当地移民局逮捕入狱……尤其是午夜凌晨的突然来电，总让村子里留守的人揪着心。阿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从电话那头，阿辉咯咯吱吱地笑个不停，说自己做梦都是甜的。那个月矿地出金多，他的工资加上提成拿了二万多，去非洲前他在家这边的工地上干活才拿两千多。可没过多久，2013 年六月的一天，阿莹接到阿辉一通急匆匆的来电，压低了声音细声说道：“放心，我很安全，没事”，就匆匆挂掉了电话。后来，阿莹才知道阿辉和六个工友那时正躲在库马西一个乡村附近的山林里，他们赶在荷枪实弹的部队进场清理前逃了出来。

那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外国人小规模采矿的联合行动，如热带风暴般席卷加纳全国。数万名在加纳的上林淘金者和上千条采金生产线首当其冲，遭受重创。荷枪实弹的部队和警察突袭达芬河和奥芬河沿岸的上林人矿区，一台台还未偿清贷款的挖掘机被淋上汽油，在熊熊大火中焚毁；一台台汽车被扣押，工地被砸被毁，夷为平地；部队开始到处抓捕上林的淘金者，库马西、顿夸和奥布阿西等地的上林人都在逃命。那时阿莹和村里留守的妇女日夜揪心，他们在从新闻上、从加纳发回的照片里看到很多上林人在加纳的工地像飓风后的受难现场，一片狼藉。逃命的淘金者抱着枪蜷缩在可可树林里，不敢作声。赤膊上身的工人，抱着双头蹲

在地上，被拿着冲锋枪的当地军人围捕。当地移民局不足二十平的监房，里面羁押四五十名被捕的上林淘金者，每天还陆陆续续有上林的矿工被收押进来。

阿莹在电视上看到央视新闻频道播放着“加纳政府逮捕 169 名中国淘金者”的新闻，心提到嗓子眼了。阿辉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她心急如焚，她不知道这 169 名被捕者里有没有阿辉、不知道阿辉是死是活、不知道一个籍籍无名的中国打工者在非洲失联后应该求助于谁。

6 月 6 号，将近千名淘金者的家属，拉着“加纳军警暴力执法，中国同胞遭遇洗劫”、“请求父母官为同胞做主”的白色横幅，聚集在县政府门前抗议，愤怒无助的人群中也站着焦灼不安的阿莹。

十天后，阿莹终于等来了阿辉那通报平安的急电，她悬着心才暂时放下。一个月后，阿辉从加纳匆匆回国，像一个劫后余生的逃难者。他的背上是一道道被劫匪砍的刀伤疤痕，腿上和背上全是被雨林里的毒蚊子盯着红色发肿的包。神情恍惚的他胡子拉碴，人一下老了很多很多。可在家呆了四个月，阿辉又再一次踏上前往加纳的航班。他投资入股的矿地在清理行动中付之一炬，数十万的债务和家人的生活开支如滴滴答答的警报，让他没有选择和退路。渴望“翻身”的他只有再次赶赴这生死未卜的跨国淘金之路。

这十六年来，数百位和阿辉一样来自中国南方这个贫困地方的籍籍无名的草根淘金者，丧命于这趟生死未卜的跨国淘金之路。他们的死亡和噩运，最后以几句直白、冰冷的叙述句，出现在外事公报文或协会公告里，成为一则新闻、一个官方的警戒、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一则在这个小地方流传的轶事和一声叹息：

“2020 年 4 月 8 日，一名 45 岁的上林县公民在刚果金遭抢劫身亡，亡者生前于 2017 年 11 月到非洲喀麦隆在其表姐的采金矿点务工，2020 年 1 月起才辗转到刚果（金）为林姓浙江老板打工。2006 年离婚，其子已成年，无业”。“2020 年 8 月 6 日下午，加纳顿夸原始森林金矿附近，4 名持枪劫匪袭击了两位从工地返回住处的上林籍的淘金者，钟某被劫匪开枪射中腿部，送医途中，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其家属希望当地大使馆能够协助运死者骨灰回国”。“2020 年 8 月 13 日，非洲刚果（金）共和国发生一起 3 名上林籍公民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绑架事件，生死未明”。“2020 年 11 月 10 日一名广西上林籍公民在马里身患疟疾，因肾衰竭不治身亡。生前曾在加纳、刚果金、刚果布从事采金工作。今年九月，赴马里共和国打工，家属大使馆能够协调帮助将死者骨灰带回国内安葬”。“各位呗哝（壮话音译，兄弟姐妹的意思），圣诞节与加纳大选即将来临，近期劫匪非常疯狂。2020 年 11 月 28 日晚，加纳阿散蒂省奥布阿西地区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两名上林籍公民当场死亡，亡者生前与朋友共同在加纳投资淘金，其工地刚开工不到两月”。“2021 年 3 月 21 日，马里一位上林县的中国公民因感染新冠肺炎导致呼吸衰竭不幸去世。患者三月初有咳嗽、乏力等症状，在美国医院治疗期间确诊感染新冠肺炎，3 月 10 日转院至马里医院新冠病房，CT 显示肺部炎症（受损面积约 50%），血氧饱和度约 90%，诊断为重型新冠肺炎。住院期间，患者胃口和睡眠较差，病情发展较快，3 月 19 日复查 CT 结果显示广泛肺部炎症（受损面积约 90%）。3 月 21 日凌晨，患者因病情恶化，经抢救不治身亡”……

这些如在沙漠里顽强生长的风滚草般的跨国矿工，满怀旺盛的能量和躁动的希望，满世界淘金；但他们的流动却以死亡这种剧烈的形式夭折、终结，以“某”、“某”的代名出现在简短的官方公告里。籍籍无名的他们最终变成野生流动性世界里的黑暗亡灵，成为漂泊不归的“野鬼”。而他们死亡的余波，将在中国南方边陲一个个像阿莹这样的家庭里不断地震荡。

（为了尊重受访者的隐私，文中所有人物均采用化名。）



在場

在場奖学金由 Matters 写作平台及文艺复兴基金会共同出资设立，目标是资助非虚构写作者完成有潜力的短期计划，题材包括但不限于观察纪实、调查报导、田野研究，唯需书写记录内容 100% 真实，文中事实引述或描述，需注明来源。“在場”奖学金每个季度开展一次，一年共四次，致力于持续培育、支持华文世界的非虚构写作。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电影《驾驶我的车》(2021)剧照

非虚构

驾驶我的车，拿起我的笔

沈非 | 生活亲历者

这也是一只小鸟的故事。

去年10月，我爸满60岁退休了。

几个月后，更大的改变也发生了。

如果不是那变故带来的连锁反应，今年一月的他会是个快乐的上海爷叔，搭第一班地铁去面馆吃早饭，拍张照片发朋友圈，接着回家策划全家人的晚饭。而在1月14日这天，老文青如他也会和前同事们坐在电影院看《阿凡达2》，而不是写好一段话发在群里，赶往医院。

一个月前，因为大家似乎都怕“阳”，这场电影无奈做了推迟；一个月后，绝大多数人已经阳过而成了“杨康”。

生活还得要继续。

语境变了，原谅我不能来现场和大家一起观影，此刻的我往返奔波在去医院陪护的路上，我得和死神赛跑，抢回我的父母……

然而，总有些语境是永恒不变的，譬如卡梅隆的追求，譬如人类对外星空永远的好奇和孜孜不倦的探索，在我看，这些更有着当下的现实意义。

不多说了，祝大家观影愉快，新年快乐，永远健康平安。

——沈非 2023/1/14 晨

我们在改变来临前忍受。现在也还是在受苦。

晚上六点档电视新闻第一条是庆祝的语言，在讲我们今天的胜利多亏了某个人的英明指挥。

我也不知道是谁赢了。谁又指挥了什么。

但的确有人赢了，有些东西被跨越了。

去年底的那天，我爸因为一通迟迟没有人接的电话，赶往爷爷奶奶家，为我抢回爷爷。我爷爷1933年在上海马桥出生，今年90了。

陆续得了新冠的奶奶和爷爷具体经历了什么才到那种境地，我们都不知道，现在也无法知道全貌。爸爸回家后告诉我，那晚警察和消防员都来了，消防员破开大门，他冲进去看到的画面是他父母倒在床两侧的地板上，“一边一个。”

链条上的所有人——每个人都不可或缺，我们的生活是由人组成的——都忙不过来，要救的人太多了。爸爸打通120，对面回复说爷爷排在180多号。

前阵子，他和很多朋友的通话里都反复强调一个观察：死神来得太快了。医院走廊躺满了人，都没留下多少地方让人走。他在有九张床的急诊留观室见证了四场死亡，第一场就发生在他们进留观室没多久，那张床被简单清洁，然后腾出来——我爷爷躺在上面，接着和死神搏斗。多么荒唐。快一半人在受苦，然后消失了。躺在那里的几个人还很年轻，可能也就比我大几岁。

他每天都和别人说很多话，不怎么和我说话。当然，这种父女沟通模式已经持续很

久了，没什么大不了，可能之后也不会改变。而且那几天我是三口之家唯一得新冠的人，一个31岁却依然不太成熟（“成家立业”里的每一个部分，我似乎都做得不是特别好）的“年轻人”，一个“爷爷住院了，奶奶脑子糊涂了”的小孩。我现在能理解他只想我好好养病，等我彻底恢复，我们可以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和终极的毁灭赛跑，抢救下最重要的人和事。

于是，1月12日，接力棒交到我手上，下午是我去陪爷爷的。他对我说的前几句话里有一句“活么活不好，死又死不掉。”他是一个非常儒雅的老人，从我有记忆以来，没见过比他还好看的老爷爷。他眨着眼睛，盯住我，让我带他回家。这件事在我小时候，都是他牵着我的手在做的，从学校回家。现在的我也真的还是小孩，没法带他走，只好因为他觉得热，拿起旁边的旧报纸折一折，当扇子给他扇风，或是用小勺，挖着我娘娘带去的蛋挞中心部分喂他。每勺都是扭过头替他吹凉了，我再转过来喂他。一小口，一小口，蛋挞也就这么吃到只剩下外壳。

硬的部分他已经咽不下去了。他说自己在这里被折磨，周围的人都在骗他。

查房的护士们心态比我好得多，这些链条上缺一不可的人们一看见我，很稀罕地聚到我周围，冲他讲“哇，孙女来看你了诶！”有个护士靠近我说悄悄话，原来前几天他们为了带他去另一栋楼做CT检查，骗他说做完就能回家。他无法忍受欺骗，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只能对他说指标一好，我们就带你回家，过个团圆的春节。

“骗”得到了了解。

可能我擅长“解释”。

“一边一个。”

痛苦如果是光谱的话，会不会是一端精神，另一端肉体。爷爷神志清醒地想离开这个世界，奶奶一头雾水地等他回家。换个更温柔的说法吧，有位战斗了太久的男人只不过想活得好一点，陪他妻子过兔年，她属兔——那个护士估计也知道这件事，安慰这件事还真的是这些人做得更好。她用生肖的比喻“讲故事”：可爱的小兔子会跃过凶猛大老虎，蹦蹦跳跳地来到我们身旁。

我奶奶1939年在上海静安出生，2019年——那个昨日世界的最后一年，她80岁。我记得那年我们给她过生日，她在饭局上激动地念出类似“孩子们对我那么好、孙女和外孙这么优秀，我觉得自己好幸福”这样的话。

今天我看她，做足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去看，比如她完全不记得我。实际上，她立刻认出我是她孙女，但能联系上的“注释”相当有限。她对物的印象有点懵懂，盯着一些东西看的神态像小孩观察世界，对具体的人（谢天谢地，目前具体的人里还有我）的印象过于强烈，以至于哪怕我就在她面前，她会像对在场第三个人介绍我那样，很兴奋地讲“非非会开车子了！”

我不能带她出门散步，只好在他们家从这头走到那头，她像跟着妈妈的小鸟，跟着我。在我陪伴她的几个小时里，“非非会开车子了！”出现很多次。

我是看了她那侧床头柜上的日记本才知道，她只记得我会开车是因为12月中旬那次家庭聚餐，我在世界崩塌之前告诉她我拿到驾照了，而且开车送他们回家。

她太开心了，记上一句：

又知道非非会开车了，回家就是她送我们的。

她坐在床头反复阅读，怎么可能不记得这个——不“只”记得这个？

记忆也有两极。她忘了太多东西，目前最想记起“家”在哪里，会问清楚具体到室的地址，而不是小区名。我不想带她去外面散步了，还是去我们的家里好。很多年前，爷爷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

要不是带着奶奶走来走去，我都不知道奶奶和爷爷用自己的方式在屋里留下那么多痕迹。我感觉自己重新认识了他们，也有信心为她绘制出充满细节的地图。

比如奶奶的日记本。我回家和爸爸聊起，他说他完全不知道奶奶记日记，也是，他忙着解决别的生活问题。他之前每次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都像个风风火火的将军，丢下类似“最近疫情肆虐，千万不要出门”的指示就挂了，没功夫、也不敢——谁知道哪天自己就把新冠传给老人呢——踏入爸妈的小屋，带着好奇去看他们的生活。

宏大的东西太多了，人们为看见具体的人感动，但真正做到的没几个。看见真的太难，就像前面有群山，我们只想被看，不想看。我们受苦太久，可能无法省下多少温柔给别人。

我娘娘是最早找到日记的人——我妈告诉我，娘娘对待他们的方式要比“将军”温柔太多——爸爸没去看电影，赶去爷爷那天，她来这座迷宫看她的妈妈，在日记本里新增条目，想把大雾吹散。

爸爸住院已经十七天了。

她如此开头。因为在上一个日期，一个现在看来似乎也不太对的日期里，奶奶写了爷爷被送去医院的事，“天天流不尽泪水”……总要有人告诉她故事的后续，让她安心，止住泪水。

这个世界有始有终。爷爷可能真的是家里最聪明的人，他给死亡下战书的时间还要早。爷爷写了座右铭，把纸放在透明的餐桌垫下面。

生命为本
健康第一
妻儿为上
金钱粪土

这张纸是他一生的故事。

透明桌垫郑重地保管着一切。几张充满回忆的泛黄相片，其中一张是他抱着嬢嬢在我们老家的合影，照片里的嬢嬢很小，我第一次见那么可爱的小嬢嬢，忍不住看了很久，感觉自己也在重新认识她。奶奶可能把这举动解读为我不认得他们，掀起桌垫拿出照片问我，像是在抽查作业——她和我爷爷，都是语文老师。

“你知道是谁吗？”她歪着头问我的样子可真像一只小鸟。

“当然认识呀。嬢嬢和爷爷。”

“那你认出这是在哪儿拍的吗？”

“常德路的院子里呀。”

这条路指向的是我们的老家，我和奶奶、爸爸、嬢嬢都在那已经不复存在的房子里长大。它是我奶奶的爸爸，一个1920年代初，因为深信某种理念，从常州武进逃至上海的一代“沪漂”买下的。多年后，他因为讲了几句真心话，被迫离家，下放至嘉定外冈。在奶奶还不是“小孩”的时候，她曾清醒地向我赞叹她的爸爸写得一手好字，有一双白嫩的手。他虽然最终还是回家了，但再也无法提笔。在我嬢嬢的回忆里，他最后一次提，是临死之际，只为留下对五个孩子的嘱托。

于是四个中文字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步調一致。他那个年代的人写繁体字。我们也因此发现，“言”的出现有多重要。苦难太重，许多双手和人的尊严被狠狠践踏。明明这个男人的名字也很美——张遵时——为什么他生活的时代要这么对他？

奶奶的妈妈也有个很美的名字：邹蕙卿。这个女人曾是有钱人的太太，在家庭因变故而收入骤减后，默默撑起这个家。她和遵时一起在院里陆续种下四株树苗，可惜其中两株和遵时一样过早离开这世界，我没见到院子最鼎盛时期的样子，但能感受到坚持种树的美。

蕙卿真的是树，活得更长，甚至活到陪我长大，所以我能在好多旧照片里看见她，以及她看着我的样子。我所见到的两棵树中，有一棵是最终长得比房子还高的柳树，隔了老远都能看到，家里有两棵树的小孩没几个，我曾向一起各回各家的同学炫耀“那是我太太（这是“奶奶的妈妈”的上海话念法，发音是tata）种的树！”四个字母也挤在一起，像家人。

有年上海刮台风，它倒了。我去见树最后一面，它像一支钢笔，搁在围墙上。因为那阵子拆迁谈判刚好已接近尾声，我和奶奶都觉得它是棵通人性的树，知道房子留不住，所以自己干脆“走”了。可惜那时完全没有拍照的冲动，现在想来真的非常后悔。我们到底留下了什么？谁在帮我们留？

或许答案真的只存在于过去，需要我们回头才能看清。我把照片翻过来，发现爷爷为自己怀抱爱女这一平静又珍贵的瞬间提笔作诗《七绝·为与蓝儿共照而题》：

彩霞万朵随身飘
嫣然一笑乐陶陶
怀抱爱女情眷眷
此情此爱无人超

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了，因为我爸也为我写诗。最近一首是为我们一起拼（主要还是我在拼，拼到指腹疼了好几天）乐高打字机而写。打字机是我送他的礼物，它藏着只有我们能懂的密语：

拼出一台打字机
它可以是消暑，练脑
也更是对
幼年的补偿

它不允许拼错
有点像走过的人生
它可以重来
人生从不可以

拼出一台打字机
用文字告诉未来
渴望成功
兴许是每个凡人的梦想

用时光打发无聊
用劳作成就作品
用成功记得长大
用快乐追忆童年

写东西真是家族遗传。

嬢嬢把奶奶的日记改造成留言簿，这一次接力棒的形态是黑色水笔。我把我和奶奶做的事情记得很详细，和她一起吹。所以有风吹走房间里的尘埃，我看清一条命中注定的路。

我从奶奶家离开，回自己的三口之家，碰上妈妈要去查奶奶存款——存折的纸页用完了，不知道最后的余额——我选择陪她。期间我忽然想起奶奶，想起很多已经无法再聊的话题，眼泪掉下来，幸好戴着口罩，谁都没发现。银行网点里工作人员少，排在我们前面的男人带着好多钱，虽然妈妈因为操作时间太长很不耐烦，坐在椅子上生闷气，但在点钞机持续发出的声音里，我莫名感受到一种柔情：他也是链条上的一个人呀，辛苦工作一年，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回家的路由我负责。有段时间没开车了，我先开始开得比较慢，后来变快了。

爸爸回到家，烧奶奶以前给我做的一道菜，炸田鸡。她知道我喜欢吃，大学时期我每次回家她都要为我多烧几次，爸爸也知道奶奶不会再这么做了，那么他来。他的确烧出了一模一样的味道，只是因为眼泪，尝起来不太一样。这顿饭吃得太艰难，我们都没想到的那种艰难。先是爸爸，接着是我，最后是妈妈，都止不住眼泪。不知道这种一家人边吃边哭、慌慌张张地抽着纸巾，同时又彼此安慰打气的场景，是不是也在其他人家发生着。

爸爸哭是因为想到自己爸妈双全，至少活了那么久，只是没料到此时此刻的“一边一个”，奶奶的“忘”开始得太突然。妈妈哭是因为想到自己的妈妈。我的外婆都没有活到我妈现在的年纪，她走得太早了，而我妈是医生，这一点更让她痛苦。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为此我一直对我妈怀有强烈的歉疚，我会想象家里其他大人是以怎样的心情瞒着她，不让她知道她的妈妈走了。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坏消息”。

去年三月，蓝瓶咖啡首店开张，许多人去排队，有视频被妈妈看见，认出那里原是自己长大的地方。要不是她告诉我，我都不会为我过早离世的外公外婆写下一篇[长安路900号普通人的故事](#)。

我本来没打算写，只是发了条朋友圈圈，有前同事留言鼓励我“写一写！”

另一位前同事来约稿：“刚看到你的朋友圈，觉得这个故事好棒呀，你有兴趣写一写吗？”我是2015年年底入职“好奇心日报”的，之前对世界的了解很有限，是好奇心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开阔的人。

今天下午，因为想试探下奶奶是否只记得我会开车，我做了一番引导，有点像教小孩说话：

“你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吗？”

“哪里啊？”

“我在一个文学杂志工作。”

“叫什么啊？”

“小鸟文学。”

当时奶奶坐在床尾，向我的方向举起大拇指——因为怕她忘记，她回答的时候我就坐在床头，把我的工作也端端正正地留在纸上。她背对着我。

这个大拇指让我挺意外的。

奶奶，我在小鸟文学工作，是一个编辑。

我不仅会开车送你回家，还会用文字带你走出记忆的森林，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希望那个感叹号能助我一臂之力。

写完我坐到她旁边，肩并着肩，她突然问了一个类似“官方是否还重点关注着你们”的问题。原来奶奶除了我会开车，还记得我们的好奇心。

她低头观察我的手，接着拿起来，在她自己手里感受：“你的手嫩嫩的，是文化人的手。”

当时我只能苦涩地笑，此刻才明白，她想起了她爸爸，遵时的手——希腊语里说，爱是长久的凝视——我好像接收到那个受了太多太多苦，没能与我见面的男人发来的信号。

生生不息。

沈彤，红彤彤的彤，太阳。

沈蓝，蓝色的蓝。

这是我爷爷奶奶给他们的孩子起的名字。

沈非这个名字是我嬢嬢取的。她或许期待我在蓝天里飞，“飞”太明确了，“非”看起来更好。真巧，去年有人在纸上写下我的名字，拍照发我，认为我的名字很好听，也很好看。在我眼里，主要还是那人的字比较美。1月15日上海下大雪，那个人注意到我手干燥，把一罐润肤乳扭开，递到我眼前。我想起用指腹轻点洁白表面的触感，可能某种程度像是踏雪，踏出一条路来。

在一片黑暗里，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

一只手感受到另一只手，柔软而坚定。

命运过于清晰，没有任何理由继续逃避。现在，我想试试看能不能用文字“飞”，我相信自己的速度可以战胜一切。

我要“飞”去接我珍爱的人回家了。

希望我们都能度过一个健康、自由的兔年。

2023/1/19 晚



沈非

小鸟的家人。她“飞”过许多地方，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我想象自己也在饭桌旁，或者和照片里的人一起野餐，一起劝酒，一起庆祝生日。我几乎能构想出那种氛围，那种时刻——快门按动，宴席开场，酒酣耳热，每个人举着筷子夹着菜。他们的笑容变成了我的笑容，他们欢聚的快乐也变成了我的快乐。一切都极具感染力。我从全国各种各样的卖家手里买下了成百张照片。

这些照片是文化的记录者，它告诉我们流行如何变迁，人们从在家聚餐到去馆子吃饭，他们的习惯和喝的汽水种类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照片怀旧而亲密，是人们欢度相聚时光的写照。看这些照片的感觉，就好像走错了饭店私人包间，很快我就要被别人发现。

有很多东西当然是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照片里这些人生活的艰难一面。不知道这一顿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喜欢吗，还是只是不情愿地坐在那里？他们吃得高兴吗，还是早就急着要走？那些脸上的笑容是出于真心的吗？

我尤其留意照片里年纪更大的那群人。三四代人欢聚一堂，在一家不错的馆子里庆祝生日，这件事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人生经过了多少挣扎，才能从那个饥荒连着政治运动的年代里活到了那一天，头上戴着寿星王冠，坐在一大桌子任谁都没办法吃完的佳肴面前？



非虚构

那天晚上， 我发现了三四十年前 中国人的聚餐照片

Christopher St. Cavish | 局外人

你看，饭桌上的他们都没有拿手机



我爸妈和他们的年纪差不多。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也想起了他们。我开始思考这些照片背后五味陈杂的意义：照片里很多人如今应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些胶片上的记忆依然留存于世，这一点，他们的家人是否知道？但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扫大家的兴。对我来说，这些照片传递出的信息再清晰不过，不管是吃家里做的家常便饭，还是在豪华饭店里享受摆成三层的大餐，聚餐都是让人快乐的事情。重要的并不是桌上摆了什么，而是和谁相聚在一起。吃饭只不过是人们相聚的理由。家人、朋友、同事之间见见面，聊聊天，共度一段时光。这才是聚餐的力量所在。



我在这里贴里一小部分我找到的照片（其余的我在 Instagram 里建了一个账号，你可以搜索 Chinese_Dinner_Party，没准我还会试着写一本书）正值新春假期，很可能你已经处在亲情疲劳和饭局疲劳的边缘，这些老照片或许是个小提醒：我们一生之中最欢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和我们爱的人、爱我们的人共度一段时光。笑一个吧！





Christopher St. Cavish

美国作家，2005 年移居上海。他写美食，也写作为一名“局外人”的生活。

局外人

Christopher St. Cavish 以前是个厨师，他也是这样开始他在中国的生活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作家、编辑或者随便怎么称呼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他与他感兴趣的人交谈，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也写下了这个剧变中的国家不少变迁故事——直到他发现自己和中国的更多关联。



图片来自 Mert Kahveci on Unsplash

非虚构

解读希特勒：背叛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 发现经典

在他的最后阶段，
希特勒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德国的叛国者。

有一个耐人寻味但很奇怪且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实：希特勒并未给那些对他犯下最大罪行的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害。

苏联因希特勒丧失了至少一千二百万人，苏联自己说丧失了两千万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为了超级大国。在波兰，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如果不包括波兰犹太人，是三百万人；但是，希特勒战争的结果是一个比战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为团结的波兰。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几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百万至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政策，赋予了他们建立国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后，犹太人自近两千年第一次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一个自豪与光荣的国家。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以色列。

希特勒给英国在客观上造成了更为巨大的损失，尽管他根本不愿意与英国打仗，而一直只是半心半力地与英国作战。英国因希特勒战争失去了其帝国，并且不再是世界大国；由于希特勒的战争，法国与其他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与民族的地位都同样地降低了。

完全客观地看，希特勒对德国造成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损失。德国人也因希特勒蒙受了可怕的人口损失，有七百多万人，比犹太人与波兰人还多，只有苏联人的损失更大；其他参战国的损失远远不能与上述四国相比。但是，苏联与波兰在付出可怕代价以后更为强大，以色列因犹太人的牺牲才得以存在，而德意志帝国则从地图上消失了。

德国的地位不仅与所有其他西欧大国一样降低了，它还失去了以前国土（它的“生存空间”）的四分之一，其余部分分裂了，两个分裂的国家因被纳入两个对立的权力阵营而被迫处于不自然的敌对关系。至于至少在其中较大国家中的人们今天又可以舒心生活的事，不是希特勒的功劳。1945年希特勒在德国留下了一片焦土，不仅是一片物质上的，而且（这很容易被忘记）也是一片政治的焦土：他不仅留下了死尸、废墟与残垣断壁，以及千百万饥饿的、流离失所的人们，而且留下了一个崩溃的管理机构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而且这两点——人们的惨状与国家的灭亡——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有意造成的。他甚至试图作出更为严重的事情：他针对德国的最后计划是民族的灭亡。最迟在他的最后阶段，希特勒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德国的叛国者。

这一点，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不能像亲身经历的那代人那样容易感受得到。希特勒的最后几个月恰恰形成了一个传说——尽管不是一个光彩的传说，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希特勒开脱，不必对1945年德国的垂死状态负责任。按照这一传说，战争末期的希特勒只是其本人的一个影子，已经病入膏肓，一个废人，失去了决策力，只能瘫痪似的坐视周围发生的灾难。按照关于1945年1月至4月所流行的叙述，他失去了对事态的任何控制，在他的地堡里指挥着已经不存在的军队，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万念俱灰，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幻想在柏林的废墟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简言之，他对现实如同一个盲人，可以说已经不正常了。

这一图像无关宏旨。当然，希特勒1945年的身体已经不是最佳状态；当然他老了，而在五年的战争以后，他的神经大受创伤（丘吉尔与罗斯福也一样）。当然，他越来越阴沉，越来越经常地大发雷霆，让身边的人感到恐惧。但这种把一切描绘得黑上加黑，在末日的场景中陶醉的诱惑，常常使人们忽视了一点：恰恰在最后几个月的希特勒，就果断与意志而言，再次达到了他的顶峰。意志的相对瘫痪，固守无想象力的常规，可以在此之前的一个阶段里看到。如在1943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担忧地确认了一个“元首危机”，又如在1944年上半年也是如此。但是，面对战败，希特勒又回来了，就像被电击了一样。他的手现在虽然在颤抖，但是它抓起来仍然（或者说又是）迅猛且致命。1944年8月至1945年4月间，身体上衰落的希特勒，表现出来的咬牙切齿的坚忍不拔与急促行动是惊人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佩服的；但是，这些行动越来越清楚地（直到最后毫无疑问地）指向今天听起来对某些人难以置信的目标：全面摧毁德国。

这一目标开始还不能被清楚地看出，但到了最后清楚无疑。希特勒在最后时期的政策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1944年8月至10月），他成功地阻碍了中止输掉的战争，让最后决战成为可能。在第二阶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他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最后出击——向西方的出击。在第三阶段（1945年2月至4月），他以在1941年以前用来征服、自1942年至1944年用来消灭犹太人的精力来全面摧毁德国。为了看到希特勒这一最后目标是如何逐渐显现的，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希特勒在战争最后九个月的行为。

1944年8月的战局，在军事上与1918年9月颇为相似，当年的德国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撒手不干了。这就是说，战败按正常人的估计已经不可避免，结局可以预见到。但是结局还没有到来，败局还没有被确定，前后两次都没有。敌军还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与1944年与1945年所发生的一样，1918年也同样可以把战争拖到下一年。

众所周知，鲁登道夫在这一局势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战争该结束了。”他促成了停战请求，而且把他的政敌推进了政府，让德国的停战要求显得更为可信，给予了德国一个负担较少的、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他后来控告这些他自己委任的破产管理者（“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从后面给了未被打败的军队背后一刀，这使他1918年9月的行为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行为方式是一个负责任的爱国者的行为，他在战败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目标，即为自己的国家避免最严重的损失，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希特勒在1944年8月22日，做了与鲁登道夫1918年9月29日的行为截然相反的事情：在一次“雷雨行动”中，他命令立刻逮捕与监禁约五千名魏玛共和国的前部长、市长、议员、政党骨干以及政治官员，其中包括后来联邦德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与库尔特·舒马赫。这正是当年鲁登道夫在相应的局势下，把政府交接给他们，让他们结束战争的那群人，可以说是德国的政治后备力量。鲁登道夫在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来掌舵；而希特勒在相同的处境下却把他们监禁了。这一行动，在当时没有公开，很奇怪，在以后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被提到；一般情况下，它被与对1944年7月20日密谋者的迫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与后者没有关系。它是希特勒要预防任何可能再次发生1918年那样的在他们看来过早中断战争的第一个征兆：他决意在没有可预见机会的前提下也要继续战斗到底，用他的话来说：“直到十二点零五分”，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干扰。

关于这一时刻的这一决定，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在所有历史上，在战败时有两个思维方向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务实的与英勇的。第一种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拯救老本；另一行为的目标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关于这两个目标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有个说法，对于第二种行为方式甚至还可以，未来从来不能完全预见到，似乎不可逆转的事情有时还可以得到逆转。在德国历史上有腓特烈大帝的著名例子，1760年他的处境，与1918年鲁登道夫以及1944年希特勒的处境一样，但是通过“勃兰登堡奇迹”（即出乎意料的俄国皇帝更迭与同盟的改变）得救了。如果他放弃的话，那个挽救他的偶然机会就来得太晚了。但是，奇迹在历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有谁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之上，那就等于在玩中奖率极低的彩票。

腓特烈大帝的先例，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德国宣传中被大肆渲染，但这是否在希特勒的动机中真的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值得怀疑。一场现代的民族战争，在根本上与18世纪的内阁战争有所不同。把希特勒动机中决定性的角色归根于1918年的反面例子，则更为确切。我们还记得，1918年是希特勒的觉醒经历，对于（那场在他看来过早结束的）战争失败的激愤，是他不可遗忘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而他的决心——决不允许一个“1918年11月（革命）”再次发生——是他决定当政治家的主要动机。而现在这一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希特勒可以说已经到达目标了：一个类似1918年11月的局势又在眼前，希特勒这一次能够阻止它，就此他下定了决心。

不可以被完全忽视的是，他在1918年强烈的，而此时又复活的对德国“十一月罪犯”及其同胞的仇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以十分赞赏的语气引用了据说是位英国记者1918年以后所说的话：“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叛徒。”现在，如果有位德国人说出那个可想到的与正确的想法，即认为战争失败了，而且透露出他想活下来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德国人绞死或斩首。希特勒从来就是一个大仇恨者，对于杀人，他内心充满乐趣。希特勒的仇恨力，他那多年来发泄在犹太人、波兰人与苏联人身上的屠杀欲，现在公开转向了德国人。

不管怎样，希特勒在1944年夏末秋初，又焕发出一种让人回忆起他最佳时期的精力与能力。在8月末，在西线几乎没有一道防线，在东线也没有，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与其说是一条防线不如说是一个破洞”。10月底，两条防线被再次建立，同盟国的进攻被顶住了，在后方希特勒发动了“人民风暴”，所有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被动员参加人民战争。希特勒通过竭力传播关于一种他后备的神奇武器的谣言来维持斗志。实际上，当时不是德国而是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这一1945年的神奇武器。想起来很使人感到诧异，如果那场希特勒所希望的、惨重与血腥的、为此在1944年再次把德国振奋起来的防卫战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第一枚原子弹将会落在德国，而不是在日本。

但是，希特勒本人使得局势未能发展到那一步，他把为这场防卫战所积蓄的、刚刚集聚起来的力量很快就浪费了。在1944年11月，他决定再一次进入攻势，而且是在西线。1944年12月16日，德国人在阿登最后一次发动进攻。

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所有军事细节不同，我们现在必须较为仔细地叙述阿登攻势。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插曲，他决定了战后德国的占领区且最后成为分裂的界线；而希特勒随之开始将其矛头转向自己的国家。

阿登进攻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行动相比，是希特勒最个人化的行动。从军事上看，它是一个疯狂的行动。要想获得成功，一场进攻战，在当时的技术作战条件下，进攻一方至少需要具有三比一的优势。而 1944 年 12 月在西线，德国陆军与同盟国陆军的对比还不到一比一，更不用说同盟国还有空中的压倒性优势。为了在具体的进攻前线建立微弱的暂时优势，希特勒还把东方的防线抽调一空，尽管他当时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绝望地警告他，苏军正在组织一场巨大的进攻。这就是说，希特勒在玩双重的孤注一掷：如果在西线的进攻失败（这就力量对比而言可以预见到），它消耗了为后来保卫德国西部所需要的力量；同时这一进攻使得（如果苏联人进攻，而这也可能预见）东方的防卫毫无希望。

两种情况也都出现了。阿登进攻失败了，而苏联人发动了进攻。尽管起初得到了雾天的帮助，它使得同盟国的空军不能起飞，圣诞节前几天的进攻只取得了不很理想的战果。然后，天空就晴朗了，在圣诞节的几天里，充当进攻主力的两路德国坦克军团被同盟国空军摧毁，1 月的第一周内，他们的残余被推回到出发地点：1 月 12 日，俄国人冲破了德国东线所剩余下来的单薄防线，一鼓作气地从维克萨河一直冲到奥德河边。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古德里安一而再、再而三地绝望而急迫地给希特勒推算过，但是希特勒什么也不想听。阿登进攻是他最个人化的主意，是他的最后第二个主意（最后一个我们还将认识）；他顽固地将其付诸实施。

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都在猜测。军事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希特勒不像今天常被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军事上的绝对外行。就他的军事知识水准，他不能就其行动的成功希望抱有幻想。他向参战的军官们吹嘘这些幻想，这不能证明他自己也相信这些幻想。相反，我们有理由猜测他有外交方面的动机。在西线的进攻，哪怕是失败的，尽管（恰恰因为这一点）希特勒为此削弱了他的东线，把德国的东部向苏联的进攻开放，可以作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个信号，希特勒现在已经把它们而不是把苏联看成主要敌人；他愿意将他的全部剩余力量投向西线，哪怕整个德国因此成为苏联占领区。或许可以说，希特勒要西方国家在一个纳粹主义的德国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之间选择，向他们提问：“你们愿意谁站在莱茵河边——斯大林还是我？”他可能还在相信，他们宁愿选择他。如果他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当然错了。罗斯福在 1945 年深信可以与斯大林顺利合作。丘吉尔不这么看；但是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也一定会选择斯大林，不会选择希特勒。希特勒因他的大屠杀在西方成了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人物，但可以设想的是，他自己不这样看，就像希姆莱不这样想一样，后者在 4 月份还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单纯的建议：德国在西线投降，在东线与西方国家一起（向苏联）继续战争，即便他这样看，有证据证明，如果他必须选择的话，他宁愿在东线而不是在西线战败。这与他的德国人相反，他们十分恐惧俄国人的进攻，许多人已经开始像盼望解脱那样盼望着美军与英军的占领。在战争中，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尊重增长了，而他对罗斯福与丘吉尔则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可以设想希特勒有着以下的双重思路：或许在西线出乎意料的极高昂斗志的表现，同时坐视东线的失败会震惊西方国家，使它们愿意作出妥协；如果不能，那也很好，就在东线真正失败，西方国家自己看会有什么好结果。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路。

如果我们认为，希特勒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是外交方面而是内政方面的，他实际上是在针对着自己的民族，那么希特勒的想法就不那么复杂了。因为在 1944 年秋季，德国民众与希特勒之间已经发生了分裂。德国民众不愿意进行希特勒所要的绝望的最后战斗，他们希望有一个结局，而且是一个损失尽量小的结局，也就是在西线结束战争。把俄国人挡在国门之外，而把西方国家放进来：这已经成为 1944 年底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的战争目标。而对于这个目标，希特勒用他的阿登进攻摧毁了。他不能把所有持这种想法的人砍死，因为人太多了，绝大多数人三缄其口，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以做到，他们如果不愿意与他一起赴汤蹈火，那么就把他们交给复仇心切的苏联人。他还可以消灭他们希望得到解脱般的美国人与英国人占领的愿望，他就此下定了决心。如此看来，阿登进攻战——在军事上是纯粹的疯狂，外交上最多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空想——突然获得了一个明确的意义；因此这样看应该是正确的。但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开始对德国与德国人动手了。

希特勒的阿登进攻战明显偏离了他 1944 年 8 月的防卫方案，这也说明了上述观点。原有防卫方案的目标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在所有战线上僵硬地、招架性地抵抗，而在军队必须后退的即将失去的地区，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而阿登进攻战的目标则是一个恐怖的结局，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战役中消耗最后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提问，为什么希特勒突然改变了主意，那么答案便会扑面而来：因为他看到，全面的人民战争没有可能了，德国民众不愿进行人民战争。他们不再像希特勒那样思想与感受。好吧，那么他们就应该因此受到惩罚，而且是判以死刑：这是希特勒的最后决策。

我们可以争论，这一决定是否在阿登进攻战中已经默默地表现出来了。在 1945 年 3 月 18 日与 19 日的元首命令中，它反正得到了明确而不可否定的形式，希特勒以此判处了德意志民族的死刑。

此时，苏联人站在奥德河的东岸，美国人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想要顶住已经不再可能，西方与东方同盟国在德国中部的会师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但是，民众在东线与西线的战斗与后退地区的行为却截然不同：在东线，他们大批逃逸，在西线他们却原地不动，把桌布与床单作为投降的标志挂在窗口，并且哀求德国军官不要再保卫他们的村庄或城市，以避免在最后一刻遭到毁灭。

对西线民众的这种行为希特勒在其第一个 3 月 18 日的元首命令中给予了答复。他命令，德国西部的被进犯区，“从主要战场后面开始，立刻撤出全部居民”。这一命令是在当天的局势会议作出的，有人反常态地提出异议。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以前的建筑师和当时的军火部长，今天是（1978 年）希特勒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此报道：

在场将领中的一位对希特勒说，无法实行几十万人的转移。已经没有火车可供使用，交通早已完全瘫痪了。希特勒无动于衷。他回答道：“那么他们就应该徒步行军！”这

也无法办到，那位将军插话道，为了行军必须有供养，人群必须经过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们也没有必要的鞋具。他未能说完。希特勒不为所动地转过身去。

如果说，那个让德国西部的全部居民在没有供养的前提下进行无目标的行军（我们只能称之为死亡行军），近乎于一个试图进行的针对德国人的大屠杀的话，那么第二个 3 月 19 日的元首命令，即所谓的“尼禄命令”，就完全暴露了要剥夺德国人的、而且现在是所有德国人的任何生存可能性。其关键的段落是：

所有帝国区域内的军事交通、通讯、工业与供给设施，以及敌人可以立刻或在可预见的时段内用来继续其战斗的物资，都必须被摧毁。

按施佩尔的证词，希特勒对提出抗议的施佩尔用“冷冰冰的语调”解释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我们会想起前面已经引用的，希特勒于 1941 年 11 月 27 日当失败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时所说的那句话，让我们再次回忆这句话。希特勒当时说：“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他将其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 1945 年 3 月 18 日与 19 日的两个命令没有被完全执行。否则，德国人就会像戈培尔两年前就犹太人所说的那样，确实不会遗留多少了。施佩尔尽其可能地阻碍了摧毁命令的执行。还有一些纳粹党干部，不敢作出最极端的事情：经常也有直接相关的人员（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目的），拒绝摧毁他们的生存基础；最后，同盟国快速的、很少被认真抵抗阻碍的进军，也使德国人免于落入希特勒为他们设计的悲惨命运。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希特勒的最后命令毫无影响。1945 年 3 月中旬，德国还有部分领土未被占领，在那里，元首命令仍是最高等法律，而在纳粹党与党卫队干部中仍有狂热分子，他们与其领袖一样思考与感受。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段内，他们与敌对的空军与炮兵在竞赛进行对德国的最终摧毁。许多报道表明，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德国绝大部分城市与乡村的民众陷入了敌我双方的炮火之中，他们更害怕自己的摧毁突击队与党卫军巡逻队。

他们执行的希特勒的计划，实际上比敌方的计划更为残酷。敌方军队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最原始生存的基础”，起码西方国家的军队不是这样。结果是，快速向前挺进的敌军的占领，至少在西部被当作一种解脱而受到欢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全是纳粹分子的民族，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失去幻想的、不愿与希特勒有什么关系的民族。他们当时常认为这是一种假装的屈从，但这只是极少数。人们真的感到被他们的元首出卖了，而且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其最后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自己以极端方式进行了同盟国打算进行的“再教育”。在这几周里，德国人的经历犹如一个女人，其情人突然变为其谋杀者，她不得不向她的邻居呼救，来对付那个与她交往的男人。

让我们彻底明确事实：希特勒 1945 年 3 月 18 日至 19 日的命令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像在 1944 年秋天，是为了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要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就不能让几十万德国人向内地进行死亡行军，而又在那里摧毁他们继续最基本生存所需的一切。相反，希特勒的这些最后的针对德国的大屠杀行为的目的，只可能是惩罚德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一场英勇的决战，也就是拒绝了希特勒为他们决定的角色。这在希特勒眼里是一个应该判以死刑的罪行（以前也一直是如此）。不愿意接受命令的角色，它的人民就必须死去：希特勒一直是这样想的，由此看来，希特勒在战争末期针对德国的屠杀行动，与其在战争初期针对波兰的屠杀行为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应。

希特勒本来并不打算像对犹太人与苏联人那样，对波兰人进行大屠杀。对他他们设想的角色与罗马尼亚相似，即在一场早已计划好的针对苏联的征服战争中充当一个服从的盟友与协助民族。他们对这一角色的拒绝，而不是但泽问题，才是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但泽已经在波兰的完全同意下，由一个纳粹市政府按照希特勒的愿望执政；但泽只是一个借口。耐人寻味的是，希特勒在取得侵波战争的军事胜利后，并没有用它来实现他原先的目的，即把被波兰人拒绝的盟友关系强加给他们。这样做在政治上符合逻辑，就当时的局面而言也不可能做到；相反，他现在把波兰人当作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愤怒的、长达五年的疯狂惩罚与报复行动的对象。在这场行动中，他的灭绝欲望第一次在放弃其政治理智的前提下得到了发泄。希特勒既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屠杀者。尽管他的屠杀欲望最初只是把犹太人与苏联人当作牺牲品，但当他的意志被拒绝的时候，他的屠杀欲望就占了政治谋略的上风。战争初期在波兰是这样，战争末期在德国也是这样。

不过，希特勒赋予德国人的角色，要比当年给波兰人的角色更为重要：先是一个征服世界的“主子民族”的角色；然后至少是一个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英雄民族的角色。但是，不管是出于软弱，还是出于（该受到惩罚的）抵抗，到最后德国人也不服从了。这样他们也得到希特勒的死亡判决：再引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应该“灭亡与被消灭”。

希特勒与德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些奇怪。在战争期间，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希特勒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必然产物：有一条从路德，经过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直通希特勒的线索。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不用说新教与普鲁士传统，后者是一种（包括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在内的）理智而无私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传统。理智而无私地为国家服务，这是最难以承认给希特勒（哪怕是战前那个硕果累累的希特勒）的品德。为了实现其对民族力量的全面动员——而且不该忘记的是他的不可置疑性与不可替代性，他一开始就牺牲了德意志国家，不仅是其法制国家的部分，而且是其秩序国家的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里早就讲到了。他有

计划地用大众疯狂取代了理智；可以说，他在六年里把自己当作一种毒品灌输给了德国人（但在战争期间突然又中断了灌输）。至于无私精神，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的极端例子，他把自己个人的使命意识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按照其个人生涯的标准来安排其政策；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重复。如果我们回忆起关于他的政治世界观的叙述，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完全不以国家的范畴，而是以民族与种族的范畴来思考，这附带解释了其政治行动的粗鲁性，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成就的原因：自民族大迁徙以来，欧洲的、当然也包括德国的政治文明的基础是，把战争与战争后果限制在国际制度之内，对民族与种族不加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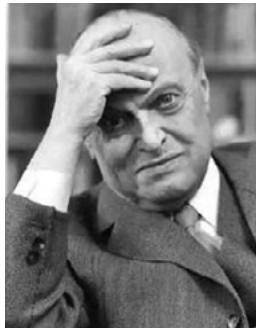
希特勒不是一个国家巨匠，仅此一点他就是德国历史的一个例外。我们实际上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类似于路德的人民领袖。他与路德只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空前绝后的，既没有先驱，也没有后继。但是，路德在其许多方面几乎是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化身，而希特勒的个性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关系，与他的纽伦堡党代会会场建筑与纽伦堡市容的关系一样，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即便在他们对领袖最崇拜的时候，德国人也就此保留了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崇拜中，总还有一点惊讶，惊讶于他们得到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意外的、另类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奇迹”，是“上帝的特使”，用富有诗意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他是一位外边漂来的不速之客。在这里，从外边来的不仅是指来自奥地利。对于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来自更远的地方：先是是从天上来，后来是——上帝保佑——来自地狱的最底处。

他爱德国人吗？在不了解德国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德国；实际上，他从没有认识德国。德国人是他所选择的民族，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本能就像一根磁针一样指向了他们，指向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权力潜能民族。他们只是作为权力工具使他真正感兴趣。他为德国抱有巨大的雄心，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代的德国人达成了一致：当时的德国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雄心勃勃但同时政治上无所适从；这两点给予了希特勒机会。但是，德国人的雄心与希特勒为德国抱有的雄心并不一致（哪个德国人想定居苏联？），希特勒缺乏辨别细微差别的听觉器官。总之，他一上台就不再听了。他为德国所抱的雄心，越来越像一个养马人与一个赛马场主对其马匹的雄心。最后，希特勒犹如一个恼羞成怒的、失望的赛马场主，他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马，因为它未能赢得比赛。

消灭德国，是希特勒的最后目标。与他的其他灭绝目标一样，他未能完全实现。他所达到的，只是德国最终向他告别了，这比他想象得更快，也更彻底。在拿破仑最后下台三十三年后的法国，又一位拿破仑被选为共和国的总统。在希特勒自杀三十三年后的德国，如果有人想以希特勒为先驱，继承希特勒的衣钵的话，那么他连哪怕是最大的边缘者机会都别想得到。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的是，对希特勒的记忆在年长的德国人那里被压抑，而绝大多数年轻的德国人则对希特勒一无所知。更不应该的是，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爱国者。因为，德国的历史没有随希特勒而终结。如果有谁相信相反的观点，而且或许因此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正好圆了希特勒的最后心愿。



本文摘自《解读希特勒》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景德祥 译
2016年1月
译林出版社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1938年移居英国担任记者。1954年返回德国后，曾先后为《世界报》及《明星周刊》撰稿，被公认为20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Mateus Campos Felipe](#) on Unsplash

非虚构

旧世界的解体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 发现经典

莫非他们果真同意那些东西?
那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到底该对他们抱持何种看法?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因人成事,显然不甚有趣且无足轻重的青年人,在1933年发生于德国的个人历史。但在继续讲下去以前,似乎有必要先和某些读者稍稍沟通一下意见。他们一定认为,我这个因人成事、的确微不足道的升斗小民,已经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这种意见或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可言。

是我搞错了吗?还是我真的已经在这里听见,某些好心好意陪伴我这么久的读者正逐渐失去耐心,已经开始随手翻阅本书了?

此种不耐烦的翻阅动作大致可用言语表达如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933年时的柏林,有个年轻人因为女朋友约会迟到而担忧其安危;他在“冲锋队员”面前表现得精神涣散;他游走在几个犹太家庭之间;他还不顾一切——这即将出现于后面几页——离开自己的同伴、抛弃自己的人生规划、告别自己保守而不成熟的观点。这一切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看来柏林在1933年确实上演了一些历史意义十足的事件。可是,假如我们真要探讨它们的话,想读到的至少也是希特勒与布隆贝格、施莱歇、罗姆等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暗盘交易?究竟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布劳恩为何亡命海外?奥伯弗伦何故自杀?我们可不想听一个不知名小伙子的个人遭遇,更何况,他未必就比我们更清楚那些重大事件。他虽然比较接近现场,却从未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所以甚至还称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目击者。”

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我必须鼓足余勇才有办法公开承认,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站得住脚,而且我并未以个人的故事来浪费那些高标准读者的时间。指责当中的正确之处则为:我没有深入探讨那些事件,我确实并非特别称职的目击者,而且没有人会比我更看轻自己的重要性。不过,我依然相信——请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自我标榜——我这个不足挂齿的小老百姓的琐碎的个人故事,正好道出了德国与欧洲历史上从未有人谈论过的大事。这对后世而言,会比我讲述到底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或希特勒和罗姆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要来得重要和有意义。

什么是历史?它发生的地点何在?

我们阅读各种正常历史撰述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它们只不过勾勒出事件的轮廓而非其本质。人们因而产生误解,以为历史仅仅上演于几十个“主导民族命运”的人物之间,而那些人作出的决定与行动,日后即被称作“历史”。于是,我们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之历史,被视为一场介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蒋介石、罗斯福、张伯伦、达拉第以及其他一二十人之间的棋局。他们的姓名几乎人人皆可朗朗上口。反过来说,我们这些不知名的其他人物,便显得顶多只是历史的对象或棋局中的卒子而已,可以任人摆布、放着不管,或被牺牲宰杀。我们的生命——假如我们果真有生命的话——似乎存

在于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所置身的棋盘完全无关,仿佛我们不晓得棋盘上的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若从上述角度观之,以下说法未免显得荒诞无稽,不过那却是最简单的事实:真正称得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决定,便发生在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之间,来自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的内心。

这种由群众同时作出的决定,往往连当事人自己都对之浑然不觉,可是它们足以让最强势的独裁者、部长和将领完全不知所措。这些决定性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从不以群众集会或大规模示威游行的面貌出现,尤其当群众纠集一处时,反而无助其发挥威力。它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永远只是千百万单独个体的私人经历。

我在此所说的并非某种笼罩于一团迷雾之中的历史现象,而是无人可否认的再真实不过的事物。比方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在1918年战败,让联军打赢了世界大战?是福煦与海格统率大军的艺术有所精进,而鲁登道夫则退步了吗?实情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德国兵——也就是1000万个知名人物当中的绝大多数——突然变得与以往不同,不再愿意于攻击时投入自己的生命,或战至最后一人来固守阵地。

这个决定性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德国兵并没有私下集会密谋叛变,一切都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出现于其胸中。他们大多并不晓得该如何表达这种非常复杂、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心理演变过程,顶多也只能借助大声喊出“三字经”来加以概括。如果有人对他们当中长于言词者进行研究,只会发现一连串最偶然、最个人化(同时一定也较不有趣、较不重要)的想法、感觉及经历。这通过与家中的书信往来、他们和班长之间的个人关系、对伙食的意见等形式表达了出来。与这些表达方式有着密切关系的,就是他们对战争前景和战争意义的观感,以及(因为几乎每个德国人多少都具有哲学家气质)他们对生命的意义及价值之看法。这个决定世界大战结果的心理演变过程,并非本人拟在此分析的对象。不过,对那些准备复制相同状况的人而言,这个演变过程应该会让它们兴致盎然。

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有趣、更重要且更加复杂的相似演变过程:群众如何同时大规模出现相同的心灵活动、反应及变化,因而使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成为可能,并在今天构成其无形的背景。

在“第三帝国”肇始之初存在着一个难解的谜团,而且在我看来,它比“到底是谁在国会大厦放火”这个问题还要来得有趣。那个谜团就是:德国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在1933年3月5日那天,大多数德国人仍投票反对希特勒。可是这大多数人而今安在?难道他们死光了吗?从地球上消失了吗?还是要等到这么晚才变成了纳粹?否则为何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值得称道的反应?

几乎我的每一位读者,从前都应该认识过几个德国人。我相信他们大多认为,自己的德国友人相当正常、友善和文明,与别国人士并无不同之处。他们固然难免拥有若干自己的民族特质,但这也是其他民族共通的现象。可是,当人们听见今天从德国发出来的言论(并察觉到德国正准备采取的行动),禁不住都会想起在德国的熟人,并且目瞪口呆地问道:他们到底怎么了?他们果真是那个疯人院的一分子吗?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用他们的名义做出了什么事情?莫非他们果真同意那些东西?那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到底该对他们抱持何种看法?

这些难以解释事项的背后,的确存在着奇特的心路历程和个人经验。它们来得十分波谲云诡,可以揭露许多事实,但其对历史发展所将产生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那些心路历程及个人经验就是本人在此的课题。但若不追根究底来到它们发生的地方(即单独德国人的私人生活、感觉及想法),便无法掌握其原委。尤其自从政治领域被纳粹肃清以后,这些地方便愈发成为角力的场所。而且那个四下征伐、贪得无厌的政权,更早已开始向昔日的私人领域进击,打算在那边也把自己的对手——也就是不愿顺从的人——驱赶出来并加以征服。

今天就是使用放大镜把政治角力场彻底搜寻一遍,也看不见任何风吹草动。德国内部所进行的战斗,就发生在最私人化的领域之内。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便可以观察出这种政治斗争的迹象,例如: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爱的是什么样的人,他闲暇时从事何种活动,他跟什么人交谈,他看起来笑容可掬还是愁容满面,他阅读什么,他的墙上挂着什么样的图画……世界大战未来各次战役的胜负,即事先决定于这个角力场上。这种说法听起来固然光怪陆离,实情却正是如此。

本人因此相信,通过那些看似个人色彩十足、缺乏重要性可言的故事,我不但道出了真正的历史,或许更进而点出未来的历史。基于这个原因,我庆幸所描述的对象就是我这个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人物:倘若我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反而会因此失去代表性。职是之故,我盼望那些惜时如金、不读闲书的高要求读者,能够把这本记叙个人事略的拙作,视为能够提供真正有用信息的书籍之一。

至于那些比较不挑剔、强调开卷有益的读者,他们已经无条件给了我那么多的时间,来阅读这段怪异人生在怪异环境之下演出的故事。我想在此为上面偏离主题的表现向他们表示歉意。同时也让我感觉不好意思的,就是我情不自禁思绪大发又牵扯出许多题外话。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新出现的想法似乎正可用来进一步阐述我的故事。说来说去,最好的道歉方法莫过于赶快继续讲下去!

与狼共舞 (1933年4月)

纳粹革命暂时在4月1日达到了最高潮。随后几个星期之内的趋势,就是各种事件再度纯为报纸上面的新闻而已。恐怖固然继续肆虐、各式集会游行也层出不穷,但其节奏已不若3月间那般强烈。现在集中营已成法定机构,人们经过诱导以后对之习以为常,并且晓得该看紧自己的舌头。

“同步化”的工作——此即在一切官方单位、地方行政机关、大型商店、各种协会及联盟的高层安插纳粹党员——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只不过现在变得条理分明,几乎采用了一种正经八百的方式。其所遵循的是法律条文和行政命令,已不再是狂野而令人捉摸不定的“个人单独行动”。革命从此官样十足,建立于“既成事实”之上。如此一来,德国人唯一还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来迁就现状。

现在又可以上犹太商店购物了。虽然大家继续受到劝阻,而且不断有海报把不听话的

家伙斥为“民族叛徒”，可是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去犹太人那边买东西。商店门口已不再有“冲锋队员”把关。犹太裔的官员、医生、律师和记者虽然已遭免职，但现在是依法行事，所援引的是某某法条。更何况，曾在前线作战，或在帝国时代即已出任公职的较年长犹太人获享例外待遇。大家还能够提出更多的要求吗？

各级法院被冻结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终于获准继续开庭宣判。纵使法官已经不再是终身职，但这个新措施也规定得有模有样，同样完全照章行事。法官一方面固然随时可能流落街头，其职权却也被无限扩充：他们现在变成了“人民法官”，那也就是“法官陛下”的意思。他们无须再兢兢业业拘泥于法律条文，甚至根本就不必这么做。明白了吗？

重返高等法院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如今我待在同一个大厅、坐在同一张凳子上，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门口重新站着相同的法警，和往常一样维护公堂的尊严与秩序。甚至连法官大多都还是原班人马。我们判决委员会的那位犹太法官则已不见踪影，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不过，那位老先生早在帝国时代即已出庭宣判，所以并未遭到免职。他被下放到某个地方法院，调入主管地名登录或簿记的部门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年轻地方法院法官。他脸色红润、体型高大，很不搭调地坐在白发苍苍的高等法院法官中间。高院法官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将军，而地院法官则只相当于尉官而已。因此大家交头接耳说道，那位年轻法官私底下是“黑衫队”高干。他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总是伸出手呼“希特勒万岁”。庭长和其他老先生回礼时，则犹豫不决地挥动手臂，说出含糊不清的字眼。从前这些温文儒雅的老绅士习惯在早餐休息时间，安安稳稳地坐在议事厅，轻声议论日常事务或司法界的人事变动。现在这已成为过去。他们在开庭前后只是默默不语，很尴尬地啃着自己的面包。

审判程序往往也进行得十分诡异。判决委员会那位神采飞扬的新成员，以充满自信的口气，卖弄着令人摸不着头绪的法学知识。当他在庭上发言的时候，我们这些正在准备国家文官考试、对教科书内容记得一清二楚的见习生，一个个都听得面面相觑。最后庭长终于忍不住以礼貌性的口吻问道：“同事先生，您或许没有把《民法典》第 816 条也列入考虑吧？”那位法官大人听了以后，表现得就像是刚被考倒的学生一样，连忙把手边的《民法典》拿来翻阅。接着他略露窘态，但依然趾高气扬，完全不当一回事地承认“哦，原来如此。那么事情刚好颠倒了过来。”旧司法体系就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短暂的胜利。可是某些时候，那位新手不但死不认错，反而还放大音量、滔滔不绝表示旧法理应该退居二线。他甚至开导那些年迈的法官同僚：大家应当读出字里行间的真正含义，而非仅是拘泥于表面上的意思。他随即引述希特勒的言论，更摆出舞台上的少年英雄风采，坚持必须按照其站不住脚的论点来作出判决。此时，那些年迈的高院法官的脸上露出的表情，让人看得心酸不已。他们只是以一种说不出来的忧伤眼神低头望着卷宗，同时不知所措地用手指拨弄回形针或吸墨纸。

若是从前的话，出言如此狂妄的候补文官绝对通不过他们的考试。如今呓语和谬论变成了至理名言，背后更有国家机器为之撑腰。他们只得乖乖顺从，否则若被打成政治立场不可靠，免不了会遭到撤职。这将意味着面包不保、集中营……于是，他们只得唯唯诺诺地表示：“同事先生，我们的意见当然与您完全一致。正如您所晓得的……”然后，他们只能设法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恳求对方多少还是要把《民法典》列入考虑。

那就是 1933 年 4 月时的柏林高等法院。一百五十年前，同一座法院的法官宁可被腓特烈大帝下狱，也不愿屈从君主的敕命，来更改自己认为正确的判决。直到今天，每个普鲁士学童都还晓得来自那个时代的一则逸事。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但它至少标志出这座法院的令誉：依据传说，腓特烈大帝兴建“无忧宫”的时候，打算拆除附近的一座磨坊风车，于是向磨坊主人开价购买。但磨坊主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风车，于是一口加以回绝。国王乃作出威胁，表示不惜强制征收。磨坊主人回答道：“陛下，您当然可以这么做——假如‘柏林王室最高法院’不存在的话！”那座磨坊风车今天依然矗立于“无忧宫”的旁边。

到了 1933 年，别说是腓特烈大帝了，甚至连希特勒都不必亲自施压，即足以让柏林高等法院的审理工作被“同步化”。这时只需要由几个少不更事的地院法官来出面；他们只需要精力充沛就好，再加上一些半吊子的法学知识即已绰绰有余。

我不必再浪费太多时间，见证这个具有悠久光辉传统的伟大机构如何走向末路。我的见习期已接近尾声。我待在“第三帝国”柏林高等法院的时间，只剩下了短短几个月。那是告别之前令人感伤的几个月，而此处的“告别”具有多重的含义：我感觉自己仿佛待在一个临终者的床边。这栋大楼里面早就不再有值得我追寻的东西，而且曾经主宰此处的伟大精神，早就日复一日消逝得无影无踪。现在我只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而且我一思及此就会不寒而栗。我向来对法学没有太大的兴趣，并不热衷于法律界的公职——虽然那是家父为我订出的生涯规划。尽管如此，这个地方依然是我所认同的对象。现在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整个司法界在耻辱之中堕落沉沦下去。我对它不能说完全没有归属感，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积极参与，甚至我或多或少曾以身为其中的一员为荣。如今它已在我的眼前灰飞烟灭、腐烂发臭。我却无力振衰起敝，只能耸耸肩膀很沮丧地确定：此地绝非我可以大展宏图之处。

不过从表面上看，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些候补文官的地位，很明显每天都在不断上升之中。“国家社会主义法学家联合会”写信给我们（也写给我本人），用谄媚示好的言词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正肩负着建立德国新法律的重责大任。他们还写道：“请加入我们的行列，让我们拳拳服膺元首的意旨，齐心协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马上把那封信函丢入字纸篓，只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了。

从法院见习生那边可以感觉出来，他们的自我意识正日益高涨。现在是他们而非那些高院法官，在开庭后的休息时间高谈阔论司法界的高层人事变动。人们仿佛听见一根又一根无形的元帅令牌，正在看不见的行囊之中沙沙作响。即使那些原本不赞同纳粹的人，也发现自己的机会已经来临。

“同事先生，现在的局面有如秋风扫落叶。”他们如此说道，并隐约带着胜利的快感，述说某人才刚刚通过国家文官考试，就已经在法务部获得任命。反之，某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庭长，已经二话不说被撤职查办——“你晓得吗？他从前跟‘国旗同盟’过从甚密。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要不然他们就表示，某某庭长已经被降调到偏远地区的地方法院去了。

这又让人闻到 1923 年时的“辉煌气息”：年轻小伙子骤然大权在握，于一夜之间变成了银行总经理及轿车的拥有者。年长者和那些冥顽不灵、一味信赖人生经验的人，最后只能在停尸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话要说回来，现在和 1923 年时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的“入场费”稍微高了一点。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必须多加留意，免得一不小心非但法务部去不成，反而被送进了集中营。大家站在高等法院的走道交谈，于意气风发和稳操胜算之余，却又流露出惊惶和不信任的语气。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听起来反倒像是背得滚瓜烂熟的标准答案。不时有人话才说了一半就突然住住，四下张望是否有人把他话中的意思听错了。

这时的年轻人变得野心勃勃，可是每个人又都好像有一团东西卡在喉咙。有一天，我不晓得讲出了什么异端邪说，马上就有一位见习生把我从人群中拉开，以诚挚的目光私下向我表示：“同事先生，我想对您提出警告！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您好。”

接着，他打量我的眼睛继续问道：“您是共和派，对不对？”这时他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心平气和地安慰我：“别害怕，我在心里也是共和主义者。我很高兴您的立场与我相同。可您还是小心为妙，千万别轻忽那些法西斯主义者！”（他竟然只称之为“法西斯主义者”）“在今天的情况下，发表怀疑论点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您这么做只不过是自掘坟墓而已。可不要以为，现在还有办法采取任何抵制法西斯的行动，更别说是公开展现反抗态度了！请相信我的讲法！我很可能比您更了解法西斯党人。我们这些共和派现在只能与狼共嗥。”

这就是共和派的安身立命之道。

旧世界的解体

那时我必须告别的对象，并非只局限于柏林高等法院而已。“告别”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字眼，它来得非常彻底、激进，并且毫无例外。我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已经解体，仿佛理所当然似的，一天又一天消逝得不知去向。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确定，那个世界又多消失了一块、又向下沉沦了一些。大家四下寻觅复寻觅，最后却只能确定那个世界已经踪迹全无。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奇特的演变过程。那就好像一个人踩在脚底下的土壤，正不断被冲刷流失。但更佳的比喻或许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正很有规律地不断被抽走。公共领域内堂而皇之发生于众人眼前的事件，看起来反倒伤害较小：各政党已经自行解散，要不然就遭到查禁。起先是左派，接着又轮到右派——幸好我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以往声名大噪、著作流传甚广、言词被拿来讨论的人物，现在也都不见了。他们或已流亡海外，或已被送入集中营管束。大家不时听说，某某名流“于面临逮捕之际自裁”，要不然就是“于逃逸时遭到击毙”。到了夏天，各家报纸列出了三四十位著名科学家或文艺界人士；他们被斥为“民族叛徒”，被注销国籍，并遭到鄙夷。

更加让人感觉不安的，却是一些无伤大雅人物的销声匿迹。那些人本来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某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大家每天都听见他的声音，早就把他当成老朋友看待，可是现在他已经消失于集中营内。如果有谁还敢再提起他的名字，那就是自找苦头。一些长年陪伴大家的电影明星和舞台剧演员，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像妩媚可爱的卡罗拉·内尔便突然被注销国籍，变成了“民族败类”。再以汉斯·奥托那位容光焕发的年轻演员为例，其事业自上一年的冬天开始如日中天，成为每个社交晚会谈论的对象。大家都期待他成为德国引领企盼已久的舞台剧超级巨星。有一天，他却横尸在一座“黑衫队”营房的操场上，依据官方的说法，他被逮捕以后，“趁人不备之际”从四楼窗口跳了下去。一位最知名的专栏漫画家，曾以戏而不谑的幽默，每周为整个柏林市带来欢乐，现在他也自杀了。闻名遐迩的“卡巴莱”演员，亦相继步其后尘。还有更多人不知去向。没有人晓得他们究竟是死了、被拘禁了，还是早已亡命海外。反正他们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发生于 5 月的象征性焚烧禁书行动，那只不过是报纸上面出现的新闻而已。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却是书店和图书馆内的许多书籍也失去了踪影。当代的德国文学撰著，姑且不论其好坏如何，已经全部下架。去年冬天新出版的作品，如果在 4 月以前还没有弄到的话，现在就再也读不着了。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还有少数几位作家受到容忍，他们的书籍就像尚未被击倒的保龄球瓶，兀立于空荡荡的书架上。除此之外只剩下古典文学名著，以及有如雨后春笋一般，突然大量冒出来的“种族文学”和“本土文学”作品。后二者的水平极其羸弱，读了只会让人引以为羞。

真正的爱书人在德国本来已属少数，现在他们的处境更加堪怜，只能眼睁睁望着自己的世界在一夕之间遭到剥夺。尤其人们很快就体会到，每一本被迫下架的书籍都可能给持有者带来麻烦。于是，他们除了沮丧之外，现在又心生畏惧，连忙把海因里希·曼和福伊希特万格等人的作品塞进书柜第二排。如果有谁还敢讨论约瑟夫·罗特或瓦塞尔曼等人的新近的作品，也只能交头接耳悄悄讲话，仿佛正在图谋不轨。

许多报纸和杂志也从书报摊消失了，可是剩余的报刊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却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它们原有的风格已经难以辨认。阅读报刊就像是跟熟人打交道，大家早已习惯于它们针对特定状况所作的反应，也晓得它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现在它们写出来的东西，却跟以往的意见格格不入，不但完全否定自己，而且早已面目全非。这让读者只能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疯人院。诸如《柏林日报》或《福斯日报》之类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立论公允的报纸，已于一瞬间变成了纳粹宣传喉舌。其一贯以深思熟虑、博学多闻的笔调表达出来的内容，现在与《攻击报》或《人民观察家报》咆哮谩骂出来的东西没有两样。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有办法从两报的文艺版读出弦外之音。当我们正为此而窃喜的时候，报纸的正刊却不断以严正口吻出面灭火消音。

固然许多编辑小组已遭撤换，可是这往往并非真正的理由。比方说，有一本名叫《真相》的杂志，立论向来与其标题同样严谨。1933 年之前的几个年头，它几乎是人手一本的刊物。有一群才智过人的激进青年为该杂志撰稿。他们于世界末日和千禧年观点的氛围下，仍保有某种优雅的气质。那些人自视甚高，具有丰富的学养和内涵，自然不会是任何政党的党员，更不可能成为纳粹。他们的编辑群甚至在 2 月还公开宣称，纳粹运动将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而已。他们的总编辑因为做得太过火，已经被炒了鱿鱼，几乎连性命都难保（不过现在他终于获准写言情小说）。其他的编辑人员继续留了下来，而且仿佛理所当然似的，在倏忽之间都变成了纳粹。他们维持原有的优雅文体和千禧年观点，

却表现得好像自己始终就是纳粹一般，而且党性比纳粹本身还要来得坚强。这份杂志现在让人读得目瞪口呆：同样的版面编排方式，同样言之凿凿的伟大论调，同样的作者；可是他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它变成了一份既老到又血统纯正的纳粹刊物。这是信念上的转变？是玩世不恭？还是说那些名叫弗里德、埃施曼、维尔辛等的先生们，在内心深处本来就是很好的纳粹党员？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未必对此完全清楚。反正我们很快就停止了猜测，而在倒尽胃口之后，又多出一份可以挥手告别的刊物。话要说回来，诸如此类的告别还算不上是最令人伤感的事情，因为那只是跟一些难以描述、不完全与私人有关的现象和事物说再见。尽管如此，它们曾经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氛围，而且我们绝不可看轻与之告别所造成的影响：这足以使生命之中弥漫着一片灰暗。现在笼罩着整个国家的空气——也就是充斥于公共领域内的气氛——已经失去了芬芳及生趣，变得乌烟瘴气和毒性十足，让人浑身上下都很不自在。不过在某种程度内，我们还可以设法把来自公共领域的空气阻隔在外。我们可以把窗户关紧，躲在自家的四壁之间过着“私底下”的生活。我们可以想办法不去过问世事，还在屋内摆出鲜花，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把耳朵和鼻子都堵起来。这种做法颇具诱惑力，所以许多人都试着这么做，我也不例外。可是，我所作的尝试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窗户已经再也无法关上，而且即使在最“私底下”的生活之中，也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告别。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无论如何，“置身事外”的做法，就是当时在诱惑之下所形成的普遍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自从 1933 年以来，德国已经重复出现了千百万个精神病理学案例，而“置身事外”的现象即为此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就正常人的眼光观之，大多数德国人今天若非罹患了精神疾病，至少也处于严重的歇斯底里状态。如果人们想了解为何会演变成这种局面，就必须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不赞同纳粹的人——也就是居于多数的德国人——于 1933 年夏天所面临的奇特状况，以及其令人诧异的反常矛盾心理。

不赞同纳粹的德国人在 1933 年所处的境地，可说是任何人所能够碰上的最艰难遭遇。人们已经找不到出路，受到完全的钳制，各种出人意料的冲击，更带来了极度的震撼。纳粹已将吾人紧紧抓在手中，可以恣意妄为。所有的阵地均告陷落，任何集体抗拒行动都变得毫无可能。个人的抵抗更只不过形同自杀而已。即使在私人生活中的避难所，我们也不断受到穷追猛打。各个生活领域均已崩解，出现了漫无止境的溃散逃窜。同时，每天都有人向我们提出要求：并非劝我们投降，而是要我们变节。只要与魔鬼缔结一个小小的盟约，我们就不再是囚徒及被追赶的对象，反而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胜利者与加害者。

这是最简单粗浅的诱惑，许多人就此陷入其壳中。随后的发展却往往显现出来，他们未免过于低估了自己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且根本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纳粹。这成千上万的人今天就在德国来回奔波，成为良心不安的纳粹。他们佩戴着党徽，正如同当初身披君王紫袍的麦克白，陷入两难而无法自拔，必须一再接受良心的谴责。他们四下张望，寻觅脱身的机会而不可得，结果只能喝闷酒、服用安眠药，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他们已经不再清楚，究竟应该盼望纳粹时代——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时代！——赶快结束，还是担心那个时代终将成为过去。不管怎么样，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悔不当初。可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些人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梦魇，再加上其道德观点及精神状态均已错乱，没有人晓得他们在倒下去以前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没有真正被写出来。

除了这个最粗浅的诱惑之外，1933 年还出现了许多种其他的诱惑形式。其中的任何一种皆足以使身陷其中的人变得疯狂，或者罹患精神疾病。这是因为魔鬼拥有许多不同的网：网格粗的拿来捕捞大而化之者，网格小的则用来对付心思细密的人。

谁要是拒绝当纳粹，就必须准备面对凄苦的前景：他将山穷水尽，只能坐以待毙；他必须每天忍气吞声，承受各式各样的奇耻大辱；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令人发指的事物不断上演；他将流离失所，受尽漫无边际的折磨。可是，这种恐怖的状况居然也能够产生诱惑力——在自我安慰与自我麻醉的外衣之下，已经暗藏了魔鬼的各式圈套。

较年长的人比较容易落入第一种圈套，那就是逃避到幻想世界。他们喜欢自命不凡，把自己幻想成高人一等。凡是落入这个圈套的人，眼中只见纳粹于掌权之初所呈现的半吊子和不专业作风。他们每天借此向自己和别人提出证明，表示一切都不可能照着这个样子长久进行下去。他们摆出一副比别人更有概念、等着看好戏的姿态。他们对纳粹妖魔般的行为视而不见，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儿戏和瞎胡闹的部分。他们自我欺骗，刻意表现得趾高气扬、袖手旁观，借此来掩饰自己的全然束手无策。每当他们有新的闹剧或《泰晤士报》上面的报道可供引述时，便觉得信心十足，更加沾沾自喜。

这一种人起初心平气和、志得意满，接着就极力自我陶醉，月复一月地预言纳粹政权不可避免的覆亡。可是，等到那个政府显然已经站稳脚跟，而且开始获得成功以后，这才发现情况的确不妙——他们可没有对此作好准备。这群人正是纳粹在随后几年内运用巧妙的心理策略，以各种自我吹嘘的统计数字来主攻猛打的对象。1935 年至 1938 年间许许多多的归顺者，主要也就来自他们那边。自从被视为不可能的成就一再出现以后，他们再也无法摆出洋洋得意的姿态，只得承认失败而集体投降。此后他们即力不从心，无法再认清纳粹的那些成就实为最恐怖之处。像我在 1938 年便听过如此的对话：“他就是有办法解决别人束手无策的问题。”“可是，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像你这种人反正只会吹毛求疵。”

其中某些人至今仍然高举战旗，并没有因为各种失败挫折而放弃希望，月复一月，或至少也是年复一年，预言该政权必将出现的崩溃。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表现出某种大义凛然的气概，可是这种态度也有一点稀奇古怪。最奇特的地方就是，有朝一日或许会证明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在此之前必须先经历不少令人沮丧的残酷现实。我可以想象出来，他们会在纳粹垮台以后到处告诉别人，自己打从一开始就不断预言此事。可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他们只会是一场悲剧里面的堂吉诃德角色。“理直气壮”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的一种相当不光彩，只会帮助敌人争取到得之有愧的荣耀。我们只

需要看看路易十八便不难明了此点。

第二个危险是变得愤世嫉俗，像受虐狂一般陷入了仇恨、忧伤和无止境的悲观主义。这几乎称得上是德国人失败以后的自然反应。而每个德国人处于逆境时——无论是在个人或国家的生活领域之内——都逃不出这个诱惑的折磨：完全放弃一切，以一种意气消沉的无所谓态度，把自己和世界拱手交给魔鬼。同时，他们更以执迷不悟的乖戾态度来进行道德上的自杀：

我开始对阳光感觉厌恶。

啊，寰宇即将全面崩塌！

这看起来颇具悲剧英雄色彩：他们拒绝一切的安慰，可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拒绝态度的本身却隐含着毒性最强、危险最深和最令人堕落的安慰剂。

人们于是对自暴自弃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快感，演变成瓦格纳式对死亡与毁灭的热爱。这正是那些缺乏勇气面对自己失败的人，广泛出现的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我安慰形式。我可以在此作一个大胆的预测：这也将是德国人在纳粹战败之后的基本态度，就像一个倔强的小孩在自己的洋娃娃被夺走之后，好像整个世界已经毁灭一样而号啕大哭（德国人在 1918 年以后的态度大致也就如此）。在 1933 年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德国人遭到击败，但他们心中的这种念头并未充分展现于所谓的“公众”态度。因为按照官方的讲法，并没有任何人被击败。表面上只有欢呼、兴盛、“解放”、“拯救”、万岁和令人痴狂的团结一致，以致苦难毫无置喙的余地。尽管如此，我在 1933 年以后已亲眼看见许多个案，可以充分展现出这种典型德国失败者的态度。我相信其总人数应高达数百万之多。

我们很难以概括的方式，说出这种潜藏于内心的态度，对外在的现实造成了何种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其结局就是自杀。不过，有更多人选择迁就现实来苟全性命，也就是说，他们扭曲了自己的脸孔。只可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正是今天在德国还看得见的“反对势力”之代表性人物。无怪乎这种“反对势力”从来就没有目标、方法与计划，自然不可能会有前途。这些“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言论”。每天出现的恐怖事件，逐渐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们沉迷于对各种恶形恶状的描绘，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让他们苦中作乐的方法。与他们交谈的时候，便很难不绕着这些话题打转。假如那些恐怖现象不复存在的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反而会怅然若失。对其中某些人来说，这种悲观下的绝望甚至可以让人乐此不疲。

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也意味着“过日子是很危险的事情”，会让人肝火上升，甚至会让人进了疗养院，到头来有些人就真的精神分裂。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一条小径，又殊途同归将人导入纳粹的怀抱：既然凡事都已经无关紧要、一切均已沦丧殆尽、万物皆已妖魔化，何不干脆奉行最可悲和最猖狂的犬儒主义，让自己与魔鬼同行？何不一面在心中自我解嘲，一面跟着干出同样的勾当？这也是不时可见的现象。

我也不能不谈第三种诱惑的形式。这就是我自己采取的方式，而且我同样并非唯一这么做的人。其出发点正来自对上一点的认知：绝不可让自己被仇恨与苦难所腐化，而且务必要保持品行端正、心平气和、和蔼可亲及“不拘形式”。可是，令人激愤与受折磨的事件日复一日迎面袭来，该怎么做才有办法避开仇恨与苦难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淡然置之、把目光移开、把耳朵捂住，并设法避世绝俗。但这只会使人柔弱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最后也产生一种类似精神疾病的症状：完全与现实脱节。

为了简单起见，就以我自己为例来作说明。但我们绝不可忘记，在我这个单一案例的后面必须加上六至七个零。

我不是容易记恨的人；而且我一向认为，如果过分涉入与不听规劝者的论战及争吵，只会造成对丑恶行为的仇恨，结果反而摧毁了自己心中难以重建的有价值事物。于是，我表示拒绝的姿态就是退避，而非攻击。

在我看来，当人们恨透了一个对手的时候，同时就很清楚地表达出某种敬意。可是，纳粹显然并不配得到这种敬意。我避免与纳粹分子密切往来，因为光是他们的样子即足以令人心生恨意。他们虽然一味纠缠，硬是要逼人跟他们狼狈为奸，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他们对我作出的最大侮辱。真正的奇耻大辱来自始料未及之处——他们每天借着让自己令人无法视而不见，强迫我对他们产生仇恨与厌恶，以致从我这边获得原本不配享有的待遇！

当人们立场够坚定的时候，是无法被强迫作出任何表现来的。仇恨心与厌恶感不也包括在内吗？纵使外在的生活已被研丧殆尽，甚至完全遭到破坏，本来不也可以安之若素，以视若无睹的方式来轻忽一切吗？

我刚好在那个时候，读到司汤达一个既危险诱人又具有双重意义的说法。他借此提纲挈领地表达出自己对时局的观感，认为 1814 年以后展开的复辟时代让“一头跌进污秽”（这正是我对 1933 年初以来各种发展趋势的观感）。司汤达写道：现在唯一值得努力一试的做法，就是要“让我自我维持神圣与纯净”。

神圣与纯净！这也就是说，除了不让自己成为共犯之外，也要避免痛苦所带来的伤害，以及仇恨所造成的性格扭曲。简而言之，必须躲开外来的影响，以免出现任何反应。纵使自己并不喜欢，也要规避一切的接触，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掉头就走，不惜退居弹丸之地。这么做的先决条件，是要让毒性十足的空气无法侵袭过来。而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一样东西，使之不受损害并维护其自古以来即神学意味十足的美名——不可磨灭的心灵。

我直到今天都还认为这个出发点有其正确之处，而且不会加以否认。但是，当初我自以为可行的做法——视而不见并躲入象牙塔——却完全行不通。我感谢上帝让这个尝试立刻彻底失败，因为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往往并没有马上受到挫折，以致误以为有时为了挽救心灵上的宁静，就必须牺牲这种宁静。最后，他们必须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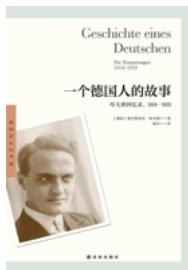
这种置身事外的方法与前两种不同，于随后几年内在德国公开表现了出来，其表达形式即为汗牛充栋的田园文艺作品。不过，就连文艺界人士也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个现象。德国在 1934 年至 1938 年间出版了大量儿时回忆、以家庭为背景的小说、风景图册、大自然抒情作品，以及许多柔情万种的小玩意儿。这是前所未见的现象。除了刻板的纳粹宣传文学之外，德国能够获准发行的书籍几乎完全来自那些范畴。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这个趋势就已经不断退潮。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不管再怎么挖空心思，也越来越无法营造出那种不痛不痒的氛围。不过，在此之前的状况只能令人摇

头叹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和雏菊花、稚子放长假时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情景、烤苹果和圣诞树。这种文学充满了赤子之心和缺乏时代背景的色彩，仿佛有约在先一般，在游行队伍、集中营、军火工厂和“冲锋队”募捐铁罐的环绕之下纷纷出炉。如果有谁曾经像本书作者一样，于偶然之下必须大量阅读此类书籍的话，便会逐渐发现，它们在乖巧、平静和温柔的叙述背后，正在字里行间不断发出呐喊：“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于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记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恳求！”

我认识那些作家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每一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已经令他们无法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方说，他们的亲朋好友已经有人被逮捕，要不然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童年时代的回忆已无法再提供保护伞。不少人因之而崩溃，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将来我会找时间叙述其中的一些故事。

以上就是德国人在 1933 年夏天所面对的矛盾。那看起来就仿佛是，必须从几种让心灵死亡的不同方式之中作出选择。我们可以说，于正常环境下过惯日子的人，在这里会感觉自己若非进了疯人院，就是待在一所精神病研究所里面。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无力回天。此外，那个时候还算是比较无害的阶段，接着还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本文摘自《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周全 译

2017 年 9 月

译林出版社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1938 年移居英国担任记者。1954 年返回德国后，曾先后为《世界报》及《明星周刊》撰稿，被公认为 20 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Jean Carlo Emer](#) on Unsplash

非虚构 魏玛与凡尔赛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 发现经典

他们不可能一直把德国压倒在地上。

1919年1月选出的国民议会在魏玛举行了会议，而非在动乱不安的柏林。他们之所以前往魏玛，是因为该地相当宁静，并且在军事上易于防守——或许有一部分也是由于这座小城在文化史上的声誉，而那是新德国有意链接的对象。但魏玛国民议会所面临最重要与最困难的课题，并不是如何来制定《魏玛宪法》。真正的难题在于，应该决定同意或者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因为德国在1919年4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收到了现成的和约。

《凡尔赛和约》草案的内容在1919年5月被公开以后，德国人不啻狼狈挨了一棍，而且平民百姓的感受跟国民议会和政府完全一样：在东部、西部与北部割让的领土多得骇人听闻；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武装，必须支付巨额赔款，不再拥有殖民地。而且，整份和约处理德国的态度，不像是对待一个虽然打了败仗但仍旧属于国际共同体的战争对手，反倒像是处置一名收到了刑事判决书的被告。平民百姓、国民议会与政府当局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签字。

假如不签字的话，事态又将如何发展下去呢？就此而言，不但是在当时，即便今日回顾起来也毫无疑问的是：西方盟国必将恢复敌对行动，挥军入侵德境，并且在不遭遇抵抗——最起码不遭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按照盟军那时的计划占领威悉河以西的德国。结果德国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历经可怕的内斗与一次政府改组之后，在和约上面签了字。

德国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多数成员都忧心忡忡，害怕国家将随着联军的占领而陷入分裂。他们认为，若不签字的话，联军将会在西部与既有的南德邦国，以及与普鲁士北方境内新成立的国家级政权单独签订条约，导致德意志国裂解成两个部分：西边的部分将被西方列强占领，东边和东北边的部分则是旧普鲁士与萨克森。今天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摆在眼前之后，我们禁不住想问：上述情况难道果真有那么可怕吗？

假若当时就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将会形成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演变出来的局面：出现一个迟早必将依附于西方阵营的西德国，以及一个当时仍然完全保有普鲁士东部省份的东德国——但其命运难以预料。因为，无论在从前或现在都很难预测，万一盟军入侵到威悉河一线之后将造成何种情况。

谁又能够确定，南德各邦的政府以及德境西北部新成立的政权将会签署条约？届时柏林如果仍然有德意志国政府存在的话，联军是否也必须占领德国东边的部分？这种解决方式岂不比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情况要来得有利多了——一个没有俄国人的“1945年”、东部的省份不至于遭到肢解、德国全境完全由西方列强占领？由于协约国迟早必须想办法找来另外一个德国政府，因而就连这种被占领的状态也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以上都是完全没有答案的问题。反正纵使德国人在1919年不曾签署和约的话，照样有机会如同签订和约之后那般，继续保存德意志国。德国固然在《凡尔赛和约》上面签了字，可是从中期和长期的眼光来看，此事甚至为德国的强权政治带来了更佳机会，即便德国人当时对此还不明白。因为《凡尔赛和约》只是巴黎和会直接与德国有关的一部分

而已；如果心平气和观之，在巴黎建立的整个和平体系绝非不利于德国的强权地位。德国固然因为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被套上了两副沉重的枷锁，有朝一日必须设法挣脱。可是，在另一方面却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德意志国在西部、东部和北部的面积缩小，但其主体并未受损，该国在欧洲所处的地位非但不比1914年之前来得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势。

套用当时习惯的讲法，德意志国在1914年以前是被“团团包围起来”。它位于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四大强权之间。其中的三个强权——英国、法国和俄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盟对抗德国。

四大强权之一如今已完全解体：奥匈帝国早就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弱小的后继国家，它们光是因为自己的面积便永远无法成为强权，甚至迟早将沦为邻近大国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大国就是德国。

俄国现在变成了苏联，处于欧洲的体系之外，而且它和德国都遭到唾弃（此强硬用语并不算夸张）。这个俄国宁可与同样遭到唾弃的德国交好，也不打算跟西方列强结盟。

如果套用西洋棋术语的话，德意志国当下的“布局”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的周围已经出现了许多有利变化。德国这种强化后的布局早已随着战争的结果，但也随着和约的规范而定型下来，除非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否则就无法加以逆转。德国由于限制军备和战败赔款而受到的削弱，反而仅仅具有暂时的性质。等到战争结束了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将不会再有人企图借由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或者强迫德国继续赔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结果而获得强化，并未遭到削弱。

西方列强却自始就立场纷歧，他们大费周章以后才对和平条约的最后内容达成协议。其中最强大的一员随即退出：美国不曾签署《凡尔赛和约》，远离了欧洲的事务，并且拒绝继续为之前向法国作出的承诺提供担保。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仅仅受到两个强权支撑，即英国与法国。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可看出，那两国必须共同作出最大的努力才有办法与德国相抗衡，他们不可能一直把德国压倒在地上。

更何况他们彼此之间很快就产生利益冲突。英国在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后感觉心满意足。因为德国早已遵照停战协议所列出的条件，向英国交出了舰队；《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重新拥有大型舰队；德国的殖民地已遭到没收并接受英国管辖，有些甚至还直接拨交给英国。英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争目标。

可是，对法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它未能达成自己的作战目标。法国以该国当时的四千万人口，历经惨重的流血牺牲之后才刚刚撑过了战争，却赫然发现自己继续面对着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既没有被分割也没有被裂解的德国。从长远来看，一旦德国恢复了元气、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之后，将会重新享有优势。

法国因此和1919年后的德国一样，也主张修正主义。既然《凡尔赛和约》无法让法国感到满足，于是法国为了本身的生存利益必须让德国付出代价，并将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德国则打从一开始就像立下决心，务必要修改《凡尔赛和约》，尤其是要摆脱阻碍国家复兴的两大枷锁：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

德国国内对此产生的共识是：和约的内容无法被接受，必须加以修正。修改时的优先级却自始就莫衷一是——应该首先设法回避有关限制军备的规定，重新成为军事强权呢？还是应该首先尝试摆脱赔款来重建德国的经济，通过这种方式再度成为强国？前者是国防军的策略，并特别受到其当时的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支持，而且它首先获得采用。塞克特致力于秘密重整军备，而且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目标基本上只可能与俄国联手达成。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防军与红军之间就已经偷偷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苏联向国防军提供俄国的场地，让他们在那里演练操作遭到《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诸如坦克、飞机和化学战剂等等。国防军用于交换的做法，则是向仍处于草创阶段的苏联红军提供训练，并且传授德国参谋本部的作业方式。1935年时，德国派驻苏联的军事全权代表科斯特林将军，在苏联进行了一次被评定为特优的军事演习之后表示：“我们与有荣焉。那些指挥官和领导人员都是我们的学生。”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显然也很早就出现另外一个与苏俄合作的机会。波兰在1920年发动攻击以后，波兰与苏俄之间随即爆发战争。俄军起初占了上风，一路逼近华沙。塞克特当时已经开始考虑，如果俄方获胜的话，德方也应该进攻波兰，并以某种方式与俄国再度瓜分波兰——至少也要让德国完全收复1919年被《凡尔赛和约》割让给波兰的土地。

不过，这个想法还是落空了，因为“波苏战争”的最后结局对波兰有利。俄国人未能并吞波兰的疆域，反倒是波兰人大量并吞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土地，而且一直保留到1939年为止。不过，就连这种发展方向也对德国有利。波兰与俄国之间持续出现的强烈敌意，使得国防军高层的“塞克特路线”不断有机会推动德苏军事同盟，以便两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联手向波兰开战。国防军的那种做法，甚至一度还争取到德国官方外交政策的支持（虽然后者其实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如此便出现了战后的第一个耸动事件，即德国与苏俄在1922年签订的《拉帕洛条约》。刚好就在热那亚举办一场国际经济会议的时候，突然传出有关缔结该条约的消息，使得西方国家对德国抱持着浓厚的不信任感——这种所谓的“拉帕洛情结”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根除。

就表面上的内容而言，《拉帕洛条约》是德国与苏俄以温和理性的态度事后补行签订的和约。《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作废，新德国与新俄国如今决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时西方列强尚未与苏俄建交）、相互以最惠国待遇来维系贸易关系，同时两国之间全面恢复正常关系。在那些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但它们的背后自然还隐藏了更多东西。

因为自从签订《拉帕洛条约》以来，德、俄两国原有的松散军事合作关系益形巩固，一直持续到1933年为止。两国有可能联手向波兰发动武的可能性，也仍旧令双方的军事高层念念不忘。于是，国防军优先争取的目标，已在某种程度内通过德、俄之间的合作而得到实现，那就是要规避《凡尔赛和约》所列出的军事条款。

德国外交当局和德国整体政策所着重的事项却有所不同：重整军备不该列为德国最优先的目标，当务之急应当是设法摆脱赔款的负担，以便让德国经济获得重建的机会。为了实现摆脱赔款这个目标，德国的政策于是对一种社会灾难视若无睹，然而那个灾难

却对德国的国内政治氛围造成毁灭性影响，此即 1919 年至 1922 年之间连续不断的快速通胀。而且，通货膨胀在 1923 年更是势如奔马。

1923 年出现荒诞不经的情况之前（我马上还会对此作出说明），德国一切的钱财早已在 1919 年至 1922 年之间全面贬值。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德意志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仍相当合理，大约是十比一。到了 1922 年，一美元已可换得两万马克，也就是说，德国所有的货币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于是，在货币储蓄者和现金拥有者受害的情况下，德国财富进行了剧烈的重新分配，而其中的获益者是当时享有经济优势的实物资产拥有人。

德国在 1919 至 1923 年之间充分就业，不过实得工资持续下降。德国工业界让德国储蓄者付出代价之后，得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潮，而那正是其他各国在士兵大量复员之后所面临的困扰。德国工业界出口了价格不断下跌但是数量极为可观的商品，于是还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

因此，最先在德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并非工人，而是储蓄了金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产形同遭到没收。这种情况激起了巨大的恨意。于是斯特凡·茨威格后来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 1919 年至 1923 年之间的通货膨胀那般，将德国中产阶级调教得愿意接受希特勒。

德国中产阶级的那种愤恨并非毫无道理可言。因为中央政府不但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反而还刻意借此追求一个重要的目标——让德国在国际间不再拥有可被接受、可用于支付的货币，试图用这种方法摆脱赔款。

德国的修正主义和法国的修正主义因而在彼此相互碰撞。德方放任通货膨胀肆虐，以便让自己失去偿付能力来规避赔款。法方则设法利用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的机会开疆辟土，将《凡尔赛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双方修正和约之争的最高潮，就是 1923 年所谓的“鲁尔战争”。

法国也曾经在之前几年内，针对德国违反赔款规定的行为采取过某些制裁措施，时而跨出莱茵河左岸地区占领右岸的若干城市。最后法国在 1923 年决定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当时那里是德国最为重要、延续德国经济命脉不可或缺的工业地带。法国如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先是在经济上，而后在政治上，将这个地区从德国切割出去。

德国的对策是进行所谓的“消极抵抗”：鲁尔地区停止了工业生产。可是，鲁尔地区的工人和工业家们必须继续养家活口，而当时的因应之道就是完全无限制地操作印钞机。结果，连印钞机都不敷使用了。在 1923 年的时候，光是想印制足够数量的纸币也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这么一来，就不得不动用民间的印刷机来帮忙印钞票。此外并衍生出交通方面的问题：一整列又一整列的货运火车必须被用于运输，以便及时将刚印好的纸钞运送出去。当时，荒诞不经的情况已有各种报道叙述了，在此便不对这个主题多作说明。

总而言之，鲁尔地区进行消极抵抗以及政府资助消极抵抗之后，所造成的情况是：德国的货币经济实际上已在 1923 年陷入瘫痪。那光怪陆离的一年当中，美元汇率成为全体德国百姓都十分熟悉的话题，而且美元汇率产生了宛如体温计一般的作用。在 1923 年初，一美元还折合两万马克；8 月时的美元汇率已经突破百万大关，又过了三个月之后进而突破千亿大关。到了 1923 年底，一美元所能换得的金额已高达 4.2 兆马克。德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货币了。

1923 年之前，通货膨胀还只是夺走人们储蓄的金钱而已，现在就连以现金支付的收入亦已严重贬值。如今工人也深受通货膨胀荼毒，受害者已不再像从前那般只局限于家有积蓄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人们再也无法靠工作赚钱，而且即使赚到了钱，也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变得一文不值。德国普遍出现荒谬的情况，以致在 1923 年秋季演变成攸关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德意志国在 1923 年秋季已濒临政治解体。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行动则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尽管如此，消极抵抗还是为德国带来了一个非常幸运的结局：其他的赔款支付对象——英国和美国——如今已得出结论，不可以再这么继续下去。于是法国遭到施压，被迫结束在鲁尔地区的冒险行动；德国则终于完成早就应该在 1919 年至 1920 年做出的事情，进行了货币改革。

有了新而稳定的货币作为基础之后，即可对赔款另订规范。德国得以分期偿付已调降的赔款金额，在起初不订出赔款总金额的情况下，每年支付二十亿马克左右——但是为此必须以某些国家岁入项目作为抵押，其中主要是关税收入，同时铁路的管理权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德国还必须针对西部的边界，与英国、美国和法国达成最终协议，如此一来即可同时排除日后法国的侵犯行动以及德国修正领土的要求。

1924 年与 1925 年之交，上述事项在西方促成了一个新的和平条约。它总共分成两部分，分别为 1924 年暂时解决了赔款问题的《伦敦协议》，以及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在《洛迦诺公约》中，德国终于自愿放弃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且作出承诺，等到盟军撤出当时仍被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后，该地区将维持非军事化。为此交换到的非常有利条件是，英国与意大利从此将为法、德两国最后敲定的德国西部边界提供保证。

《洛迦诺公约》意味着，法国基本上已经与自己的东欧盟友脱钩。既然德国西部边界已得到意大利和英国的保证，那么纵使德国在东方与法国的盟邦（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交战，法国也不得越界进行干预。

这个在《洛迦诺公约》里面虽然从未明讲，但是不言而喻的结论，使得法国转而采取纯粹的守势。法国在签订《洛迦诺公约》之后的几年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以此举动向世人宣布，该国从此不再自视为欧洲的霸主，以及中欧与东欧新成立民族国家的担保人，反而只是一个关注自身安全、除此之外别无希冀的国家，不但愿意迁就德国，而且必须迁就德国。

法国起先还尝试避开这种状况，其做法是敦促各方也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由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对德国的东部边界做出保证，尤其是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然而，这项要求非但遭到德国拒绝，就连英国和意大利也加以反对。两国的这种反应不无道理存在。毕竟西方列强于紧急情况下面对一场德国的东方战争时，将无法真正动用武力来保障波兰的疆界，这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白显示出来的事情，而且纵使在当时也不难预见于此。况且，如果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的话，那么苏联也必须

参与其中，但苏联当时是欧洲列强的拒绝往来户，同时苏联根本无意为了向波兰的某些边界提供保证而出面对抗德国。更何况，苏联自己在波兰也有许多失土。

因此，签订《洛迦诺公约》以后的情况如下：德国人不声不响但非常有效率地在东边与苏联合作，以便规避《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同时他们在西边形同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签订一个新的和约，继《凡尔赛和约》之后启动了一个新的和平体系，借此排除法国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

德国起初必须继续支付战败赔款，但是负担已经减轻，虽然赔款的总金额仍未确定。除此之外，美国在此时已经以一种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方式来涉足欧洲经济。

法国和英国不仅为德国支付战败赔款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美国的债务国。当初两国为了继续作战下去，需要美国大量提供贷款。美国人现在坚持他们必须偿还那些贷款；法国和英国尽管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不得不还钱。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经济循环。德国向英国和法国支付赔款，英国和法国则向美国偿还战债，而为了让此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美国又向德国挹注贷款。这么一来，德国主要是依靠美国的贷款，而在 1924 年至 1929 年之间处于重建阶段，甚至出现中度的经济繁荣。贷款的数目大幅超出了德国的赔款金额。曾经有人非常粗略地估算出来，德国人在那几年内大约支付了一百亿马克赔款，却获得了二百五十亿马克左右的美国贷款。同时，德国人更因为经济的复兴，在对外出口方面表现极佳。

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亲自主导了各种相关事务，并且从中争取到一个经过明显改善的《凡尔赛和约》版本，即便他并不因此感到满意。他难得公开透露自己进一步修正和约的目标，但还是几度作出相当明白的暗示，让人得以大致道出端倪。

施特雷泽曼的近程目标，是要让法军和英军撤出当时仍遭两国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他也实现了这个目标，却无法亲身经历此事发生，因为英、法两国在 1929 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同意撤离，但完成撤军行动的时间是在 1930 年。

施特雷泽曼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动员所谓的“境外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德国人。他希望那些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德国的前哨站，促使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唯德国马首是瞻，甚至促进当地争取与德意志国合并的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在他任内也相当顺利，比希特勒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行得还要成功许多。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些“境外德国人”不免遭受了可怕的报复。第三个目标已经是远期的目标。就此而言，施特雷泽曼寻求修正东边的疆界，主要是撤销所谓的“波兰走廊”。至于上西里西亚被并入波兰的部分，他希望通过施压——但未必开战——在时机有利的时候加以收复。这个目标似乎也并非毫无指望，因为此时《洛迦诺公约》已经导致法国在东欧被绑住了手脚。

施特雷泽曼的第四个和最长程的目标，是要将德意志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统一起来——当时奥地利被称为“德意志奥地利”。这种“德奥合并”当时也是奥地利百姓所完全乐见的，不过施特雷泽曼的构想是将此事保留给无法预见的遥远未来，静待有利外交局势出现。德国固然继续秉持修正主义立场，但在短期之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联军提前撤出莱茵地区。然而在撤军之前，必须先对赔款的总金额作出最后规范。1929 年终于通过所谓的“扬格计划”，对此达成了协议。“扬格计划”更进一步调降了德国每年赔款的金额，订出的赔款期限却非常漫长，要求德国一直赔款到 20 世纪 80 年代。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由于经济蓬勃发展，轻而易举就可以用出口盈余来支付那笔款项。

自从 1924 年至 1925 年引进新规定以来，出现了几个颇为平静和幸福的年头，然而这一切随着 1929 年从美国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被打乱。对德国来说，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的贷款停止继续流入；若是短期贷款，甚至必须部分偿还。德国迄今仍然相当高的就业率立刻急剧下降，在经济方面则出现了破产潮。这个发展使得此时刚改组的德国政府再度有机会摆脱赔款负担，并取消不久前在“扬格计划”中订出的新规范。但这回不必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那般大肆通过通货膨胀来进行，而是借由刻意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它让德国变得如此贫困，以致根本不再有能力继续支付赔款。最后，就连德国的债权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事。

这项通货紧缩政策成为德国在魏玛共和时期，为求摆脱赔款而遭遇的第二场重大社会灾难，而且这一回的政策起到了效果。全球经济危机不但波及德国，同时更对整个西方世界造成重创（俄国除外）。在所有受到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本身），人们如今开始意识到，当前的形势使得这种“政治性的付款”——亦即一方面由西欧盟国向美国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由德国向西欧盟国支付赔款——不应该对日益陷入崩溃的全球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于是，美国总统胡佛在 1931 年要求一概停止此类“政治性的付款”，起先是通过有效期限为一年的《胡佛延期偿付案》实现了这个目标。等到一年期满后，1932 年在“洛桑会议”期间果真达成持久协议，由法国、英国和其他的债权国放弃继续向德国索取战败赔款。即便当时肯定德国仍须支付一笔金额为三十亿马克的尾款，但德国从未支付那笔款项，而且不曾有人认真追讨。也就是说，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理通过其刻意让德国陷入贫困的政策，终于实现了摆脱赔款的目标，纵使他本人在此不久以前已经黯然下台。

我还想简短对此指出的是，德国在 1930 年至 1933 年之间陷入贫困一事，直到今天仍然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危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全球经济危机只不过是部分理由而已，其情况正如同 1919 年至 1923 年之间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仅有部分是出自那场由公债加以支撑、然后打输了的战争。反正无论就前者或后者而言，都只不过是部分的事实。若能及时在战后进行货币改革，德国应不至于沦落到让全国储蓄资产都化为乌有的地步；而若能采取不一样的经济政策，应可大幅减轻全球经济危机对德国造成的伤害，而非使之更进一步恶化。因应大萧条的经济政策当时非但有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在德国亦有诸如瓦格曼等经济学家加以鼓吹：这种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即使牺牲了政府的预算平衡也无妨），通过所谓的“赤字开支”让经济再度产生动能。布吕宁的政策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他激化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恶果，蓄意使德国的经济完全朽坏，借以摆脱赔款。如同前文所述，他获得了成功。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做出说明：他的这个成就在内政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陷入贫困的德国百姓成群地推向了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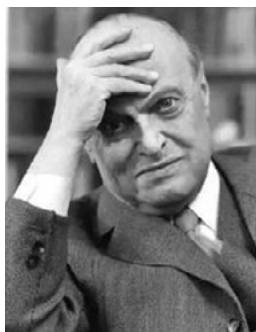
同一年内，德国的修正主义政策还取得另外一项重大成就。1932 年在日内瓦举行了国

际裁军会议。西方列强曾于《凡尔赛和约》中，将德国的解除武装列为全面裁军之先决条件。那种官样文章如今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杠杆。德国人的论点是：除非西方列强现在也裁军到德国被迫裁军后的同样程度，否则他们就必须允许德国有权重新扩充军备。德国人用这个论点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世界局势已经全面改观——一则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再则是因为距离战争已有一段时间的缘故，1919年时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到了1932年12月，西方列强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向德国政府作出承诺（当时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已非布吕宁，而是施莱歇尔），允许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意味着，在1932年底的时候，德国绕了许多弯路之后终于摆脱自从1919年以来阻碍德国重建强权地位的两大枷锁——必须支付巨额战败赔款，以及被迫将国防力量维持在最小限度内。德国再度以大国的身份跻身强权之列，而且德国已然成为东欧和南欧的潜在霸主，终于确认了《洛迦诺公约》早已呈现出来的迹象。那些都是德国修正主义所获致的决定性成就，而且一切都还完成于魏玛共和时代。可是，它们随即却由一个完全改头换面的德国来坐享其成。

魏玛共和国直到1932年为止都还不断处于内耗的阶段，其内部早就已经坍塌（这是即将在下一章探讨的主题）。此时在内政方面所着眼的事项，已不再是应该如何延续魏玛共和国的命脉，反而是它的继承权。魏玛共和国在1932年临去秋波、做出重大成就没有多久之后，其继承权就在1933年落入希特勒手中。结果如今已重新恢复昔日强权地位，并且至少已在中欧东部地区跃升为准霸主的那个德国，就是希特勒的德国。



本文摘自《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周全译
译林出版社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1938年移居英国担任记者。1954年返回德国后，曾先后为《世界报》及《明星周刊》撰稿，被公认为20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电影《超脱》(2011)剧照

档案

在中国，“抑郁症背后的 社会结构”是什么？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疾病与自我、社会的关联？

“就社会学角度而言，抑郁症只是外显的症状，只是某个深层社会问题的外在表现，而更根本的思考，应该是在社会层面上重塑幸福与韧性的环境与个体。”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有超过3.5亿人受抑郁症困扰，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而且患者人数还在快速增长，预计2030年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第一位。处于长久危机之中，面临不确定的时代与不稳定的生活，人们的精神健康势必受到影响。现在我们说的“抑郁症”(depression)，始于20世纪西方，历史并不悠久。那在“抑郁症”没有被发现之前，世界上的人难道就不抑郁吗？显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人饱受精神痛苦折磨，只是他们不以“抑郁症”命名而已。所以，“抑郁症”如何在西方社会诞生，怎样成为精神痛苦的代名词，以及从西方扩散到其他地方时，如何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医学相互作用，构成其庞杂历史与现实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我们很容易明白，抑郁症不能只从普遍性的科学视角（医学和心理学）理解，也要结合社会、文化、历史等语境化因素探讨。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的界限一直不是那么泾渭分明[1]，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都在起着不同作用，所以治疗也不能局限于单一方式。

以2022年中国出版关于抑郁症的新书为例，就涵盖了许多视角，比如医学的《发炎的大脑》、心理学的《走出幻灭》《抑郁症自救手册》、社会学的《诉说忧伤》、历史学的《抑郁帝国》、患者声音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走出抑郁症：徒步环游3000英里的治愈之旅》，等等。

众多视角中，医学和心理学是主流，抗抑郁药和心理咨询也是如今最常见的治疗方法。相比之下，历史学、社会学和患者声音等人文角度比较边缘，许多人也忽视它们的存在。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以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戴维·A·卡普(David A.Karp)的著作《诉说忧伤》(Speaking of Sadness)为由头，就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访谈了该书译者萧易忻。



萧易忻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毕业于英国埃塞克斯(Essex)大学，2016年出版过《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一书，是中国为数不多关于抑郁症的社会学专著，曾入选第三届“中国社会学会年度好书推荐”的十大好书。《诉说忧伤》是一本特别的书。作者卡普不仅是研究抑郁症的学者，自身也是抑郁症患者，深知精神病学领域的问题，希望更多人倾听患者的声音，关注影响症状形成的环境和社会因素，不再简化为量表和手册[2]。

“我坚持认为，自1980年以来，精神病学领域追求科学和理性的做法消除了病人叙述故事的声音，对倾听病人讲述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社会语境相对冷漠，这其实降低了病人对治疗者的信任。更麻烦的是，不尊重病人、不从病人的角度考虑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药物治疗，而后者被许多人认为最终弊大于利。……我特别想让读者意识到一点，即尊重那些通常被无视、因而其自我被贬低的个体故事具有政治意义。很多以前，卡尔·马克思就告诉我们，所有富有成效的社会变革都源于集体叙事。”卡普在书中写道。

基于这种关怀，卡普不试图解释什么导致抑郁症或者如何治愈抑郁症，而是采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关注抑郁者如何理解这种从本质上来说是模棱两可的生活情境，他们的抑郁意识如何随视角推移而发展，他们如何看待精神病学和药物治疗，以及如何与家人和朋友打交道。研究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50名被“正式”诊断为抑郁症，因此一直在接受精神病专家治疗的患者。

卡普认为，抑郁症本质上是一种断裂的疾病。许多受访者将抑郁体验比作溺水、窒息、坠入无底洞或身处黑暗无光中的隧道等。他们非常渴望与他人的联结，但同时却被剥夺了建立联结的能力。抑郁症的大部分痛苦来源于患者认识到，人际联结能让自己感觉更好，但在抑郁症发作期内，患者丧失能力，无法建立这种联结。长此以往，退缩将使恐惧和自厌融合，催化出绝望，而绝望又会反过来使退缩的冲动更加强烈，形成真正的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个人的情感健康与整个社会的健康密不可分。某种意义上，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都是社会的受害者。其中，三种文化趋势（医疗化、断裂、后现代化）催化个人错位和抑郁症产生。“医疗化”指的是文化诱导大众有意愿将情绪痛苦视为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越来越多的医学和其他治疗专家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将疾痛(illness)解释为一种不正常的疾病(disease)[3]建立了基础；

“断裂”主要指美国工作和家庭中日益减少人际联结，比如失业、离婚、临时工、不稳定就业、过度的个人主义、自由又孤独的生活方式；“后现代化”指美国人艰难寻找自我之旅。整个社会让人能抓住和相信的东西很少，无论什么价值、仪式和信仰，都只能提供暂时安慰。构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秩序的可靠意义结构已然崩溃，造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所有人越来越容易陷入一系列情绪障碍。

卡普觉得，治疗抑郁需要人们重建社群和联结。他说：“如果我们不履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滋养社会，我们就要付出个人患病的代价。集体痛苦的累积最终会产生改变社会结构的冲动，而这种社会结构正是导致我们许多人生病的原因。如此看来，数百万受情感障碍折磨的个体是这一辩证过程的一部分。在当前这种文化不满的时刻，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所有人都相互关联并对彼此负责这一精神信息。”



和卡普不同，萧易忻的书分析语境是中国，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国际比较上，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总是低于其他国家？他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分析架构加以解释。结论是，中国在“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上大多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构”中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估计中国病患的比例将会升高。

《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出版7年后，中国与世界发生许多变化，对应的分析也随之变化。萧易忻说：“面临险峻的经济形势，抑郁症的状况不容乐观。然而这个架构不再是承平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可能是地缘政治两极化下的另类全球化。……这也导致中国会给自己压力，要跟美国竞争，反映在教育等各个行业面临全面提升的紧迫性。强国的论述亟欲摆脱被卡脖子的瓶颈，诸多领域将会处于类似军事化管理的状态，大家在各自的行业中上紧发条，时时处于战斗状态。在这样的氛围下，‘躺平’的论述是不受欢迎的。”

以下是《小鸟文学》和萧易忻的访谈节录。

01

抑郁与自我、社会有什么关联？

小鸟文学：《诉说忧伤》的第七章“疾病、自我与社会”是探讨文化趋势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作者戴维·A·卡普提出了“医疗化+断裂+后现代化=个人错位”这一理论方程式加以解释。但他分析的语境是美国，如果反观当下的中国，你觉得会有什么异同吗？之前你也对中国的抑郁症做过研究，写过《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这本书。

萧易忻：他的框架跟我有重叠的部分，只是讲法不一样。譬如“医疗化”，在我的著

作中的“第二部分：社会建构篇”提及了产官学媒（企业、政府、学界、媒体）复合体怎么共同催生抑郁症？抑郁症在社会层面越来越多被人认知，然后什么手段都要用医疗方式解决，这其实就是“医疗化”。

关于“断联”，在我书中的“社会结构篇”中也有类似看法。我的书有谈到生产面及消费面的问题。生产面谈到空间跟时间巨变。在空间的变化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资本集中在城市，跨境流动、跨省流动，产生农民工、高管等流动的问题，这让家庭结构产生松动的可能。外遇、离婚、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其实都是顺着资本相对集中在某个地方所衍生的结果。资本集中于城市在空间上造成大量流动，松动了原先稳定的家庭结构，进而产生社会问题，也就连带影响到抑郁症的产生。而卡普所提及的“断联”，其实跟我所提的家庭结构松动所引发的外遇、离婚、留守儿童等问题非常类似。

还有时间的竞争，快速效率化的生产成为常态。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要超过发达国家，有非常多竞争力的论述，这论述变成了整个国家的战略。当这个国家有旺盛的企图想变成强国，各行各业想要短期超越过去，有非常多对效率的要求。不仅如此，民间也会自动形成竞争态势，像是许多家长给小孩报名补奥数，这其实是一种数学超前教育的游戏，小学教初中甚至高中难度的内容，如果我们问家长为什么要补，很多家长答不出出于教育上的理由，只是表达唯恐孩子不补习就赶不上的焦虑。即使政府有意禁止补习，但家长们却依旧焦虑，补奥数的现象并没有消失。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教育到大学之后就很难突破了，而大学以前的教育却是提前教较难的内容，过程中不是培养孩子的自信，而是透过批评、责备、大量作业及利用同侪比较的方式而让孩子处在压力下去成长，这固然是一种训练抗压的教育方式，但在我访谈的案例中却看见这种教育下的副作用，发现许多孩子患了抑郁症就不想再学习，他们将过去的努力视为无意义的游戏。一个孩子自信被摧毁是件很命的事，因为那将侵蚀他过去所有的努力，并且不想再努力。当一个人没有信心走下去，过去高强度下学习到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

近来政府已注意到这问题，并且出台“减负”措施，但也要小心“减负”不要吊诡地再制造出新负担。该反思的是，培养信心，并从信心中逐步培养抗逆力，或许才是教育中特别需要培养的能力，然而，目前我们教育上鼓励孩子的氛围还有待努力。整体而言，政府与民间迭加所形塑的竞争态势，大家都可以明显感受到。

而在竞争力的强调下，大家都想过上美好生活，这个社会也会有美好生活的想象，但都必须符合某些社会期待，像是做好先生、好太太、好学生、好员工，有一个社会层面的“大他者”总是凝视着我们，要求我们必须符合它的期待。这个“大他者”可能是社会习俗、规范或各类考核制度。而符合期待的过程中，这个“大他者”会不断地向我们索取，大家就像是演员配合演出，这个“大他者”作为一种社会的超我，总会给我们许多压力，于是就会与自我不断冲突，有些人因此就过得很累，产生情绪问题。

像我有些访谈的材料中总是呈现这样主题：那就是，我怎么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像我访问到一个大学生，他从小学到高中都很优秀，但到大三时，崩溃了。因为他觉得同学比他更优秀，所以吃不好、睡不好，然后抑郁。这些压力是家人给他的，也是他给他自己的，但竞争力的感受已经深植在他心里，当他发现在大学中再怎么努力其他同学总比他更优秀，他就有焦虑感，静不下来，然后生病。

不仅是他，我们当上了老公、太太或员工的，也都有不同的美好生活想象，也就有不同的压力。这是社会化过程中给我们的压力，但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状态。我们总是会想，为什么我不像某个较优秀的人，而不是先想，我为什么不好好活出我自己？当我们不确定感很强，就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于是就“错位”，因此抑郁。至于“后现代化”，这是个很大的词，要看哪个层面。中国呈现一种不均质的状态，某些部分非常保守，但某些部分却又非常开放，呈现混杂的状况。我的书中提及“个人主义化”与“自恋社会”的形成，也是某种“后现代化”的体现。

关于中美抑郁症状况比较，可以参考我的书最后一章的总表（第144–146页），这张表用一个全球/国际层面、国家/国内层面，以及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构的矩阵表两相对照，可视为类似于中美比较的框架。我在这总表中有提到哪些因素是中国具备条件，哪些是发展中，哪些是缺乏，哪些是推迟、隐藏。这可看出中国目前的问题。

就我的理解，美国的医疗化很突出，包括医生的供给数多；许多人认为抑郁症只是一种心理感冒，有病就去看医生；媒体的相关报道及心理咨询也很发达，有情绪问题就去付费咨询，相较于中国人，他们不会感到非常羞耻；精神用药也比较普遍。但中国不是如此，仍存在很多对抑郁症患者污名化的现象，而且我们心理咨询的规范性也比较弱，很多人会认为心理咨询师是江湖术士。即便是正规心理治疗师的私人执业，也不便宜，除非你愿意支付动辄数百或数千元的心理咨询费数次，不然医疗可及性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数也比较少[4]。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抑郁症的社会建构的方面没像美国那样广且深，抑郁症患者的数据始终不高，但很多只是没被挖掘出来的黑数罢了。

除了医疗化方面比美国弱之外，“断联”方面也不太一样。美国的个体化更严重。他们基本上是尽量自己解决问题，有问题再来找政府，因此个人发生问题总是要自救，若欠缺群体支持或付不起诊疗费用的民众，会更容易陷入抑郁症的苦况中。但中国做法是政府尽量促成和谐，有一些集体性，但在精神医疗、心理咨询与社会工作的支持系统及社会的接纳度上还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补救“断联”的问题。

小鸟文学：卡普提到《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那本书，其实就是批判这种“过度”的个人主义，认为它助长了个人的自我关注，导致陌生、孤立和孤独的集体意识。

萧易忻：我的书在第四章消费面的分析中，也谈到个人主义化。虽然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追求个人的意识越来越鲜明。在一个普遍贫穷的时代，大家落差没那么大，心里的疾病也没那么严重，但贫富差距大了，到

处比较，落差也大，心理不平衡会更严重。

个人主义化与“去传统”有关，在西方过去是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在中国是儒家与家族次序的传统，对两者而言，“去传统化”都是某种意义的解放。像是婚姻不再受制于父母，可以离家奋斗不用终其一生待在老家，脱离传统束缚似乎是现代化下年轻人的渴望，但另一方面却又是一种确定感的丧失，因为自己出去闯荡一切要自己负责，家人不在身边，即使失败了也要自己负责。而在高度竞争化下失败的机率很高，不确定感也就更高，情绪问题也就随然而生。

在中国，当家族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权威，个人意义的来源就不再是家族，而是出去闯荡的个人，个人在不断流动中找寻自身认同，因此会不断在异地找寻朋友或社群，以便建构自我认同。而社交媒体发达的今日，在微信或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成为许多人建构自身生命叙事的方式，这些希望被点赞的动作本身就是自我建构叙事意义感的表现，也是将关注转向自己的现象。当别人不点赞，有些人（当然不是所有人）就会有不同的遐想，这也引发一些情绪的起伏，但这些动作都会让人更聚焦自我，并在意别人对自身的观感。若过度在意，无可避免会引发情绪问题。这也是信息发达的当代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它更加剧了关注自我的现象。

小鸟文学：从社会结构的阶层视野出发，有人认为，在很大意义上，抑郁症是个中产阶层疾病。《诉说忧伤》也提到：“毫无疑问，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聚集在美国社会阶层体系的低端，他们从未把自己的不良情绪定义为需要医疗干预的疾病。”中国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尤其在近3亿农民工中，就有许多在医疗系统之外寻求安慰和关怀的爱情困扰者，但一般不被看到，只有在极端如富士康员工接连自杀事件时，才会引发一些关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和想法？这方面有什么比较好的研究吗？

萧易忻：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的确值得关注，最近像是快递小哥跑单都是APP控制，几分钟没有到就有惩罚措施，这种论文越来越多。我觉得是这样，这类群体一方面对抑郁症的认知不多，再来就是很严重才会找医生。底层人的痛苦，实际的心理状态，很多测量不到，存在许多黑数，很多国家也是这种状况。

02

未来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上升

小鸟文学：刚才聊中美抑郁症的差异时，主要是通过分析文化趋势和社会结构，当然也提到了社会建构的因素。在《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中，你说，就抑郁症如何产生而言，“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构”较“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更为关键。这也是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一旦此“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估计中国病患的比例将会升高。我比较好奇，现在离当初的研究已经过了好些年，中国病患的比例是怎样的？你觉得社会建构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变与不变？

萧易忻：大的调查很多年才有一次，我那时引用的资料是2011年公布的，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哈佛研究团队做的统计，主要集中在深圳，说中国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仅为6.5%。近来的调查，我查到2021年《柳叶刀》发表了一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学者做的研究，说中国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是6.8%，过去12月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中同期仅有9.5%接受治疗，也就是90.5%根本没有就医。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2011年那份调查表明，十个高收入国家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是14.6%，法国最高（21%），美国也有19.2%；八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也有11.1%，但中国只有6.5%。

如果就数据来看，中国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变化不大。但有一些文章会讲医疗的普及率增高，像精神科的医院、医生、护士、床位都有成长，但还是大量不足，资源有限。媒体近几年关注抑郁症是多了，但可能很多人自己看量表、诊断，也不就医，成为黑数。我们只知道他可能有抑郁症，但当事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却不太知道，除了就医与心理咨询外，现在还有很多另类替代疗法，比如接触宗教、静坐，可供自行检测出有抑郁症的人参与这些另类方案。

近来我们也可从媒体看到，高校青年教师的轻生状况常被报道，近几年比我写书的阶段更严重。许多领域的考核压力比以前重很多，什么规定都来了。许多职业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入职以后，面对很多疯狂量化的考核。竞争力论述渗透到各行各业，然后又有一个强国思想主导。许多领域似乎都在进行类似军事化的管理，不达标就惩罚，人性化的部分越来越少。这个状况底下产生心理抑郁，并不奇怪。

近来疫情扰乱了过去的日常，但即使没有疫情，职业门槛增高已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世界工厂走向高品质管理和创新时，本来就会经历一段艰辛的过程，社会结构的层面压力加大。但疫情的到来又加剧了人们的压力，大家都多少能感受到生活的不便所引发的情绪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如此，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的抑郁症比例都上升。而中国面临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职业规范化与疫情因素叠加下，都无可避免会加剧抑郁症患病的比率。

小鸟文学：你对“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是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但这些年中国与世界有许多变化，比如全球化退潮；在中国，称自己有“政治抑郁”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中兴起“躺平”、“摆烂”等文化趋势。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和想法？

萧易忻：现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状况，已跟我几年前写书时所提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架构不太一样了。我认为将来或许会越来越朝两极化发展。两极化是各自有各自的系统，但全球化的基底还在，还不是完全的冷战，只要彼此依旧存在邦交关系，大概很难彼此100%脱钩，不过彼此也都想很大程度保持自主性。像疫情刚发生时，西方口罩不够，现在变成战备物资，有自己的供应链，不想被垄断在中国手里。

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策略，以前是实行“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现在则实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离岸外包”是只要

成本低，哪里都可设厂；现在，如果不是他所认定的朋友，就不能信任，一定要找朋友搞供应链，变成“友岸外包”。所以一些世界级工厂的供应链可能会分散，有些外商则因中国封控期间的不确定性，供应链断链带来很大困扰，所以就完全撤出中国；有些则是因为中国有顾客，那就在中国设厂只生产给中国顾客，但已不再把中国当世界工厂来供应全球，而是将厂房分散到越南、印度等国家。

现在解封了，流动性恢复，今年经济状况照理说应该会比去年更好，但仍存在许多风险，如果看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减进口），中国以往主要是投资强、出口强、政府支出强，但是这几个面向要回到疫情前却并不若以往容易。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状况不佳，房地产面临危机，由于许多地方财政很大部分都是靠房地产支出，一旦危机形成连锁反应，银行也出现问题，这些因素加起来，经济状况仍未脱离险境。而且减薪、失业等问题让消费也很难起色。现在每年有一堆大学生毕业，去年就超过千万，求职更为困难，整体形势依旧险峻。

面临险峻的经济形势，抑郁症的状况不容乐观。然而这个架构不再是承平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可能是地缘政治两极化下的另类全球化。具体而言，应该是说，只要中国与主要国家依旧维持邦交，WTO贸易架构依旧持续，经济全球化的基底还在，要完全“逆全球化”在短期内还难以发生，而是转变成“友岸外包”的供应链重组，某种贸易保护也会产生，这可视为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次重大调整。

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在WTO贸易架构依旧存在之下，这个世界虽然仍会维系贸易往来，但却可能渐朝向两大块化的趋势发展。这也导致中国会给自己压力，要跟美国竞争，反映在教育等各个行业面临全面提升的紧迫性。强国的论述亟欲摆脱被卡脖子的瓶颈，诸多领域将会处于类似军事化管理的状态，大家在各自的行业中上紧发条，时时处于战斗状态。在这样的氛围下，“躺平”的论述是不受欢迎的。此外，许多职业逐步规范化，不再野蛮生长，很多考核都来了。学历也呈现愈来愈贬值的趋势，现在读本科没有什么特别的，学生们也都很彷徨，要去读个研究生。但你问他为什么要读研？他也说不出来，通常都是本科毕业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再学习几年。我的学生毕业后多半也都去考公务员。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考公务员？他们说，其实在一般的企业做，也没好到哪里去，工资也差不多，还累得半死，而且比公务员更不稳定，那还不如去当公务员。

对许多学生而言，公务员根本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排斥的，但最后也都不得不将就，因为他们企求稳定。可见这个社会的不确定感很重，人们就会去找有确定感的工作。但是，现在物价与房价对一个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一直是沉重的负担，入职与升等的门坎因行业规范化而愈来愈高，赚钱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容易，非常努力却供不起房，所以就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生育率愈来愈低。

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还有很多学生愿意结婚、生小孩，但之后逐年递减，近来想成为“单身贵族”的学生愈来愈多。许多学生反映，努力得不到回报，再怎么努力都没法过幸福生活，就想“躺平”，觉得我就只能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呢？这其实是无奈的心态。

03

除了吃药，治疗抑郁的方式很多元

小鸟文学：新冠疫情以来，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都在升高，中国也不例外。像去年，由于长期封控和频繁核酸等因素，许多人的精神健康都出了问题，抑郁和焦虑时常发生。虽然现在政策转向开放，但“疤痕效应”仍在。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待新冠疫情对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我们如何才能从疫情的创伤中真正走出来？比如之前心理学家彭凯平说：“我们下一代受到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青春三年时光在疫情中度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经历过的悲剧，焦虑、抑郁、情绪失控、自杀现象都在上升。”

萧易忻：疫情期间的心理问题，各国都会发生，我相信很多关于情绪问题的研究都陆续在进行中。疫情期间的情绪问题主要有三种：焦虑症、抑郁症，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这些症状在疫情期间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增多。焦虑、抑郁相信大家在封控期间多少能感受，而PTSD则是体现在当事人会不断重现创伤的情景，像是买不到药、买不到菜，或者家里有人意外死亡等状况，这个症状干扰生活，产生逃避感、警觉性神经质等现象。这三种症状的加剧，是比较负面的视角。但是，也有反方向的视角或研究，比如创伤后的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创伤之后，有些人反而会有新的思考，心智上成长，更为正向。像有些人正是因为经历了创伤，反而之后更能同理那些不被理解的弱势；有些人经历悲剧，但之后对于经历类似悲剧的人能给予更多的安慰与支持；有些人差点过世，但之后侥幸活下来，也就更珍惜当下的生命，甚至为未完成的梦想而努力；有些人则懂得沉潜，好好规划这段出不了门的时间，修一些网课，充实自己，让自己处在一个预备期，蓄势待发。

小鸟文学：的确，对于一些人来说，新冠疫情对他是一个启蒙或者收获，可以帮助个人成长和理解社会。

萧易忻：创伤之后，现在解封，在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里，那个挫折感是不是还会继续发生，进而影响到他的心理状况，仍有许多变数。一般说来，PTSD是时间久了，没有其他重大的创伤发生，通常会逐步好转。但如果有一些事情撞击进来，过去创伤的场景可能会浮现，让当事人继续陷入这个症状中。

如果整个社会走向恢复，人们会逐步回复常态。但如果沒有改善，或许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将持续侵蚀经济成长的果实。然而一个人究竟会走向康复还是会持续陷入低潮，还是跟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外在环境有关，每个人毕竟都不一样。

关键的个人因素在于当事人的应对及调整之道是否具有韧性；而关键的外在环境因素则在于当事人所在产业或环境在解封后是否让人产生信心，还有这个社会的心理支持系统是否更为健全。支持系统可泛指精神医疗、心理咨询与社会工作人员的投

入，以及心理健康的相关教育与亲友的陪伴等等。

小鸟文学：在社会建构的视角中，中国民众对抑郁症的认知与实践是你讨论的方向之一，你对此也做过一些访谈和调查。能不能具体讲讲一些你觉得比较有价值或有意思的人物和故事？

萧易忻：刚我讲过一个学生，还有一个人，她去看了精神科，药吃了一段时间不见好，就转而透过宗教寻求解脱，她去教会，也祷告、读经，但都没有用，抑郁症还是很严重。那时正好是汶川地震之后，灾区需要很多服务，有人就建议她去服务灾民。去了七天后，她就能睡觉，之后就变好了，不再服药。

她的讲法是说，看到这些比她更惨的人，以及看到那些即使身处苦难却依旧乐观的灾民，会让她激出一种自我反省，她反省到自己其实很幸福，今天能够帮助人是她的福气，没必要自怨自艾，然后就渐渐想开了。由此可知，她心结之所以能解开是透过走向他者、看到某些人的痛苦以及某些人在灾变中的乐天而促使她反思自我，也透过服务别人来感受到助人的喜乐，如此才逐步走出过度关注自我的状态，而治愈了她自身，最后她连药都丢掉了。

这种透过某种外在情境来反思自己的疗愈方式，让我想起心理治疗里有一派叫“冒险治疗”，类似于以前有个真人秀节目叫《跟着贝尔去冒险》。英国冒险家贝尔专门带着一些中国明星到比较蛮荒的地方，克服重重困难，比如没有饮食，要吃虫子、喝自己的尿。这种可控的冒险，其实是让人处在一个“我在对付自己的恐惧”的境地，而且在实地的冒险状况比我们的现况更惨。一旦我们能直面它并且克服它，当我们再回到工作和生活场域时，我们可能就想开了。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疾病与自我的关联，比如当我们不再过度关注自己，而开始关心别人，在跟他者互动的过程中，可以疗愈自己。抑郁症有很大的可能跟自恋有关，我的书第四章也提到了“自恋社会”的话题。现代人的很多焦点会关注在自己身上，因为认同是不确定的，非常片段化，必须在每一个生命阶段找认同，找稳定性，来建构自我的生命叙事。但过度聚焦在自己的问题时，就容易陷在钻牛角尖的状态中，而陷入情绪问题。

我不是说所有抑郁症患者都适合这种治疗方式，而是说治疗方式可以很多元。你可以相信医学指标化的论述，相信实证主义所证实的药理功用，尤其现在很多抗抑郁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副作用愈来愈低，且有实证基础，许多精神科专家都鼓励不要害怕吃药。

但从我的访谈案例看来，的确也有人吃药不见好，却用另外的方式得到疗愈，就像我刚才说的例子，是透过服务的方式来疗愈自己。如果心里有结，光是吃药无法解决，这一点许多精神科医生也会持相同看法，所以许多医生还是会推荐除吃药之外，最好进行心理咨询，把心结打开。总之，疗愈其实可以有很多方式。

04

个人、亲友、社会可以做些什么？

小鸟文学：当初为什么会对抑郁症研究感兴趣？写完《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之后，你没有继续抑郁症的研究，而是转向社区营造，为什么？

萧易忻：在我打算做博士后研究时，我关注到很多朋友患有抑郁症，比如毕业回去找不到工作、工作压力大想轻生等等。我发现，似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却都患抑郁症了，为什么呢？能不能有一种社会学式的解释？而当时在中国的学术书籍主要以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讨论抑郁症，却欠缺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也很欠缺全球化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抑郁症的问题，于是我在博士后期间，就开始了这个研究。

后来没有继续是因为抑郁症案例看久了，我也会觉得难受。我开始思考疗愈方面的议题，但大部分的社会工作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实务涉及的是心理咨询，我认为这些实务已有许多良好的基础，许多学者都做出了贡献，能做出突破是有限的，但社会工作具有“社会性”，而我本身又有社会学的背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认为社区工作是很好的切入点。因为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转向对“社区营造”的研究。

我倾向关注社会很多层面的苦难怎样能够改善？如何让人们更幸福及更有韧性？如果这个社会是无数社区组成，每个社区都做好，社会就应该会变好。社区怎样把它营造好，有很多创新的做法，包括如何在社区里面建构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环境？当然这又牵涉到非常多层面，不过多多少少跟治疗有关，但不是医学意义上的治疗，而是更友善幸福的环境怎么建构。因此我就转到这种社会层面的疗愈面向来。

比如一些精神康复中心举办精神患者的策展，让患者自己创作，呈现心路历程，从而帮助去除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让社区的人能够进到策展中来认识这些人，这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让大家不觉得抑郁症有什么好羞耻的。当然，社区营造很广，健康只是一个部分，还有很多诸如地方创生[5]、人文空间、儿童友好社区等议题，但整体而言就是要帮助人过上幸福且具有韧性的生活。

就社会学角度而言，抑郁症只是外显的症状，只是某个深层社会问题的外在表现，而更根本的思考，应该是在社会层面上重塑幸福与韧性的环境与个体。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怎么改变？比如在制度建构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可不可以做一些预备性工作，而不是等症状发生后再去解决，而“社区营造”，可以说就是这种预备性工作。

小鸟文学：虽说《诉说忧伤》并不致力于探讨如何治愈抑郁症，但在最后，作者还是表达了一个思路，即“重新发现社群”。当然，这与他认为“抑郁症本质上是一种断裂的疾病”密切相关。你怎么看？关于如何治愈抑郁症，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比如个人、朋友、家人和社会都能做些什么？

萧易忻：“断裂”是很社会学式的想法，它的基本预设是，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

无法脱离他人独立存在。人必须要连结，不连结就会出问题。比如你一出生就是如此，需要父母照顾，然后你用的尿布、喝的奶，处在一个安全的社会，这都跟别人间有关，所以是那些人撑起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往往不会想到这些，我们很聚焦，自恋地看自己的成长，忽视这个过程的背景。很多人直接间接帮助你，供应你吃穿用住，让你的生命能够滋养，你才能渐渐长大。这是社会学里社会网络的视角。而关于治疗，我认为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协助当事人或提供自助的方法，另一方面是营造友善于患者的环境。

在第一个层面上，治疗刚才讲了一些，像服务人，然后我在《诉说忧伤》的直播活动中也提到一些，像个人可以借助客体，包括时间（过去的照片、日记、音乐、视频）、空间（回忆之处）、他者（人、动物、植物、话语）；还有精神分析、静坐的方式；体验教育、冒险治疗、戏剧；身体的运用，比如嘴角上扬、说正面话语（赞美别人、感谢别人）、自言自语（声音可以刺激大脑）、律动、呼吸……等等。

朋友和家人最重要的是陪伴，其实不用多说什么，不要有太多英雄式拯救，也请少问“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多一点倾听，对方会更愿意讲内心的故事。

一个患者常有不被理解的状况，像是邋遢的外表，不愿洗澡或整理仪容。我在直播中也引用《诉说忧伤》这本书的某个访谈句，提到抑郁症患者连洗澡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当事人也引发他哥哥的不解。如果我们因为他有某些被我们看不惯的行为而责备他，将会使他更加封闭自己，锁进无止尽的抑郁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评估他需要做到哪些事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功能，然后切割成许多微小的任务（如减少白天睡觉的时间、能正常刷牙、洗脸、洗澡等等），每天陪伴他完成一点小任务，而不要给予过多要求，每完成一个任务就给他正向的鼓励（如：好棒啊！你今天洗了脸，真是漂亮！）。

透过完成一点一滴的小任务，陪伴他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功能。这样的陪伴将让他逐步敞开心扉，与外界连结。如果自己本身是患者，每完成一点小任务，也可练习自己赞美自己，甚至发出声来赞美自己，赞美与肯定的话语具有改变的力量。

关于第二个层面，就是“营造友善于患者的环境”，中国台湾新北市的慈芳关怀中心是个值得参考的案例，在这个机构的精神患者没有严重到需要住院，但又不太能顺利找到工作，处于中间阶段，于是关怀中心就是一个社区精神患者可以在日间一起生活的地方。他们会透过举办精神患者的策展来让社会大众了解患者们的内在世界，苦难的故事。患者们可以透过各类的创作（如绘画、拍照、写诗、作词作曲等等）来呈现他们的故事。

民众透过这样的策展就能培养同理于这样处境的人，营造一个对精神患者友善的社会，这就是一种对精神患者去污名化的社会教育。在日常生活方面，机构内的社工也会陪伴患者买菜做菜，每当他们完成任务，就给他们正向鼓励，其实患者有了陪伴，他们可以做得很好，可以生活自理。这就是用一种联结的方式来疗愈，运用陪伴与一起做事的方式来让患者恢复正常功能。我们很需要在“断联”的状态下建构这种重新连结的友善社会。

小鸟文学：除了《诉说忧伤》和你的书，你能不能为普通读者推荐一些了解抑郁症的书？最好涵盖不同视角[6]。

萧易忻：心理学方面，有一本绘本《我有一只叫抑郁症的黑狗》，浅显易懂，还有像《抑郁症的正念认知疗法》，用正念增进滋养的活动，减少耗能的活动，可以每天做一些练习；历史方面，《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历史》，结合很多社会学、文学、艺术、医学的专著，可以看一看；人类学方面，凯博文的《苦痛和疾病的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医学有很多，随便搜就能找到，但除非你是医学专业或者想进一步了解，才会读那些指南，比如《抑郁症与临床疾病：哈佛医学院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诊疗指南》。最浅的是那本绘本，小朋友也能看，能够做一些启蒙教育，让小朋友及早了解情绪问题。

[1] 由于抑郁症的模糊边界，最近这些年，很多人像卡普一样批评抑郁症的过度诊断，把生活中的正常痛苦变成了医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史教授乔纳森·萨多斯基（Jonathan Sadowsky）在《抑郁帝国》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对意见和其他观点。

他说：“近几十年来抑郁症的诊断率上升是事实，但其原因和意义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有以下3种：第一种，抑郁症患者真的可能变多了；第二种，我们可能会和以前一样有同样多的抑郁症患者，但更多人被确诊了——有了更好的检测方式；第三种可能性是诊断漂移（diagnostic drift）——重新标记被认为是不同疾病或者根本不被认为是疾病的状态。可能其中两种或者全部3种都在起作用。”

[2] 《诉说忧伤》的初版是1996年，新版是2016年。和过去相比，现在有不少医生都在反思抑郁症量表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等的问题，开始关注患者的声音和社会环境因素，但杯水车薪，对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匮乏的中国更是如此。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探索，比如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姚灏医生在做的精神健康照护。他说：“目前，国内的精神卫生服务主要还是以医院服务为主，没有延伸到社区和家庭，在治疗方式上也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很少提供社会心理支持。但其实对于精神障碍者来说，社区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场所。离开医院以后，他们在社区中仍面临着多样化的照护需求，精神健康照护的目标应该是帮助精神障碍者更好地在社区中实现自立生活以及复元。我们做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研究的目标也是为了完善国内的精神健康照护体系，实现‘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的照护模式。”

[3] 疼痛（illness）和疾病（disease）是哈佛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著名区分，前者指身体或情绪痛苦的主观体验，后者指痛苦的生物学原因。卡普称，凯博文雄辩有力地论述了从跨文化视角看待一系列情感障碍的价值，反思几乎完全基于生物医学模型的西医。

[4] 据《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2015年底，中国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30122人。到2020年底，医师数增长为50124人，也就是每10万人只有3.55名医师供给。相比许多国家，虽有增长，但远远不够。而且，精神科在中国属于冷门科室，很少有年轻人愿意主动踏入，污名化和收入低是一个长期问题。

[5] 地方创生的概念源自日本，目的希望地方发挥特色、并发展出最适合的在地经济，让人们不一定非得要在都市工作，能够选择其他乡镇或回到自己的故乡，以改善高龄少子化、城乡发展不均等问题。

[6] 我在做这篇访谈时，看了《抑郁帝国》这本书，觉得附录的参考文献很有价值，也可以作为一个阅读清单参考。它涵盖七个方向的推荐，包括关于抑郁症和忧郁症的历史和哲学通论，抑郁症人类学和相关问题，精神分析，政治、社会认同和平等，DSM，生物精神病学和制药，回忆录与叙事。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1930 年代的一张上海警察合影，来自 [Hong Kong & Shanghai Tours](#)

档案

武定路上的社会想象

伊险峰 | 小鸟年度专辑

这是小鸟文学年度读书笔记开篇，
回应 2022 年最重要的公共问题之一。

武定路在上海静安区，市中心中的市中心。靠近胶州路的一段，路北住宅楼有六七家底商，卖外国食品为主的小连锁超市、宠物美容、小酒馆、越南米粉店之类。住宅楼属于一个叫银华苑的小区，建于上世纪末，二十几年前，设计粗犷，有很宽的人行道，没有太多残障人士服务意识，底商留着奢侈的七级台阶，扔个垫子就是户外阳光位。

赶上天气好，会有很多年轻人坐在台阶上喝酒喝咖啡，带着狗，有点喧哗。胶州路和与它平行的延平路，再加上武定路，它们组成的这个“干”字形街区是上海最热闹的士绅化酒吧区之一，以前都是外国人扎堆的餐馆酒吧，现在日咖夜酒、早 C 晚 A。

2022 年 6 月 11 日，下午四点不到。几位警员在台阶前要求喝酒的人不要聚集。12 天前，上海解除封控，此时并没有恢复堂食，在街边喝一杯酒是否属于堂食，没有人给明确解释。警员在一个弹性很大的空间里以自己的理解或者内部掌握的规则来面对每天呈现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四点零三分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有几十个人了。三四位男性警员在强制一位年轻女性上警车。这位女士着短裤和 T 恤，个子不高，大约也就一米五出头，很健康，晒得黝黑，不响，不肯上车。警员也不出声，默默发力。如同默片。

偶尔有其他女生边用手机拍摄边喊：你弄疼她了！不许打人！不要打女生！

另有警员说女生袭警：她咬了警察的手臂！

从头到尾一直在现场围观的超市店员为旁观者解说：

女生和她的朋友们在台阶上喝酒。

警员要求不要聚集。他们不肯散。

警员要求查看随申码。不知道有没有出示。

警员继而要求查验身份。这女生不肯说。

警员要求不肯出示身份证件的女生去派出所。女生抗拒。

僵持。

女生的一位朋友说女生从澳大利亚回来，不习惯这种方式。

来了四辆警车之后，女生终于被塞入警车带走。

每个个案都有前因后果。在三月到六月，前后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警务问题被更多的人所关注。这些问题过往当然存在，只是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关联，它被忽

略了。就像居委会和社区，它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跟他们打交道，所以他们是个模糊的、无所谓被评价为“好”或者“不好”的存在，直到它在封控期间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重要角色。我们才会注意到它，才会思考它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思考我们如何与它们相处。

以下文字是读书笔记。

间或有一些思考，但我不研究法律，所以相关问题都不在法律意义上探讨，只是从普通人感受出发，思考面对的问题。也并不总是有答案，可以说大多数都没有答案。你可以看成有人遇到了事，看了书，抛问题出来讨论。总的来说，这些都是特殊的 2022 年的一部分。

相关的书中有些凑巧正好看到，有些则是按图索骥——因为关注了这些话题之后，特意找来看。如果不是 2022 年，大约也不会接触。它们都是内地公开出版图书，这说明大部分相关的知识和行为、心理的探讨，早已经成为公共话题的一部分。但愿这种探讨在未来能够持续。

01

盘查

1. 身份证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焦点？

我们看到和了解到的，有多人因为查看身份证问题与警员产生矛盾。他们的问题包括：

- 为什么查我的身份证？
- 警员是否可以随便盘查路人身份证？
- 我没做什么不得体的事，问我身份证是一种对我的羞辱。
- 我有犯罪分子特征？这对我是一种冒犯。

2. 几个规定

《居民身份证法》第 15 条：

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五）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绝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分别不同情形，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第 11 条：

对可疑人员进行人身检查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效控制被检查的嫌疑对象，在警戒人员的掩护下对其进行检查，防止自身受到攻击和伤害；（二）对女性进行人身检查，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可能危及检查民警人身安全或者直接危害公共安全的除外；（三）对拒绝接受检查的，民警可依法将其带回公安机关继续盘问；（四）对可能携带凶器、武器或者爆炸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检查时，应当先检查其有无凶器、武器和爆炸物品，如有，则应当当场予以扣押，必要时，可以先依法使用约束性警械，然后进行检查；（五）责令被检查人伸开双臂高举过头，面向墙、车等，扶墙或者扶车站立，双脚分开尽量后移，民警站于其身后并将一只脚置于其双脚中间，迅速从被检查人的双手开始向下对衣领及身体各部位进行检查，特别注意腋下、腰部、裆部及双腿内侧等可能藏匿凶器或者武器的部位；（六）当盘查对象有异常举动时，民警应当及时发出警告，命令其停止动作并做好自身防范，可以依法视情使用警棍、催泪喷雾器及武器等予以制止。

3. “自由裁量权”

与一位擅长于刑事诉讼的律师聊及此事，他说不要心存幻想。大部分情况下警界都会用“自由裁量权”给警员赋权。

4. 产生屈辱感是正常的

可以确认的是，盘查产生屈辱感和强烈的不适感是正常的。盘查身份证，确实是一种短暂剥夺自由的行为。

盘查在各个国家中都是警务实践中争议比较多、权利问题比较敏感的区域。所以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合理怀疑”为重要前提。理论上，你被警员拦住的时候，你确实有被“合理怀疑”。

英国《警察与罪证法》特别强调，这个合理怀疑的“其理由的充分度应相当于逮捕行动所依据的理由”。

5. 自由裁量权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宽严程度不同。

英国《警察与罪证法》进一步解释：

——警察所基于的正当怀疑的理由，其理由的充分度应相当于逮捕行动所依据的理由；

——正当怀疑理由不能单凭警察的直觉与本能，必须有客观性的东西作为依据，标准是能够使客观的第三者也持相应的怀疑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有相应的事实根据；

——一个人的发型、衣着、肤色或者属于某个群体或有犯罪前科都不能单独成为所谓的正当怀疑的理由。

6.“面子”的悖论

另一位女士，与武定路上这位女生一样，在6月初一次盘查身份证时，不愿意提供身份证号码给警员，警员请女士去派出所，这个被称为“口头传唤”。显然，相比于报身份证号给警员，去派出所，后者时间成本更高，并且可预见的是，去派出所一定会把身份证号码告知给有关部门的。

果然，警员把女士交给内勤人员，排号，轮到这位女士，坐办公室警员表示两点：一是如果你很闲，选择这种方式也可以，“但你看，最后还是要说身份证号的”。二是警员问你要身份证号码，你不给他，他没有面子，他当然要口头传唤你到派出所来。

“面子”是民间用语。被盘查身份证的人士产生的屈辱感本质上也是“面子”问题，正式的说法应该是“尊严”。

保护公民尊严是政府存在的理由。

7. 2016年对“面子”的探讨

多少与面子是有关的。一位中产阶层的体面的北京市民，傍晚去机场接人，被警方怀疑嫖娼。在警车上猝死。当时引起轰动。

有评论者“客观”分析：“如果不起诉，会伤到中产阶级，最后离心离德；如果起诉，有可能让赖以维稳的警察团体缺少安全感，而让他们不能正常履行职责”。

当时看到这个评论很惊讶。我们什么时候不是以是非来判断问题？我们要的唯一结果不应该是公平公正的社会吗？在实现这个公平公正的过程中，肯定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成本包括了个别警员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未来对自己行为的约束。

六年多过去，我们看到这种必要的约束并没有出现。权力更放纵自己了。

这本来是一个规范行为边界的好机会，但很显然最后的结果是向着这位“客观”分析者所揭示的方向走去。最后此案当事人免于起诉。

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如果警员队伍是500万的一个队伍，以500万基数的概率来看，为什么这里不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行为失当引发严重后果的人？如果有几个违法者被发现并受到惩罚，这为什么会导致一个群体不能好好工作，并被“伤了心”？

评论者说的也是一个“面子”问题。

8. “你再说一遍”

警方临时交通管制，市民对此管制有不满，问如何通过，当事警员也有火气，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市民骂警员“傻逼”。警员回应：“你再说一遍。”

这是江湖结怨式冲突。双方挑衅并希图升级时会有这样的对话。

警员职责中包括维持秩序并减少街面冲突，以挑衅激化矛盾为目的的言论，警界管理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更不能挑衅刺激在先，等市民入了圈套再升级无论如何此话不能说出口。

如果说“傻逼”，被认为是辱警，警员直接扑上去将之处理，我觉得虽然严苛，反倒更能理解一些。“你再说一遍”，这种江湖流氓话语无论如何不能出现。

02

警员的修养

9. 善的原则

希望对方向好，彼此有善意。不是希望把对方置于困境。

从道理上说，这不是警民之间关系原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原则。

10. 成为优秀警察的两个美德

《警察：街角政治家》中开宗明义提到：只培养两种美德，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在知识方面，必须理解人类痛苦的本质；在道德上，必须解决达到正义的目的与使用强制手段之间的矛盾。如果一名巡警形成了这样一种悲剧式的意识和道德上的平静，那么他通常会在工作中获得成长，提升自己的信心、技能、敏锐性和警惕性。



《警察：街角政治家》

11. 警察知识的两部分：判断和理解

警察知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判断，用来预测他人具体会如何行动，尤其是要警惕地预见特定情形中固有的危险和不服管束的微妙征兆。做出判断就要形成可以管控 / 不服管束这一概念组，以及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概念的实用程序。

另一部分则是理解，用来解释人的总体状况，特别是侧重于人所遭受的痛苦这一问题。在理解方面，警察在对痛苦的普遍性、痛苦的成因以及对痛苦的补救办法的认识方面存在差异。一些警察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悲剧式的观点，另一些警察则形成了犬儒式的愤世嫉俗的观点。

——《警察：街角政治家》

12. 移情和共情能力

相当多的伦理和道德相关的书中对此有大量论述。这是一个广泛而且基本的命题，也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所在。如果说责任越大，对应能力应该越强。对于一个合格警员来说，因为承担更多的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功能，他应该具备更强大的共情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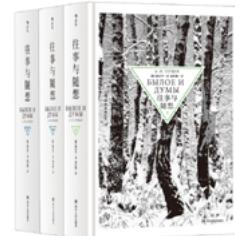
《关怀伦理与移情》

这种假说认为，在某人确定是否会对那些身处困境或有所需求的人感同身受并无私地给予帮助之时，“移情”是一个关键因素。下述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通过移情感受他人的痛苦，人们往往会采取行动来减轻他人的痛苦，而不仅仅是让自己远离他人的悲痛以及他们悲痛的根源。显然，后者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但是，巴特森相信，选择帮助别人而不是逃避，这种动机也可能被解释为隐晦的自我中心主义。

13. 不应该制造恐惧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分析沙皇俄国与英国警务在指导原则上的差别：

每个穷人在走进自己黑暗、阴冷、潮湿的小屋子，关上门后，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这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当然，得到严格保障和全力防卫的个人权利，有时难免成为罪犯的避风港，这也无可奈何。与其使每个正直的人在自己家里像贼一样发抖，不如让机灵的贼逃脱惩罚要好得多。在我来到英国以前，每逢警察光顾我的住所，我便心惊胆战，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从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敌人的准备。在英国，警察来到门口或走进门口，只能增加安全感。



《往事与随想》

减少干预，克制，赫尔岑还提到英法之间差异。英国警员甚至只是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两个人喝醉了酒，在酒店里打架，警察却若无其事，站在一边观看，像一个欣赏斗鸡的旁观者，法国人见了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为什么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进拘留所。他不知道，只有当警察不具备父母的权力，他的干预仅限于被动行事，也就是在当事人要他行动以前绝不行动的时候，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

14. 维持秩序还是“抓坏人”

魏斐德在他研究上海的重要作品《上海警察》（《魏斐德上海三部曲：十年新实验 1927~1937》）中提及警察两大任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困惑也在于此，警员出警，究竟是在以“我”为执法对象，还是单纯只在维持社会秩序。后面我们还会多次提到这两大任务的衍生和延伸问题。

在当代西方，警察的两大任务，执法和维持秩序，是互相关联但却相对独立的。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公安局将这两个方面，即“司法警察”和“行政警察”视为社会控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由于这两方面合而为一，警察在执勤时便一身二任，既是审判者又是指导者——体现了晚清地方行政中的儒家精神（惩罚和教化）。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就要要求警察能同时有效地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然而在上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十年新实验 1927-1937》
(又名《上海警察》)

“开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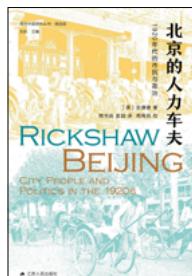
15. “化解人们的恶意”

魏斐德对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上海警界与错综复杂的政界关系梳理中，特意强调两大任务，其时，中国警察制度创立不过三十几年时间。

警察制度创立与现代文明始终相伴而来。同时期，北京警界也对自身行为边界有清醒认识，与小威廉·克尔·缪尔所强调的“街角政治家”的成熟自律和管理模式相近。

《北京的人力车夫》中讲到一个小故事：在北京的日本人吉川幸次郎逛瓷器店，不小心碰碎了花瓶，店主索高价求赔偿，无法说服、报警。警察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这个花瓶本应该值多少钱，古董店老板所说有所不实；但另一方面，因为你的过失打破了花瓶，作为安抚，是否应该赔偿古董这一点老板略高一般卖价的金额？”

数年之后，吉川幸次郎回忆道：“当时我非常感动，不，即使到今天，也仍感动不已。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我感动的不仅是他能引用《史记鲁仲连传》中排难解纷这样的古典语言，而是他把人民的和平生活放在心头，遇到纷争，去化解人们的恶意，使之趋于平缓，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增强恶意。他把视为警察的任务，令我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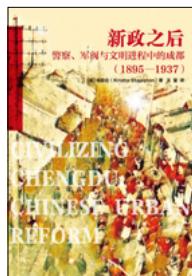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 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6. “开风气”

周善培，大清国成都地方的一个基层官僚。他成为成都警察制度的建立者的初衷与一百多年前大多数投身于国家制度革命的先进者想的问题一样，“开风气”。司昆伦在《新政之后》这本书中解释“开风气”的意义。

周善培像许多其他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常常使用一个词义模糊的短语来表达他对成都改革的意图：他声称他要干的就是“开风气”。从词义上来看，这个中文短语的意思就是表示敞开环境，让新鲜空气流进来。这句话常常被晚清时期的许多精英人士使用，它的意思就是文明化，敞开来接纳“进步之风”。这种对文明化的渴望从本质上来说，在新政时期的许多积极分子来看，是理所当然能接受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地建立了经济和军事强国，对于像周善培这样的官员来说，就足以表明日本的强国发展的道路是进步的、文明的。



《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 (1895—1937)》

17. 周善培对警察形象的塑造

为了培训成都警察，警察局建立了“警务学堂”培养警官，还有“巡警预备营”。周善培亲自编辑了课本，并在学院里任教，军官则在训练营里教低一级的新兵操练步伐和使用武器。

警察局将按一个高度有秩序的、官僚主义体制的方式运转。规章制度对于新进人员的生如订立了严格的规定，新进人员来自诚实本分的家庭。所有的警官和警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文化，其程度必须达到使他们能够填写局里面制作的无数的表格，以便警局能对警员的活动进行监控。警察在当值时遇到一切发生的事件时，必须携带记事本，将其记录下来。

周善培对于培养成都警察的专业作风的概念明显地受到一种忧虑的影响，他担心新式警察会被人与过去一身陋习的衙差和“保甲”局的局丁局勇混为一谈。他订立的规章制度反复地提醒禁止警员进入城市居民的家中，即使是那些有犯罪活动嫌疑的人，在没有获得警局的授权的情况下，也不得进入其家。

警员不得向前来报案的人勒索钱财。违反这项规定将受到的处罚是削去一只耳朵，作为耻辱的标记。

只有当嫌犯在佩有武器和具有危险性的情况下，警员才可使用警棍，警棍的一切使用都必须由下属分局向分局报告。

警员的制服必须突出显示警员所在的下属分局的名字以及他自己的徽号。

订立的规章须公布，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分发出去，鼓励市民向警察局报告警员滥用职权的行为。

行为规范要求警员在执行警务时，要穿戴制服，不得谈笑；对居民说话要有礼貌，要有耐心；走路步态要庄重，只有在特殊情况需要时才能急速奔跑，否则不得随意乱跑；须将辫子盘在头上，前额每七天剃发一次。

警员不得携带或佩戴任何在着装规定中没有明确提到的东西；不得出入招待会、娱乐场合的人群中，除非是去执行监管任务；在执行公务时不得打伞，不得抽烟，不得吃东西，不得饮酒喝水或购买东西；不得进入茶楼、烟馆、戏院或其他“不宜进入的场所”，除非是奉命检查。

警察，不同于衙差，必须要有尊严。

18. 公共服务，开风气与文明的入口

相对于现在警界人士肩负国家稳定之类诸多大任来说，警务之初，开风气往往是小处着手。所谓“新城市景观”——《新政之后》中强调：“从这些措施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国家权利，对于城市的空间进行控制管理有着如下的一些理由：秩序、卫生以及可以称之为东京模式的‘新城市景观’。傅崇矩的人力车生意和周善培的特许区都归因于它们曾大量地存在于东京画面的巨大影响力之中。”

警察局对公共卫生的兴趣开始于周善培对公共厕所的改革尝试。1903 年时的公共厕所只不过是一些沿着道路挖的长坑，有人定期照管，将其掏空，并将掏出的粪便出售给城墙外的农民（他们还上门吆喝，收集夜晚的大小便）。1903 年的为建立警察队伍做准备工作交货环境，警察局监督在这些长坑前面建起了围墙。1906 年周善培为公共厕所的建立标准发布了一套准则，要求它们用围墙将厕所从街道上隔离开来，要有很好的通风条件，专供那些出门在外的人方便之用。傅崇矩在他的《成都通览》中宣称厕所改革是一项不合格的成就，但这可能因为他是一个不大使用公厕的人。清朝结束以后的那几年里，在一份成都警察的期刊里，一个评论员指出民众对周的公厕规定有相当多的反对和不满意。他将其首先归因于一种“公德心”的缺失，其次是警局没有维持公厕的清洁，“已经到了人们一进去便无立足之处的地步”。

——《新政之后》

在国民党执掌上海之后，在卫生局的 17 位检查员与公安局成员之间不断发生误会和冲突。公安局采取了一套专门的规定以管理公共卫生检查员的行为。这些规定显示了公共卫生检查员今后将由警方管理，身穿制服的警官因而会参加在闸北和南市的公共卫生运动集会。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十年新实验 1927~1937》

19. 没有结束的探索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急于建立新制度的周善培们已经注意到警务边界问题的重要。在其后三十几年的警察制度初创时期，不同的人针对——公领域的建立、立法权与执法权、家庭与个体、传统保甲制度等——与警务控制和现代城市文明相关的行为进行了探索和规范。

这些探索的现代化意义深远。它实际上围绕两条线索进行，一是在中国建立一种市民社会——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优先于国家”的概念，二是中国传统乡绅治理的儒家社会解体之后的重构。

这个过程至今没有结束。

有相当多的人注意到上海对春天封控的反应激烈，同时也注意到上海表现出了特别的抗拒，这与上海相对完整建立了“市民社会”有关。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文明形态。

20. 上海“公领域”的形成是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建立的

探讨上海公共空间形成的著作很多，恰好今年读到《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我们举小浜正子的一个研究观点为例：

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发展和高涨的民族运动及其所显示的共同性的基础，则具体表现为由民间社团执行日常公共职能的公领域的发展。

近代上海的公领域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近代性。

近代上海公领域发展的历史背景，是帝政后期以善会、善堂为据点，在中国地域社会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公共性。近代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的活动，或为救济社会弱者，或为缓和都市社会的矛盾，这些都是在以前善会、善堂举行善举的基础上注入了地方公益的新理念，在都市社会的现实与外国文化的影响中展现出了多样性。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公领域具有地方公益的理念，它具体体现在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中，地方自治停止后，则体现在慈善事业和救火会的活动中。

近代上海的公领域并不是对民间势力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的过程中取得对公共事务的权限而形成的。对于民间社团行使都市社会的公共职能，国家抱以合作的态度。由于权力机构只能办理相对小规模的公共事务，因此民间势力在权力机构的支持下掌握了行使公共职能的权限，近代上海的公领域便在这种环境中得到发展。近代上海公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清末民初在地方精英的领导下，上海实行了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机构打出地方公益的旗号，对慈善团体和救火会实行了重组。地方自治机构与这些民间社团的关系良好，重组工作对于城市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地方自治停止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行政权力的空白，

民间慈善团体和救火会便承担起城市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呈现出“自由”和多样化的发展。官方的参与很少，对民间社团的活动也持合作态度；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成立之后，民间社团继续承担救济社会弱者和消防的工作，但是上海市政府开始对它们实行积极的指导、监督和管制，在公领域内，国家和社会进一步相互渗透。

21. 用宪政思维规范警务边界

回头看周善培在成都：

周善培在编写 1903 年成都警察规章制度时，表现出受到了某种宪政思想的影响，在这份规章制度中明显地出现寻求对国家权力的限定。尽管周具有精英政治的思想特点，他写定的这些规章制度中的特征大约仍可归因到他日本明治维新后期警察规章制度的依赖，以它为效仿的模型。1903 年写就的这份公文借助这些词：“有立法权的”“有执法权的”和“有司法权的”来规定了警察局的权力以及权限。详细列出了运用这些权力的每种限制。

警察局有权制订一切涉及地方治安事务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不得妨碍“人民应有合理之利益”。

在 1903 年制订的这份警察规章制度中有 24 条这样的规定。它们主要是对警察的指示，当他们遇到普通公民一方有不能接受的行为时应如何处理，但是他们也须对这类行为进行限制。例如“在公共场所维持秩序的规定”要求那些计划在本市商场或是其他公共场所举行特定集会的人，必须事先通知警方，并获得允许。警察局得到通知后，便会派出一个警察到场执行特别的职责，命令他阻止妇女，不得混杂在人群中。

——《新政之后》

22. 防止滥用警权

因为同样的观念，警察被非常理想化地看作是“民之导师，民之保姆”，因此“故人的我们，人民爱我们”。余秀豪在《警察手册》中强调任何进入警界的人都必须拥有“牺牲的决心”，不存“自私自利之心”。最重要的，警务人员必须严格自律和尊重人民的“自由之权力”，以防止滥用“警权”。余秀豪的关心反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争论问题，即儒家家长制和法家权威主义之间在强调教化和约束方面的矛盾。作为人民的模范，上海的警察还有一套详细的《行政执行法》和完全由他们自己实施的警察条例。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十年新实验 1927~1937》

23. 与传统衙役与保甲制做出区隔

警力的扩充是国家权力扩张的一个明显例证。在帝制时代，与现代警察制度相对应的是对家庭的编制，即将居民以“百户”和“千户”为单位进行人为划分和编整。这种所谓的“保甲制”的目的在于，通过老百姓的彼此监督与治安责任的集体分担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缉拿凶犯。

按照儒家的治国理论，这并非是一种强制手段，而是一种互助型机制。国家不会对家庭的内部权威结构施加干预。从西方视角看，这种通过家庭或团体的责任制来保障秩序的做法似乎是古老过时的，然而在皇权与父权合一的中国文明中，却是不乏逻辑的：行为不端的个体并不会被逐出门户，家庭内部仍然是完整的。

.....

在民国时期，这种状况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方面，通过制定法律，家庭和团体的责任被转移到个体，并由此导致惩罚与家庭的脱钩，家庭不再拥有惩戒和制裁的权力。各家之间的相互监视，被警察对个体的监管和处罚，以及对部分人在西方 - 日本式监狱中的“改造”所替代。

另一方面，是建立农村地区的警察网络，其密谋依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这项举措早在 1901 年之后，当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了。在南京政府实行“剿匪”行动——其中既包括真正的土匪，也包括共产党——的地区，警察和其他治安力量的规模尤其壮大。



《中国革命：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

24. 始终存在的控制与服务之间的矛盾

正如斯蒂芬·麦金农等所证明的那样，袁世凯在建国改革中最成功的举措之一是 1902 年前后在直隶引进了现代警察制度，先是在天津、保定等城市试行，然后扩大到农村地区。袁氏对义和团运动后北京的日本占领区司令官川岛浪速提出的建立

一支现代化的警察总队的计划感触颇深。警察部队在新建立的警察学校接受培养，成为一支职业化的军事力量，专门监控社会秩序。因此，他们与以往京城的禁卫军、街坊团体或差役并不相同。袁氏显然要用这支力量来越过地方精英，直接对民众施加控制。当警察制度改革推行到直隶农村地区之后，一种全新的行政单位“区”便建立起来，以适应监管和收税的需要。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区”并不等同于传统士绅阶层聚集的中心，因此，它成为建国过程中试图削弱、超越地方权力机构的一种典型机构。地方士绅意识到此举是国家要取代其权威，因而极力反击或抵制北京方面控制的警察力量在其家乡地区的扩展。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04

你不了解的居委会

25. 多说两句警界之外的“警力”

保甲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宋代诞生于元朝发育完善的管控社会的一种手段。明朝时继续使用。它的核心在于控制、互相监视。延续至 1949 年。1950 年被废止，居民委员会诞生。近年的网格化管理、重新启用的“十户长制”，被质疑者认为与以“自治”为理念的居民委员会相冲突，是保甲制的新形态。

关于居委会有三点值得确认：一，从诞生之初就是政府职能的一个延伸，与自治本身关联度不大。所以上海在封控之后，称上海的封控是群众自治组织为保护自己的自治行为，引发群众广泛质疑。二，居委会当然不是警务工作的一部分。但就如同朝阳群众这个概念一样，它行使了某种意义上的监视功能，这个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是审慎地交给警务部门来完成的。三，你在封控期间发现它巨大的存在感，只是因为平时你没有机会与它打交道，它一直是个强势的存在。

26. 运动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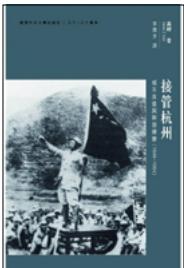
反美运动的首要运作机制是居民委员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里弄委员会”。简称“里委”。到了 1952 年上海的里弄委员会已经惯于组织读报小组来宣传党的政策，解释国际时事，开阔居民的视野，并进行具有政治热情的民众动员工作。在抗美援朝中，里弄居民援助建设飞机大炮的捐款达到 165 亿元。1950 年 11 月至 12 月间，区政府通过居委会组织了 26691 人参加了 742 组巡逻队，次年 3 月巡逻队发展到 6860 组。他们监察着上海 10483 条弄堂，组织夜巡，看护工业建筑工地以防破坏，并把那些已经在街头执行安全巡逻的居民队组织到公安当局领导之下。在镇反运动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及“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居委会成员受命监视邻居，甚至被要求公开揭发自己的双亲。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红星照耀上海城 1942~1952》

27. 与警界密切合作的监视居住

于是，一种崭新的治安体系，即“特控”应运而生，并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社会控制起着重要作用。“特口管制”，即“特控”制度的设计，是根据“可疑”人群的危害程度，将其分为两类，三等。进入“特口”名单者常常并不逮捕，而是由其心甘情愿区严密监视。镇压反革命运动前，杭州市的“特控”名单上有 13048 人。其中，约 8000 人为原国民党党员或士兵。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后，“特控”人口降为 3016 人。1951 年 7 月，杭州市军管会决定释放 277 名反革命分子，并将他们移交给 56 个居民区，“管制”一到五年。在此期间，被“管制”者被剥夺全部或部分政治、经济权利，并必须在居民委员会和群众的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



《接管杭州》

28. 警界的线人系统

王晓明在《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这篇文章中对居委会大妈在生活中存在感减弱表示一种审慎的支持。但随着“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再度在市民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居委会的功能也再度强化。

最近 20 年来，社会的确是逐步在向外开放，经济的确是空前地活跃起来，即以上海来说吧，耸起了那么多高楼，开张了那么多商店，还来了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你走在淮海中路上，真会觉得上海和东京、香港也差不了多少。与 1970 年代相比，今天的个人空间似乎也明显扩大了，居委会大妈不再上门来盘问你家客人的姓名，你也尽可在与友朋喝茶时乱发牢骚。户口、国家编制、鲜红的公章，这些昔日牢牢箍住你、使你不敢须臾脱离的东西，现在似乎都有点贬值，即便少了一两样，人也照样能够生活。政府已经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现在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个流行的“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似乎确实可以解释当代中国——至少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选自《九十年代文存》

29. 居委会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副面孔

事实证明，王晓明在历史趋势上可能表现得过于乐观了，而另一方面，尽管九十年代物业、产权等私有财产相关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委会的存在感，但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只是没有机会与他们产生关联。另一位学者陈云在她的《“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行动》中为我们记录了一个九十年代末到世纪初的武汉普通居委会里针对低保人群的“十八不准”。

- 1) 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实际生活水平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 2) 不按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及人员就业状况或拒绝核查的；
- 3) 非因拆迁购买商品房或现已有住房又新建（购）住房的；
- 4) 家庭拥有或使用机动车辆（残疾人专用车除外）的；
- 5) 有高价值收藏或投资股票、商业保险或其他投资行为的，使用柜式空调、穿高档名牌、经常在娱乐场所消费的；
- 6) 近期新增（含赠送）金银饰品、古玩字画、冰箱、空调、计算机等高档非生活必需品的；
- 7) 家庭月人均电费超过 15 元（7、8、9 月超过 20 元），月电话费支出超过 40 元，家庭成员使用手机、小灵通（含他人赠送或暂借）的；
- 8) 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或到普通高中就读“调节计划生”“三限生”“特长生”，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就读民办学校，或上各种艺术类特长培训班等；
- 9) 家庭养狗及其他高级宠物的；
- 10) 家庭成员主动放弃合法收入或合法赡养、抚养，抚养人有能力改造赡养、抚养、扶养义务而没有履行，导致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 11) 当事人在法定就业年龄段内且具有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一年内两次介绍就业而拒绝就业的，或一个月内累计两次无故不参加社区、街道组织公益劳动的，半年内累计两次未到社区居委会签字盖章的；
- 12) 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难以核实的；
- 13) 有打牌、卖淫、嫖娼、吸毒、偷盗、计划外生育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 14) 无理取闹影响公务，对工作人员打骂威胁的；
- 15) 在外区居住户分离者和外地到本地就读的在校学生；
- 16) 群众反响强烈、居民评议小组评议不通过的；
- 17)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因上述原因被停止保障未满 6 个月的；
- 18) 其他不符合办理低保条件的。

这个社区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经是卖走私香烟的一个市场，后被政府取缔。陈云在“十八不准”的记录之后，特意强调：“而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以前卖过烟的一律不能享受低保。”

她评价道：

一个“享受”二字，把政府部门那种居高临下的施惠者形象表现得一览无余。这与中国传统救助理念的施恩思想不无关系。对社会弱者的照顾本应是现代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倒像是政府在向其人民施舍，而且还要求人们得了政府的好处要知道图报。例如，在《武昌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中有如是规定：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如在一个月内有两次拒绝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停发其保障金（至少半年）。在为官者看来，“这些人得了政府的好，总应该回报社会吧”。总之，把参加义务劳动作为享受低保的附加条件是各地普遍的做法。

——《“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行动》

30. 十户长制

《温州日报》一篇报道（节选）

去年以来，仰义街道探索的“十户长制”，通过一路“下沉”和不断升级，在共建共治中构建起合纵连横、通达上下、和谐左右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近日，该街道被列为全省首批法治化综合改革试点街道。

“十户长制”起源于 2020 年初的疫情防控，当时，为精细化布控疫情防控工作，仰义街道在辖区村居创新推出“十户长制”，即以十户为单位，择优推选信用基础好、群众口碑高、干事责任心强的“户代表”为“十户长”。在辖区内 14 个村居“任命”406 名“十户长”。“十户长”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围绕疫情防控传播政策、摸清底数、稳控情绪、健康监测……积极发挥了守护村民安全的贴心“大管家”职能。疫情形势好转后，“十户长制”被保留下来，并逐步完善成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固有制度。

“把人员分布切割成块，开展分块服务，块与块之间互动相连，实现服务及时性、精细化、可共享。”仰义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克介绍，经过改良与更新，“十户长制”如今升级到了 2.0 版本，被广泛运用到安全隐患联防联控、社情民意联传联达、环境卫生联管联治、增收渠道联建联营等十个领域。（《温州鹿城区仰义街道“十户长制”引领共建共治》，张琳、胡晚露，《温州日报》2021.8.12）

05

谨慎的“街角政治家”

31. “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

一位核酸检测阴性并拒绝警员非法转运的年轻男子，对那位威胁株连他家三代的警员说。

32. “他儿子就是他的软肋。”

33. “他们找了我的父母。”

一位因为发布了警界认为有害于稳定大局的文字工作者，知道自己会有一些麻烦。他没有等到警员来找他，但是等到了父母忧惧地问他做了什么事，居然让警察找上门来。警员大约认为这是最高效去管理一个不安分子的方式吧。另外一种软肋。

34. 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家

回到警界话题。套用小威廉·克尔·缪尔的“街角政治家”理论，它的核心观念是执法者如何审慎使用自己的权力，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一种和谐，减少冲突，保持“不失控”的状态。警员相当多数时候都是独自面对棘手问题，即使有伙伴在旁边，通常来说他们面对复杂而且变化迅速局面的反应时间一般也相当短暂，所以才有“街角政治家”这样的说法。前面举的三个例子，第一个广为人知，引起轩然大波。第二个并非来自警界，而是来自社区，他们表达了与警界合作的“渴望”——把当事人关进小黑屋几天。第三个在特定人群中，屡见不鲜。但它们都从一定意义上展现了一种面对棘手问题的谈判筹码和手段：以威胁为主。

小威廉·克尔·缪尔在对美国警界调研中提及一些另外的手段，贾斯蒂斯，是他针对警界的田野调查中一个重要的调查对象，同时他也是一个成功解决多个问题的警员。贾斯蒂斯的一些说法，或者可以成为警界参考。

35. 不应该异想天开

贾斯蒂斯对人类状况的观点与他所抱有的有限目的意识有关。他本人的道德计算体系满足于差不多就行。他并不觉得自己负有任何实现全面改善的责任。他不信奉乌托邦式的或完美主义的标准。他只要求自己提供有限的帮助。在他看来，人类遭受一定程度的苦难是不可避免、无法根除而且也许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为警察能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一个街区，或使另一个人重获新生的想法是自命不凡和异想天开。贾斯蒂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问他为什么违法分子有时候会改过自新？他说“我确实见过一些人洗心革面，但是这不一定是我努力的成果。依我看，如果某个家伙真的改过自新了，那可能是因为他开始有责任感了，比如可能是结婚成家了。他改过自新更多是靠他自己。”

36. 满足于不完美

在贾斯蒂斯看来，他满足于不完美有两个原因：长远利益以及是非的复杂性。

“后天会是什么样？”这是一个长期性问题，是对一切自命不凡的想法的当头棒喝。纵然有朝一日世界变得完美起来，除非它能在出手拯救它的人离开之后仍然能够自我运行，否则之前千辛万苦就是白白浪费了。历史的长度要超过幻想中的救世主的寿命。生命中的矛盾和弱点会卷土重来。

37. 贾斯蒂斯认为好警察的世界观

有大局观……他们着眼于大局，认为自己不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么做会对社会趋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要大谈什么“我一天里逮捕了 15 个人”，而是要对整个体制进行质疑。羁押一个醉汉有什么益处？他最关心的固然是手头拮据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他会一直牢记大局。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考虑他所做的事情应该如何适应大局？比如，你奉命去处理家庭纠纷，当妻子的要你马上把她老公给抓起来。遇到这种情况，我佩服的警察就会考虑，要是真的把她老公抓了，那么谁来养家糊口呢？你得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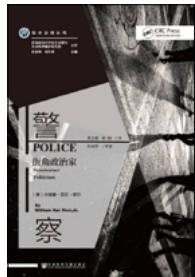
38. 警员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对夫妻自己的问题必须由他们自己设法解决。警察可以制止纠纷，但是却解决不了导致纠纷的原因。贾斯蒂斯的目的不是一劳永逸地给某个家庭

带来一辈子的和谐，而是能够防止当前的家庭关系不要过分恶化，这样各方就还有机会来弥补，这就足够了。让家庭这个社会单元继续运转下去，然后由偶然事件、冷静的事后思索或新的信息自由发挥作用。这诚然算不上什么壮举，但是在贾斯蒂斯心目中，这样做却是明智的。

39. 警员不是警察机器的一部分，他应该知晓自己在社会中有多个角色

因此，警察责任的限度之一源于贾斯蒂斯认识到，永恒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而警察责任的另一个限度则源自一个复杂的道德思想体系。贾斯蒂斯始终牢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的工作是“全局性”的工作，由多个部分组成：自己既是法律执法者，又是福利工作者、心理医生、维护和平的人员、法律的执行人，同时还是警队成员、居家男人、一代人中的一个成员。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个角色之上，而是在所有这些角色之间求得折中妥协。



《警察：街角政治家》

06

保持谨慎，同样是警界问题

40. 不作为与“我也很无奈”

如前所述，街角政治家的手段和处理问题能力来源于“政治”生态。我们还是拿一个非警界的案例来说，春天时一个广为流传的录音，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李老师，我真的很无奈。我比你更伤心。您仅仅是一个家庭，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这个街道基层干部的声音被认为是良知。我也认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在封控前后，我与多个街道基层干部打过交道，他们有的很严肃，有的有点愤世嫉俗，有的也很焦虑，但如果说有共同点，我觉得是都不乏良知。知道有些东西不对，知道了问题……但要有所作为？对不起，另一个共同点是，不作为。哪怕带着哭音。每个人都无奈。李老师问题的解决不是这位街道干部的良知化为了行动，而是这个录音大面积流传。而这个录音发生在4月初，之后又有多少荒唐事？

41. 你可以投诉

11月底，上海地铁里警员检查手机。被检查者曝出他们之间的对话，其中一句是：你可以投诉，但我们还是会检查。

你可以投诉，但我现在就要做这件事。这样的事在封控期间比比皆是：非法进入家里消杀的时候，非法限制自由出行的时候……当然没有人接受你的投诉。你一味投诉，可能还会被定义成是寻衅滋事。

42. 不要违法

郑州村镇银行储户去郑州讨说法。有疑似警员打电话给储户，很客气，警告到郑州的储户不要违法。储户告诉这位疑似警员：应该不要违法的是你，你打听我什么时候离开是不对的。你应该告诉银行不要违法。你盯梢我是违法的。

43. 还有一点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呼吁：枪口抬高一寸。这东西敢情好。感觉都会产生一个共同体了。我曾经表达过，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都是被枪指着的人在呼吁抬高一寸，拿着枪的人并没有任何表达。

44. 人人都懂的道理

如果普通人能懂，警员当然也懂。如果每个人都有良知，警员当然也有良知。他们在平均素质上不会差。但在强大的官僚机器启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认为，警员在保证个人修养的前提下，更应该考虑问题的是警界层面。

45. 园丁思维

研究大屠杀背后现代性因素的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官僚体系、现代文明的高效率反噬了现代文明本身。他引入“园丁”这一概念阐述现代思维。

现代的种族灭绝总的来说就像现代文化一样，是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做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件。如果花园的设计有对杂草的界定，那么有花园的地方就必然有杂草。而且杂草必将被清除。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它与其他建造和维持完美花园的活动在类别上没有什么区别。所有将社会视为花园的看法都会使一部分社会栖居地被界定为人类的杂草。就像所有其他的杂草一样，他们必须被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并被保持

在社会的界限之外；如果所有这些方法还不够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被杀死。

现代文化是一种园丁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实际上，它是通过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生自发性的不信仰，以及对一个更优越的当然也是人工的秩序的渴望来界定自身，来界定自然，来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除了全面的计划之外，花园的人工秩序还需要工具和原材料。此外，它还需要保护——以抵抗显然是缺乏秩序造成的持续不断的危险。秩序——它首先被视为一项设计——决定着什么是工具，什么是原料，什么是无用的，什么是无关的，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野草或者害虫。它依据与自身的联系把世界上所有的元素进行了分类。这个关系是它赋予这些元素并且为它所许可的唯一的意义——如同本身被分化了的关系一样，这种意义也是解释园丁行为的唯一正当理由。从设计的观点看，所有的行为都是工具性的，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



《现代性与大屠杀》

46. 行为的中介化

“和受害者在身体上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鲍曼引用米尔格拉姆著名的电击实验来论证行为中介化之后，一个无责任、无理性的世界。

他假设，残酷不是残酷的个人之所为，而是力图脱卸他们普通义务的普通男男女女之所为；他发现，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那些在内心确信他们憎恶偷盗、杀戮和攻击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在权威的命令之下相对从容地干这些勾当。而个体自我行事时不可设想的行为在完成命令时毫无犹豫地得到执行。”

……

“在被试者和电击受害者的结果之间插入任何力量或者事件都会使参与者降低他们的紧张，并因此减少违抗的数量。在现代社会，常有其他人站在我们和那些我们也有份的最终具有破坏性的行为之间。”

事实上，我们这个理性的社会最突出也最自豪地展示的成就就是对行动的中介化，在权威等级描绘与划分的阶段之间将行动分离，并依据功能的专门化切割行动。米格拉姆的发现的意义在于，理性的进程内在地、不可避免地促进了结果是野蛮和残酷的行为的产生，即使行为的意向并非如此。行动的组织越是理性，行为就越容易制造痛苦——而个人却保持着平静。

47. 要全社会承担的结果

齐格蒙·鲍曼的妻子珍尼娅·鲍曼是集中营生还者，齐格蒙·鲍曼称，“她的那本《晨冬》回忆了多年来人类的邪恶，为我开启了我们通常拒绝注视的视野”。他引用了《晨冬》中的一段话，作为他关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由和初衷。那段话是这么说的：“残酷的极致是在毁灭受害者之前剥夺他们的人性。抗争的极致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坚守住人性。”

他为大屠杀总结了教训。

我们在这里引用鲍曼的严肃的、非人的、残酷的历史事件分析，并非认为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了大屠杀这样的悲剧，而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与大屠杀的产生机制有相关性。这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是有必要记住这两条教训。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众，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轮到我——激励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

……

大屠杀还有另外一个教训，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如果说第一个教训包含的是一个警告，第二个教训则呈现出了希望：也正是后者使得前者有不断被提及的价值。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有人被迫这样干，也有人不屈于压力，因此不能把这样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身上。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

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有人问，为了使邪恶被囚禁，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反抗之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时戛然而止？

48. 与机器的战争

我们面对的是机器，官僚机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以大局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他们只是不想以人的名义。

罗素喜欢探讨这样的问题，我们拿过来一段。

当我们说国家是一个有机体时，所用的是一种比拟，但如果不能认识到比拟的局限性的话，那么它可能就是危险的。在严格意义上，人类和高等动物都是有机体：凡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善或者恶，都是发生在作为个体的他身上的，而不是发生在他这个或那个部位上。如果我牙痛，或者脚趾痛，感到痛的是我，如果没有神经连着我大脑的相关部位的话，这种疼痛就不会存在。但是当一个赫里福郡的农夫遭遇到了暴雪的时候，感到寒冷的并不是伦敦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个体的人才是善恶的承受者，而一个人身上的任何独立部位或者任何人的集合都不是善恶的承受者的原因。若认为在不同个体的善恶之外，人类集体也有善恶，那就错了；而且，这是一个直接导致极权主义的错误，从而是危险的。

“国家”是一种抽象物；它并不会感受到痛苦或者快乐，它没有任何希望或者恐惧，我们认为是国家目的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掌控国家的那些个人的目的。当我们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特定的某些人取代了“国家”，他们拥有的权力比大多数人所享有的多得多。由此，对“国家”的赞颂实际上变成了对少数统治者的赞颂。没有哪个民主派能容忍这样一种从根本上来说不公正的学说。



《权威与个人》

07

更广泛的范围内，保持一种谨慎

49. 紧急情况分为两种

我们还是从周善培，这位光绪年间的现代警察制度建设者的忠告入手。

周善培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告诉过街正们，他们身负重任，在街坊上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便是去完成拆除雷管这项艰难任务的人。

他解释道，一般情况下，遇到公众纠纷，警察快步上前终止，但是遇到政治危机时，他们的这种快步上前的行动就会造成误解，导致严重的冲突发生。

据周的回忆录所说，街正们十分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协会领导者们为城中居民因罢工而遭受到的困难提供帮助，警察局也同意暂时停止向戏院收取强征的税款，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保持新政机构的运转，例如，警察在保路运动期间就淡出公众的视线。于是，在成都，在新政和铁路冲突之间，一直维持着一条清晰的界线。



《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

50. 警惕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一位警员在处理上海街头事件时与街头群众说：“我只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民群众。”他应该了解一下周善培在一百多年前的智慧。警员与现场群众是不对等的，现场群众可能会有激烈口号，但警员的职责应该以稳定事态为首要目的。警员应该谨慎面对政治问题。英国一位警务出身的政客，他有丰富的处理伦敦街头事件的经验，他说：

“仅因为街上几个小时的骚乱，有些人似乎就极力要牺牲我们受世人羡慕的管理模式。”他呼吁保留与人民为友的警务传统，不要与人民为敌，称塑料子弹、催泪弹、新的拘留中心是“不人性的”，他警告说：

“一旦我们向公众宣战，警察就成了暴力的受害者。”



《英国警察：权力与政治》

51. 避免无原则站队

很多时候，警员出警应该是维持秩序。有些人对某些东西不满，有所表达，他们所主张的、所反对的本来与警界政策和警界作为无关。警界应该以维持秩序为己任，避免出现过激行为。

当然，如何理解过激是一个更根本意义上的问题。目前的考量标准似乎是只要表达不满，就是过激。

而且，政府各部门之间，很容易形成一个共同体。这在传统戏剧和评书里叫“官官相护”，是最不得的一种官僚生态。这是另一个更根本意义上的问题。

安徽某地，因为教育政策导致某些教师不满，去教育主管部门上访，警察维稳，驱散并且限制部分领头人的自由，“配合调查”。未几，教育主管以及主管之主管，调整政策——也就是说，警界所维护的教育主管部门自顾自地承认了政策漏洞，予以纠正。

警界感觉委屈，在自己控制的微博上发了一个黑锅图片。

显然，含意是我们替教育部门背黑锅了。

52. “警情通报”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蓝底白字的“警情通报”。现在，每个政府部门都可以直接发微博面对公众，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去中介（媒体）化的行为。去媒体化当然可以更高效地面对公众，但这其中有两个弊端。

一是公众是原子化的存在，他们并没有有效地质疑能力和空间；

二是媒体本身尽管公信力上也不断被质疑，但它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在形成报道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甄别客观性，并尽力保持公正平衡报道。

在去媒体化之后，直面公众的警界，虽然获得了信息发布的主动，但也因此被推到最前面，一旦有“背黑锅”这样的情况出现，警情通报伤害的是警界的公信力。

相当多有争议的涉警事件，警情通报并不是最有说服力的文件，它也从来没在关键时候起到最稳定的功效，往往是上级部门或者更高级别的媒体去把一件事情说圆，而最终效果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造成塔西佗陷阱的机率远远大于背后高效率传播、一锤定音式解释和局面稳定的诉求。

53. 公众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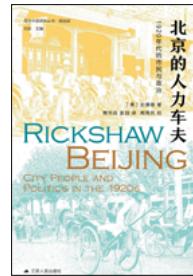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警情通报除了要披露“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之外，警界的声明或者对外界公开的信息还是一个进入到公众舆论中的一个信息。所有信息在其中都是平等的，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公共空间。警情通报是不平等的。质疑警情通报，目前十有八九会被认为是寻衅滋事。这不利于公共空间的形成。

《北京的人力车夫》中注意到人力车夫们的公共表达，以及警界如何面对或者称疏导这种情绪：

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乔治·盖茨说道：“对于一个非正式的公开法庭来说，在中国总会有‘芸芸众生’时刻准备着下判决书。”在街头和其他公共场合，人们“总爱凑热闹，毫无顾忌地使用特权；对公共场合发生的事情口无遮拦”地评论。而车夫们总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委屈，在公共场所的“非正式公开法庭”上诉说成冤情。正如老舍所言：“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叙说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另一处。”

……

车夫们想要开展有效的政治行动，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他们与北京居民，与公私权力机构以及互相之间，却零距离接触。在白天的商业活动中，夜晚的饭局、看戏，以及政治集会时，他们就成了人群之中的另一群人。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弱势，使他们对城市社会政治团体的管理方式和人们参与政治的途径十分敏感。他们在养成桀骜不驯的习惯和不时在街头上演同仇敌忾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更广泛、更激烈的政治基石。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这些自我意识和组织管理的要素集合起来。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54. 必要的警员测试

《警察：街角政治家》中提及美国警员申请进入警察局时会进行若干项测验，包括“奥蒂斯自我管理智力测验和陆军普通分类测验。不论其价值如何，他们各自在接受任命时同样提交了仿照第 21 个问题的权力主义法西斯倾向量表（F-scale）”。中文版翻译在译者注中详细解释了这个测验的具体内容。

二战结束前后，阿多尔诺（Adorno）等人在加州大学做了一个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人格根源的研究，即威权型 / 权威型 / 权力主义人格。

研究者认为，“对法西斯的宣传表现出极其敏感的那些人彼此之间具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所表现出的众多特征，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症状’。”可以称之为法西斯综合征。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不一定是公共的法西斯分子，或者也并不认同那些明目张胆的法西斯观点，但是他们是潜在的法西斯宣传易感人群。一旦客观情境发生变化，他们可能就倾向于支持法西斯主义，将法西斯主义付诸行动。这种作为行为的准备状态的潜力，就是威权型 / 权威型 / 权力主义人格。

研究发现，反犹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很高的相关性；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与反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即自由 – 保守倾向光谱上，左端与非民族中心主义或反民族中心主义相关，右端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最终形成的法西斯倾向量表，量表中并不外显地包含民族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涉及任何少数民族的陈述，但是能够测量偏见、法西斯主义的人格倾向。

55. 谨慎使用暴力

长期以来，关于美国警察执法中使用枪支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这与美国本身枪支暴力问题相关，也与我们片面强调几个典型的、影响力大的执法暴力有关。《警察：街角政治家》从警员和警局两个角度谈及枪支使用问题。

然后他（当事人）就威胁我们，说要去拿猎枪……按照法律规定，我本来可以把那老头儿给崩了的。我当时面临严重的威胁，原本可以开枪打死那个嫌疑人。可是我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朝任何人开过枪，连一枪都没有开过，而且我也希望自己永远用不着开枪打人。可是，我当时不开枪，就有可能导致自己或他人面临生命危险。我们那次真的很幸运。要是这种事儿是警察生活的常态，我当即就会辞职。

这是警员对生命问题的思考，他觉得为了这份工作使用枪支是不值得的。而警局在规定中也特别强调：

对人类生命的庇护是构成警察部门规章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警察局的政策是，警察部门的所有成员必须在穷尽一切手段而无用时，方可使用枪支。”

56. 另一种“自由裁量权”

接受小威廉·克尔·缪尔田野调查的警察局长强调“抓人是无能的表现”。局长的观点是“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抓人”。不仅如此，局长还特意强调，因为某些各类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拒捕）而大量抓人是无能的表现。在他看来，为逮捕人数规定定额是令人不齿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他的警察局里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毫无疑问，在我们正在研究的样本中，大多数年轻警察持有和他一样的看法。只有 5 个执法型警察，坚持认为，逮捕人数多少和警务工作好坏实际上就是一回事。

08

警权的延伸

57. 机器控制社会

前面说及居委会、十户长制、网格化管理实际上已经在探讨警权延伸问题，他们一定程度上扮演的是警员的角色。这里我们说的不是编外警员问题，而是除了“人”之外，各种机器的使用。

机器反噬人类是从 19 世纪弗兰肯斯坦开始一直存在的人类恐惧。

在 11 月底上海警员检查手机软件、照片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些人认真地思考了不带手机的可能性。结论是尽管不方便，但总的来说是可行的。在此前多年，人们对手机应用的方便性持认可态度，虽然它让渡了相当多的安全和隐私需求，但人们并未因此产生太多的恐惧和被威胁感，可见，机器本身是否成为问题，背后的因素还是人和制度。

58. 电视摄像机是一种武器

这个无须多说。在几年前，我们曾经试图以摄像头的数量泛滥为题材探讨隐私话题，但显然在编辑部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人认为并未造成冒犯，有人认为公开场合无死角提供更多安全感……对于很多人来说，摄像头属于“出生即有”的存在，它视为理所当然，很难产生太多质疑。

英国反暴乱专家理查德·克拉特巴克少将已经明确表达了目前占正统地位的主流观念：“电视摄像机就像是一种存在于大街上的武器。任何一方都可以使其为己所用。如果政府用它来鼓励其官员、警察和军人去帮助媒体人，并且回答媒体的问题，那么这将比任何形式的审查或政府管制都要有效。”

59. 网约车里的录音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公共场合，所以录音是正常的。并且这些录音是对司乘人员的保护。每当有网约车案件发生，录音都会提供破案线索，让人认为录音是保护的一种手段。唯一问题是，它让渡的是所有人的权利。

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做，为此付出多高代价合适，这是一个问题。



《媒体，国家与民族：政治暴力与集体认同》

网约车案件没有想象中那样高发，它只是会被“放大”，因为它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费和生活场景，很容易被以“同理心”的名义设身处地被想象成为自己遭遇的一部分。

似乎正确的思考方式是：如果每天有一百万单网约车业务，一天中有一起与网约车有关的大案发生，它是否远远高于正常社会的案发率，是否值得为此加大干涉司机隐私力度。在 2022 年的清零闹剧中，很多人懂得最重要道理是，为抓一个阳性，牺牲几千万人的自由——这是可以计算、并且应该被计算的。否则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到困境当中。

我们同时还知道一点，对于警界来说，任何一个有关网约车的案件都可能会引发舆论关注，如果不能如期破案，会对它们的声誉造成伤害。对于警界来说，即使是亿万分之一概率发生的案件，也是有一个算一个的大案，在这里没有概率之说。那么，给每一个网约车装上录音录像设备——既不增加警界成本（因为集中采购和特许、标准等可能还会有寻租空间），又有利工作，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那么只要渲染夸大网约车乱象就可以解决一系列所有问题。

60. 如何定义公共空间

《特里盘查》书中提及一段与公共场所窃听相关的隐私案。很明显一点，这是窃听。即使它公开地跟你说，“录音设备已开启”，但本质上还是窃听。

1967 年，一名叫卡茨的人因在电话中传播赌博信息而遭到逮捕。在对卡茨的审判中，控方出示了对卡茨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录音是通过对卡茨使用的公用电话亭安装窃听设置得到的。对于此次窃听，办案人员没有取得搜查令及任何法律文件。检控方坚持认为电话亭是公共场所，不受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无需搜查令就能进行窃听。

主审此案的大法官斯图尔德认为，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们正当的隐私权，保护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地方。即使一个人身处公共场所，但如果他不想把自己的某些行为或物品暴露给公众，那么他的这种隐私就应当属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畴。当卡茨进入电话亭关上电话亭的门的时候，他希望享有的权利是他的电话交谈不被外面的人听到，简单来说，他不应被窃听。所以侦查人员窃听来的录音属于非法证据，法庭不予采纳。

卡茨案的意义在于，它扩大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对普通公民的保护范围，让人们在公共场合中也得到隐私权的保护。而且它采用合理期望标准来判断每一个具体情况是否属于宪法的保护范畴。按此标准，只要当事人在处于某一空间时，主观上期望隐私，同时这种期望又被社会认为是合理的，那么这个空间就属于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地方。

61. 电子监控的后果

一本署名米歇尔·福柯的书，《监狱的“替代方案”》，里面实际上只收录福柯一篇文章，其它几篇都是福柯监狱理论的延伸。其中有一篇为《“监控下的住宅”——与托尼·费里的谈话》，对话发生在西尔万·拉弗勒和托尼·费里之间，时间是新冠疫情之后。欧美知识界对于警权等公权力始终保持一种高水平的审视。

我们有必要指出电子监控造成的后果，尤其是：

将一种封闭的维度引入开放空间之中，使监禁行为成为自由生活的共同外延；将一个不可让与的场所，如处于一系列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条文保护下的住宅，变成了一个刑罚的执行空间、一种监狱、一个痛苦的居所，废除了公领域与私领域、犯法与非犯法的习惯界限。将个人领域转变成刑罚机构的分支；

以刑罚调整为借口，允许刑罚机构僭取额外权利，以便 24 小时全天候侵入受刑人的住宅及其身体，允许刑罚机构在个人住宅内部与私生活之中摧毁受刑人的隐私权维度；

对电子脚镣佩戴者的判断力、兴趣、历时性、性情产生了持久性影响；有必要时潜移默化地、通过产生日常的本能压力影响了他们的健康状态，这种影响也会在职业活动与家庭生活方面奏效；挑唆受刑人与伴侣或家庭成员之间争吵，加深其关系裂痕，因为他们责怪受刑人延误报道或切断警报器之时就参与到了监控体制当中；通过将痛苦藏匿到视线之外，受刑人的生活内部，否认或掩盖了这些场所的痛苦。

在简单的规范化动作之外，还对被置于监控设备之下的人产生了去人格化、去主体化、去自主化的效应；以本质上刻板的、无形有、数据的、循环的、算法的交換作为索引，形成一个机械和技术的框架，替代那些在情理上前途无量，且由人道和教育援助支持的许多方案；声称探求主体性的客体化、时间性的空间化、感性精神的几何化、存在感的测量或量化，也就是说对个体经验的程序化，对生命绵延的同质化，将内在生命压缩为钟表式的平庸自动性；让质性的存在屈服于一个指令的、演

算的、可追踪的系统，这个系统还是由其他事物来操作的，即一个外部的控制与监测机构，这种屈服如同一种异化体验：将主体性同化为千篇一律的日期更替，将生命贬低到输入与输出的“演算”层级后同化为机械的重复；通过颠倒结构（机构，空间）和状态（情感、心理、人际关系的维度）之间的实体建筑关系来重构监狱的高墙，因为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看，禁闭的感觉（状态）来自围墙（结构）中的幽禁，显而易见，在开放环境中，被电子监控抵押在家、屈服和听命于一个可追踪的限制（即反射于情感中的日常被监视和必须时常报道的感觉），导致监狱高墙在受刑人内心和身边的重现（结构）；……

粉碎了以下基本区别：内部与外部之间（因为在“在家里监禁”和“监狱在家里”成了一回事）的基本区别，相对空间与绝对空间之间的基本区别、美学（词源学意义上的主体的感知）与本体论（存在的物质和环境条件的意义上）之间的基本区别。



《监狱的“替代方案”》

62. 手机的配合

行程码的使用和争议，每个人都意识到让渡巨大隐私的后果。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没有被告知处于监控状态下的普通人来说，它显然具备了电子脚镣的功能。

63. 虚构的监狱

我们正在进入一种虚拟监狱之中。这种状况随着电子技术不断提升，从政府到技术公司到知识分子与社会批判者都有所警惕。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

杰里米·边沁构思出来的圆形监狱是一种围绕着中央瞭望塔的环状监狱。所有的犯人会因认为自己时时刻刻受到监视而不敢造次。

福柯指出，那些监控并记录我们的一举一动的国家行为创造了虚构的监狱，让公民出于被掌权者监视的恐惧而限制自己的行为。这一理论认为，监视的视线能够和铁镣铐一样有效地控制大部分人的行为。那些撰文探讨隐私和监督的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引用圆形监狱理论来证明，大规模监督造成的一大伤害就是社会控制。



《谷歌化的反思》

64. 福柯理论在新冠时代的延伸

新冠病毒流行所暴露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执政者对它的应对处理方式，通过大量轨迹追踪和地理定位这类设施，说明了接受和应用的最佳条件。

在这一点上，吉尔·德勒兹和福柯解释说普遍化监控几乎不可察觉地安置在了我们社会之中，这正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它来自社会集体大部分成员对这场大规模强迫的主动或被动参与。也就是说，要利用经过强化的、全面的监控机器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殖民，其最佳手段不只是怂恿人们的认可，而且还要激发他们的积极贡献。出于这一目的，利用“死亡恐惧”就成了非常有效的权力策略。

——《监狱的“替代方案”》

65. 禁用手机处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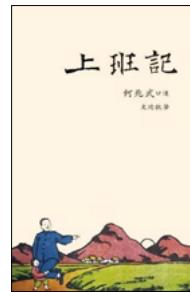
一位因为寻衅滋事而被行政拘留 15 天的人说，他在放出来之后的 15 天，是禁用手机的。因为禁用手机，他的社交网络、工作都受到限制；因为是处在 72 小时核酸有效期那段时间内，所以他也没有可能去乘地铁、出入任何需要扫场所码的地方，包括公共厕所所在内。对他的处罚，无形当中变成 15+15 天。

66. 虚拟还是真实的监狱

2022 年 11 月，一个微博上的帖子引起注意。有位在校大学生提问：听说以前大学是随便出入的？这引起疫情三年里，过了一个“假”的大学生活的感叹或者调侃。封

闭的无法自由出入的学校某种意义上就是监狱的隐喻。它甚至不是虚拟监狱的隐喻。不过，虽然有众多评论者感慨现在大学校园生活的封闭与沉闷，但封闭的大学校园并非疫情时期才有。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把丰富、自由的大学气氛当成特例；监狱一样的控制才是常态。

在西安的日子基本上还算平静，只有 1955 年赶上了抓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刚解放时的“思想批判”确实大有不同，从思想问题升格为了政治问题，整个的气氛也紧张起来。比如学校里规定，不许出校门，我对这个的印象非常深。因为有一次我的鞋破了，我忘记了这项规定，拎着一只鞋准备到校外的小摊上修，结果走到门口被警卫拦住了。按里说，这是限制人身自由，应该是违法或违宪的——不过那是资产阶级的法学观，无产阶级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革命的需要”。不能修鞋，那么只好服从了。



《上班记》

09

泛警员化倾向

67. 警惕泛警察化倾向

全民警察，可能有主动的成分，也可能是被动化的。比如“告密”，这是一种典型的泛警察化的倾向，与它一致的是“举报”。自己不喜欢或者不认同的观点，举报。它背后的逻辑是凡事由强权解决，爸爸最公平，父权最威严。我们探讨的所有警务问题，如果说有所批评，其中一个重要指向是它与父权的结合。

68. “告密”

“永远相信你的感觉”。鼓励告密是一种文化。并且也并非是中国年轻人身边多了一个举报按钮就更容易做出这种选择。可怕的是，全世界也都是如此。

现如今的美国大学生都出生在 2001 年九一一之前后，成长于自此后的担惊受怕的日子里，这显然毫无益处。自从那可怕的一天开始，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发现可疑状况，要及时举报。”……（如广告）新泽西捷运正在向乘客灌输情感推理的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

“如果感觉不对劲，那很可能是真的。”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69. 可以殴打一位法西斯主义者吗？

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你认为你对法西斯主义者深恶痛绝，你认为你有能力判断谁是法西斯主义者，你认为一个好人可以殴打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所以，你有了可以殴打那个法西斯主义者的权利。《娇惯的心灵》那本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探讨了这个问题：“如果现在有学生认为，殴打法西斯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是可以的，同时只要与我意见相左，就可以被贴上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标签，那么可以想见，这种修辞上的变动会在大学校园里带来什么，以及大学生们为何战战兢兢，不敢在校园里发表不同意见。”

如果我们以倚老卖老的姿态评价，我们可以说，这理论上探讨的是“红卫兵”在当年中国行为逻辑的问题。

70. 反对者的态度

（卢西娅·马丁内斯·瓦尔迪维亚）写了一篇雄辩的文章，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题为“像我这样的教授，面对校园内的极端局势，不能保持静默”。摘录如下：

一个要讲话，并不必要通过他人的意识形态纯正度测试。若没有思想的自由交流，大学生活——甚至于公民生活——都将消亡。面对着恐吓，教育者必须发出声音，而不是保持沉默。我们在其位，就要担当起独一无二的责任：我们教给学生的，不是思考什么（思考的内容），而是如何思考（思考的方法）。正是自觉担当起这份责任，才使我这样的教师——女性，同性恋，混血，患有创伤后心理障碍，尚未取得终身教职，随时可能被替代——意识到，无论我的处境多么危险，我都要为人师表，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尊重他人的想法。你要培养学生什么，你就要示范什么。如果就像全美那么多同事一样，我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所想，那我不就是这一问题的共犯吗？

——《娇惯的心灵》

又不完全一样。这也是被我们称为美国“文革”的“政治正确”没有泛滥的原因吧。

71. 我相信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若干年前，《时代周刊》报道中引述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对当时如日中天声誉正隆的韩寒的评价：“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

在 2010 年代初期这个评价自然会引起韩寒拥趸的不满。但事过境迁，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会发现，对韩寒如此评价未必尽然准确，但对于韩寒这一年龄段的人倒是有可能切中了要害。

他们与国家、政府、执政党这种利维坦处于相对来说没有交集的状态。而在 2010 年代以及之前一段时间里，政府虽然做不到“不扰民”，但就像居委会与中产阶级的关系一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代人可以忽略利维坦的存在。他们过自己的生活，那些人与我无关。

那些人，也包括在地铁里随时拦截下乘客的警员。而我，年轻、打扮入时、看起来是本地人、国际化、有教养、知识分子、富裕阶层……他们不会拦下我。

当然，也包括武定路上的女生。她没有太多负担，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72. 所谓“信任”

这本质上是一种信任，或者自信。应该是陈丹青吧，他们在八十年代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都市传说，可能确有其事，就是他们发现美国小孩都有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

那个时代成长于社会的少年或者青年，遭遇霸凌是生活常态，霸凌者与被霸凌者都不以为然。

武定路上的女生，是新一代。他们生长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无忧，社会进步和不断富裕同样是“出生即有”的社会常态。简单点说，中国用三十多年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终于造就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他们是第一代。

他们对社会的想象中没有随后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出现四辆警车、四五位警员强制将一位女生塞入警车、拧手臂、摁倒在地……

还有最后沮丧的警员们。

73. 吕荧，“六亿一人”

钱理群在一本书中回忆一位叫吕荧的知识分子。

这位在朋友印象里“温文尔雅、遇事躊躇踌躇，不很善于言辞，多少有些迂夫子气”的美学家，却匆匆跑到台前，文文静静地地说：“我说两句，胡风的错误，是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这是理论问题，思想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此言一出，全场都愣住了，有几秒钟死一般的沉寂。吕荧很快就被拉下台去，但却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瞬间。胡风分子何满子评论说，这是“六亿一人”，在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沉沦和失语”时，唯有吕荧一人发出了正义的声音，“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中国人民正气的一脉，全仗吕荧这个孱弱的书生孤丝独悬而赖以不坠了”。

——《1949~1976：岁月沧桑》

74. 所谓“正义”

吕荧 1969 年冻饿中去世于北京清河农场。生前因为持续多年的迫害，而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他以书生气著称。他相信正直、相信讲真话、相信直抒胸臆。中国传统文人讲文死谏，武死战”，前者是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可。他们知道道义最终会褒奖“谏者”的勇敢和对原则对价值观的坚守。他们想象中的社会最终是正义的。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及这种“信任”的由来。

这个理论只是为了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即一个就大多数情况来看是组织良好的、不过其间确发生了对正义的严重侵犯的社会而设计的。既然我假设一种近于正义的状态需要一种民主制度，那么，这一理论就涉及到非暴力反抗对于合法建立的民主权力的作用和恰当性。这一理论不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政府，并且除了偶然之外，也不适用于其他持异议和抵抗的情况。

我将不讨论这样一种抗议形式，它伴随着军事行动及抵抗，是一种改造甚至推翻一种不正义的腐朽制度的手段。从这方面来讨论非暴力反抗行动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如果达到这一目的的任何手段都被证明是正当的话，那么非暴力反抗显然也就是正当的。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非暴力反抗的问题只产生于多少是正义的民主国家；是对那些承认并接受这一宪法的合法性的公民而言的。



《正义论》

75. 她相信她的反对是有效的

女生不肯上警车。在反抗暴政角度上，很难说这个行为本身有什么后果。我们认可、相信、支持她，是因为她对社会的想象：她相信她的反对是有用的。

相比于我们这些年龄更大，仿佛经历过更多的事，劝她不要硬抗的人，说不要吃眼前亏的人，我们知道自己究竟是在说什么吗？

76. 恐惧支配着我们

恐惧是第四个幽灵，它是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这前三个幽灵派生出来的，但却比前三个更厉害，影响更大，也更有害。“恐惧”潜伏在意大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潜伏在人们并不怀疑它的地方。贫穷、微贱和受压制的人害怕他们专横的东家；有钱有势的人害怕他们不可靠的和难控制的下属；中产阶级既怕富人的势力又怕群众的暴乱。恐惧影响到几乎所有问题，它使政治决议变得尖锐，把不满激成暴乱。它支配着许多人的生活，改变人们的性格，它使坚强的人丧失意志，忠诚的人丧失道德，自由的人丧失独立，诚实的人丧失对真理的热爱，骄傲的人丧失尊严，聪明的人丧失逻辑性和一致性，忠心的人背叛朋友和信念。它扼杀了一切希望，教会人逆来顺受。



《意大利人：一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

77. 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社会想象

我们的社会想象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都是复杂的。它包含了我们对他人的正常的社会期待感，是那种可以让我们履行构建社会生活的集体实践的共识。这也包含了对我们如何与他人协作，从而去履行公共实践的某种共识。这种认识既具有实在性，又具有规范性。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事情通常会如何进展，但是这一理念与事情应当如何进展以及哪些错误会使正常的实践无效的理念相结合。

就举通过大选来选择政府的例子吧，使我们每个人的选举行为有意义的部分背景认识是我们对整个选举行为的意识，包括所有公民的参与；每个人可以自主选择，但选择的范围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微观选择可以汇集成具有约束力的、集体的决定。对这种宏观决定，我们还有一个基本认识，即我们有能力去分辨其中的犯规行为，如施加某种影响力、利用钱财拉选票、依靠威胁等等。

换言之，这种宏观决定，如果要名副其实的话，就需要符合一定的规范准则。例如，如果一个少数派强迫其他所有人去服从他们的命令，这样的宏观决定，就不会是一个民主的决定。



《现代社会想象》

78. 你知道他们对社会心存希望

继续查尔斯·泰勒。

就说组织一次游行吧。这说明游行这一行为已经储存在我们的库存里了。我们知道

如何去召集人、如何选游行的旗帜、队伍又该是如何行进的。我们知道游行要在一定的界限内进行，既要从空间上（勿干扰特定的空间）又要在侵害他人的方式上（只在抗议的门槛内，不能采用暴力）。我们知道这些惯例。

让我们的行为成为可能的背景认识，是复杂的。但使之有意义的一部分认识是，设想我们与和我们有某种关系的他者对话——像我们的同胞，或其他人类。这里包含着一个语言行为的问题：说话者与说话的对象，以及对他们如何可以彼此存在于这种关系中的某种认识。在此存在着公共空间；我们彼此已经进行了某些对话。像所有的语言行为一样，对话既是针对曾经说过的话而说，又期待着将来要说的话。人们不会为不可能得到的去游行示威，为乌托邦的理想去游行示威——或者，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那就因此成为另一种不同的行为。当我们游行的时候，我们所要表达的一部分内容（甚至更多的）是，民主社会对我们来说是有可能的，是我们可以带给大家的，尽管这受到我们老头子政权统治者的怀疑。

79. 未受污染的纯净

几个月后。深秋上海，再度证实了年轻人的社会想象。

他们未受污染的纯净，他们相信未来是好的，他们还相信社会。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希望。

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危险，就像有人警告过他们的，“你们会为你们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不管是善意提醒，还是威胁，它暴露的都是这位年长者在另一个维度上对社会的想象。在这句话的主人那里，没有未来，没有光明。他心怀恐惧，未来一片黑暗。他是一个 Loser。

涉及书目

《警察：街角政治家》

小威廉·克尔·缪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英国警察：权力与政治》

罗伯特·鲍德温，理查德·金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

《特里盘查：美国警察拍身搜查规则研究》

杨曙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关怀伦理与移情》

迈克尔·斯洛特，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

《往事与随想》

赫尔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十年新实验 1927~1937》（又名《上海警察》）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孤岛岁月 1937~1941》（又名《上海歹土》）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红星照耀上海城 1942~1952》

魏斐德，岳麓书社，2021年10月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史谦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

《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

司昆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小浜正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杜赞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九十年代文存 1990~2000》

林大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蜕变》

高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

《“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行动》

陈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

《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

《权威与个人》

伯特兰·罗素，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

《现代社会想象》

查尔斯·泰勒，译林出版社，2014年2月

《媒体，国家与民族》

菲利普·施莱辛格，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

《监狱的“替代方案”》

米歇尔·福柯，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0月

《谷歌化的反思》

希瓦·维迪亚那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上班记》

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

《1949~1976：岁月沧桑——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

钱理群，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

《正义论》

约翰·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

《意大利人：一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

路易吉·巴尔乔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小鸟年度专辑

关于过去的一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



电影《西线无战事》(2022)剧照

长久危机下的个人抉择 | 2022 年度 newsletter ①

曾梦龙 | Newsletter

你又会如何回望 2022 年？

最近几年，每到年终，总会看到或者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回顾 2022 年，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年”，但在前年，这是《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如果拉长时间维度，比如 10 年、100 年、1000 年，几乎可以肯定现在不是最糟糕的年代。但是，持续的糟糕感受也许证明，我们正处于一场“长久危机”(permacrisis，柯林斯词典 2022 年度词汇)之中，整个世界在发生剧变，每天都可能见证历史。

去年 12 月，我写的年度文化观察笔记，题为《瘟疫之下》。当时，西安正在封城，《牛津词典》(韦氏大词典)的年度词汇都和新冠疫苗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2022 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大流行”……一年过去，新冠大流行不但没终止，人们反倒经历更多灾难。

今年 4 月，历史学者张灏逝世，王汎森在悼文中的一段话切中许多人的感受。他说：“过去两年多，我经常想起《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他们总是联手而来：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新冠病毒、俄乌战争、疫区封禁的饥馑，还有死亡。余英时老师、张灏先生的故逝，都来得令人惊愕万分。因为疫情，我与他们两位久不通问，然后某天醒来突然发现死亡骑士的身影居然悄悄出现在他们身边。”

“天启四骑士”概括了 2022 年的一个切面。不过，只有在重重危机之下，才谈得上人的品性和良知。那些坚持说话、敢于行动、互相帮助的人，还有“润”、躺平摆烂(牛津词典 2022 年度词汇是票选的 goblin mode，可意译为摆烂、咸鱼模式等)、同流合污的人，也构成了 2022 年另一个切面。可以说，危机暴露了原有的社会问题，也勘探到了人的心灵，显现出不同质地。

相比去年的年度总结，今年我没有分文学、影视、社会、媒体、城市、历史、思想七个方面回顾，也不试图相对全面地观察文化趋向。因为过去一年，每隔四周，我聚焦写作的是知识界动态与争鸣方向的 newsletter，所以这篇文章依旧是针对这个方向的年终回顾。我将挑选十个话题(国内外各五个)总结，希望勾勒出围绕 2022 年重要事件的公共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许多话题和事件已经在过去的 newsletter 中比较详细地记录和探讨，所以不会在这篇文章中过多重述。还有一些很重要，或者有意思的话题和事件，由于篇幅、体例等原因，遗憾没能纳入。如果你有兴趣，欢迎阅读过往的 newsletter。最后，还是去年那句话，你可以把这些文章当成一场回顾，也可以是一份邀请——你又会如何回望 2022 年？毕竟，我们应该有着真实的个人记忆，而非权力强加的虚假集体记忆。

以下是国外篇的 2022 年度知识界动态与争鸣回顾。

01

俄乌战争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 2022 年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那么 2022 年影响全球最大的事件则是俄乌战争。

据联合国，到 2022 年底，乌克兰至少有 17000 多人伤亡，战争造成二战以来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被迫逃离家园，790 万人跨越边境沦为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此外，还有 650 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目前，乌克兰有 177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930 万人需要粮食和生计援助。随着漫长冬季的到来，加上俄罗斯军队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生活在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 1000 多万乌克兰人，面临着断水、断电和没有供暖的寒冬。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是众多乌克兰难民中的一位。他今年 67 岁，是出生在波兰、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曾是顿涅茨克州马里乌波尔大学的俄语教师。2014 年，谢尔盖为躲避战争来到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在一所教会学校讲授俄罗斯文学，但妻子和儿女还留在乌克兰。不久后，教会学校关闭，谢尔盖失业，回到马里乌波尔，后又到了基辅。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谢尔盖和家人踏上逃难之路。

《小鸟文学》刊发了谢尔盖的三篇战时日记(《逃难》、《路》、《马里乌波尔的送别》)，希望展现危机之下普通人的感受与遭遇。正如译者米沙(谢尔盖是他在俄罗斯田野调查时最亲密的报道人)所言“俄乌冲突不只是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政治的波诡云谲。在他的日记里，我们能感到战争中普通人的脉动与呼吸、心灵深处的情感，以及战争阴云下的悲惨命运。”目前，谢尔盖已经逃到英国，开始创作童话，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写作这个战时日记系列。

除此之外，我们还刊发了罗马尼亚裔美籍作家、女性学者伊莱亚娜·纳凯斯库(Ileana Năchescu)的评论《乌克兰：超越“后苏联”》。相比许多从西方与中国视角出发的分析，伊莱亚娜由于身份差异，视角显得特别。比如她在文章中说：“事实上，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样，东欧也为多种全球力量所塑造：从根源上说，这场战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威权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全球迁移(其轮廓是由之前的所有迁移构成的)脱不了干系。只有跳出古老的两分(自由的西方 vs. 威权主义的东方)来理解东欧，我们才能开始把握这场战争的意义，想象新的团结。”

至于国外主流的一些反应和看法，我在 3 月的 newsletter《俄乌战争将会如何改变历史？》做过一些梳理和总结。文章写道：“关于这场战争，西方不少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场民主与独裁之争，公民需要捍卫自由民主制，但也有评论认为，现实政治不该采取这种两极思维，而要更加灵活，和非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合作，比如石油储量丰富的沙特、战略位置优越的土耳其、能够缓冲俄罗斯制裁的中国。除了批评俄罗斯和普京，许多论者也在反思西方自身的问题。”

中国学者这边，秦晖在 FT 中文网发了八篇俄乌战争相关的文章，总共五万多字，解答了中文世界许多疑惑和争论问题，包括《西方的“双重标准”和普京的“一重标准”——从克里米亚危机到普京“2·21”宣言》、《“趋纳粹”还是“去纳粹”？》、《二战之后的绥靖主义：索尔仁尼琴之问》、《如何看待斯捷潘·班杰拉？》等。

之所以说俄乌战争影响全球，是因为这场战争绝不单纯是两国之间的领土之争，而是被上升到欧洲的自由与安全，以及民主和独裁之争。比如今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颁给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理由是他们“证明勇气可以像恐惧一样具有传染性，激励人民和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自由，提醒世界民主与和平的脆弱”。



《时代》周刊封面

在国际秩序层面，不少论者认为俄乌战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新排位与站位。比如 FT 中文网的一篇盘点称，“至今为止，双方背后的支持力量基本保持一致，西方(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站位不变，继续力挺乌克兰，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其中德国与日本已开始突破诸多战后禁忌，提升防卫开支；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以军力支持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试图保持中立，继续与双方贸易合作……如果万幸没有发展成核大战，其最终结果将决定美国是否能继续独霸世界，或者中国借俄罗斯胜出而获得更加坚实的争霸地位。”

在经济发展层面，由于西方制裁和俄罗斯还击，俄乌战争造成了全球粮食危机、能源危机，以及通货膨胀。其中，数十年一遇的通货膨胀使得全球多个国家的老百姓日子雪上加霜，正因如此，许多分析人士都预测，2023 年全球经济大概率会陷入衰退。对于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来说，2022 年格外难过，像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 10 月就参与了巴黎抗议物价上涨的游行。

德国更是如此，而且陷入更复杂的争议之中。比如《小鸟文学》刊发王竞的《谁能幸存于这个冬天？》，newsletter 中提到围绕 93 岁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发表在《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关于乌克兰：战争与愤怒》展开的论争，以及《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作者娜塔莎·沃丁想起的“俄罗斯恐惧症”和战争异见(特别建议把沃丁这篇访谈和谢尔盖的三篇战时日记对照来看)，足以展现问题的复杂。

5月，戛纳电影节在线下举办，但由于俄乌战争，政治和艺术关系的争论成为焦点；9月，第17届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在基辅召开，其中有场讨论值得关注，参与者是西方最合适的讨论俄乌问题的几位历史学家，包括安妮·阿普尔鲍姆、蒂莫西·斯奈德、尼尔·弗格森、谢尔希·浦洛基。他们从各自角度探讨了俄乌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有关文学和战争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我在[10月的newsletter](#)中梳理过一些，比如中国作家余华接受俄罗斯的文学奖项，饱受非议；乌克兰最大的图书节——利沃夫图书论坛在现场和线上举行，讨论主题之一便是“为什么文学在战争时期重要？”。

关于这场战争的未来，无人知晓，但预测层出不穷。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历史和现实已经被彻底改变。

02

美国“内战”

6月20日，《[美国未来会爆发内战吗？](#)》这篇newsletter以四件事为由头，讨论了知识界对未来美国爆发内战的担忧。这些事件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废止堕胎权的草案遭到泄露；纽约州布法罗市10名黑人被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另有3人受伤；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19名儿童和2名教师被杀，17人重伤；美国国会就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举行听证会，特朗普被指“未遂政变”，一些共和党人则称听证会是“政治迫害”。

文章发出后，一些读者可能觉得美国再次爆发内战的提法听起来太过耸人听闻。但是，几天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例中确立的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废除纽约州自1913年起实施的一项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等消息出来后，都让忧虑变得愈加真实，并非杞人忧天，“内战”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最近一则[相关消息](#)是，12月，美国国会暴乱调查委员会建议对特朗普提起刑事诉讼，指控煽动叛乱、阴谋欺诈美国政府和其他两项联邦罪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要求对前总统提起刑事诉讼。当然，就像对“新冷战”的讨论一样，“内战”的说法也是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国会山骚乱。图片来自 [Wikimedia](#)

对于这些年的美国来说，国内的分裂与极化是一个长久危机。除了特朗普、堕胎、控枪等问题外，2022年的文化战争也很突出。

一个是美国的“禁书”潮，比如我在[2月的newsletter](#)中曾写：“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政府无权审查或禁止图书出版。但是在民间，任何个人或团体若认为一本书不适合阅读，可向学校或图书馆提出下架要求。这些被要求在学 校或图书馆下架的书在美国语境内称为‘受到挑战的书’或‘禁书’。”

《纽约时报》的报道《禁书在美蔓延时》称，全美各地的家长、活动家、学区董事会成员、立法者正以几十年从未见所见速度挑战书籍。据美国图书馆协会，该组织在去年秋天收到前所未有的330份挑战申请，其中每份申请可能囊括多本书籍。根据教育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言论自由倡导者等反对禁书人士的看法，这种改变不仅仅是频率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策略和场所变得政治化了。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保守团体试图将挑战推向议会、执法和竞选。”

在[3月的newsletter](#)中，我继续追踪了相关变化：“曾获普利策奖的非盈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刊发的一篇调查报道，聚焦德克萨斯州北部一个学区下架图书的事件和后续反应，比如负责人称，我们将变得保守，不希望一个孩子在图书馆拿起任何一本有关性、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书籍，尤其是以LGBTQ为主题的书籍。”

“如果说这是左翼担心右翼的行动侵蚀自由，那么在另一边，则是右翼担忧左翼思潮影响自由，比如美国出版界兴起一个新的工种，叫‘敏感读者’(sensitivity reader)，帮助编辑和作者发现书中存在的偏见，尤其是牵涉族群、性别和性取向等议题。但是，两方在攻击对方时，引用的重要理据似乎都是对审查的厌恶。”

另一个是作家萨曼·鲁西迪遇刺后，西方世界掀起的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这和近些年“取消文化”的背景相呼应。[9月的newsletter](#)对此做过一番梳理，比如文章提到，正如《纽约时报》所概括：“随着年轻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地批评言论自由原则经常为仇恨言论提供掩护，攻击性言论属于‘暴力’的概念越来越流行。‘言论自由’成为保守派的战斗口号，他们把它作为反对自由派的武器，指责自由派想要审查异议。”

“不过，将原教旨主义或神权主义者的暗杀与当代西方左翼言论联系起来的看法也遭到一些批评。批评者同意必须尊重言论和暴力之间的明确界限，因为冒犯你而试图杀死某人是可怕的，但认为这不能等同于批评‘取消文化’。‘言论自由’不是独白，恰恰是有人反对的自由，而任何言论都会遭遇社会制裁的风险。”

“和反对《哈泼斯》那封公开信人的角度类似，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关注的是刺杀背后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帕慕克称，如果我们希望看到言论自由的原则在社会中蓬勃发展，只有像鲁西迪这样的作家的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勇敢地思考他们遭受强烈仇恨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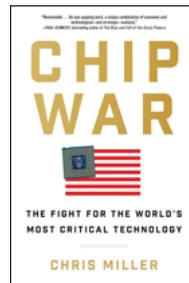
如果说这些对美国的介绍太偏主流媒体或者精英，推荐阅读“非虚构图书馆”栏目中李明洁的纽约札记系列。这个系列共三篇文章（[《2020纽约：正确与不正确的一百天》](#)、[《纽约札记：从“取消文化”到“反种族主义”》](#)、[《纽约札记：从“反种族主义”到“反资本主义”》](#)）。

约的《[残冬漫长](#)》、《[答案在风中飘荡](#)》，分别写于2020、2021和2022年。她说：“我写的都是我认识的人和我参与的事情，是普通人的视角，不猎奇非宏观，这是中美主流媒体都不太写的范畴，但我感觉是真正民意所在。”

03

芯片战

曾有读者好奇为什么我会在 newsletter 中写[芯片战](#)这个看上去像科技，一点都不文化的选题。事实上，如果你看懂那篇文章，就会发现当前的芯片战，最重要的绝不是科技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像今年《金融时报》的年度商业图书奖颁发的正是《芯片战：争夺全球最关键技术》(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一书。



之前的文章提到，“随着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开始担心自身的优勢与安全，转而寻求自给自足。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反应，使得芯片的全球供应链发生变化。对于台积电，正如《金融时报》的报道所言，它既处于美国与中国台湾之间一场较量的中心，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的新冷战中，它也站在打得最火热的前线。目前，台积电正在推动制造地点多元化，准备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建造工厂。此前，它的投资几乎都在中国台湾和大陆。”

“米勒在一篇评论中称，中国的补贴和美国的芯片限制迫使下游行业发生变化。苹果正增加在越南和印度的设备组装，其精细的供应链决定整个行业采购零部件的方式。最大的信号是，苹果为中国用户生产的手机可能会使用与在海外销售的手机不同的组件。苹果已向美国立法者表示，它将只会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手机中使用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分开运作‘中国’和‘非中国’供应链显然是在进行脱钩。在补贴方面，除了中美，欧洲、日本和印度也在推出各自的半导体补贴。”

“谈及未来，米勒说：‘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的挑战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建设，美国认为自己只能将计算能力作为其在亚洲保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因此，美国的战略是加倍发挥其在芯片供应链中的核心作用，并阻止中国进入这一场域。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动态很难改变。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调整其外交和国防政策，才能帮助中国企业更顺利地融入世界。’”

“特里奥罗则认为：‘美国的封控措施已经产生了一系列附带影响，未来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全球半导体行业。……总之，半导体行业一直在以市场驱动的方式向前发展，资金、人员等在此过程中自动流向最优化的位置。这种动态在权力对抗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半导体行业正在努力调整和重组其供应链以维持摩尔定律，但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所以，选芯片战作为年度话题，原因有四：第一，芯片战是中美在科技领域，乃至国家安全上的竞争，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这些年长久危机中最重要的几个话题；第二，芯片战的参与不止中美两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均有参与，各方的竞争或合作，在塑造新的国际秩序与关系，也是逆全球化或者局部全球化的一个体现；第三，对于半导体行业，各国都采用了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受到争议，反对者认为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而在许多国家，“市场经济”的含义似乎都在被重塑；第四，由于台积电在芯片战中的特殊地位，使得这成为台海关系的一个折射。2022年佩洛西访台扰动全球神经，她见过的人中就有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

04

伊朗抗议

因头巾问题去世的22岁女孩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点燃了伊朗的抗议之火，“女性、生命、自由”的声音响彻街头。9月16日至今，伊朗抗议超过百日。据BBC，这场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政府抗争，动摇了政权，但却让民众付出沉重代价。根据该国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ANA)信息，已有超过500名抗议者身亡，其中包括69名儿童。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所称的“虚假审判”之后，有两名抗议者被处决，至少还有另外26人面临同样的命运。

报道称，“尽管伊朗过去也出现过席卷全国的示威——一次是2017年至2018年初，另一次则是在2019年11月——但是目前的这一波抗议不一样，因为它牵涉到全社会各界的人，而且妇女在‘女性、生命、自由’的口号下正担当着领头角色。伊朗的一些名人已经踏出了没有回头路的一步，去支持抗议者，当中有些人已经被捕或被迫流亡”。

如何理解这场抗议？我在[10月](#)和[11月](#)的 newsletter 中做过一点介绍，比如伊朗裔美国作家、《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作者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在《卫报》撰文称，伊朗发生的两件事让她意识到，无论结果如何，这次是个转折点。第一件事是伊朗人民，尤其女性和年轻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力量，并决定使用它；第二件事是伊朗当局发现自己已失败，不再是处于强势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他们很害怕，剩下的就只有枪了。

除此之外，也推荐“小鸟文摘”栏目的合作者王立秋翻译的一系列伊朗文章，主要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结绳志”和“地球是透明的”上，比如有《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里，头巾会成为伊朗政治的中心？》、《伊朗来信：革命正席卷伊朗》、《关于伊朗抗议：霍玛·胡德法访谈》，等等。

年底，《时代》周刊将“伊朗女性”评为年度英雄，表彰她们为摆脱国家限制而争取自由的斗争。文章称，“伊朗年轻女性走上街头，带领一场受过教育、自由和世俗的运动，她们渴望能够有一个正常社会，包括允许女性上大学、到外国旅游、有体面工作，及拥有政治参与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当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触手可及时，剩下的限制似乎越是羞辱，最后的抵抗就越不令人畏惧”。

这场抗议不仅仅对伊朗人民意义非凡，在世界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中也具有广泛意义。12月，《外交政策》刊发了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的文章《2022 年：好人反击之年》（2022: The Year the Good Guys Struck Back）。赫什认为，在威权主义、民粹主义、仇外情绪在世界各地抬头十年，许多主要民主国家似乎严重失灵后，民主在2022年卷土重来。虽然危险趋势继续存在，但自由民主价值观已经成功地在许多方面重新确立地位。

他举的积极例子有：2月俄乌战争，乌克兰保护“自由之火”；4月法国大选，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的勒庞；10月巴西大选，左翼前总统卢拉险胜右翼现任总统、“热带特朗普”博尔索纳罗；12月德国，中间派政府立场坚定，挫败一场未遂政变，逮捕25名涉嫌密谋推翻政府的右翼极端分子；特朗普和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简称 MAGA）运动均深陷困境；伊朗当局无法完全镇压9月开始的抗议，甚至处决了示威者，等等。

和赫什类似，以号称“历史的终结”闻名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表示了对未来的信心，认为自由民主注定战胜独裁。部分原因是，过去一年，独裁统治的经典陷阱在俄罗斯等国身上变得更加明显。在今年的 newsletter 中，我也介绍过福山的新书《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文章写道：“他仍然乐观，认为自由主义目前的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长远来看，抛弃自由价值观将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最终导致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

比较谨慎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民主专家拉里·戴蒙德。他说：“烧退了，但病毒仍在体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民主与专制趋势之间的斗争将是一个不稳定且非常混乱的局面。”

05

伊丽莎白二世和戈尔巴乔夫逝世

最后一个话题是“死亡”，这也是每期 newsletter 的最后一条。瘟疫、战争、饥荒、意外、自然等，都是可能造成死亡的因素，但很难统计准确数字。比如《经济学人》一项统计推测称，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全球已经有 2100 万例超额死亡。这比官方数字高了 3.1 倍；据第三方来源汇总估计，俄乌战争至少造成 22.6 万人伤亡，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今年以来，尤其这个寒冷冬天，许多人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告别。

由于 newsletter 方向的原因，我选择伊丽莎白二世和戈尔巴乔夫逝世作为议题。一方面，他们的逝世可以作为死亡这个大话题的代表；另一方面，两人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改变了整个世界与历史，极具象征意义。

9月的 newsletter 写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君主制’成为争论焦点。在一些英联邦国家，‘脱离君主制’、‘成立共和制’的讨论兴起。……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格雷厄姆（Anthony Glees）认为，21世纪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赞成君主制，主要取决于君主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伊丽莎白二世对此驾轻就熟。她履行其义务，严肃认真地为国家效力，特别是严格避免对政治的任何干预。”

“在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戈尔巴乔夫说，支撑我的首先是对改革的信念，坚信它是历史的必然，这副担子不轻松，但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扛起来。尽管有错误和过失，我们却把国家带出了历史的死胡同。我们给了它自由的初步经验，解放了人们，使他们有可能凭自己的智慧生活。我们给‘冷战’、核武器竞赛画上了句号。”

总结之后是展望。虽说五个话题中三个都和“战”（日本 2022 年度汉字）有关，但在今年我和历史学家罗新在圆明园徒步访谈时，一段对话给“人”的未来以信心，摘抄如下：

“小鸟文学”：你曾说，你这代人都受到进步史观或者普遍历史观的影响，你也认同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中的说法：“未来我们将见证作为神圣认同的民族国家的终结、战争的消弭、资本主义的消亡，以及全球合作新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年对中国和世界发生许多变化，如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但你还是相信未来会朝上述方向演进，只是说我们这几代人等不等到的问题？

罗新：我坚信不移，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步，我们现有的国际秩序、民族国家形式，一定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是怎么变，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是历史的逻辑，人类历史就昭示这个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凯利会说“第五次开始”。当然，开始跟结束这中间，隔得不知有多远，我们等不等到没有关系，历史学家的好处就是它不是以个人作为时间尺度。”

祝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平安！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电影《隐入尘烟》(2022)剧照

档案

长久危机下的个人抉择 | 2022 年度 newsletter ②

曾梦龙 | Newsletter

危机暴露了原有的社会问题，
也勘探到了人的心灵，显现出不同质地

最近几年，每到年终，总会看到或者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回顾 2022 年，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年”，但在前年，这是《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如果拉长时间维度，比如 10 年、100 年、1000 年，几乎可以肯定现在不是最糟糕的年代。但是，持续的糟糕感受也许证明，我们正处于一场“长久危机”（permacrisis，柯林斯词典 2022 年度词汇）之中，整个世界在发生剧变，每天都可能见证历史。

去年 12 月，我写的年度文化观察笔记，题为《瘟疫之下》。当时，西安正在封城，《牛津词典》（韦氏大词典）的年度词汇都和新冠疫苗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2022 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大流行”……一年过去，新冠大流行不但没终止，人们反倒经历更多灾难。

今年 4 月，历史学者张灏逝世，王汎森在悼文中的一段话切中许多人的感受。他说：“过去两年多，我经常想起《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他们总是联手而来：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新冠病毒、乌俄战争、疫区封禁的饥馑，还有死亡。余英时老师、张灏先生的故逝，都来得令人惊愕万分。因为疫情，我与他们两位久不通问，然后某天醒来突然发现死亡骑士的身影居然悄悄出现在他们身边。”

“天启四骑士”概括了 2022 年的一个切面。不过，只有在重重危机之下，才谈得上人的品性和良知。那些坚持说话、敢于行动、互相帮助的人，还有“润”、躺平摆烂（牛津词典 2022 年度词汇是票选的 goblin mode，可意译为摆烂、咸鱼模式等）、同流合污的人，也构成了 2022 年另一个切面。可以说，危机暴露了原有的社会问题，也勘探到了人的心灵，显现出不同质地。

相比去年的年度总结，今年我没有分文学、影视、社会、媒体、城市、历史、思想七个方面回顾，也不试图相对全面地观察文化趋向。因为过去一年，每隔四周，我聚焦写作的是知识界动态与争鸣方向的 newsletter，所以这篇文章依旧是针对这个方向的年终回顾。我将挑选十个话题（国内外各五个）总结，希望勾勒出围绕 2022 年重要事件的公共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许多话题和事件已经在过去的 newsletter 中比较详细地记录和探讨，所以不会在这篇文章中过多重述。还有一些很重要，或者有意思的话题和事件，由于篇幅、体例等原因，遗憾没能纳入。如果你有兴趣，欢迎阅读过往的 newsletter。最后，还是去年那句话，你可以把这些文章当成一场回顾，也可以是一份邀请——你又会如何回望 2022 年？毕竟，我们应该有着真实的个人记忆，而非权力强加的虚假集体记忆。

以下是是国内篇的 2022 年度知识界动态与争鸣回顾。

01

新冠疫情

关于新冠疫情，我在 4 月 newsletter《防疫的代价》中，以饶毅、杜骏飞、梁建章三人的争论为中心，展开了对“什么样的防疫举措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民众是更优选择？”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从人文社科角度补充了我在 2020 年疫情爆发期访谈过的几位学者（如余新忠、刘绍华、周雪光）的观点。

《防疫的代价》中写道：“回看这场争论，饶毅和梁建章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分歧，都是支持在提高疫苗接种率的前提下，开放或者说共存，诉诸的理据都是科学，价值立场本质上是效益主义，追求所谓‘最大幸福’。这种计算我们在经济学者对疫情的意见中也可明显看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宋铮，测算了封城的经济成本，以及‘动态清零’的经济绩效。……相比之下，杜骏飞代表的是人文主义立场，但可惜的是，他语焉不详，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批判，甚至坦承自己的懦弱。”

“防疫绝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这也是饶毅忽视或者不好多说的），而是牵扯到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多个维度。……概括起来，关于法治、市场、民间社会、专业人士、人的权利与尊严，等等，都是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不足，是值得人们继续追求的理想。事实上，这也是近代以来，许多国人一直为之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是文明的进程。”

5 月，我以“城市文明”为切口，访谈了身处上海、将上海作为中国研究田野的社会学者 陈映芳。她的诸多观点富有启发，并从一些上海市民的行动中挖掘出积极因素和希望所在。在后面下半年的一些事件中，足以佐证她的敏锐和预见性。

比如当时她认为：“一些市民具备了个体独立意识和专业化知识（或基本的防疫知识、法律知识），在面对不正当的执法行为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他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私权，包括监督公共权力应该怎么执法。这类现象在这次上海及北京等城市的封控中，到处可见。这意味着市民拥有健康的民权 / 私权意识，同时有能力在城市这座舞台上，将个人的生命、生活安全问题拓展为一个城市公共议题，从而与公权力展开价值规范博弈。这应该被理解为城市文明、亦即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成就。”

“在这次城市危机中，突出的问题，不是民众观念上的蒙昧或行为规范的落后，换句话说，不是市民迫切需要被启蒙的问题，是城市管理中‘例外状态’如何被确定，以及法治原则和专业化管理、社会共治如何被落实的问题。而市民最需要的，是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生活 / 生命安全，以法律手段来抵制权力对自己权利的侵害。所以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法学专家、医学 / 防疫专家们忠实于他们专业理念和职业伦理的发声和行动，是多么珍贵、重要。”

12 月 5 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篇 newsletter 发出后，估计不少读者还对里面“放开”的讨论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觉得有点超前，防疫政策不太可能那么快地急转弯。事实证明，这低估了“中国速度”。随着“新十条”和 2023 年 1 月 8 日开放边境的消息公布后，恐怕没有多少人怀疑“放开”的确定性，但之前担心的药品不足、医疗挤兑、老人患病等问题不出意料地随之而来。

12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称，“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绝不是被动地放开”。学者曲卫国撰文质疑道：“为了实实在在地减少大家的疑惑或误解，我希望李斌能拨冗告诉老百姓，为了这次开放，国家卫健委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我完全业余，但想知道他们在费心准备时，是否想过这么几个问题？”

“1. 有要求各地，尤其是药店和医院提供病房的收治能力情况报告吗？2. 开放前，他们有要求药店和医药提供相关药品的储备情况吗？3. 开放前，他们有要求各药厂增加相关药品的生产量吗？或者做过预案？4. 开放前，他们是否考虑到医护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也会感染？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5. 开放前，他们是否考虑过现有的 120 是否能应付可能出现的呼叫挤兑？……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李斌，你说你准备好了，那你怎么解释这 20 天老百姓的慌乱？”

连 92 岁的学者吴敬琏都 出来发声，称“防疫战略的转变，绝不意味着所谓‘躺平’，更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大家要做的是，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督促政府做好准备工作。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无公共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基层党政机关、公共卫生机构、传媒）认真负起责任来，就难免发生民众慌乱、病急乱投医或求告无门的风潮。”

政策突转后，一些人宣告三年疫情“全剧终”。虽然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平心而论，疫情及其问题并没终结。试举三例，一是“通信行程卡”下线后，各地 健康码何时退出，存储的个人信息如何处理？二是感染高峰和春运挑战尚未过去，老人、农村和脆弱人群等面临的新冠与医疗风险依然艰巨。

三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官的黄应生呼吁：“既然防疫政策现在已经调整，涉疫情案件的处理思路也应随之调整。此前一些涉疫案件，如隐瞒行程或者管控期间擅自外出但没有引起疫情传播的，现在就不宜再定罪处罚了。凡是沒有生效的案件，应该一律终止审理、审查或侦查，作宣告无罪、不起诉或撤销案件处理。对于部分已经生效的判决，如 2021 年 11 月当新冠肺炎病毒演变为奥密克戎病毒之后，因为传播奥密克戎病毒而被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人，建议司法机关予以纠错。”

02

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

年初的铁链女事件和 6 月的唐山打人事件之所以放到一起，是因为它们不仅引发公众热议，而且集中反映法治和性别两个重要议题。

在 2 月的 newsletter 中，我梳理了“铁链女”事件中的思想争鸣。比如文章写道：“最先争鸣的是法学界，焦点为‘是否应该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教授、黎敏副教授、陈碧副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桑本谦教授等，都主张提高刑罚。另一边，北京大学的车浩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柏浪涛教授等，则主张维持现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哪方，都清醒意识到，单纯加重刑罚并不能彻底解决妇女拐卖问题。长期关注性别平

等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贺欣也同意这一点，直接另辟蹊径从‘信息’的角度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还有公权力的问题。“赵宏聚焦‘公共责任里的缺位者’，包括当地的民政部门、计生部门、村委会、妇联组织、残疾人权益保障组织、公安部门。……郭于华在《任你说破了大天》一文中探讨的则是该事件暴露出来的‘信任危机’或者‘塔西佗陷阱’。她认为，目前我们陷入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而且是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杀熟和凌弱；后者体现为如丰县案这类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公权力、权威、专家、官媒、司法等系统的质疑。”

信息生态的问题。唐建光在文章《关于丰县的朋友圈》中写道：“丰县的锁链，盖过奥运的光环，恐怕是十年以来最惨的宣传滑铁卢。官方摧毁了媒体系统，以为从此可以权威发布号一统江湖。然而正常的信息生态被破坏之后，更多人选择‘我不相信’。”

性别视角的探讨。“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博士熊婉茹在 2021 年发表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中国 26 个省份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的 1215 起拐卖妇女并强迫结婚的案件的相关数据，认为重男轻女的父权观念所导致的出生人口高性别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性别迁徙、适婚女性短缺下底层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是导致以强迫结婚为目的的拐卖妇女现象的根本原因。”

至于唐山打人事件，性别视角、社会治理、扫黑除恶等都是可以探讨的角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将其评为《2022 年中国十大刑案》中的第一名，认为“这是一起激怒国人的打人案，而且折射出许多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份名单中，虽然有几起案件的关注度没有唐山打人事件那么高，但也相当重要。比如谭修义改判无罪案自 1993 年 7 月 17 日从家中被警方带走，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被刑满释放，谭修义失去自由共计 10744 天，超过了 29 年，成为国内已知被羁押时间最长的冤案当事人。”何家弘写道。

某种程度上，这些事件引发的公众关注推动了法治进程。在今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阶段收到 8.5 万网民的意见和近 300 封群众来信，该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中，就将第六章前移为第三章，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更加突出对妇女人身权和人格权的保障。更具体的变化则包括增设对拐卖绑架妇女侵害行为的强制报告和排查制度；完善对性骚扰的规制，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性骚扰的主要表现形式，便于识别和界定；明确规定学校和用人单位作为责任主体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和工作制度，等等。

03

职业教育改革前景

由于抗风险能力和经济政策等原因，危机之下，经常会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现象。新冠疫情也不例外，过去三年，它大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比如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全球有 131 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在这场疫情期间翻倍上升。但与此同时，仅在 2020 年，就有近 9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收入不足 1.9 美元。现在，几十年一遇的通货膨胀正加剧侵蚀全球各地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中国的青年失业率（16—24 岁）也让人忧心。

2022 年的中国，郑州富士康工人和广州城中村劳工的遭遇，揭开了疫情下底层命运的一角。于此，端传媒刊发了一篇《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疫情三年中国工人生存状况全观察》，从三个方面（世界工厂地位的动摇、供应链的动摇与工人的抗争、工人“恶意讨薪”与老龄化）系统梳理了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变迁以及疫情防控给中国的供应链、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工阶级带来的严重后果，提供了一幅图景。

相比之下，我把这个问题往前推了推，讨论的是较少被关注，但更关乎未来的职业教育。这些职校学生毕业后大多流向劳工阶层但是流入劳动力市场，以及进入职业学校之前，其实有许多改革的空间和必要。

5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该法自 1996 年颁布以来，首次大修。修订的新法放弃“分流”的说法，以“协调发展”取代，被看作是把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上升为类型教育，取消了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之间的差别，迈出改革的第一步。

在《“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源，就是培养完整的人”》这篇 newsletter 中，我梳理了各方对此次修订的讨论。比如熊丙奇提倡建设既有普高（学术）课程，又有中职（技工）课程的“综合高中”；姚洋称，“当前的职业教育某种意义上成为阶层分化的工具”。他设想的方案是，6 岁上学前班，然后实施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等到 17 岁之后再分流。这样孩子们完成了高中教育，心智也比较成熟，家长也认了，自己的孩子努力过了。

文章写道：“如果说熊丙奇、姚洋的观点太‘顶层设计’，那么服务中职学生与老师的公益组织‘HOPE 学堂’组织的讨论《职业教育法》修订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要更接地气和具体一些。比如讨论中提及，新法强调企业的力量，但原本就没有处理好的‘校企合作’乱象（如学生被学校当作廉价低端劳动力输送到企业‘实习’）存在恶化可能性；新法提到社会力量参与，那公益组织未来可以做更多事情，帮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回应更多职校青年的成长需求。”

“重要的还有观念上的改变，像‘HOPE 学堂’发起人梁自存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智慧，都提到了社会需要去除对职校学生的污名（觉得他们智力低下、道德不佳、坏学生、混日子等），职业学校很多做法（比如定位是管住学生，怕出事）也不合理。……其实，不仅是职业教育，究其根本，所有阶段和类型的教育都应该尊重劳动，重视人的尊严。”

04

香港作家倪匡和西西逝世

7 月 1 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纪念，我本想以此为主文写当月的 newsletter，但是，在看了一大圈资料后，自觉没有能力和空间完成这个写作，只在短讯中，写了一则动态：

“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推出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专题，刊出四篇文章，分别从政治发

展、宪制秩序、跨境互动、经济转型等角度，探讨香港在后半期的路途上，‘一国两制’实践何去何从？比如张炳良认为，香港若失去独特性，经济转型毫无成果，管治绩效未见改善，并沦为国家包袱，‘一国两制’的存续便成疑问；朱国斌觉得，‘一国两制’实践能否行稳致远，将取决于中央和特区的长远战略和治理智慧。”

主文则变成倪匡去世，题为《“我坚持人要有个体自由”》。因为许多人哀悼倪匡，其实哀悼的是已逝的香港黄金年代。比如文章写道：“被称为‘倪匡接班人’的作家谭剑说，‘他的成功是天地利人和的结果，也是香港这个开放城市兼容并蓄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倪匡因香港给予的自由而写出天马行空的作品并致富，香港因倪匡的作品而成为对外输出大量小说的城市。’”

“评论人李照兴撰文称，‘倪匡除了设计出卫斯理惹人好奇之外，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代表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人，可以有多跨界。试想像，在主要创作跨度以四八年计（1957 年至 2005 年），400 多本作品，300 部电影剧本。编剧最密集时像 1971 年及 1972 年，一年间有 21 部作品，平均一个月生产两个剧本，更不用说涉及更多专栏小说。……那也是个香港与台湾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大连结时代。’”

如果说倪匡代表的是香港流行文化人，那么 12 月去世的西西，可以说是香港严肃文学和城市书写的象征，也是香港最重要的几位作家。

2019 年，西西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提名词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文学都被视为是次要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城市不能出产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著名作家。香港诗歌或许在很多人眼中是个更抽象和虚妄的概念。西西或谐或庄的诗歌道出了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的品格。她的诗歌也证明了一个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大的叙述，而可以是表面琐碎的絮语、寓言或者童话。西西的诗歌阴柔，纤细，机智，敏锐，动人心弦，无可辩驳地宣示着香港诗歌的存在感。”

在颁奖典礼上，西西说：“1997 年临近，人们在身份问题上苦苦挣扎。许多年轻人至今仍在纠结这个问题。不要以为改变治理方式就能轻松解决。……香港的经历实际上是写作的宝库。由于我们独特的文化背景、视角、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香港作家与其他华语作家不同，不可否认，这对华语世界是一种福音。”

05

“二舅”的爆红与争议

长久危机之下，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但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恐怕没有标准答案。2022 年 7 月爆红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想以“二舅精神”作为生活范本，提供一种选项，但饱受争议。

在《为什么<二舅>会引起那么大争议？》这篇 newsletter 中，我梳理了这场争论。文章称：“在知识界，大多数人对这则视频的叙事框架持批判态度，认为其美化苦难，对苦难没有历史、制度、社会结构等层面的反思，非常肤浅，而且存在精神鸦片的嫌疑，让人对不公认命，不再反抗。”

其中，学者周濂将争论抽象为，“在无能于反抗，或者即使反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不公无法得到及时纠正的前提下，个体应该如何自处？”。他给出了四个选择：“选择 1：继续奔走呼号，把余生投入‘西绪福斯式’的反抗中；选择 2：做清醒的现代人，对一切可能蛊惑我们思想和情感的话语保持警惕与批判；选择 3：把社会不公部分‘转译’成命运苦难，承认之，接纳之，这是身为草民不得不然的选择，尝试在私人领域的生活中活出一点自己的精彩；选择 4：逐渐变得漠然和麻木，沦为牺牲品而不自知，甚至为施害者辩护和叫好。”

他分析说：“四种选择并非泾渭分明，多数人是混合体，随时间、阅历和心力的变化，伺机游走，此消彼长。大致说来，四种选择各有弊端：选择 1 最需要勇气，但时刻面临被恶龙所屠的危险；选择 2 保持批判性，做清醒的现代人，会给自己带来‘免责’的愉悦感和智识的优越感，从而存在自欺的可能；选择 3 看似优游自得，其实高度不稳定，随时会被假冒成苦难的社会不公打破平衡，且有可能滑向选择 4；选择 4，既是系统的牺牲品，也可能是共谋者。……最终的最终，你会发现，选择只是假象，因为你别无选择。”

如何抉择不仅与现实的“危”有关，也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未来的“机”。对于不少人来说，十月的会议是个心态上的转折点，觉得未来可能更多是“危”，很少会出现“机”，异常悲观。但是，正如我在十月 newsletter 中介绍学者秦晖在“苏联式国家的‘测不准定理’”这场讲座中的发言：“仅仅从经验角度讲，我觉得这种体制的确是‘测不准’。因此，所谓的悲观、乐观，其实都没有什么根据。只要人们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历史进步的概率还是可以扩大的。如果没有努力，这个概率就不可能大。”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Hatice Yاردım](#) on Unsplash

档案

关于书，这里有一组 来自旧金山的对话

黄璐 | Newsletter

你知道全球出版和文学界正在关心什么，
也能反映出全球文化的某种走向

我叫黄璐，在旧金山大学读创意写作硕士，这个专业让我离写作者和出版界很近，尤其是 2022 年秋季学期的“(旧金山) 湾区诗学”课，让我走访了许多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独立书店，还有那些与书相关，但不那么标准化的人和机构，比如写作教育机构、工作坊、滑板作家，在旧金山唐人街出生长大的华裔诗人和说唱歌手，伯克利和奥克兰的独立出版社等等。20 年前，人们觉得科技会将文学淹没，可是在科技巨头扎堆的重镇旧金山湾区，大量作家还在这里生活，每天都有文学活动在发生，文学还是在蓬勃发展。

作为对 2022 年英美文学趋势的年度总结，我和小鸟文学的编辑商议，采访了我的写作项目中一位印度裔同学斯威莎·阿米特(Swetha Amit)，她是项目里最活跃的同学之一，采访过很多作家，正在杂志社工作，也在诸多美国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另一个采访对象是教授刘易斯·布兹比(Lewis Buzbee)，曾经是雷蒙德·卡佛的知心酒友，做过书商和出版商，现在旧金山大学教书。他总说他在 15 岁时因读到了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才开始了写作生涯。他著有小说《费里哲曼的欲望》(Fleigelman's Desire)，中篇小说《第一个离开》(First to Leave)，短篇小说集《淘金热之后》(After the Gold Rush)，以及给年轻读者的作品《斯坦贝克的幽灵》(Steinbeck's Ghost)，《查尔斯·狄更斯的阴魂不散》(The Haunting of Charles Dickens)，和《时间之桥》(Bridge of Time)。

我曾经担心这份专注于英美文学界的 Newsletter 会过于窄众，因为它毕竟和国内的读者相隔很远，无论从信息还是文化的角度。但是从另一个视角看，它也是“世界上正在进行什么”的一种有限沟通，从广泛的好奇心的角度，你知道全球出版和文学界正在关心什么，也能反映出全球文化的某种走向。这正是我从这两份对话中感受到的东西。希望对你来说也有价值。

1) 和斯威莎·阿米特的对话

黄璐：你认为这三年的疫情对文学有影响吗？

斯威莎：有的，我想很多作家都在写在失去身边的人之后，他们如何熬过死亡，如何恢复正常生活。

黄璐：今年关于疫情和死亡的书会更多吗？

斯威莎：我觉得不是。我还没有读过关于这个的小说。也许有一些短篇小说在出版，但没有关于新冠疫情的长篇小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黄璐：你提到了家庭。你认为在疫情期间，人们会更多地写他们的家庭吗？

斯威莎：对，在大流行期间，所有人都被长时间封在某个地方。每个人都想写点什么，想写故事。这始于 2020 年 3 月的封禁，在 6、7、8 月达到了顶峰。

黄璐：你注意到文学界和出版界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吗？

斯威莎：我注意到我们在班上读的作品很多来自有色人种作家和印第安作家，我认为这是一种变化。今年布克奖的获奖者是斯里兰卡作家谢汉·卡鲁纳蒂拉卡。今年早些时候，国际布克奖得主是印度作家吉坦加里·什里的 2018 年印地语小说《沙之墓》。这本书由美国翻译家黛西·洛克威尔翻译成英语。她是一位印度有色人种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我们看到有色人种作家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在出版社中，多样性的变化可能是缓慢的，但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实现多样性。在很多写作会议和采访中，能看到很多有色人种作家在教育公众。

黄璐：你听有声读物吗？

斯威莎：没有。我更喜欢读书。阅读让我知道作者如何处理时间，如何运用不同的视角，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人物和背景。有声读物变得非常受欢迎，因为它们可以让经常旅行的人和在开车、通勤的人听，这很方便。但我更喜欢读书。此外，有些人没有读书的习惯，他们更喜欢听别人讲故事，比如他们的爷爷奶奶。

黄璐：除了多元化，你认为今年还有什么趋势吗？

斯威莎：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是，有许多短篇小说集和作家的首作得以出版。人们和出版商喜欢不同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很受欢迎。

黄璐：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你认为明年或将来会发生什么让人兴奋的事情吗？

斯威莎：我希望看到更多有色人种作家出版作品，并在文学界获得突出地位。我希望看到更多印度作家的作品被列入大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和阅读清单。

2) 和刘易斯·布兹比教授的对话

黄璐：布兹比教授，你觉得今年的文学景观与去年有什么不同吗？

布兹比：不，我没有看到大的变化。但我的见闻主要限于美国和加拿大。我对英国和欧洲图书销售了解并不算多。

我认为最大的趋势是独立书店正在蓬勃发展，这是文学景观最大的变化。对读者和出版业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它让出版社有机会出版更多更小、更中型的书，也让很多书籍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一席之地。对于一个社区来说，书店作为社区的一部分，仍然非常重要。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购物，线下书店仍然是一个对人们有意义的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趋势。

开一家独立书店并不总能成功，有太多公关要做。就在几个月前，亚马逊关闭了它的所有四家书店。亚马逊说，我们做不下去了。我认为这真的很棒，你知道的，一个巨型企业不知道如何让一个真正的书店做起来。但在美国各地的小城镇里，会有人买下一家书店，然后处理贷款和债务问题，我认为这非常吸引人。我们叫它“爸爸和妈妈”经营。拥有大量图书的亚马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做不到。

黄璐：你读过很多独立出版社的书吗？你觉得他们出版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主题等方面会（和主流出版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吗？

布兹比：我一直在读很多独立出版社的书。我认为它们现在所做的与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出版社，他们真正关注的是文学而不是商业。他们的首要使命总是出版的最优秀的、最令人激动的书。虽然主流出版社也在这样做，比如他们仍然出版小型书籍，但他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哦，我们需要找到畅销书才行。他们很多的精力都花费在那里了。有趣的是，10 年前会与大型出版社合作出版作品的作家，现在都在与小型独立出版社合作。而且，由于文学市场非常活跃，从独立出版社里出版的书，可以获得和大型出版社一样多的关注，甚至销量。这对作家非常有利。所以这是行业里一个蓬勃发展的部分，它也拓宽了可以出版的文学类型。大多数独立出版社只是在他们的车库里和家里做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办公室什么的。现在的作家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黄璐：是的，我采访了我的同学斯威莎，她说她注意到，今年有很多新作家出版了他们的首部作品，你也这么觉得吗？

布兹比：是的，当然。其中部分原因是，这就是事物的自然规律。现在写严肃文学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这真是太棒了。所以文学不像以前那样狭窄，有很多独立出版社支持他们。同时，由于现在的一场对一切事物（包括文学）进行多元化（diversify）的运动，在一些较边缘的社区和文化中涌现了一批作家，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的，所以文学的前景是光明和充满活力的，有太多事情正在发生。那么多新的故事和作家。这真的很棒。作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但这更是一件私人的烦恼。在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学的标准反应是，哦，人们不再阅读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们阅读得越来越多。阅读的人也越来越多，阅读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

这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无论你走到哪里，虽然人们都在看他们的手机，但这与实际情况相矛盾。文学景观是非常活跃的。

黄璐：多元化的运动是指什么？

布兹比：这指的是创造巨大的多样性。这场运动规模大、范围广，追求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看到更多的多样性——种族、民族和宗教等等。如今，由于作家在文学领域的特殊地位，读者和出版商都希望选择更多样化的作家。

黄璐：什么样的书不能在主流出版社出版？

布兹比：关键在于，主流出版社能够、也将会在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上取得成功，不论是非常商业化的书籍还是非常前卫的。大众总是只是因为书有趣，就愿意买它们。这些年来我发现，真正的读者什么都读，种类繁多，可能是最畅销的名人传记，但也可能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在阅读的世界里，似乎只有阅读和不阅读的区别。没有任何中间状态。有些人肯定只读畅销书籍，有些人只读“文学”（这里的文学要打上双引号），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阵营的。读书 vs. 不读书。

黄璐：对的。不过，我也知道人们不只是把生活比作书。如果他们认识了新朋友或去新地方，他们也会说这就像读了一本新书一样。

布兹比：那当然。我不认为我们读书是为了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书中，但我们在书中发现了另一种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读书的原因吧？我们通过阅读来了解别人是什么样

子的。这是阅读的一大好处。它想要打开读者的世界，而不是使他们狭隘，心里只有他们自己。

所以我认为，对美国出版业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没有出版足够多的翻译作品。如果你去其他国家，你会发现许多被翻译的美国文学。在美国，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书的数量非常非常少。这是独立出版社非常活跃的一个领域，那就是出版翻译作品。我刚读了一本小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翻译得非常好，是一本很棒的书。我们真的应该在书店里四处走动，指着书籍们说，这是这国的文学，那是那国的，还有其他好多国家。

我在思考另一个一般性问题，有一件事在过去 10 年里变得很清晰了。2004 年，第一个电子阅读器问世，一两年之后，Kindle 问世。当时，人们觉得实体书即将消失，所有人都将只在 Kindle 上阅读，所以 Kindle 刚推出时，它的销量急剧增长。但现在它非常稳定。在所有被人们购买的书中，我认为只有 13% 或 15% 是电子书，其余都是实体书。纸质书真的没有消失的倾向。读者们会说“电子阅读器很好”，但我们真的喜欢读纸质书。另一件事是，即使是使用 Kindle 和其他电子阅读器的读者，也只有 6% 的人仅仅使用电子阅读器。这意味着大多数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的人也会阅读纸质书。我喜欢纸质书，所以这让我很开心。因为如果我们都使用电子阅读器，书店就绝对没有存在必要了，但书店是人们见面的地方。这让我很开心。

黄璐：你会开一家书店吗？

布兹比：是的。其实，这是我一生中拥有书籍最少的时候。你知道的，我是个老人了，我从 1976 年开始在图书行业工作。我有很多书，也读过很多书，我妻子也是这样，她也是作家，也在图书行业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命中都有过很多书，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女儿，所以书更多了。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只保留一小部分，比如我最喜欢的、会重读的书。其它所有书我都送回给了书店、朋友和图书馆。所以纸质书的一大优点是，当你读完它，你可以把它传给别人，他们也可以读，这样的传递可以持续几十年。对于电子书来说，你无法真的把它分享或借给别人，对吗？

上学期我班上有一个同学在看书的时候，把书掉在浴缸里了。虽然弄湿了，但还能用。即使所有的书页都掉了，你还是可以读它。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工具。当你读完一本书后，你可以让它流通起来，给朋友、书店、图书馆等等，这是一种很棒的感觉。

黄璐：是的，它也可以是一种收藏。

布兹比：是的，当然。

黄璐关于翻译，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本中文书叫《黄金时代》作者是王小波。这本书现在是中国最有名的书之一，但直到 2022 年才在美国出版了全译本。你知道这本书吗？

布兹比：不，我不知道。我去搜搜它。他在中国出版时受到阻碍了吗？

黄璐：我觉得应该是。他的书有些和文化大革命有关，而且以前被认为很淫秽。

布兹比：是的，关于审查制度的有趣之处在于，在中国它非常常见，但在美国，它不那么明显。我想说，另一个真正令人不安的趋势是自唐纳德·特朗普以来的（对图书的）谴责。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试图从学校课程和图书馆中封禁一些书籍。更有甚者，我记得是在弗吉尼亚州，州长办公室试图起诉私人书店，因为它们关心 LGBTQ 书籍，政府希望叫停这种行为。这种程度的审查在美国是非常麻烦的。政治操纵。团体，家长和立法机构都在参与。这其中，他们最想封禁的是关于 LGBTQ 的书籍，尤其是针对儿童的 LGBTQ 书。这令人很不安，这是我们继续与之斗争的事情。

黄璐：你认为独立出版社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吗？

布兹比：不，我觉得不能。这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巨大的、激进的运动，在审查人们的阅读。这只是他们议程的一部分。他们想让 LGBTQ 群体的生活变得悲惨。所以他们开始攻击图书馆、学校，现在甚至书店。

黄璐：可以给我介绍今年五个最令你惊艳的作家或书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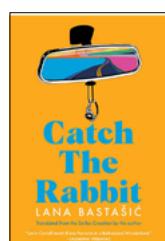
布兹比：《爱人军团》卡尔·索达（Army of Lovers by K.M. Soehnlein）。这是今年我最喜欢的书。它如此令人惊叹，同时也如此让人揪心。



《爱人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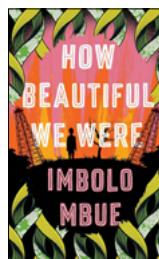
《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谢汉·卡鲁纳蒂拉克（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 by Shehan Karunatilaka）。

《捉兔子》拉娜·巴斯塔西奇（Catch the Rabbit by Lana Bastasic）。这是喀麦隆裔美国小说家，喀麦隆是一个非洲国家。我觉得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最重要的书。



《捉兔子》

《我们曾经多么美丽》伊姆博罗·姆布（How Beautiful We Were by Imbolo Mbue）



《我们曾经多么美丽》

《这就是我们如何去爱》丽莎·摩尔（This is How We Love by Lisa Moore）。她是一位加拿大作家，优秀的散文文体家，语言优美独特。



《这就是我们如何去爱》

《像这样的小事》克莱尔·吉根（Small Things Like These by Claire Keegan）。她是一位爱尔兰作家，语言能力也极为出色。



《像这样的小事》

我认为这些书都十分惊艳，而且都很重要。他们都是原创性极高的作品，而且有绝对紧迫的事情要告诉读者们。这些书涵盖了很大的范围。来自斯里兰卡作家的《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简直像史诗般惊人，它讲述了人对人所做的恐怖的事情。它就像《百年孤独》一样震撼我，我真的这么认为，或者像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捉兔子》和《我们曾经多么美丽》则是关于整个大世界的书，而《这就是我们如何去爱》和《像这样的小事》是关于我们作为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温馨而亲密的故事。我想了解人类的方方面面。

黄璐：感谢。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布兹比：我想说，总的来说，尽管有来自所有媒体和其他快乐之源的竞争，阅读仍然是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人们会去读书。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读书，但对于读书的人来说，读书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世界有多操蛋，我们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所以文学仍然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认为它会消失。

黄璐：你认为疫情对文学有什么影响吗？

布兹比：我认为我们还不知道，尽管疫情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但它还不算真正结束。书要花很长时间。尽管有一些关于疫情的书籍，但我认为真正的关于它的文学，我们只会在 3 到 5 年之后才能看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反应迟缓。写一本书、出版一本书需要很长时间。我想 5 年后，我们可能会清楚地看到疫情对文学的影响。

黄璐：你找到几个词来定义今年的文学吗？

布兹比：Bountiful(该词意为丰富的，慷慨的，大量的)。(文学)有太多太多(事情正在发生)了。这真令人兴奋的。但是，我还是有偏见的，哈哈，因为我热爱图书。

3) 另外.....

还有一份 2022 年出版趋势一览。我们在上一期的 Newsletter 里总结了受到多份主流媒体肯定的年度图书，也粗略提及了 2022 年一些重要的出版趋势，不过篇幅原因没有展开。在此总结如下，也作为对以上对话的背景补充：

有声书

阅读总是与视觉、触觉，以及新书的气味联系在一起。现在，对听觉的追求也使有声读物取得了进展，可以说有声书是近年来需求上升最为显著的文学载体。所有品牌都鼓

励自助出版和独立作家认真考虑出版有声读物、电子书和纸质书。有声读物可以和很多活动并行,如做饭、开车、做家务、通勤等等,这是它兴起的一大原因。根据一项研究,74% 的消费者在车里听有声读物,比去年的 69% 有所上升。研究还认为,随着智能音箱的发展,如谷歌的谷歌助手和亚马逊的 Alexa 等,有声书的发展趋势也会随之增长。

独立出版社

在美国,独立出版社是实验文学、性少数文学、边缘人种作家和新兴作者的重镇。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游民出版社 ([Nomadic Press](#)) 为例,它的使命是:通过出版物、活动和积极的社区参与,让有意被边缘化的声音在书面和口语世界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帮助纠正几个世纪以来根本不应发生的暴力和沉默,并与那些对未来有美好的共同愿景的人,建立联盟和社群伙伴关系。

在其中出版过的一些性少数和有色人种作家有感于和这些编辑的一对一合作,他们说:“在这里出版好像上了一堂研究生写作研讨班课”,以及,“这里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亲密社群”。

自助图书出版

自 2010 年以来,美国在线自助出版书籍的数量迅速攀升。疫情进一步推高了这些数字。现在,作家已经可以通过各种电子出版平台自助出版,如亚马逊 [KDP](#), [PublishDrive](#), [巴诺出版社](#), 苹果图书, [IngramSpark](#) 等等。

AI 助力写作与出版

可能你已经听说过聊天机器人 ChatGPT,它可以完成各种千奇百怪的任务,当然也包括写作。你可以提出要求:“写一个设定在旧金山的爱情故事”,它便开始一字一句写出一个故事,里面会出现旧金山常见的大雾天气和地标建筑;如果改成上海,则会出现里弄和街巷。不过,它的爱情故事似乎一直在遵循一些套路,比如人名、制造惊喜、野餐、求婚等等。而且,它也无法进行更高级的创作时,比如发明新故事形式。目前的共识认为,人工智能还无法取代人类的创造力。但它可以帮助内容生产者寻找灵感、检索事实、纠正语法错误、规划写作等。出版业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语法和剽窃检查,并计算全球消费者的阅读偏好。

作者投入数字营销

作者和出版商都希望与读者建立长期、持续的关系。随着自助出版趋势的兴起,作者们开始喜欢在个人网站或社交媒体上给粉丝们回信,参与线上活动、社交媒体聊天、播客采访等等,而非仅仅依靠出版商来推广图书。

在 TikTok (海外抖音) 上发帖,已成为许多作者的营销策略。例如,Tiktok 热门的文学话题 #BookTok,其视频累计浏览量超过 945 亿次。其中,并不是作者在谈论自己的书,而是真正的读者在推荐书籍、给出评价。据《福布斯》报道,2021 年, #BookTok 帮助出版商在美国销售了 8.25 亿册纸质书。



黄璐

中英两语青年写作者,旧金山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在读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NOAA on Unsplash](#)

档案

当世界似乎万劫不复， 我们如何在行动中找到意义？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关于环境与科技的变化，我们如此总结。

“那些自信预测到本世纪末气温将上升 5°C 的科学家，私底下可能会边喝啤酒边告诉你，她真实的预计是到本世纪末气温将上升 9°C。”2018 年，美国知名散文作者乔纳森·弗兰岑在《地球尽头的尽头》一书中写道。

弗兰岑并非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相反，彼时他已经相信，地球很快就会过热。但同时，他并不认同一些科学家与政客自欺欺人的选择：为让人们不失去行动的动力，而不断向民众抛洒希望，说什么“我们还有时间”。因为可以扭转这一切的节点恐怕早已错过了。2022 年的气候新闻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拉开帷幕的（以下未标注年份的时间均为 2022 年）。2021 年底，流媒体电影《不要抬头》上线。影片中，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角色知道彗星即将撞上地球，在电视上歇斯底里地大喊“我们全部都绝对会死的！”很戏谑，但也很真实，NASA 的气候科学家彼得·卡尔马斯 (Peter Kalmus) 写道，这就是今天成为一名气候科学家的感受。

电影播出时，地球才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第六热的一年，科学家们预测接下来只会更热。现实果然如此。二月，[南极海冰覆盖面积缩小到前所未有](#)；六月，[鸽子与鹰从印度的天空中暑坠落](#)；八月，[格陵兰冰原第一次落下雨滴](#)（而不是下雪）；与此同时，[洪水带走了巴基斯坦 1700 多人的生命](#)。

2022 年，[欧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高温对发达地区的侵袭，让人们对于热浪更为关注，也感受更深。整体而言，全球气温达到历史第五热，比前工业时期（1850 到 1900 年）高出 1.2°C，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 400 万年来最高](#)。

中国所受影响也十分突出，中部和东部地区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持久和广泛的极端热浪，伴之而来的是严重干旱。九江两个月未下雨，[芝麻渴死了，花生大多是空壳](#)。城里人大多仍以为干旱并不存在，将鄱阳湖当作奇景，一片没过脚踝的“草坪”与龟裂土地打造的休闲公园。但干旱的效应很快蔓延，高度依赖水电的四川省遭遇大规模限电，企业被要求让电子民，被强制停工十余天；重庆等地遭遇连续山火，[北碚区](#)在 45°C 的高温下燃起熊熊火焰。

展望未来还有更多坏消息。研究人员的[最新建模显示](#)，2023 年晚些时候将再次出现厄尔尼诺。这种名为“[小男孩](#)”（西语）的气候现象通常表现为海面异常变暖，会给印尼、澳大利亚北部等地带来干旱，给全球带来整体升温。2016 年，作为有史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就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科学家预测，新一轮的厄尔尼诺很可能推动气温在 2024 年再破纪录，一举越过 1.5°C 的升温界线。[即便是偏保守的估计](#)，也认为在未来五年，人类有一半对一半的几率会体验到升温 1.5°C 的世界。

1.5°C 的跨过让人感到恐惧，但其实即便只是 1.4°C 升温，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比起本不能逾越的警戒红线，如今这个数字的意义更在于能输入模型，运算后果，好让人们提前做准备。比如，[IPCC 三月发布的报告就显示](#)，如果不适应 1.5°C 的变暖，中国将因海平面上升和由此产生的洪水遭受全球最重大的经济损失，27 个主要城市的年高温相关死亡率将至少增加 50%。适应意味着一系列的行动，包括改造基础设施，建立更完备的预警系统，甚至于安排高危地区的居民进行季节性的迁移等等……而结合上一条信息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准备时间了。

这也是气候报告变得越发复杂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是一份面对必然会受损的未来，该如何继续行动的指南，但读起来更像是一段底线不断被突破，却被一再容忍宽限的不健康关系。

IPCC 的报告中，所有的排放路径都被置于几条不同的升温情景之下：控制在 1.5°C 下的情景、略微超出但在世纪末回落的情景、大大超出的情景……比如，[将升温限制在 1.5°C 左右](#)需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迟在 2025 年前达峰，并在 2030 年前减少 43%；要将升温限制在 2°C 左右则需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迟在 2025 年前达峰，并在 2030 年前减少四分之一。

[针对《不要抬头》的批评认为](#)，它很好地传达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所引发的情绪，但并没有足够能力去呈现这个问题，反而像大多数灾难片一样，传达出一个暧昧的意思：所有的阴谋论都是真的。政府在撒谎，科学家在撒谎，人民立场摇摆、偏执激进，真相掌握在一个红头发的售货员手里。

实际上，改善现实，减少未来气候灾难损失的途径，仍是依靠全世界政府的投入和通力合作。而随着内容走向具体的行动要求和实际的利益取舍，这些气候会谈每年都在变得更激烈和混乱。

十一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在埃及举行](#)。在现场的人描摹了一个奇怪的场景：东道国埃及采取了一种“极不寻常”的做法。他们没有与所有国家共享文本进行磋商，而是在一个周六的凌晨将个别国家和谈判集团一个接一个地带进房间，每次大约 20 分钟，展示文本的各个部分。代表们不确定他们看到的内容是否与其他国家相同，也不清楚他们所作的评论是否转达给了其他谈判人员。

即便如此，这场“[不透明、不可预测、充满混乱和猜疑](#)”的会议仍然带来了核心进展。此次大会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来补偿脆弱国家因气候变化遭受的创难。而为人诟病的结果则是，国家们没有提高减排的雄心，拒绝为此负担具体的指标。

十二月，延期改址的生物多样性大会 (Cop15) 在蒙特利尔举行。协议内容包括到 2030 年保护 30% 的陆地和海洋，重建 5000 亿美元的环境损害补贴，应对物种灭绝，增加生物多样性资金，促进和保护原住民的权利。[考验将是这些目标能否实现——10 年前设定的目标全都未能实现。](#)

政策上看，看起来更具希望的是各国各自的气候政策。八月，美国总统拜登[通过了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法案](#)，为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供暖和能效提供了 3690 亿美元的支持，法案可能导致到 2030 年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40%；澳大利亚则将国家的气候目标从 2030 年减排 26% 提高到 43%，还通过了该国自 2011 年以来首部气候变化立法；在巴西，卢拉的胜选被视为一个好消息，他取代了任期内大肆破坏亚马逊雨林的博索纳罗。

但对普通人来说，过去一年争论最激烈的话题的不是气候资金该如何分配，而是[把西红柿汤砸向梵高的那几个人](#)。人们为了这个问题吵成一片：你要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梵高的向日葵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事实上全球的气候抗议都在升温。四月，[全世界超 1000 名科学家走上街头](#)，发起针对气候危机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论文张贴在政府大楼的玻璃上，一并自己的手，往众议院的台阶上投掷假血，封锁道路和桥梁。一直以来，科学家群体采取的都是跟活动家不太相同的路线，他们选择理智冷静地用一份份报告和研究说明现实，但事态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

二者的行动并无明显区别，因为梵高的画被保护得很好，实际并未受到任何损坏。只是后者不涉及名作，关注的人果然没有那么多。两次行动都有抗议者被逮捕入狱，而警方则谴责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治安资源。

在对《地球尽头的尽头》的书评中，[《爱尔兰时报》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话](#)，“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头脑中存在两种相反想法的同时，仍能保持行动的能力。”随着气候变化万劫不复，当下该如何行动俨然从一个科学问题变成了哲学问题。

乔纳森·弗兰岑写下自己复杂的思考我们现在认识的地球就像一个患有严重癌症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用破坏性的猛药治疗它，在每条河上修筑水坝，用生物燃料、太阳能农场和风力涡轮机毁掉每一处风景，以多争取几年时间让全球变暖放缓。或者，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保证更高生活质量的治疗方案，在与疾病抗争的同时，保护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地区，其代价就是稍稍加速了人类灾难的降临。”

“后一种方式的一个优点是，万一出现聚变能这样的奇迹疗法，或者一旦全球消费率与人口数量下降，可能仍会有些完整的生态系统得到保全。”

人类从未停止试图一劳永逸地扭转地球的状态。前段时间，破坏性的猛药又多一枚：一家创业公司声称他们已经发射了气象气球，将在平流层中释放硫颗粒。这是“地球工程”的思路，一种人为操纵气候的方式，模仿大型火山爆发后发生的自然过程，将更多的阳光反射回太空。而有证据显示，尽管争议重重，美国政府也正[制定一项地球工程研究计划](#)，往激进的方向再进一步。

技术上这并不困难，但地球工程长期以来为人诟病，是因为人们并不了解大举介入自然的真正后果。逻辑粗暴，自以为是的行为，就像计划生育这类人口控制手段一样，会带来难以扭转的长期影响，意识到时往往为时已晚——2022 年，[中国人口 60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或许通过技术真的可以全盘改变地球，逆转气温，那可能将是个完全人造的环境，原本自然的地球生态不复存在，以人类生存为唯一宗旨。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在自然的废墟上重建家园？

2022 年的人工智能知道什么是 ABO 宇宙

2022 年发生了许多科技大事件：[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望向宇宙深处，寻找宇宙刚刚

出生时形成的星系;人工智能内容生成(AIGC)空前繁荣,从 Stable Diffusion(图像生成)到 ChatGPT (文本生成),技术的飞速进展引发创作的狂欢;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扩展应用到治疗常见疾病的临床试验,比如高胆固醇;研究人员在实验猪的身上“逆转了死亡”,在其死亡后一小时重新恢复了心脏和大脑的循环和细胞活动……

但这里想提的是一件有意思的小事。六月,美国参议员辛西娅·卢米斯 (Cynthia Lummis) 将一份拟议的加密货币立法草案放在了 GitHub 上,征求公众意见。这是美国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提出立法,“于是正如你可能预见的一样,人们提出了一些‘往马里奥游戏里面添加更多马里奥’之类的建议”,Matthew Butterick 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Matthew Butterick 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兼程序员,最近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多起集体诉讼的代理律师。这些诉讼案直指 GitHub Copilot 和 Stable Diffusion 这些人工智能生成公司,它们的共同点是利用公开的人类作品,不论是代码还是画作进行训练,最终反过来威胁到从事这些创作的人类作者。

人工智能对个人信息的使用早就深入我们的生活,不论是人脸识别收集人脸,还是算法推荐收集用户使用习惯,但人们似乎从未像如今一样对它产生好奇。过去围绕这些话题最多的讨论是关于隐私泄漏,如今人们也想知道这些深度学习模型的原理,以及自己的付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这种探索在过去一年变得深入了许多。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发生在 AO3 同人文社区,一些用户想搞明白 GPT-3 (OpenAI 的文本生成模型) 是不是从 AO3 上爬虫了内容作为学习数据。

于是他们尝试输入:史蒂夫不得不承认,他对新时代如何处理 Alpha 和 Omega 之间的社会平衡有一些保留意见。

AI 续写道:作为一个 Omega,他深知在高度有竞争力的 Alpha–Omega 关系和 Omega–Omega 友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多么困难。特别是像史蒂夫这样的人,他是非常好胜的,想成为一个职业官员。他意识到,他与他最好的朋友以及室友托尼之间的关系并不公平。

从续写结果能很直观地看出,无需解释,GPT-3 就天然地理解同人文专有的 ABO 世界观,甚至也知道史蒂夫和托尼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后文的续写还带出了巴基。他们,也就是漫威宇宙里的美国队长、钢铁侠和冬兵,常以多角恋 CP 的方式出现在同人文中。试验佐证了自己的猜测之后,这些用户给 AO3 写信试图阻止自己的内容被 AI 爬虫抓取练习,并同时在网络上发起抵制的倡议。这在过去一年逐渐积攒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即人类作者对被用于训练的反感和抵制,这是 AI 发展路上绕不过的伦理问题,如今终于浮出水面正式爆发。

因此如果要展望 2023,MIT TechReview 认为,这个问题预计将迎进展,监管也将更多地涉足这个“狂野西部”。与此同时技术并没有在坐等。2023 年预计也将是下一代大型语言模型启动的一年(因为 GPT-3 的下一代,GPT-4 马上就要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同属 OpenAI 的 ChatGPT 使用的模型为 GPT-3.5,而非 GPT-4。怎么理解这个进步呢?GPT-3 不到三年前问世时有大约 1750 亿个参数,而新的 GPT-4,曾有传闻显示,有大约 100 万亿个参数,是前者的 500 倍。

创作者们的焦虑还有一些其他缘由。美国记者 Ryan Broderick 将此称为“某种造物主时代的终结”,这里他指代的是互联网平台由“创作者经济”向“影响力经济”的转变。那个绚烂丰富、人才辈出的网络时代正在被组织化的内容给替代。他猜想到 2023 年,公共互联网内容将分为两种类型从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扒下来的半匿名短视频,以及半职业化的跨平台精品媒体机构。

AIGC 狂欢的同时,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领域则在 2022 年遭遇重创,整个 Web3 行业的资产价值下降了 70–90%,许多大型实体(贷款机构、交易所、加密基金等)崩溃。最新晋的发生在十一月,交易所 FTX 崩盘。风险投资家 Fred Wilson 写道:“这场大屠杀规模巨大,让我想起了 2000 年至 2001 年间网络行业所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些是市场自行其是,但并非全部都是。Web3 领域存在欺诈、管理不善、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以及更多的问题。”

展望 2023,他认为,尽管 Web3 有着令人信服的价值观,但他并不相信现在就回到水中是安全的,“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胃和非常久远的眼光”。

他人的关注视角之外,最后也希望借此机会总结一下这份 newsletter 在过去一年写过的科技话题(以下为时间顺序):

- # 乔·罗根、Spotify 与音乐人之战 # 【大平台】
- # 战争中,科技巨头高空走钢索 # 【战争】
- # 社交媒体,作为不完美的战时编年史 # 【战争】
- # 信息的手穿墙而过,战争报道中的信息核查 # 【战争】
- # IP 属地显示与匿名性的消亡 # 【隐私保护】
- # 马斯克与自由广场之死 # 【大平台】
- # 对于隐私保护,如果承诺管用,还要法律做什么? # 【隐私保护】
- # 惩罚巨魔,理解巨魔,制止巨魔 # 【大平台】
- # 手机要被收走了,你该怎么办? # 【隐私保护】
- # 想变成 TikTok,Meta 的算法焦虑 # 【大平台】
- # 不可靠的“云”# 【隐私保护】
- # 被改变的客服口音与“广西话”# 【新技术】
- # 伊朗抗议,断网的治理术 # 【公民行动】
- # 技术离开中国 # 【政治】

AI 生成艺术的下一步:版权问题 # 【新技术】
马斯克入主推特,带来了什么? # 【大平台】
防疫工具退役了,没有人怀念它 # 【隐私保护】
简单【分类】能看出,【大平台】正在遭遇中年危机,陷入转型的焦虑,有的直接被卖给了疯子;【隐私保护】受到持续关注,无一例外是涉及到中国的案例,不仅是关于保护信息,也关于如何保护自己;更具时间敏感性的是上半年的【战争】,当然,至今这

场战争也没有结束,它用自己长久的韧性和出人意料的发展,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已经来临。新型战场上,精确武器、卫星和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战斗方式,Starlink、无人机,甚至于 TikTok 都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电影《无名姐妹》(2022)剧照

档案 “女性、生命、自由”， 2022年小众群体动态关键词

Snufkin | Newsletter

这是对该领域过去一年的总结。

01

口号的产生：伊朗运动回顾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三个简单的词响彻伊朗，变得极其重要。“女性、生命、自由”，人群高喊着，并挥舞旗帜。这句口号迅速从线下蔓延至线上，它出现在示威活动现场，出现在卡塔尔世界杯观众席，也出现在社交平台的热帖中。

写 newsletter 的年终总结时，我想以这三个词作为连接，来回顾小众人群的这一年。因为无论是 LGBTQ+ 群体、原住民、黑人或是争取堕胎权的女性、残障人士等等，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们往往为同一种愿景而抗争，那就是平等的、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

“女性、生命、自由”，在英语世界里的翻译为“women, life, freedom”，它最早是以库尔德语“Jin, jiyān, azadī”提出的。2022 年 9 月，22 岁的伊朗女子 Mahsa Amini 因违反着装规定而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随之引发大规模且长时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在 Mahsa Amini 的葬礼上，妇女们摘掉了法律规定必须佩戴的头巾，开始高呼这一口号。而这一口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后期的库尔德自由运动。当时，库尔德妇女运动的成员们用这个口号来回应来自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迫害。库尔德人是一个总人口约 3000 万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四国境内。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民族，为了获得更大的承认和独立，特别是在土耳其，他们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

《金融时报》点评，“女性、生命、自由”总结了这个国家(伊朗)的 Z 世代——抗议活动的主要驱动力——所追求的：一种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现代世俗生活方式，并确保基本权利。

几十年来，性别不平等和对妇女的歧视在伊朗一直是合法的。1979 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妇女的权利受到限制，被强制要求佩戴头巾只是其中一项。这场争取平等的斗争一直持续至今。近期，伊朗人民已经见证了他们抗议活动所带来的部分改变。比如，官方宣布执行着装规定的“道德警察”(Gasht-e erhad) 被停职了。伊朗总检察长 Mohammad Jafar Montazeri 在一次针对示威活动的会议上含糊地宣布了这一决定，并补充说“道德警察”“与司法机构无关”。他也没有透露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的女性将会如何处理，只表示机构将继续“监督社区层面的行为行动”。此外，也有报道称，部分女性现在可以不戴头巾在公共场合行走——尽管着装规范仍然是法律强制规定。

但在 ARTFORUM 中文网翻译发布的《德黑兰狱中来信》中，今年 1 月再次被捕的库尔德记者/活动家马赫萨写道：强制头巾法案和道德警察被取消的烟幕弹在英文世界开始播

外界开始欢呼伊朗女性革命的胜利，而不再密切关注里面正在进行时的抓捕与监禁。最高领袖在电视上咬定这场抗争是境外势力的阴谋，他们正急于“找出组织”。

40 岁的阿拉什(Arash, 化名)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表示，一切都只是政府的表演，“如果政权放松对头巾的立场，它本质上是在质疑自己的基础和压制。”“宗教和头巾只是镇压的工具。”

据 BBC 报道，已有四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年轻人被处决，另有 18 人被判死刑。显然，伊朗当局的目的是让要求自由的抗议者们感到恐惧，但异议仍在继续发酵。

改编自伊朗裔插画家 Marjane Satrapi 真实经历的动画长片《我在伊朗长大》有一句经典台词：“永远不要忘，是恐惧让我们失去自由意识，把我们变成懦夫。”片中小女孩的经历就如同今天报道中的伊朗当代年轻人，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了解不同的社会方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怕发出自己的声音。

最新消息是，南部城市扎黑丹上周五仍发生了新的示威活动，数千名抗议者在星期五的祈祷后走上街头，尽管安全部队封锁了主要道路。与此同时，伊朗货币兑美元汇率周六跌至历史低点，欧盟可能对德黑兰革命卫队实施制裁。一些欧盟成员国想要更进一步，把革命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归为恐怖组织。

02

2022 年的小众人群

2022 年的女性：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而战

“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金斯伯格的这句名言在 2022 年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一年，世界各地的女性仍在为自己的自主选择权不断抗争。

回顾过去，会发现早在 Mahsa Amini 之死引发大规模抗议之前，伊朗女性就已经走上街头。每年的 7 月 12 日被伊朗政府定为“全国希贾布和贞洁日”(National Hijab and Chastity Day)，去年的这一天，数百名女性走上街头，摘掉希贾布(穆斯林妇女穿着的头巾)，以抗议伊朗政权强制实施的头巾法。数十名著名的妇女权利活动人士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全国希贾布和贞洁日’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对伊朗人民、尤其是女性发起新的镇压浪潮。”#No2Hijab 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被国内外伊朗人广泛传播了好几天。“我应该有权决定我想穿什么，而不是因为我的选择而被监禁。”#No2Hijab，“一位女性用户在推特上写道。

本次抗议活动中，至少有两名女性活动人士被伊朗当局逮捕，数十人被拘留。

此外，引发爆炸性讨论的事件还有美国“罗伊诉韦德案”的推翻。5 月，由最高法院大法官 Samuel Alito 撰写的一份近 100 页的意见草案被泄漏给了新闻媒体 [Politico](#)。该意见虽然不是最终决定，但表明最高法院 9 名法官中的 5 名保守派将投票推翻 1973 年使堕胎合法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当时，Planned Parenthood、UltraViolet、MoveOn 等非营利组织立刻联合组织了多场示威活动，他们的集会口号是“[Bans Off Our Bodies](#)”。此外，Ariana Grande、Billie Eilish 等名人也在[纽约时报](#)联名支持堕胎权利。

但一个多月后，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还是正式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这意味着该国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宪法堕胎权利不再存在。现在，美国各州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管制堕胎了。[《柳叶刀》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最高法院的裁决基于一份 18 世纪的文件却对 21 世纪妇女的现实情况一无所知。该文章认为，“投票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法官不会成功终止堕胎，只会成功终止安全堕胎”。

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使用药物堕胎有时是一些意外怀孕的女性的唯一选择，且堕胎药物的获得变得更加艰难了。各州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持续至今——今年还是“罗伊诉韦德案”50 周年。最高法院至今仍在寻找意见草案的泄密者。而随着 2024 年初选临近，堕胎问题正在成为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关键点。

没有选择的还有阿富汗女性。过去一年，阿富汗女性的处境更艰难了。自从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的女孩们一直被迫从高中辍学。该禁令针对 7 至 12 年级的女生，主要影响 12 至 18 岁的女孩。去年 2 月伊始，一些阿富汗女性上街游行要求获得教育、工作和人身自由的权利，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镇压。迫于国际压力，塔利班曾在 [BBC](#) 的采访中承诺，所有女孩将在 3 月底阿富汗新年伊始时返校。但很快人们就察觉到，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九月初，四所位于阿富汗东部的女子学校曾尝试开学，但它们都没有得到塔利班教育部的正式批准，[最终又重新关闭](#)。

当然，在糟糕的倒退之外，也有一些好消息传来。比如，哥伦比亚最高法院于去年 2 月底宣布，支持怀孕 24 周内堕胎合法化，这项裁定意味着，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墨西哥](#)、[阿根廷](#) 和哥伦比亚——已经全部将堕胎合法化；苏格兰宣布包括卫生棉条和卫生巾在内的经期用品在苏格兰向任何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这是他们结束“经期贫困”行动的一部分；还有，经过六年的审议，2022 年 4 月 12 日，印度尼西亚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首次宣布强迫婚姻(包括童婚)和性骚扰为非法，无论是婚内还是婚外的身体虐待罪最高可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印尼此前的刑法不承认婚内强奸。

在同一张地图上标记这些事件，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女性能够使用的“武器”以及所要面对的“战争”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同一段时间里，当一些女性在争取冠姓权或卫生巾时，还有一些女性要争取的是基本的温饱以及身体不受虐待的公平。而这正体现了“结构”的责任。在强调女性的个体自主时，不能忽略的是“结构”对她们的限制。另外，过往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没有独善其身这回事。在“全球化”这个词逐渐被淡出的当下，全球女性的命运仍然息息相关。

2022 年的生命：存在于数据里的死亡

俄乌战争贯穿了整个 2022 年。自去年 2 月 24 日开始，众多主流媒体都开辟了独立板块，实时更新这场战争的最新情况。

[CNN](#) 报道，这个农历新年，在距离白俄罗斯边境几公里的地方，乌克兰军队正在为他们预计的残酷春天进行训练。卢甘斯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负责人 Serhiy Hayday 说，民兵在与俄罗斯人作战时士气低落，因为他们被派去进攻时必须经过大量尸体，一些昨天还在

交谈的人就躺在那里。

根据联合国人权监测团的记录,从2022年2月24日到2023年1月9日,这场战争共导致6952名乌克兰人死亡,1万1144人受伤。而俄罗斯方面,《纽约时报》引用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米利上将(Mark A. Milley)去年11月提到的数据,俄罗斯的伤亡人数“远远超过10万名士兵”。

在过去一年中,这场如今陷入僵局的战争被反复提起的就是各种伤亡数据。除了死伤的士兵,还有上千万流离失所的、生活被摧毁的平民。

为了活下去,自战争伊始,便有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逃离边境。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逃离战区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考虑其它潜在的危险。美联社就曾报道,波兰一名49岁的男子因涉嫌强奸一位19岁的乌克兰难民而被拘留,这名女性不会说波兰语,他在互联网上以提供庇护所为由引诱她。

显然,由于数量过于庞大,政府或机构不可能对每一个愿意接送、接收难民的人进行审查。被欺骗、被敲诈,甚至在过程中付出生命——难民、移民或寻求庇护者在边境常遭遇这样的命运:

2022年4月20日凌晨4点30分左右,528名非法移民逃离马来西亚北部的移民拘留中心,其中大部分是罗兴亚人。在他们匆忙逃跑的过程中,包括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试图穿过附近的高速公路时被高速行驶的车辆撞死。

2022年6月2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酷热天气下,警方和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在一辆卡车及其附近区域发现了64名非法移民,其中48人当场死亡,16人被送往医院。这16人中有5人最终在医院死亡。他们大多来自墨西哥,也有部分来自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许多人死于热衰竭、中暑和脱水。

除了战场与边境的死亡,2022年世界各地还出现了多起枪击事件。最为轰动的莫过于7月8日上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遇刺身亡。此外,5月24日的美国得克萨斯州校园枪击案造成21人死亡,包括19名学生和两名老师;6月25日凌晨一名42岁的伊朗裔挪威男子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开枪,造成2人死亡,21人受伤;八天后,7月3日下午,一名22岁的男子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朝人群开枪,造成3人死亡、4人重伤。

尤其在大规模事件中,大部分生命的命运在新闻上只是死亡数字的组成部分。但这些数字能否带来反思与改变?能否促使新的解决方案出现?或许这才是记录的意义。

比如,得克萨斯州校园枪击案后,美国开始了新一轮关于枪支管制以及公共安全的各方辩论。数千人在华盛顿集会,呼吁枪支改革,呼吁出台更严格的枪支法律。枪支安全组织March For Our Lives呼吁禁止攻击性武器,对试图购买枪支的人进行普遍的背景调查,以及建立一个全国许可制度,对枪支拥有者进行登记。

乌克兰难民安全事件背后,斯洛伐克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部队在边境进行干预,以保护可疑案件中的妇女和儿童。柏林警方也在社交平台上用乌克兰语、俄罗索语、英语发出警告,妇女和儿童不要接受过夜邀请,并敦促他们报告任何可疑情况。

而至于俄乌战争本身,在当下,就像《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所写的:“唯一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却没有表现出他会这样做的迹象。”

2022年的自由:也保守也改变

过去一年,LGBTQ+群体有获得更多自由吗?

古巴的性少数群体或许会给出肯定的回答。2022年9月26日,古巴国家选举委员会表示,古巴压倒性地通过了一项全面公投,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和收养孩子。在这个曾把同性恋群体送进劳改营的国家,这是LGBT权利倡导者的一次巨大胜利。它的通过将使古巴的同性婚姻和民事结合合法化,并允许同性伴侣收养孩子,促进男女平等分担家庭权利和责任。

新加坡与东京的人们则可能给出相似的答案。5月,东京市政府公布一项计划草案,宣布从11月开始接受同性伴侣的登记,承认性少数群体的伴侣关系。但伴侣关系的认可仍然不等同于合法婚姻,日本法律尚未承认同性婚姻。8月下旬,新加坡宣布将结束殖民时代将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这似乎是该国同性恋权利倡导者的一个重大胜利。但在废除这项法律的同时,新加坡政府重申了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

美国的跨性别者经历了较挣扎的一年,因为3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Ron DeSantis签署了该州备受争议的“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法案。它将禁止学校人员或第三方在课堂上向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有关性取向及性别认同的内容,反对者称其为“Don’t Say Gay”法案。美国阿拉巴马州则开始禁止医生为19岁以下的跨性别青少年提供医疗服务,包括激素疗法和手术等,违者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格兰在12月下旬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改革,使跨性别者更容易改变他们的法定性别,包括取消对性别焦虑症的医学诊断,并将最低年龄从18岁降至16岁。性别认同改革(苏格兰)法案以86票对39票获得通过,得到了执政的苏格兰民族党和议会中除保守党以外的其他党派的支持。

除了性少数群体,2022年积极抗争的还有劳工们。首先是星巴克的员工们,水牛城的一家星巴克商店在2021年末宣布成立星巴克工人联盟(Starbucks Workers United),从那时起,超过20个州的100多家星巴克门店纷纷效仿。2022年上半年,工会向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提出了数十项指控,包括拖欠工资、解雇工会组织者等。TikTok、Gorillas和特斯拉等公司的柏林员工们也曾试图组建劳资委员会,尽管该举措遭到他们的科技雇主的反对。8月,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AB 257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在于成立一个快餐委员会,为加州的快餐工人制定全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与健康和安全有关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

不得不提的,还有言论自由。过去一年,因言获罪的人仍然很多。8月9日,34岁的沙特公民Salma al-Shehab被判34年监禁以及34年旅行禁令,原因是她拥有一个Twitter账户,并关注和转发了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的发言。11月7日,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州的一家法院裁定,两名TikTok创作者因制作了一段视频将被判处鞭刑,原因是他们在视频中诽谤了该州州长。同月,尼日利亚一名24岁大学生在学校被捕,原因是他曾在推特上发布了暗示该国第一夫人滥用公共资金的帖子。

03

2023年1月小众人群 newsletter 更新

韩国计划为在职父母延长产假

韩国雇佣劳动部一月初表示,计划将在职父母的产假从目前的1年延长至1年零6个月。部长李正植在向总统报告的《劳动部今年工作计划》中提出了上述内容。政府正在努力保证在职父母双方都可以享受长达18个月的产假,旨在减轻人们抚养孩子的压力,鼓励生育,以应对该国极低的出生率。

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而且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政府数据显示,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9年达到3800万的峰值,到2040年将减少900多万。尽管在过去的16年里,政府在儿童保育补贴和产假支持上花费了超过2000亿美元,但它仍无法扭转这一趋势。

根据韩国现行法律,夫妻必须在孩子八岁前休产假,在前三个月的产假中,夫妻可以获得每月收入的80%——由政府的就业保险系统资助——如果这个数字在70万韩元(约人民币3844元)到150万韩元(约人民币8238元)之间。在剩下的九个月里,父母可以得到月薪的50%,但也有一个数额限制——最少70万韩元,最多120万韩元(约人民币6592元)。

东京太拥挤了,日本政府希望一部分人离开

日本将为迁出拥挤不堪的首都家庭提供补助,以振兴农村城镇,并缓解大东京地区空间和公共服务的压力。据日本中央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从2023年4月开始,东京市区的家庭,包括单亲家庭,如果他们搬到全国人口较少的地区,每个孩子将有资格获得100万日元(约人民币5.1万元)的补助。这些激励措施适用于18岁以下的儿童。

这不是政府第一次尝试用经济激励来鼓励人们离开,但这个计划更慷慨,是目前提供金额的三倍。共同社称,一半的资金将来自中央政府,另一半来自地方政府。东京是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大约有3700万居民。与此同时,伴随日本迅速老龄化的趋势,农村城镇的居民越来越少,还有数百万空置的房屋。

政府发言人表示,那些搬迁的人可以在该地区工作,建立自己的企业,或者继续在东京的工作岗位上远程工作。希望轻松拿到补助的家庭或许会失望,因为政策将规定他们必须在新房子里居住至少五年,家庭成员中必须有一名成员在工作或计划开办新企业,在五年内搬离的人必须归还补助。

塞拉利昂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妇女权利法

一项开创性的新法律于上周四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生效。塞拉利昂议员们于去年11月一致投票通过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法案》。上周,塞拉利昂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该法案包括一系列改变,比如,它规定所有指定的私人和公共机构都必须确保至少30%的劳动力是女性;雇主必须为女性提供至少14周的产假,以及与男性同等的薪酬、培训和待遇;如果银行未能向女性提供与男性相同的商业支持机会,则应承担刑事责任。政府表示,就业法将适用于任何员工超过25人的企业,但最终决定尚未做出。塞拉利昂总统Julius Maada Bio为妇女们过去受到的恶劣待遇向她们道歉:“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对你们不公平。”性别与儿童事务部长Mandy Tarawallie将负责指定新法律适用的组织,她称赞这项法“将打破全国城乡妇女在经济和政治上被排斥的枷锁”,但“在该国可以说实现了性别公平之前,还必须采取更多措施”。

英国转换疗法禁令将包括跨性别者

英国政府正在寻求进一步打击那些声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所谓治疗。政府此前曾表示,跨性别者的转换治疗将不包括在禁令中,但现在,文化部长Michelle Donelan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新法案将很快公布,并将“保护所有人,包括那些因性取向或变性而成为攻击目标的人”。据BBC,英国2018年的一项LGBT调查发现,5%的受访者接受过转化治疗。

该法案将在立法前将接受一个联合委员会的审查。这不是英国政府第一次作出这样的承诺。早在2018年,政府在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LGBT行动计划后发布了一系列声明,其中一项主要承诺就是计划停止所谓的转换治疗。

LGBT+反虐待慈善机构Galop的首席执行官Leni Morris告诉BBC,她很高兴看到跨性别者将被包括在拟议的禁令中,并鼓励政府尽快提交议会。而基督教关怀组织表示他们正准备对这一领域的任何拟议立法采取法律行动。首席执行官Andrea Williams认为,这项禁令“最终将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进行自愿对话定为犯罪”。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电影《二十世纪女人》(2016)剧照

专栏

我就是很想跟大家聊天呀”| 接力访问 006 里林

杨樱 | 接力访问

“可以做些事情，只要还有一点点动力，
足够做下一件事情，就够好的了。”

有一段时间，里林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可以走出关掉经营了十年的书店的消沉，还有婚姻故障带来的迷茫。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别人做错了什么，还是没有人做错了什么也会走入这样的困境。

里林想跟朋友们讨论这些一言难尽、也根本说不清楚的私密话题，又不想止于对话。她需要被疗愈，又不想沉浸在自己的哀伤里。于是她跟朋友赵晶约定做一场演出，谈谈“作为女性的自己”。

她俩定期约见聊天，从小时候的性别意识萌芽和各种偏见聊起。两人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又能感同身受。不相关的往事在对话中交织起来，其中一部分渐渐沉淀为演出的内容，这个时候，里林发现自己好像才刚刚认识赵晶。她才知道赵晶几个月大就被送到大娘家，到了上学年龄才被接回家，这段经历对她造成了长久的创痛。而她最初和赵晶对话的初衷，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没有生育过的人，希望在靠近一个怀孕的朋友时可以感受某种女性状态差异。

“在对话开启之后《女子负像》这个演出题目就定了下来。我们发现，我们一开始这个话题，就想知道更多、更多其他人的故事。我觉得说作为女性，我只能认识我自己——我是说真正认识一个女的。每一个女性都有属于她自己的性别经历，这个经历往往是有许多伤害的，她也想表达，她甚至表达不清楚受的是什么伤害。”

《女子负像》之后，里林没有找到什么答案，而是问出了更多的问题。但是她发现了一件新鲜事：自己很喜欢聊天。对话和相处可以带来能量——这次经历成为里林后来做女性话题讨论活动的起点。这几年讨论过的话题从“性幻想”，到“月经”，到“自慰”……有时会结合木刻活动，有的还被做成小册子。

“每次想要讨论的话题，都是被触发而起的。比如开始聊月经，就是在之前的活动中遇到不知道卫生棉条的女生，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因此后来屡次被批评为月经用品进步论者，自己开始还不承认。在后来讨论中，我确实收获最多的，了解了不同人使用卫生巾、棉条、月经杯、月经内裤等各种产品的体验和各种迥异的月经故事。想法也有些变化，不再会觉得某种东西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更好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经历和体验都不一样。”

里林之前开一家“回声书店”，在海边，很受欢迎。书店不大，但是兼职的“选书人”不少，她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做书店的核心就是选书和编辑书架。站在书架前，经营者的用心一目了然”。里林还在书店里不停地做活动，放映会，作者讲座，对谈，音乐演出……这是她的爱好，也是做书店的原动力。她最受不了的是两种提问：一种是，“你到底为什

么要做那么多活动啊？”，另一种来自媒体，“请谈谈你做书店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好吗？”其实书店不算亏损，但它最终在 2017 年关闭，一是因为挣钱少了，许多她喜欢做的活动都做不成了，二是在书店里已经越来越难遇到真正的读者。

于是她开始了最初提到的，寻找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除了对女性话题的思考，和更多具体的人接触还给里林带来了一个新感受——她说开书店的时候她看人与人的关系要抽象得多，仿佛她代表的就是书店，而其他人是模糊成一片的“读者”。但是现在搬到上海做工作室之后，遇到的每个人，“一个是一个”。曾经做书店的时候她“雌心勃勃”，如今自我缩小，承认自己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但还是可以做些事情，只要还有一点点动力，足够做下一件事情，就够好的了”。

书店关了对话继续。另一件新事是木刻。里林没有美术功底，对木板和刻刀却天生有感觉，拿起刀来就好像一直是干这个活的。其实三年前她才在广州朋友那边接触到了木刻，回去就做了“作坊”，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随地刻，到处印。比如她有件“上身书”，是数张印在布上的木刻画叠在一起，缝在 T 恤上，就在胸口的位置。

我是从一张木刻画海报认识里林的，那张叫做“搓碟大师”的海报画的正是女性自慰，大概是 2022 年春节前，在上海一家水果店的大门上。后来里林解释她为之命名“搓碟”的原因：男性自慰有太多专有名词，而女性就很寥寥。“开始聊自慰话题就是因为觉得女性愉悦需要一个积极可爱的昵称，之前没有想过的，现在大家可以一起想一下，比如搓碟啦！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幅画都让人觉得很猛”尤其是水果店门口人来人往，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受过这种冲击力。



里林不觉得“讨论组”以“自慰”和“性幻想”为话题需要某种掩饰，难得的是参与她的活动的人也是。有一次做木刻工作坊，在座的男生女生埋头刻板，突然就像聊下午茶点心一样，大家的话题转向了阴道、自慰和高潮……谈话一秒空场都没出现，每个女性都看着自如、放松，每个男性也是。

木刻的简约很吸引里林，只要有胶板、颜料和刻刀，任何材质上都可以印上任何内容，而这些工具，一个双肩包就可以装下。而这些和女性话题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妙了。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

A：我想做有关性交易的聊天，关于性交易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这虽然是个很复杂的话题，但也可能很切身，完全不抽象。我只想跟女性一起讨论，因为这次我感觉如果有男性参与，会更容易起冲突。而且即使是在女性中间也会有很大的分歧，甚至可能会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Q：这个想法怎么出现的？

A：身边有朋友因为这个话题在线上争吵起来。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想清楚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所以才想跟大家一起聊天。我每次做讨论活动都是因为我有困扰，或者对什么问题很好奇，想知道更多，觉得需要跟大家一起聊聊才能清晰点。我真觉得很多时候，只有跟朋友在一起面对面相处，充分聊天，坦诚对话，才有可能实现某种最低共识。

Q：你打算怎么做？

A：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刺激，就开始问一圈身边的朋友。我以为会很一致的朋友都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有些朋友提到了非罪化，也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有人对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有抵触情绪（瑟瑟发抖）。但我就是很想跟大家聊天呀。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爱画画的吴姥姥。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Tom Tor on Unsplash

专栏

“我是茨威格笔下的维也纳人” | 接力访问 007 Yuan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破产的世界公民”。

Yuan 是 1982 年出生的西安人，也是西安交大创立工业设计系头几届入学的学生。他永远记得西安交大那个系主任招生的时候对他用的“伎俩”：“他给了我一个盒子，是从德国带回来的一个药盒，然后对我说你把这打开。我打不开。他就在中间一摁，盒子就翘起来了，是一个机关。他对我说，‘这就是设计’。就一下子把我击中了。”

后来去瑞典读研究生，他也记得当时的触动，这个更为直观：他看到机器人在给火车自动切换铁轨。他想他就是会为这一类东西感兴趣的人，而他上学、留学甚至一直到创业的时间又给了他相当的机会，让他看到更多类似的“触动”，感受到那种眼界被打开的感觉。他喜欢那份叫做 Monocle 的杂志。很多人喜欢这本 Wallpaper 创始人创办的杂志，是因为它的“高级审美”，包括整整齐齐地排列物品，从上至下俯拍的视觉陈列方式。也有人喜欢它以国家为采访对象的“野心”，迷恋它每年的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不过对 Yuan 来说，Monocle 是第一家让他看到全球有那么多小众存在的媒体，在此之前，媒体视野都是主流的、宏观的。只有 Monocle 会罗列出全球的小众店铺或者商品。

毫无疑问 Monocle 是极度物质化的，它从不以深刻的访谈或者报道见长。但 Yuan 的迷恋不是没有道理。在中产阶级消费日益大众化的时代，许多人希望作出个性区隔，Monocle 只不过比大多数人更早看到了“本地化故事”的全球市场。

2015 年，Yuan 和两个女生一起创立了自己的配饰品牌。他做事的节奏并不快，第一批包袋上市要在一年多之后。在“生活美学”消费最流行的那两年，他也没有扩张，但一直健康地活着。到了 2021 年，资本突然找上门来，因为当时“新消费”已经是为数不多的选择。做了几份商业计划书之后，他还是放弃了。因为团队的共识还在，健康最重要，包也不是一个人需要频繁大量消耗的东西。

可能在他喜欢 Monocle 杂志之前就是这样了，对小众的东西更有好感。只不过 Monocle 强化了他的这个偏好。这其实是一种奢侈选择，在大众市场才是主流的今天，守住利基市场意味着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Yuan 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不然他不会用“破产的世界公民”来形容自己，“沐浴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并且相信改革开放的人”。这份隔空自嘲，有点像茨威格笔下的维也纳人。他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带着戏谑，又有点黯然。这是他怀念 Monocle 的原因，“它给你一种对生活的向往，让你知道世界还很大，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最近 Yuan 在考虑将公司搬去深圳，因为供应链配套完整的包装供应商几乎都集中到广东那一带，其他地方，比如他现在合作的浙江企业，都逃不过产业转移带来的颓势。最近唯一的好消息，是出口在年底的时候又重新运转起来，而他也准备好好把之前酝酿好的海外市场更好地做一做。

Q：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A：招了一个非洲某国的小朋友来公司做市场推广。

Q：这件事怎么发生的？

A：我们几个月前希望进一步找一个海外推广的兼职人员，发布在一些招聘和社交平台上。

本来希望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海外的人，结果意外的、惊奇的发现国内原来有大量南亚和非洲的年轻小朋友们在半工半读。然后面试了一些，发现大家能力都挺不错。（也可能在广东地区，这种事很早就是常态了。）

Q：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有趣？

A：有趣的点在于，我们办公室又开始进入了很多年前我进外企时，在工作环境中会遇到不同国家的人，除了工作中思维不同的碰撞也会有不同文化的日常沟通带来的小趣味。也就是多元性文化带来的趣味。这个小朋友进公司后，让我觉得本国和海外脱钩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且仿佛看到了 90 年代在美国和欧洲淘金的中国人的身影。历史总在螺旋重复。再次见证这件事新一轮本身，就足够有趣了。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艺术家烟囱。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为画展现场

几年的积累，由老杨从事策展的朋友共同挑选。画展办在朋友的一个空间里，门口摆着一张折成三折的薄纸，一面印着老家村口大路的照片，一面以一个池塘一样的版式，弯弯曲曲地写满了吴玉莲的生平，你得让纸在手中转着圈才能顺利读完，如果抒情一点想，你会觉得这就像她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障碍。



吴姥姥的画

但吴玉莲的画不是这样。吴玉莲很少凭空画画，她通常都是随机“临摹”某个形象，但完全是用自己的笔触和色彩。老杨那些科班出身的朋友羡慕这种大胆和直接，“就好像小朋友，有一种果断，但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你对材料和规则越来越熟悉之后，你的果断就变成了斟酌。但是吴姥姥能一直保持小朋友的状态。她不犹豫。”

老杨从来没有用类似的词句来形容过母亲的画，他只是说每个人看吴玉莲的各种画都能找到自己更偏爱的那些。吴玉莲本人更没有评价，她好像从来不回头看自己画过的东西，如果要问她这次画展上她最喜欢什么，她的回答还是：“都不咋地。”

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吴玉莲出于直觉，一直在变化画法。有的时候是手指直接涂抹，有的时候只是寥寥数笔，而她的画材都是废物利用：孙辈丢弃的画笔颜料，路上捡回来的口红，不用的作业本和账本，甚至别人丢掉的婴儿床床头板。老杨留着所有的画作，尤其是那幅马。马画在一张浅棕色的薄纸上，色调和线条都很简单。



马的画

专栏

“通过她的画， 我们的感情能连接起来” | 接力访问008 吴玉莲、老杨

杨樱 | 接力访问

接力访问的是吴玉莲，
但只有通过画和儿子，她才能被讲述。

老杨是从一幅画马的画开始重新看待母亲的。在这幅画出现之前，老杨和吴玉莲的人生交集只停留在他15岁之前。“不着家”，吴玉莲对大儿子的评价简单明了，这个状态从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了。吴玉莲不知道儿子在干什么，“我们俩也不大说话，他也不大着家。我说谁有能耐谁使，谁能挣钱谁自个挣。这家就这样。”

老杨1971年出生于辽宁盘锦盘山县（这也是吴玉莲的出生地），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在粮库工作，全家人从中得益最多的除了最早三十多元的月工资，可能就是在父亲操作机器往外吹稻壳的时候，出口稍微松那么一点儿，就可以带出一点碎米。此时吴玉莲就会以工人家属的身份，去加工车间房后的稻壳山上出风口那里，把混有碎米渣和瘪稻子的稻壳装进口袋，拖到空地上，一点一点地吹去稻壳、筛除石子、土坷垃、稻草梗等杂物，再绕路将几斤碎米背回家。即便如此，父亲作为一大家子人里的长子，还得不时往外贴补。吴玉莲也是一样。所以老杨提起“忆苦思甜”之类的号召就咬牙切齿：“什么叫忆苦思甜？中国最穷、最受剥削的老百姓，一直都是在苦水里泡、泡到死的人，然后好不容易有点甜日子，还叫他忆苦！”

老杨想逃离这样的日子，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盘锦，在一家美术装潢店打过工，印劳模锦旗跨栏背心那种，白天的工作台就是晚上的床。而后去了大连，又在2003年去了北京，给偶然认识的地下摇滚乐队朋友们卖唱片，也做自己的艺术项目。因为2012年左右北京雾霾严重，又搬去了云南大理，而后是深圳，如今则是广州。这一路迁徙基本上尊崇两个原则：逃离不友好的自然环境，寻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和母亲的相处，除了无法推卸的赡养责任之外，从内心层面上完全出于一种偶然。

2002年，丈夫去世，吴玉莲主要跟着女儿生活，偶尔被老杨接去住几个月。她开始画画就是在2005年的北京，老杨的住处。“上他那来，待不住，待不住就给你买笔、买纸，就画画。完了跟我说瞅那人，挺好，就叫我画，我就画。我都画了。（指着住处墙壁上的荷花）那个我都画了，对着画。不画画我就待不住，我就溜达。他没有电视。我看手机。”吴玉莲说：“我去那年，正好是鸡年，我本命年。他买一张年画来，带福字，我都画下来了。”这是吴玉莲第一次作画。老杨觉得好看，留着，让她继续画。俩人从未探讨过审美和艺术标准，直到现在，老杨选中的画，吴玉莲也都觉得“不咋地”，反之亦然。

2023年初，78岁的吴玉莲在广州出席了人生第一次作品展，展出的画作都来自之前十

“那是她的作品第一次真正触动我。之前从2005年开始，我鼓励她画画，其实都是为了让她晚年有点事，别捡破烂了，做点别的。然后她画完了，我往旁边一搁，其实我都没怎么认真看。但等到这一张被我看见的时候，我才真正去了解她，去理解她，才走到她的内心。”

“像我妈妈这样的人，中国最底层、最辛劳的人，然后又是价值观最扭曲，是吧？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你如果说用现代的心理学去考察中国家庭，没有一个不是病的。你要跟他平等地想讨论什么，建立平等，没有30年你都建立不起来。”

老杨尝试与吴玉莲对话，并且是用一种知识分子式的“人皆平等”的心态。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但对于吴玉莲来说，这种沟通不能说是友好的。两个人的生活观念差异过大，即便老杨的生活也很简朴，但吴玉莲更甚。“我爸爸去世之后，我们都在外边了，我妈妈自己在家。她怎么样？她到处去捡纸皮，捡回来旧衣服，裁成小方块，三层，拿针线简单缝了做成抹布，卖给修摩托车的地方，几毛钱一块，人家收这个。这对于我来说，因为始终匍匐、挣扎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线上，即便是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仍然完全无视个人健康和生活质量，完全不是正常人应该过的。对于她来说，竟然还挺享受这样。”这样的对话当然是无效的。老杨发过脾气，也讲过道理，都没有用。他无法理解母亲对生活的态度，也对这种生存状态感到厌倦和恐惧。在这种状况之下，一幅画着马的画当然不能点石成金，但它产生了一些别的效果：老杨发现了“在妈妈身上不可能有的东西”。“她能表达自我。你今天跟她聊多少，她也不能自我表达。被生活压迫在最底线的人，不可能很好地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关照到孩子的需求，所以这种母子感情都是破碎的。我自己一直喜欢读书，就想脱离这种状态，进入人的精神面貌和那种生存状况完全持平的环境。等到我觉得说，我好像读了一点书、能去了解事情的时候，发现跟她（沟通）特别不畅通的，完全没有办法建立任何对话和交流。当时有机会去国外，你知道我怎么想，我就不想回来了。”

“是因为这幅画，我发现我跟她还是割舍不开的，因为她的晚年是可以想象的。中国的老人必须依赖孩子，就没有别的可能。就像她跟我爸爸，争吵一辈子，感情不和，家暴一辈子，她没有别的选择，就没有可能做独立女性是吧？家庭始终都是那种悲哀的氛围给笼罩着。然后就是因为这一幅画，我知道她可以自我表达，她有精神世界，然后通过她的画，我们两个的感情能连接起来，这等等的一切。我觉得之前我想逃离的故乡、我自己来自的阶层，忽然一下子，所有的可能性都在这了。”

在老杨说话的整个过程中，吴玉莲除了在说到“感情不和”的时候说了一句“那时候没钱”，

一直没说话，也没准备说话。最后老杨指着那张马的画说：“你看这纸，这个是包中药的。那一段时间在北京，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都亚健康，然后正好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馆），叫德寿堂的，我们隔一段时间去抓一次中药。这是中药包装纸。”

北京是吴玉莲住过的所有地方里最喜欢的。原因模糊不清，但“长安街”很重要。她和老杨住在宋庄小堡村，多年之后，去长安街的记忆已经在吴玉莲的脑海里扭曲错位。“地铁不坐，我都走去呢。啊，去看毛主席，没看着，没开（门）。溜跶，在长安街。”

宋庄离毛主席纪念堂超过 30 公里。老杨唯恐我们当真，但是他好像更为另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就她，还记得长安街？”

吴玉莲出生于 1945 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到四十岁的时候牙齿就纷纷脱落坏死。她去老家市集上拔牙，不打麻药，“疼迷糊了”。等到子女们给她重新装上假牙，萎缩的牙龈和假牙之间已经无法完全咬合。吴玉莲在聊天的时候会说牙疼，但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特别白、特别整齐，和她皱纹很深的脸几乎形成了反差色。

Q：你最近做什么有趣的事了吗姥姥？

A：没了，我就画点画，看手机。

Q：画画有趣在哪里？

A：我也没啥能耐，反正就是画两张画。

Q：手机上都看啥呢？

A：看视频。看人家手机有点啥图，我也照着画。

B：这话题可大了……有时候跟我说什么影视明星死了，好多人得新冠咋咋地。前阵子我弟弟接她去深圳住了十几天，因为我弟弟阳了而且症状很重，没法儿给她做饭吃，她自己也不爱做，就吃点饼干蛋糕之类的……她特别爱吃饼干……结果回到广州我发现她的手指甲盖发紫，就跟她说可能又有点儿贫血了。她就问我外边儿有没有樱桃卖，跟我说樱桃补血，都是从手机上看来的。我赶紧给买回来，难得听她说句“我想吃啥啥，我想要啥啥”。她有微信号，也看快手、抖音，逮着啥看啥，现在不都是大数据推荐信息吗，她积累的那些东西，我看很多都是那种耸人听闻的，血红月亮、世界末日之类的。

A：我觉得老看不过眼儿，累眼睛。

Q：画展你高兴不？

A：我也不认识谁是谁，反正都跟我打招呼了。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为烟囱作品

专栏

在中国这算事儿吗？” | 接力访问 009 烟囱

杨樱 | 接力访问

他说的是他的微店因为涉及裸露被关了这事儿

关于漫画家烟囱，一大半我知道的事情都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互联网上关于他有很多解说和介绍，毕竟在提到“独立漫画”的时候，烟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独立漫画”这个说法，当然也要在主流漫画的对照之下才会成立，否则它就和很多小众艺术一样，就算出现也很难被理解。其实漫画已经不是主流艺术形式了，它更多被看作某种消遣。我听到的关于“主流漫画”的解释，是“像爽文一样的那种网络漫画或者商业漫画”，而“独立漫画”的定义就更抽象：不商业（赚不了什么钱）、有点“刺激”，充满了作者自己的想法。因此当烟囱“被看见”的时候，被问得最多的还是画面的灵感，受到什么样的作品的影响。他既被当作一个创作者，又被当作一个传播者。

关于漫画家烟囱我知道的事情如下：

- 1、他有一个公众号叫做“我爱猫咪咪爱我”。2022年底的时候，他在公众号说他的微店被关了。
- 2、他有一只黄猫，还有一只黑白猫。这两只猫都出现在他的漫画里。经常出现在他漫画里的还有他老婆和他自己。
- 3、他的漫画不负责讲故事。就是那种分了很多场景安排了很多情节来告诉你起因经过结果的故事。
- 4、但是你能从他的画里感受到直观的生活。至于是哪种生活，得看他目前手边正好进行的是哪种生活。



5、他也可以输出一种不属于他的直观生活。比如有一次跟手工杂志《刺纸》合作，里边有一篇写快递员的小说，邀请他画漫画。于是他就去了小说里提到的北京通州，拍了几张那里的照片，然后根据这些照片画了画。烟囱的能力在于，他能让你觉得这样的场景他特别熟悉，但其实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6、其实不能说烟囱画的画都是毫无情节的。他接受各种采访，大家都会提到的有他吐槽画廊老板的“乞丐系列”，讲述一个无法出售作品的漫画家和给他做画展的老板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有点讽刺效果。



7、大家提到烟囱的时候都会提到中国缺乏对漫画本身的尊重。大意就是这种艺术形式在主流市场排不上号。就好像小说一样。仿佛一种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东西注定是不够严肃的。

8、但是烟囱是一个可以在画廊里卖出作品和举办个展的人，他还能上台演讲“作为漫画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和画廊的合作从他毕业就开始了，他很幸运，遇到了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成长的画廊老板，这是他得以留在北京，并且不需要额外做一份兴趣之外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前提。

9、当然，这可能和他是1983年出生的人有点关系。他从中央美院毕业那会儿，北京的生活成本远低于现在，而互联网的用户质量远高于现在。烟囱在各种漫画论坛和豆瓣都发了自己的作品，用创业的话说，他是积累过“种子用户”的人。

10、但是用户和创作者本人不是一步一相随的。这么多年以来，烟囱除了在画廊出售作品，还办一本叫做《叙事癖》的漫画杂志，然后做一个叫做“乞丐出版”的自出版项目。前者刊登他和其他独立漫画作者的作品，后者也类似，有时候你可以在艺术书展之类的场合看到。



11、结合第8点和第10点一起看，烟囱的身份就有点儿复合：他既在“圈子”里，按照艺术商品化的游戏规则活着；又在“圈子”外，有那么一点“地下”的意思。

12、微店会出售他自己和别的艺术家的作品。最近被关了的原因是因为后台审查发现他的作品有裸露。

13、在“裸露”这个问题上他碰了不止一次钉子。有一回印厂因为作品有裸体拒绝了合作。于是他在微博发起过一次征稿，要求之一就是作品里的人“别穿衣服”。

14、他用布面丙烯画漫画。有一些尺寸相当大。最近未完成的一幅宽度有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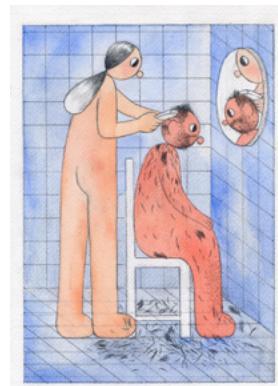
15、很早他就把作品寄到国外去。最近的尝试则是把自己的漫画书寄到国外漫画书店去销售。他说这件事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如果被海关拦下了要支付不算便宜的关税。

16、在画廊消费他作品的人，和看他的漫画书的人常常不是同一批人。

17、他觉得互联网的美妙之处就是你从来想不到全国都有哪些他闻所未闻的地方存在他漫画的读者。

18、关于店被关了这件事，他说，“在中国这算什么事儿？是吧，这都不是事儿。”和他的漫画一样，你会觉得他的豁达里面有点东西，但是他没有提，你也不会问。

19、微店被关了之后，他在孔夫子又开了一个。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挺多的,现在画的画特别大。有6米多。然后我的杂志还在修图,可能还有一本书要出。反正全是画画的事,但都还没做完,还在进行中。

Q: 画画就很有趣了,是这样的吗?

A: 画画这事儿已经让我很开心了。但是我也会找点别的事,比如做出版,做完之后把这些书卖到全世界的书店里去。就会联系国外的书店。就是写邮件,在Instagram上联系,给他们寄过去。

Q: 你有什么平时会担心的事情吗?

A: 就是印刷环节会出问题。就技术问题。其他的你控制不了,就像我的店被封了一样这事儿你控制不了,担心也没用。这是你无法预料的事情。

Q: 这么多年你画画有什么脉络吗?

A: 我觉得大家把这事儿想得太复杂了,就跟你去做体育运动一样,你觉得有意义,那是因为你觉得身体健康是有意义的,然后有人觉得减肥有意义,分泌多巴胺有意义,或者跟朋友一块儿玩儿是有意义的,但其实都在做一项运动。

我觉得画画也是一样,你干好多事儿,夹杂好多东西在里面,创作了一个作品,把它分享给别人,别人给你一个认真的回馈。就是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交杂在一起的。

我从来不担心自己表达的东西会有问题,因为它肯定是我的东西,带有我自己强烈的判断才出来的,我有一段时间会画一些写实的,然后也会画一些跟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就东搞搞西搞搞,因为老做一件事特别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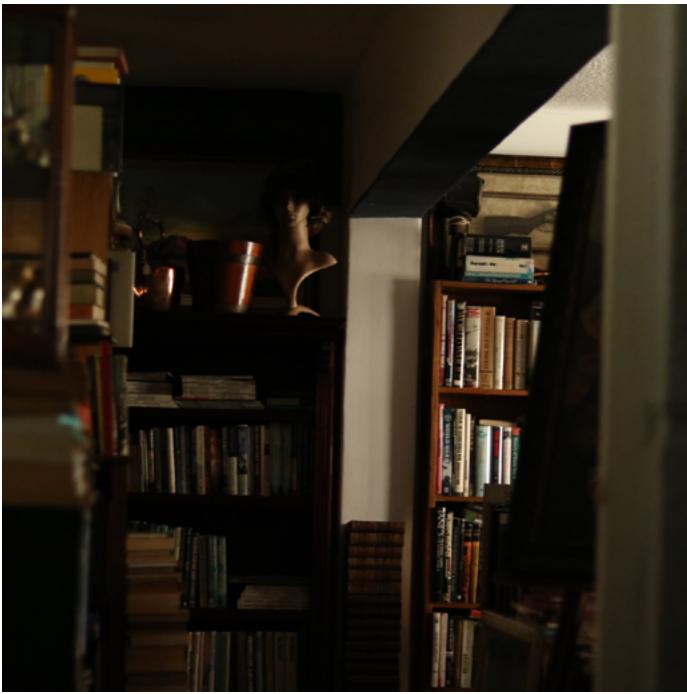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Alicia Christin Gerald](#) on Unsplash

专栏

“我有很长的人生阶段 在一个深井之下” | 接力访问 010 王淼淼

杨樱 | 接力访问

从视“优秀的人生”为理所当然，
到推翻自己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切。

很多年以后，王淼淼还在培育自己的安全感，不是设定在日程里的那种上课式的“培育”，而是有时连她自己都很难察觉的、几乎变成潜意识一部分的“培育”。无论遇到什么人，无论做什么事，甚至只是脑海里的一些念头，她都会在内心开启对话一部分来自过去的自我，负责否定和攻击；另一部分来自现在，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去的思维方式框限住，要去寻求更多可能性。

这套机制深植于王淼淼的内心，如果看最积极的那一面，就是她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套机制的存在，尽管她还没有走出“我是一个困惑综合体”的评价，但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已经是过去多年的努力成果之一。

王淼淼 1988 年出生于自贡市富顺县板桥镇。现在为一个叫寻麓书馆的机构工作，负责社群运营。这是一家房地产商下属的社区图书馆，位于成都南郊，和很多互联网词汇一样，“社群”含义模糊空洞，往往什么问题都不说明。不过推荐王淼淼的科幻编辑戴浩然曾经在寻麓书馆做过一次交流。作为作者，他惊讶这里的交流者有罕见的认真：“那天来的所有人都读了书，还有读书笔记！”

对于“开星群”的目标，王淼淼有很多设想。她反复提起的是足够包容度的环境、多元的价值取向以及真实的人与人的接触。这都是她和自己反复对话之后觉得重要的东西。

王淼淼在高二那年休学一年。无论是休学意愿还是休学这件事本身都对她打击巨大。父母长期分居两地，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对生活充满了不满。王淼淼和弟弟目睹父母的相处模式：每年见面一个月，前面半个月扮演和善，后面半个月剧烈吵架、指责、埋怨。他们没有人知道如何了解孩子的需求，父亲放手不管，母亲则充满了控制欲，要求他们必须听话。“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在父母那里也有清晰的定义，违背这个定义便是不可以。”母亲要求王淼淼考出好分数，如果她做得好，那下一次她必须做得更好。

这些观念当年有多深扎进王淼淼的生活里，现在她就需要用多大的力气把它们清理出去。这个过程复杂之处可能还在于，因为长期的压力，王淼淼对任何她认为的“过失”都显得无比自责。比如休学。休学之前，其实她就发现了自己不对劲的前兆。有一天她在学校图书馆看书，大概一个半小时都在看同一页。“突然我感受到了，为什么我在看同一页！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正常。那个时候可能是我自己有某种意识开始萌发，没多久我就开始出现身体症状了，比如脑袋抽动。”她会说当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有很多座山”，一旦想思考，

就有很多座山挡在前面。

她在一所全国重点中学读书，学校把高考班分成平行班和火箭班。等到王淼淼回去重读高二那一年，学校又分出了“超级实验火箭班”，年级排名前 50 的学生都在其中。或许是因为已经学习过一年，王淼淼以最后一名的资格进入了这个班级。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进去之后压力就非常大，从那开始，我真的感受到人生巨大的压力。也跟不上他们的节奏，受挫感也很重……那个班的学生都上了很好的大学，前面清华、北大，递减到第 48 名都是上的四川大学……而我不在其中。”

不够优秀，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重新变得优秀又困难重重。王淼淼的自责在不断叠加，焦虑也变得越来越深。她一开始只是恐惧自己脑子里的“那些山”，“它会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适应社会。因为它基本上拿掉或者叫做压制了你的学习能力，你的适应能力，整个就没有了，某种意义上就是废了，你知道吗？”而后她渐渐发现，自己其实在父母灌输的“优秀人生”里陷得太深了，唯一的解脱方式就是不断跟自己对话。

“我可能会观察，会跟我自己对话，不断对话，（这）是我身上所谓的症状一步步缓解的原因……我其实五六年前都是处在一种巨大的困惑里。我之前有份工作，在一个高端商场做客户服务。我当时也很诧异，我脑袋近乎于废掉的状态，为什么这个工作居然我做得还行。我领导对我还挺多认可的。”

“我觉得我掉进了一口深井里面，（这是）我当时跟我自己的一个比喻。在井口之上，你努力了、可能会被人看到、也会受到一定激励，就像我当年，就算我是死读书，考到好分数也会受到激励。可是我有很长的人生阶段是在一个深井之下，无比黑暗，你努力先爬到井口，这个过程真的没有人看到。”

包括“开星群”在内，寻麓书馆这份工作加速了王淼淼观察和解答内心困惑的进程。这在她的意料之外，也是她的幸运之处。书馆经常会举办读书交流会，王淼淼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每个人对于同一个事物的看待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很不同。她还记得读过《精英的傲慢》之后自己的感受，“我们的成功方式，是被学历这样一个身份极大程度定义了。当明白了自己的思维惯性诞生的原因，再来调整思维，这次终于可行了。”

作为一个受益者，王淼淼希望让这种交流以某种形式拓展出去。她会逐渐修改“开星群”入群要求，一开始是在报名表里分享三本当年读过的书籍，如果都是功利性的书，该报名者就不会被接纳。其次是确定共创意愿，后来还加上了阅读频次。“开星”被定义为一个人文知识共创社群，来的人除了对通识教育和人文感兴趣，还得愿意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和其他人分享点什么。思考必须流动起来，也许这才是社群的价值。

她也会观察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无论是她自己观察到的，还是别人主动倾诉的，她都像推理自己的思维一样条分缕析地去思考他们处境。其中有一个共同的角度，就是规训和单一价值观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自信缺乏。她甚至开始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和父母。“了解越多，当越来越发现，父母那样并非个例。自己这样，也并非个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的，似乎是可以被仔细探寻下的。‘实现个人价值’、‘尊重人本身’、‘人拥有哪些权利’都是可以被好好仔细思考的……而人有自己喜怒哀乐，是不是可以被允许，而不一定只有表现得开心，正能量，才可以是存活的方式。”

每一次自我总结都像是一次自我鼓励。她依然对周遭环境和自身有很大的不确定感，但要大大好过以往。

“对我来说，不努力，就真的挺焦虑。我太习惯活在被需要中。而我自己自从高二开始，身体就一直在拒绝太努力。而偏偏我的生存模式又是努力。这当然是一道循环题。所以，看见人的可能性，相信不是只有一种状态有价值，通过多元看见人的多样存活，尊重人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一种价值（取向），对人来说，就是牢笼。是可以把人送到精神深渊的自我毁灭剂。”

Q：你最近在做的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A：开星文化日吧，其实已经准备好了，但大家都阳了，就延期了。

Q：具体说说它是什么？

A：一个下午，八场主题分享。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有女性电影，有探讨余华的小说，有探讨“城市生活的异乡人”等等，还有心理疗愈，分享者都是我们的成员，因为他们有些本身也在做这方面专业，然后组织者也是我们成员。然后还有 12 个成员是以主题摆摊的形式来做文化交流，他们会带一定的书籍或者相关的物品，你可以购买，也可以只交流，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微观史读书会，现场他就会有一些微观史相关的书籍展现出来，也做一些互动交流，然后也展示一下之前做过城市行走等等。

Q：做“开星群”你最初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A：一开始我都在想这个社群要怎么做，觉得可能要重新找一批人，然后我猛然想起来：我们先成为第一批人不可以吗？头两个月，跟大家一起尝试去做共创项目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共识的存在，突然就放心了。我会觉得，在共创的过程中，不小比例的一撮人奠定了整个走向。

Q：有什么有趣的人推荐吗？

A：做创新教育的池晓。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隔夜的妆没有卸，好像

还在纠缠于上一段感情。



L.R.

陆冉的画很有意思，它会让你想到朱德庸、詹姆斯·瑟伯或者类似的画家，但是要更细腻、更情绪化。或许是自己的公众号“LuRan”里更新的缘故，那里发布的作品都带着一些明确的想法——你知道有些漫画作者（比如烟囱）并不喜欢说话，画作在那里，具体要说什么你自己感受就可以了。但陆冉是一个喜欢说话的漫画作者，有些时候甚至会为写篇文章或者一首诗，有的时候还有创作日记，觉得自己很差劲之类。无论是文字还是风格，她是一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作者。

陆冉追求这种不确定性，准确说，她讨厌确定性。“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追求一切原生的东西，我想怎么写，我不想遵照任何规则去做事情，就是我恨不得一切事情都是从零开始。”

“如果说我想颠覆一些规则，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我会希望我能完全从我自己出发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从‘应该怎么做’来做这个事情。”

画画也是一样。陆冉没有接受过科班训练，她画漫画是因为看到别人做了类似的事情。即，画画不是一个职业选项，不管本职是什么，只要想，一个人随时可以去画画。媒体的渠道已经打开，画作可以上传到 Instagram 或者 Pinterest 这样的平台，慢慢吸引自己的受众，或者被更系统的机构运作者发现。对陆冉来说，意识到画画可以成为自己的表达出口之一，是在 2013 年那一年发生的。

当时她在 Vice 中国工作，写艺术报道。Vice 是个调皮的生活方式媒体，有时候也被称为青年亚文化媒体”。尽管也报道科技、音乐、艺术、性少数群体乃至时装秀，但从不正襟危坐。陆冉被 Vice 的价值观吸引，“可以说，完全拯救了我，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就当了一个汉语老师，或者去国外当了一个汉语老师，然后肯定是过相对循规蹈矩的生活，不管在哪，肯定结婚。”她说的是她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的一般走向。

专栏

“对，就没有退休，也没有上班和下班” | 接力访问 011 陆冉

杨樱 | 接力访问

这不叫勇敢，因为并没有别的选择。

陆冉 2019 年辞职后第一个行动是减少开支，不打车不叫外卖，减少购物。她因此发现了一个让自己很释然的生活真谛：在钱这件事上，如今她只是省去了一个“先赚来再花掉”的步骤——以前工作的确赚更多，但是为了缓解压力，也花得更多。

陆冉是 1988 年出生的青岛人，来北京上大学，然后就留在了北京。她没有也不打算买房、没有买车、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很多人会把这样的生活状态看作一个前提，“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压力才小、才敢辞职、辞职之后才可以轻松过日子呀”，不过在这个栏目采访的有限人群里（他们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出现），类似这样的生活往往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一个人选择规避掉这些社会约定俗成的事务，必然会承担与之相当的风险。其中最显著的，当然是相对较少的物质安全感和更大的社会压力。

不过陆冉额外要承受的压力和她自己要做的事情更有关系。她是一个漫画作者。烟囱那期访谈曾经谈及过所谓的商业漫画和地下漫画，陆冉哪个圈子都不属于。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画的到底是什么。

“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我经常觉得我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我没有一个什么 IP 一样的东西，没有一个大家一眼能识别的个人标志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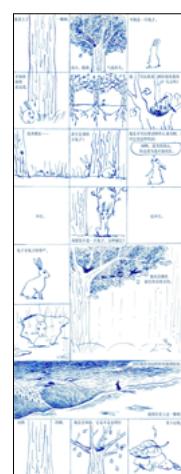
回头来看，陆冉写文章的学习过程和她画漫画的过程其实非常类似。“前几年都是快乐地在做一些探索发现。实际上，我虽然学的专业和语言文字有关，但是在真正工作之前，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是不行的。因为写作需要洞察力，但是在整个上学期间，我没有任何形成观察与总结的能力，我是那种上学的思维。”

陆冉正式开始画漫画要到 2019 年，2016 年也画了一些，就是从那之后她开始发现画画的时间和 Vice 工作的时间产生了拉锯。她决定辞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开始审视自己画的东西都有什么特点。

“我画画的初衷是表达一些感情，或者有一些什么想法，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形象来进行表达。我不追求华丽的画面，而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叙事。对，如果我要做一个叙事，我又把每一格都画得非常华丽的话，我讲这个故事就很费劲，所以我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画下来。”

于是那种寓言式的漫画、讽刺漫画之类的风格就在陆冉的画作里占了越来越多的比重。她说她小时候也大量模仿过日漫，但并没有持续下去，反倒是四格漫画让她更感兴趣。与其说陆冉致力于某种画风，不如说漫画始终是她表达想法的一个出口——她的说法是“创作欲”。

“我有一天也不一定真的还是画漫画，现在阶段是，但是总体推动我的就是一种创作欲。这就是我最大的追求，如果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同时做我的创作，这样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在做的事情让我没有办法进行自己的创作，我觉得就不行。”



现在陆冉还是靠撰稿获得收入。她也不在意自己的漫画是不是会有明确的职业前景。她觉得这不叫勇敢,因为并没有别的选择。“沿着一条确定的路去走,对我来说就是更痛苦,我现在还更舒服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规划太多。因为有了太多规划,你变得很不灵活,不能及时应对新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用一些动物性的直觉去处理就会比较理想。但是前提是有没有挣钱和买房这种大目标,只是为了活着而已。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可怀疑的人生了,你的人生就很明确在那里。”

“对。就没有退休,也没有上班、下班,也没有周末和平日。”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有段时间我突然就很想跟外人交流,和你做的这个事情有点像。去找不同的人,普通人,跟他们约在一个地方就跟他们聊天就聊现在的状况,他可能是个很主流社会里的年轻人,但我就很想知道自己现在这些人对世界各种事物的看法是什么,我就想跟每一个人去聊这样的天,然后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先聊了再说。

A: 开始了吗?

B: 还没有。我怕的是我坚持不下来。

Q: 你具体想怎么做?

A: 我当时想的是,我是暴露身份的,对方是匿名的。比如说拿我的公众号开始约,这样的话大家肯定知道是我公众号背后那个人,他们只要按时间、地点到达那个地方,坐下来开始跟我聊就行了。我“引诱”别人出来的“回报”就是画张像给他,我拍一个照,自己留一份,给他一份。

Q: 为什么你觉得“了解大家在想什么”是有意思的?

A: 一个是我觉得我可能跟这个社会脱离了太久,我想象中的人是不是太刻板了。另外一个我很想进行一种交流,面对面那种有效的交流。我想进行一定程度的辩论,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想两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看看这场对话能导向一个什么,也不是想要说服对方,就想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话,可能是这样。

我想跟 Ta 聊对各种事情的看法, Ta 对人生是怎么看的, Ta 的目标是什么,我可能会稍微挑战一下,问 Ta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那样做会怎么样……我真的好奇大家现在都在想什么,自己也想被挑战一下。

Q: 如果去做的话,你会为什么而担心?

A: 跟人无话可说,或者采访了三个人,所有人都说了一样的话。但是毕竟没聊的话也就不知道是怎么样。也许要有一个年纪的限制,因为到了一定年纪以上,被生活规训的程度就会更高,那个时候想要撼动什么是非常难的, Ta 可能会不加思考,就继续把他自己那套说出来,跟 Ta 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但我觉得年轻人有可能他会稍微真正听一下,你这个奇怪人在说什么。

Q: 想推荐什么有趣的人吗?

A: Alexwood,一个做女性主义播客的女生,最近搬离北京开始一种实验性的生活。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惠允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大大出乎 Jiro 意料。

“去过那场派对的人，都一直记得，非常热血。对，因为那种年轻人能带出的能量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东西能 copy 的，大家都是为了一样的目标，真是让我很想哭。”



Bastard, 对外宣传叫做“新中式小酒馆”，其实是 Jiro 和 Michael 以往做的事情的一个实体延伸。就好像上面提及的这场叫做“广东俱乐部”的派对，如今也可以放在自己的地盘上。

他们做过的市集、快闪和派对——在朋友开的酒吧，合作方租下的船舶馆，甚至是解封后的上海街头绿地——都以“东西”这个机构的名义进行。“东西”其实就是 Jiro (东) 和 Michael (西)，他们把自己熟悉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又蹭点“东西”在中文里面多重语义的调皮。到开出“坏东西” Bastard，这个地方的目标变成“更专注表达中国文化”，虽然还是会举办各种各样看起来不太像一般小酒馆会办的联名和活动，但这里更像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一种表达，就好像他们计划想写的那本书一样。

在设想里，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外国人看的。Jiro 觉得，国外对于中国现行的城市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家都知道在发生什么，如果我做调查，我也会知道，可是所有人在问到中国时，饭店、展览、流行……都只有问号、问号。”

那本书还没有明确的框架，但有两个是一定会出现的，一个是饮食文化，另一个是 Jiro 和 Michael 在中国去过的各种地方。他们称之为调查，然后把自己发现的有趣事物像佐料一样加入到策划当中。就好像店里的苗绣靠垫，最初只是贵州凯里某个市集上一块被清仓甩卖的布料，绣布的主人不想再做，但 Jiro 和朋友都觉得她的刺绣完全不同于传统纹样，那些睁大眼睛的小人和场景像是插画，魔幻感强烈。于是全部买回来，找裁缝裁成合适的画片，改制成本或靠垫套。从这个层面看，“东西”做的活动和小酒馆，都是俩人过往经验的杂糅发酵。

开一家餐厅是这对伴侣目前为止做过最冒险的事情。Chris 推荐 Jiro 来做接力访问的时候，理由之一就是她把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变成工作的一部分，另一个理由就很现实，就是在经历 2022 年之后，在这么多人都离开和决定离开之后，他们开启了自己新的事业。

Jiro 对此的回应干脆彻底，“因为封城的时候，这里已经装修到一半了。就是说当时要走的话，所有钱就都砸了进去。我们已经因为疫情延误了很久，而且也都不年轻，如果现在不试的话（可能就没有类似的机会）。而且我觉得，如果有东西要失败的话，尽早失败，这样你才知道失败的原因，之后才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她才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想要学更多。”

如今他们踏入了餐饮业。试录几道 Bastard 菜式：烤舞茸树花树皮、云南玫瑰伊比利亚叉烧、加了芝麻酱和奶油的拌面、虾多士，还有红烧苹果。食客大多是可以熟练使用“中餐 fusion”评价体系的人，有人说“辣菜味型单一”，也有说“取了一些味型元素进行放大”，也有把这里的菜和另一家小酒馆 Juke 做对比的，因为 Michael 是那儿的主厨。总得来说，不少都是对“外国人做中餐”有备而来的人。

Jiro 认识 Chris 是因为 Michael。后两者一度就中餐技术培训聊得很多——这件事听起来耐人寻味，因为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很认真地讨论如何从技术和人力培训的角度推动中国菜。他们都想知道作为一个跨文化学习者，如何才能更好地学习中国菜。另一方面，为何中餐明明包罗万象，魅力无穷，但整个文化及其从业者，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比西餐弱势，从消费心态到市场价位皆是如此。极少数人才能脱颖而出。

对此 Jiro 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或者亚洲的很多家长观念非常传统，认为厨师就是一个低下的工作。孩子学历很重要，考试一定要满分，他们就没有想去推动其他在生活方式里重要、或者更有创意那种技巧。就要看成绩、是不是在大公司上班，对，或者你是公务员。”

Jiro 自开始工作就没怎么进过大公司。不过最初让她来上海的工作机会却是一个例外，而且说起来很曲线救国：她想看看新就职的这家酒店管理集团是不是能为想开一家精品酒店的自己提供经验上的助益。

这个想法有旖旎的那一面：自从在墨西哥看到那些从建筑材料到经营创意都就地取材的酒店之后，Jiro 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一家类似的，把那些看起来不像是一家酒店会做的事情一起装进去，而不只是提供住宿。然而她遭遇到了更现实的那一面：新工作给她的只有大公司政治。

精品酒店和餐厅，一直都是 Jiro 想尝试的两个方向，各种机缘之下，她现在做了后者。就好像菜单，一切规则好像都得琢磨着来。包括厨师招聘。

我在“铛铛铛”的砧板剁肉声里问 Jiro，什么样的厨师符合 Bastard 这种中西合璧菜单的要求。“他们背景都不一样，我会让他们先试，看一下喜不喜欢做这种菜，或者是不是他们想要工作环境。我们的副厨当初和他朋友来试菜，朋友就直接走了，因为只想做法餐。他就觉得有趣，我觉得他也是有好奇心的。”

专栏

“我觉得今年 我想要更多自由” | 接力访问 012 Jiro

杨樱 | 接力访问

她在艰难一年开出一家餐馆，
不是因为有信心，而是命运至此。

在 Bastard 和 Jiro 告别的时候，她的同事给她端上来一碗青菜肉丝盖饭。已经接近晚饭时间了。开餐馆的人或许就是这样，日常几乎不自己在家做饭，如果不是在店里吃，就在外面吃点饺子或者面条之类，还得在上班路上。

Bastard 应该怎么归类，Jiro 略微斟酌一下，还是说“小酒馆”。她不赞成直接称呼其为 Bistro——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词这两年在上海被用得过于广泛；另一层原因，可能是 Jiro 还在平衡自己心目中的餐馆和现实中开出的餐馆之间的感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她和伴侣 Michael Janczewski 其实很想开一个更精致的餐厅。Bastard 深灰色和艳粉的主色调，加上苗绣靠垫和灰暗灯光，看上去野性而朋克，绝不会让人不由自主端起姿态吃饭。大家是来喝酒放松聊天的。

餐厅、饭店、Bistro，又或者是小酒馆，作为食客，大可以把这些名字统统拢到一边，只看这家小馆子的氛围和食物。Bastard 在胶州路一条巷子深处，不过从一步一餐馆的延平路也有入口，只要你勇于从看起来就是后厨小巷的小铁门里钻进去。

Jiro 因为摆摊做 Taco 认识现在的房东，后者改造并运营 Bastard 所在大楼（据说原本是青年旅舍），也在上海做了不少时髦的园区。Taco 这种墨西哥（脆也可以不脆）饼其实接近于街头小吃，在一手大小的饼底不变的情况下，上面堆叠的东西可以从手撕猪肉到番茄牛油果之类各种各样，想放什么放什么。吃的时候需要熟练地塞进嘴里，如果没有信心，最好不要在社交场合边吃边聊天。

不过 Jiro 的确常常把 Taco 作为社交利器之一。这也是她此前最擅长做的事情：用音乐、食物和某个充满氛围感的概念，把一群人召唤到一起。如果把这种能力叫做“活动策划”，就好像又进入了 Bistro 语境——是否所有“小菜 + 酒”都叫 Bistro？Jiro 做的事情另一重识别性在于，好几次的主题都和粤语区的文化有关。她 1992 年出生在东莞，又在广州和香港待过好几年，在定居上海之前，粤语区的文化的确是她浸润最深的那一种。

“因为朋友都会来，他们就知道你做的是不是你会想做的事情。”她这样解释自己策划的各种活动为什么总是有吸引力的原因。2022 年一月，她在 DADA 酒吧办过一次派对，找了朋友摆了各种小摊，音乐选了 1980 年代流行的香港 Disco，其中有好多现在已经很难听到。当晚陆陆续续来了三四百人，为老歌所感染，反复跟唱，场面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其实没有……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终于能出国了。

Q: 出门这件事对你来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A: 我觉得今年我想要更多自由。有更多时间旅游，才会有更好的灵感。我想今年能多去一点地方。开餐厅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压力源非常多，对，去年封了快两个月，大家都很抑郁，压力又很大，很多东西叠加起来，去年真的是太恐怖了。

Q: 推荐你觉得有趣的一个人?

A: 苏东威，之前和我一起做很多活动，学社会学，现在在帮朋友看酒吧。很有趣的人。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惠允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五，2023.01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